

讀必部幹

本圖是聯主製
社經司理志誠
命原與送國
字書源通主事
編教統(政人)的
覽基義主事列論



社 放 解

552.943
347.6=70

讀必部幹

本資是義主國帝
段階高最底義主

命革與家國

中動運義主產共
病稚幼「派左」的

礎基義主寧列論



3 1770 3989 2

社放解



A171193

總目

| | | | |
|----------------------|-------|---|----|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 (I) | — | 一五 |
| 國家與革命..... | (II) | — | 一五 |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 (III) | — | 一六 |
| 論列寧主義基礎..... | (IV) | — | 一七 |

著 寧 列

段階高最底義主本資是義主國帝

唯 真 譯 校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係根據蘇聯外國文
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所出中文版翻印。

出版局聲明

本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是按莫斯科馬恩列學院一九四六年刊印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所載原文譯出。

爲便利讀者瞭解起見，本書後面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要註釋。凡列寧自己所加의脚註，概未標明註者是誰。

目 錄

| | |
|-----------------------|-----|
| 序言..... | 七 |
|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 九 |
|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 一八 |
|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 三六 |
|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 六二 |
| 四 資本輸出..... | 八二 |
|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 八九 |
| 六 列強分割世界..... | 一〇一 |
|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 一一七 |

| | | |
|----|-------------|-----|
| 八 |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 一三三 |
| 九 |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 一三五 |
| 一〇 |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 一四四 |
| | 簡要註釋 | 一五五 |

序 言

我這本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在蘇黎支寫成的。在那裏的工作條件下，我當然時常感到了相當缺乏英法文參考書，尤其是十分缺乏俄文參考書的痛苦。但我對於霍柏森所著論帝國主義的一部主要英文著作，是以我認為該書確實值得的那種注意來利用了的。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預計到要經過沙皇政府檢查的。因此，我不僅必須極嚴格地局限於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在敘述我對於政治問題所必須作的幾點意見時，不得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

在目前自由時期，閱讀小冊子裏那些因顧慮到沙皇政府檢查而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被壓得不能舒展的頁子，真是很覺難堪了。當時，關於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社會沙文主義

(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完全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工人運動底這種分裂是與帝國主義客觀條件有關等等問題，我都不不用一種『恭順』口氣去說，所以現在我祇好請注意這種問題的讀者去看我那部快要再版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國外論文集。此處要特別指出第一一九至二〇頁上[●]的一段文字：在那裏爲了要用能受檢查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轉到他們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與他們鬥爭是作得很不徹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底兼併政策，我曾不得不舉：日本做例！細心的讀者，當然不難用俄國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基發、布哈拉、愛斯特蘭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區域來代替高麗。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除非加以研究便絲毫不能瞭解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的那個基本經濟問題，即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彼得格拉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我在俄文版序言中已經說過，本書是在一九一六年間預計到要受沙皇政府檢查所寫成的。現在，我沒有可能來將全部原文改造一番；而且這樣來改造，也許是不適宜的，因為本書底基本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要根據不容置辯的資產階級統計方面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承認的事實，來說明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初期，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國際相互關係的總結情景。

而且，把本書原文保存不加改造，這對於先進各國許多共產黨員甚至是頗有益處的，因為他們看了這本被沙皇政府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例如在現今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

前，幾乎全體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但他們還是可以——並且必須——利用那一點點還留給共產黨員的公開活動機會，來揭破社會和平主義者所持觀點和『世界民主』幻想絕頂虛偽的性質。至於我想在本序言中說到的，便是對於這本受過檢查的書所作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了。

一一

在本書中已經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說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劫掠的、強盜式的戰爭），是為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及財政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須知，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為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之總和。

我在一八七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分割情形比較表（第六章）與一九〇與一九一三年全世界

鐵路分割情形比較表（第七章）中所引用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可否認的綜合材料。鐵路情形是資本主義工業中最主要部門，即煤鐵工業底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底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在本書最初幾章內已經指明了鐵路與大生產，壟斷組織，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銀行，財政寡頭制等有密切的聯繫。鐵路網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不平衡，鐵路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便是全世界範圍內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底總結。而這種總結也就指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尚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而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事業：因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大學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情的。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縷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爲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

以小有產者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原由資本家及其報紙用來欺騙工農羣衆的口號，都早已成爲過去的了。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瓜分這種『賊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

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賊物而進行的戰爭。

三

君主制的德國所強迫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及後來『民主』共和制的美法與『自由主義』的英國所強迫簽訂的那個更加殘忍卑鄙的凡爾賽和約，替人類盡了一種極有益處的義務：這兩個和約，把那些受帝國主義僱傭的刀筆苦力以及那些雖然自稱爲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讚美過『威爾遜主義』，硬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與改良的反動市僧，都盡行揭穿了。

因英德兩方財政資本強盜爭奪賊物而發生的戰爭使幾千萬人死亡殘廢的事實，以及後來簽訂的這兩個『和平條約』，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喚醒數千百萬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蹂躪、所欺騙、所愚弄的民衆。於是，在大戰所造成的全世界破壞狀態基礎上，便發展着全世界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不管它會經過怎樣長久嚴重的周折，但結果總是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並獲得勝利的。

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在一九二二年所估計的戰爭，正是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戰爭，而絕對不是什麼一般戰爭（因爲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並且還有革命的戰爭），——這個宣言已經成爲揭露

第二國際英雄們底全部可恥破產及其一切叛變行為的紀念碑了。

因此，我現在把這篇宣言轉載於本版附錄中，並再三請讀者注意：在宣言內有許多地方明白確切而直接地說到當前這次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聯繫，而第二國際英雄們總是極力躲避這些地方，正好似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底『最著名理論家』與領袖（在奧國有鮑威爾及其同流，在英國有麥克唐納等等，在法國有湯姆等等，等等），以及許多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和傳教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解體腐化底結果，另一方面是全部生活環境都使其受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俘虜的那些小資產者所持思想底必然產物。

考茨基及其同流底這種觀點，正是表示他們完全離開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擁護過，並且是他和社會黨內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米勒蘭、漢德曼、葛培爾茲等等）作鬥爭時特別擁護過的

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時『考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上到處都與極端機會主義者（經過第二或黃色國際）及資產階級政府（經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結成了實踐上政治上的聯盟，也就不是偶然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發展着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都不免要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底理論錯誤。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與一般所謂『民主主義』，還非常厲害地流行於全世界，這些思潮雖毫不假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目，可是它們完全和考茨基一流人一樣蒙蔽帝國主義矛盾底深刻性以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那個革命危機底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和這些思潮作鬥爭，而把那些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千百萬多少處於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過來。

五

關於本書第八章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還要說幾句話。我在本書正文中已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考茨基底戰友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法亭，比英國公開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了

一步。現在，整個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這兩個思潮間的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事實，也同樣暴露出來了：在俄國有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幫助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在德國有謝德曼派和諾斯克一流人協同資產階級來反對斯巴達克團；在芬蘭、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這一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現象底經濟基礎何在呢？

就在資本主義最高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與腐化。在本書內證明了，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分泌出了極少數（其人口少於全球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就是按照最『慷慨的』和誇大的計算，也少於五分之一）特別富強的國家，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照戰前的價格與戰前資產階級的統計來說，每年從資本輸出上所獲得的收入計有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之多。現在當然是更大得多了。

從這樣巨量的額外利潤（因為這是超出資本家從『自己』國內工人身上榨取的那種利潤額以外所獲得的利潤）中間，自然是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進』國裏的資本家，也就用這種額外利潤來實行收買他們，用數千百種方法，直接與間接的方法，公開與祕密的方法來實行收買他們。

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有不少一部分的人，是必然要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站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公社社員』〔1〕的。

不懂得這一現象底經濟根源，不估計到這一現象底政治與社會意義，便絲毫也不能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當前社會革命底實踐任務。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從一九一七年起，這一點已在全世界範圍內證實了。

列寧 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

在最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以來，尤其是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之後，新舊兩大陸上的經濟刊物以及政治刊物裏，日益常見地運用『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來表明我們所處這個時代底特質。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英國經濟學家霍柏森所著的帝國主義一書。作者雖然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派與和平主義派觀點，即實質是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現時所持立場一樣的觀點上，但他把帝國主義底基本經濟政治特點，作了一番很好很詳細的說明。一九一〇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有俄譯本，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雖然作者在貨幣論問題上犯了錯誤，並且他有一些想把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但這本書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希法亭這本書底附題就是如此標法的）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其實，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

迹，特別是在許多專論這一問題報章雜誌論文中以及許多決議，例如一九一二年秋在赫姆尼茲和巴塞爾召集的兩次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裏，差不多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敘述的——或更正確些說——所總結的那些觀念底範圍！

我們往下就要用盡量通俗的文字，簡略說明帝國主義各個基本經濟特點相互間的聯繫和關係。關於非經濟方面的問題，不論它怎樣重要，我們都無法說及。參考書目以及其他註釋，因為並不是所有一切讀者都對之感覺興趣，所以我們將其載在本書之末。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資本主義最標本的特點之一，便是工業異常發展，生產集中於日益增大的企業的過程來得非常迅速。現代工業調查簿是說明這一過程的最完備最正確的材料。

例如德國，每千個工業企業中，僱傭工人五十個以上的大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個。在上述各年間，這種企業所僱傭的工人數目，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二，百分之三〇，百分之三七。但生產集中程度，比工人集中程度更要厲害得多，因為大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得多。關於蒸汽機和電力發動機的材料，便可證明這一點。若拿

德國所稱爲廣義工業，即包括商業與交通機關在內的企業來說，我們便可得到如下的數目字。在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三個企業中，大企業有三萬零五百八十八個，即只佔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在一千四百四十萬個工人中，它們佔有五百七十萬個工人，即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三九點四；在八百八十萬蒸汽馬力中，它們佔有六百六十萬馬力，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五點三；在一百五十萬瓩電力中，它們佔有一百二十萬瓩，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七點二。

爲數不滿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總數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二百九十七萬個小企業（僱有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即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一的企業，却只佔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巨大企業簡直擁有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幾乎一無所有。

德國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一千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有五百八十六個。它們所僱傭的工人幾佔總數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萬），而所擁有的汽力與電力，幾佔總數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貨幣資本與銀行（我們在下文還要講到這點），使這少數巨大企業底優勢更加強到真正壓倒一

● 按德意志帝國一九一一年年鑑 (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所載材料得出的綜合數字，見該年鑑第

切的地步，就是說，數百萬小企業，中等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事實上落到了完全受幾百個富豪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美國，生產集中的速度更加強大。美國統計材料特別提出狹義工業，並按全年產品價值份量把企業分成幾類。在一九〇四年，出產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大企業有一千九百個，佔企業總數（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個）百分之零點九；它們有一百四十萬個工人，佔工人總數（五百五十萬）百分之二五點六；它們有五十六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一百四十八萬萬美金）百分之三八。經過五年之後，即在一九〇九年間，相當的數目字已如下述：三千零六十個大企業，即佔企業總數（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一個）百分之一點一的企業，共僱有二百萬工人，即佔工人總數（六百六十萬人）百分之三〇點五，並有九十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二百零七萬萬美金）百分之四三點八。

美國全體企業底全部生產，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手裏！而這三千個巨型企業，包括有二百六十八個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產集中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便可以

● 見美國一九一二年統計集錄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第1101頁。

說是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因為數十個巨型企業彼此易於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為企業規模宏大，又使競爭受到阻難，而產生壟斷傾向。在最新的資本主義大經濟中，這一競爭變為壟斷的現象，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應當排除一種可能的誤會。

在美國統計上寫着：在二百五十個工業部門中有三千個巨型企業。看起來，似乎是每個工業部門中只有十二個巨大企業。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並不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巨大企業；另一方面，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是把各種工業部門聯合成爲一個企業，其中有些部門相繼製造同一原料（例如，由鐵礦鑄成生鐵，由生鐵煉成鋼，也許還用鋼造出各種製成品），而另一些部門又彼此執行輔助作用（例如，廢物或副產品的改製；包裹用品的生產等等）。

『聯合制碾平市場行市方面的差別，——希法亭說，——因而使聯合企業能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聯合制排除交易。第三，它使聯合企業能實行技術上的改良，因而也就能比「單純」企業（即非聯合的企業）獲得多餘的利潤。第四，它使聯合企業地位比「單純」企業穩固得多，因而加強它在嚴重蕭條（業務停

滯，危機）時期，即在製品跌價超過原料跌價時期的競爭力量。」^①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黑依曼寫了一部專論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因原料價格高昂和製品價格低廉而滅亡下去。』結果就是：『一方面只剩下幾個巨大煤業公司，每年產煤數百萬噸，共同緊密組織成爲一個煤業新迪加；其次，還有幾個巨型煉鋼廠連同它們的鋼業新迪加，也是與這些石煤公司緊密結合着。這些巨型企業每年出產四十萬噸鋼（每噸等於六十普特），採掘巨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大宗鋼製品，僱有一萬個住在工廠所建宿舍裏的工人，有時且擁有自己私有的鐵路和商港。這種巨型企業，便是德國鋼鐵業底典型代表。而且生產集中過程還在繼續不斷地向前進展。個別企業愈變愈大；屬於同一工業部門或屬於各種工業部門的企業相繼結合爲巨型企業的數目日益增加，而五六個巨大柏林銀行，便成爲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馬克思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在德國礦業中確切證實了，不過，這是專指工業受到保護關稅與保護運率保障的那個國家而言。德國礦業已成熟到可被剝奪的地步了。』^②

①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

②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Titans Gideon F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isangewerbe"), 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五六頁，第二七八頁。

這便是一個例外的誠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不得不得出的結論。這裏必須指出，他好像是因德國工業受到高度保護關稅保障而把德國當作例外情形看待。但這種保護關稅，祇能把生產集中以及企業家壟斷公司，如卡德爾，新迪加等等形成的過程加速而已。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自由貿易的英國，生產集中也引到壟斷，不過發生得較晚一些，並且所採取的形式也許是有些不同。請看列維教授根據英國經濟發展材料寫成的一部專論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的著作中所說的話：

『英國正因為企業規模巨大和技術程度很高而發生一種壟斷的趨向。一方面，由於生產集中的結果，必須在企業中耗費巨量的資本；因此，新的企業需要數量日益增大的資本，所以它們也就很難出現。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更重要），每個新企業，要想與生產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得出產為數極巨的過剩產品，只有在需求量非常增加時，才有可能使這些產品得到有利的銷售，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很低的程度，而使新工廠和各壟斷公司均感不利。』英國與那些用保護關稅促進卡德爾化的國家不同，這裏壟斷性的企業家同盟，如卡德爾與托拉斯等，大半祇是在互相競爭的主要企業數目減至『兩打左右』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裏，生產集中在大工業裏引起壟斷的事實，表現得十分明顯。』●

● 見列維所著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書 (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

五十年前，當馬克思著資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以爲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法則』。官場的學者企圖用統制辦法埋沒馬克思底著作，因爲馬克思用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證明了：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會引起壟斷。現在，壟斷已成爲事實。經濟學家們在那裏著作大堆大堆書籍，來敘述壟斷現象底個別表現，而繼續齊聲宣告說：『馬克思主義已被推翻了。』但是，英國俗話說得好，『事實是頑強的東西』，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總不能把它撇開不管。事實證明：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的差別，例如保護關稅或自由貿易的差別，祇能使各國壟斷公司在形式上或發生時期上有微細的差異，但生產集中引起壟斷，則是資本主義現今發展階段上的一般基本法則。

對於歐洲說來，我們可以頗爲確切地判明新資本主義完全替代舊資本主義的時間：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論述壟斷公司形成史的總結著作中，我們看到如下一段話：

『我們可以從一八六〇年以前時代舉出個別資本主義壟斷公司爲例；在這些實例中，可以發現出現今極爲常見的那種形式底萌芽；但這當然不過是卡德爾發達史前的現象。現代壟斷組織底真正開端，最早也不過

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壟斷組織發展史中第一個重大時期，是開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工業衰落的時候，一直延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按全歐範圍來考察問題，就知道十九世紀六十年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底最高點。當時，英國完成了建築它那種舊式資本主義組織的工作。在德國，這種組織已與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進行着堅決的鬥爭，而開始造成它自己的生存形式：

大的轉變是開始於一八七三年的破產，或更正確些說，開始於破產後的蕭條時期。這次蕭條充滿了二十二年的歐洲經濟史，只是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間斷，以及在一八八九年左右發生過異常猛烈，但也只是很短時期的高漲」。『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短促高漲時期，企業家紛紛組織卡德爾來利用當時的行情。輕率的政策，把價格提高到比沒有卡德爾時更快更大的程度，結果使這些卡德爾差不多全體都不光榮地葬埋於「破產墳墓」中。此後又經過了五年的業務不振和價格低落時期，但此時在工業方面已是流行着另一種情緒了。一般人已不把蕭條視為一件當然的事情，而認為它不過是新的順利行情發生前的一種停頓。

於是卡德爾運動便進到了第二個時期。它已經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它先後佔領各個工業部門，首先便是製造原料的部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卡德爾制度在焦煤新迪加——即後來煤業新迪加仿照它的模樣建立起來的那個焦煤新迪加——成立時，已達到了迄今沒有超過的完善程度。十九世紀末的巨大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發生的危機，至少是在礦業與鋼鐵業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

在卡德爾制度下相繼發生的。當時一般人還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現象，但現在大家都已認爲經濟生活底各個重大部分通常不受自由競爭支配，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了。」^①

總之，壟斷公司發達史可以分爲如下幾個基本時期：（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中的最高的終極階段。當時壟斷公司還只顯露出不甚明顯的萌芽。（二）一八七三年危機之後，有了一個卡德爾廣泛發展的時期，但卡德爾當時還祇是一種例外，還沒有穩固起來，還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三）在十九世紀末期的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危機時，卡德爾已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資本主義變成爲帝國主義了。

各個卡德爾彼此商定銷售條件，支付期限等等，互相分配銷售場，規定生產產品數量，規定價

① 見羅格爾施坦所著資本主義工業底財政組織和壟斷公司底形成一文（*Th. Vogelsheim: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

雜誌（*"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第六冊，一九一四年，杜平根版。參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兩

國鐵業和紡織工業底組織形式一書（*"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第一卷，一九一〇年，來比錫版。

格，把利潤分配於各個企業等等。

德國的卡德爾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二百五十個，在一九〇五年約計三百八十五個，其中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參加⁽¹⁾。但是大家都承認，這些數字是少於實際數目的。上面所引的一九〇七年德國工業統計材料說明，就是這一萬二千個巨大企業，大概也集合有全國半數以上的汽力和電力。美國托拉斯數目，一九〇〇年是一百八十五個，在一九〇七年是二百五十個。美國的統計，把一切企業分爲三類：屬於個人的，屬於商號的，屬於公司的。最後這一類，在一九〇四年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二三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百分之二五點九，即四分之一以上。這些企業在一九〇四年所僱用的工人佔全數百分之七〇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全數百分之七五點六，即佔全數

● 見黎舍爾博士所著德國巨大銀行及其因德國全部國民經濟發展而集中的情形一書(Dr. Hiesser: "Die deutschen Gross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第四版(一九二二年版), 第一四九頁。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以及國民經濟組織底繼續發展一書, (R. Loh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第二版(一九一〇年版), 第二五頁。

四分之三。它們的生產量在一九〇四年值一百零九萬萬美金，在一九〇九年值一百六十三萬萬美金，即佔美國生產總量百分之七三點七和百分之七九。

一個工業部門底生產總量，常有十分之七八是集合於卡德爾和托拉斯手中的。『萊茵威斯特發里亞煤業新迪加』，在一八九三年成立時，已集中有全區產煤總額百分之八六點七，而在一九一〇年，則已達到百分之九五點四⁽¹⁾。這樣造成的壟斷，保證獲得巨額的收入，並造成規模極大的技術生產單位。美國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於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它的資本計有一萬五千萬美金。當時發行了一萬萬美金的普通股票和一萬零六百萬美金的優先股票。優先股票自一九〇〇起，至一九〇七年止，每年獲得的紅利如下：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五，百分之四五，百分之四四，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共計三萬六千七百萬美金。自一八八二至一九〇七年止，實得八萬八千九百萬美金的純利，其中有六萬零六百

● 見克斯特溫爾博士所著強迫加入組織。卡德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之研究一書（Dr. Fritz Kosh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nsen-

seibern"），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一頁。

萬元分作紅利，而把其餘數目化爲準備資本。』^①『鋼業托拉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中所有的企業，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了二十一萬零一百八十個工人和職員。德國礦業中最大的企業，即「該爾生基爾恆礦業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 在一九〇八年有四萬六千零四十八個工人和職員。』^②美國鋼業托拉斯在一九〇二年就出產了九百萬噸鋼^③。它所出產的鋼在一九〇一年佔美國產鋼總額百分之六六點三，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五六點一^④。它所採掘的礦砂，在一九〇一年佔百分之四三點九，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四六點三。

①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情形概論一書 (R. Liefmann: "Beitrag zur Beteiligung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第一版 (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二二頁。

② 見前書第二一八頁。

③ 見契爾施博士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 (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e")，一九〇三年格丁根版，第一三頁。

④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 (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二七五頁。

美國政府委員會關於托拉斯情形的報告上說：『它們之所以優勝於它們的競爭者，是因為它們的企業規模巨大，技術優良。煙草托拉斯從創立時起，便竭力到處大批實行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爲達到此目的，它用巨量款項收買了一切與製造煙草有多少關係的發明品專利權。有許多發明品，起初是不適用的，於是那些在該托拉斯中服務的工程師只得加以研究，加以改良。在一九〇六年末，托拉斯又設立了兩個附屬公司，其唯一目的就是收買發明品專利權。托拉斯爲了同一目的，又建設了自己的鑄鐵廠，機器廠和修理廠。其中一個企業，在布魯克林，平均有三百個工人，專事試驗製造紙煙、小雪茄、鼻煙、錫紙和煙盒等的發明品；同時又實行把各種發明品加以改善。』●『其他各托拉斯，也僱備有所謂 *developing engineers*（改進技術的工程師），專門從事於發明新的製造方法，試驗改良技術的手續。鋼業托拉斯用很高的獎金付給工程師或工

● 煙草製造公司監督委員會報告書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一九〇九年華盛頓版，第二六六頁，——引自塔費爾博士所著美國托拉斯及其對於技術進步的影響一書 (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第四八頁。

人，報酬他們所作的那些能够提高技術或減少成本費的發明。」^①

在德國大工業中，例如近數十年來發展極爲迅速的化學工業，也是這樣進行技術改良事業的。一九〇八年，生產集中過程已在這個工業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集團』。這兩個『集團』也帶有相當的壟斷性質。起初，這兩集團是由兩對巨大工廠組成的『二元聯盟』，各有資本二千萬至二千一百萬馬克；一方面是霍斯達城的舊『美斯特爾』工廠和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的『加舍爾』工廠；另一方面是留威斯哈雲城的安尼林蘇打工廠和愛北斐特城的舊『貝爾』工廠。後來在一九〇五年間有一個集團與其他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而在一九〇八年間另一個集團又與另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結果便構成了兩個『三角聯盟』，各擁有資本四千萬至五千萬馬克。而且這兩個『聯盟』又開始『接近』起來，『約定』價格等等了^②。

競爭變爲壟斷。結果就使生產社會化過程有長足的進步。技術發明與改良過程，也社會化起

● 見前書，第四九頁。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版，第五四七及往下各頁。據報載消息（一九一六年六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個

把德國化學工業統一起來的巨型新托拉斯。

來了。

從前是個個廠主自由競爭，彼此分散，各不相謀，各自生產，以銷售於所不知道的市場，但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生產集中程度很高，使人有可能大致計算本國，或如下面所說，幾個國家，以至全世界所有一切原料來源（例如鐵礦產地）。現在不僅有人已在進行這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由幾個巨型壟斷同盟獨佔起來了。這些同盟已在進行關於市場容量的大致計算，根據協定來互相『瓜分』這些市場。熱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起來；最能幹的工程師都被僱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如美國的鐵路，歐美洲的輪船公司，都被奪去。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階段時，使生產達到最完備的社會化地步，它不管資本家底願望與意識如何，而把他們拖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去，即從完全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社會化的過渡制度中去。

生產是社會化了，但是佔有制仍然是私人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私有的財產。表面上大家公認的自由競爭底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少數壟斷者對其餘居民施行的壓迫，却比先前更要百倍苦重，百倍顯著，百倍難受了。

德國經濟學家克斯特涅爾著有專書論述『卡德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所謂『局外企業』，是指未加入卡德爾的企業家而言。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標題為『強迫加入組織』，其實，爲不要

掩飾資本主義，就應標題為強迫服從壟斷者同盟。簡單看看壟斷者同盟爲了「組織」而進行現代的、最新的、文明的鬥爭時所採取的那些手段，都是很有益處的。這些手段就是：（一）剝奪原料（：『強迫加入卡德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二）用『聯盟』方法剝奪勞動力（即資本家與工會間訂立合同，使工會祇接受卡德爾化企業中的工作）；（三）剝奪運輸工具；（四）剝奪銷路；（五）與買主訂約，使他們祇與卡德爾發生貿易關係；（六）有系統地降低價格（以求破壞『局外企業』，即未屈服於壟斷者的企業，耗費數千百萬金錢，來保證在某一時期內，按低於成本費的價格出售商品；例如在汽油工業中，有自四十馬克跌至二十二馬克，即差不多跌落一半的事實！）（七）剝奪信貸；（八）宣佈抵制。

現在已經不是大企業和小企業競爭，技術落後企業和技術先進企業競爭了。現在已經是壟斷者室殺那些不屈服於壟斷，不屈服於壟斷者底壓迫及其意志的企業了。且看這種過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意識中的反映吧。

『甚至在純粹經濟性的活動範圍內，——克斯特涅爾寫道，——也發生着相當的轉變，從先前那種商業活動轉變到組織者的投機活動方面去。獲得最大勝利的，並不是最會根據自己技術和商業經驗來判定購買者需要，找到並「發現」潛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夠預先估計，或是預先嗅到組織上的發展，預先嗅到某

些企業與銀行間有相當聯系的可能性的投機天才(?)」：

譯成人類普通的語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結果是商品生產雖還照舊『統治』一切，仍算是全部經濟底基礎，但實際上已被毀壞了，而大半利潤都歸那些慣幹財政勾當的『天才』所獲得了。這種勾當和詭詐行爲底基礎便是生產社會化，但達到了此種社會化的人類所造成的巨大進步，却造福於：投機者。下面我們會看到，那些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市儈式反動批評的人，『根據這點』而夢想向後退到『自由』、『和平』、『誠實』的競爭上去。

『因組織卡德爾而使價格長期提高的現象，——克斯特涅爾說，——至今祇是在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方面，特別是在石煤、鐵和加里方面看見，反之，在製成品方面，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由此所構成的利潤增加的現象，也是只以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爲限。除此而外，還要指出：製造原料（而不是半製品）的工業，不僅因組織卡德爾而獲得高度利潤的利益，使那些從事於製造半製品的工業部門受到損失，而且它對這些工業還處於相當統治的地位，這是在自由競爭下所沒有的事情。』●

我們加上着重點的那幾個字，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願承認和很少承認的要點，是現在以

● 見克斯特涅爾所著前書，第二五四頁。

考茨基爲首的機會主義擁護者極力企圖敷衍而逃避不談的要點。統治關係及由此而生的強力，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中的標本現象，便是由於萬能的經濟壟斷組織形成所必然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的結果。

我們再舉出一個表明卡德爾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原料來源奪到手裏的地方，卡德爾也就特別容易產生，壟斷組織也就特別容易形成。但是，若以爲在無法奪得原料來源的工業部門中間，不會有壟斷組織發生，那便錯誤了。水泥工業中所用的原料，是到處都有的。但是這個工業在德國也大大卡德爾化了。水泥製造廠都聯合成各區新迪加：如南德新迪加、萊茵威斯特發里亞新迪加等等。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每一車箱水泥爲二百三十以至二百八十馬克，而成本費却只等於一百八十馬克！企業所付的股息，自百分之二二至百分之二六，而且不要忘记，現代的投機『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還能攫取大量的利潤。爲要消滅這種有利工業中的競爭，壟斷者甚至於運用各種詐術：散佈謠言，說這種工業中的情形不佳；在報章上刊登匿名廣告說：『資本家們，不要投資於水泥工業呀！』；並且收買『局外企業』（即那些不參加新迪加的企業），給他們六萬、八萬以至十五萬馬克的『出讓費』。壟斷者到處採用百般方法來爲自己開闢道路，從償付一點『微薄的』出讓費起，一直到按美國方式『運用』炸藥對付競爭者爲

止。

所謂用卡德爾消滅危機，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竭力替資本主義粉飾的一種騙語。其實恰巧相反：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起來的壟斷，使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緊張，更加劇烈起來；工業與農業發展上不相適應的情形，本是一般資本主義底特點，現在更加厲害了。卡德爾化程度最高的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處於特權的地位，結果使其餘各工業部門，如寫了一部論述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問題的優秀著作的愛德思所承認了的那樣，發生『更加厲害地缺乏計劃性』的現象^①。

『國民經濟越發展，——拚命辯護資本主義的李甫曼說，——便越趨向於創立更帶冒險性的

① 見愛德思維格所著冰泥一文，載於銀行雜誌，(“Zeman” von I. Eschwege: “Die Bank”), 1909年

第一期，第一一五及往下各頁。

② 見愛德思所著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特別是與冶金工業的關係一書(德文原書: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ss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

一九〇五年來比錫版，第二七一頁。

或國外的企業，越趨向於創立那些需要長久時間來發展的企業，或者創立那些祇有地方意義的企業。』●冒險程度增加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於資本非常增加，有如決堤而出，泛濫於國外等的結果。同時，技術上異常迅速的發展，又使國民經濟中的各個部門更加參差不齊，使紛亂成分以及危機成分更加增加起來。『大約在不遠的將來，——這李甫曼又不得不承認說，——人類又會在技術方面遇到一些影響於國民經濟組織的大變革』：如電氣、航空：『在這樣發生根本經濟變動的時候，通常而且照例都有很厲害的投機事業發展起來……』●

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特別是經濟的危機，但並不祇是經濟的危機——又大大加強着集中與壟斷的趨向。我們知道，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是近代壟斷同盟形成史中的轉折點。且看愛德思論到這次危機意義時所說的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吧：

『在一九〇〇年危機發生時，除了各個主要工業部門的巨型企業外，還有許多在工業高漲時升長到浪頭上面來了的所謂「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起來的企業），『它們的組織，按現代的概念說來，已經是陳腐

●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等等 (Lippmann: "Beteiligungsges. Ges."), 第四三四頁。

● 同上，第四六六頁。

不堪了。價格之低落，需求額之減少，使這些「單純」企業陷於巨型聯合企業所完全沒有感受到，或僅僅受到極短時期影響的那種極端困難的境遇。因此，一九〇〇年的危機就比一八七三年的危機，更使工業集中到了大得無可計量的程度。一八七三年的危機，雖也發生了一種使優秀企業保留下來的淘汰作用，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程度下，這種淘汰並沒有使逃出了危機的企業獲得壟斷的地位。首先而且最高限度享有這種長久壟斷地位的，便是現今鋼鐵工業與電氣工業中的那些巨型企業，因為它們具有很複雜的技術、線索很長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其次，在較小的程度上享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便是製造機器的企業，冶金業中某些部門的企業，交通方面的企業等等。」^①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上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銀行底作用，那我們對於現代壟斷底實力和意義的觀念，就會是極不充分，極不完備而估計不足的了。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銀行原先的基本業務，便是擔任支付方面的中介。於是，銀行便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

①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〇八頁。

活動的資本，即變為產生利潤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去支配。

隨着銀行事業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機關，於是銀行便由簡單的中介人變成爲萬能的壟斷者，差不多全體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數國內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都爲它們所支配。由無數簡單中介人變爲少數壟斷者的這種過程，便是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把銀行事業集中的情形考查一下。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德國一切擁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的銀行，共有存款七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這種存款數目已增加到九十八萬萬馬克。在五年以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在新增的二十八萬萬馬克存款中，有二十七萬五千萬馬克落在五十七個擁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手中。大小銀行所有存款分配情形如下：

各種銀行在存款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數

| | 九個柏林大銀行 | 其餘四十八個擁有資本 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 | 資本少於一百萬 馬克的小銀行 |
|---------|---------|--------------------------|-------------------|
| 一九〇七、八年 | 四七 | 三二·五 | 一六·五 |
| 一九一二、三年 | 四九 | 三六 | 一五 |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排擠，而大銀行中爲數不過九個的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之半數。但是此地我們還沒有說到許多重要的事情，例如無數小銀行事實上變成大銀行底分行等等。關於這些事情，且待我們以後再講。

一九一三年末，據叔爾茨·黑維尼茨估計，在存款總額約一百萬馬克中，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佔有五十一萬馬克。這位作者不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銀行資本時寫道：『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以及附屬於它們的銀行，支配有一百一十三萬馬克，即約佔德國銀行資本總數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及其各附屬銀行，幾乎支配有三十萬馬克，而與普魯士國有鐵路管理局，同爲東半球上資本積聚得最多，而且分權程度最高的企業。』^①

① 見羅斯堡所著五年來的德國銀行一文（Alfred Lamshagen: “Fünf Jahre d. Bankwesen”, “Die Bank”）。

載於銀行雜誌（“Die Bank”），一九一三年第八期，第七二八頁。

②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載

於社會經濟底基礎（“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第一二頁，第一三

七頁。

我們特別着重指出『附屬』銀行這個名詞，因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集中方面最主要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併小企業，並且用『參與』小企業資本的方法，用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用債務方式等等『拉攏』小企業，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加入自己的『康采恩』（這是資本主義聯合底術語）。李甫曼教授用一本五百頁的巨『著』來專門描寫現代的『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①，可惜這本書裏面只有許多往往是沒有分析過的生硬材料，再加上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論上的』推斷。關於這種『參與』制度究竟使集中過程達到怎樣地步的問題，在銀行『活動家』黎舍爾那一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中說得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們在尚未引用他的材料之前，首先要從『參與』制度中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集團』，即使不是一切大銀行集團中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了。要考察那些把這一集團所有一切銀行聯系在一塊的主要線索，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

①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情形概論一書 (R. Lieh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Aktienwesen"), 第一版 (一九〇九年耶拿版), 第二二二頁。

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較小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結果我們便得出如下的情景：

『德意志銀行』所參與的銀行

| | 第一級依賴的 | 第二級依賴的 | 第三級依賴的 |
|-------|--------|---------------|--------------|
| 經常參與的 | 一七個銀行 | 其中有九個又參與三四個銀行 | 其中有四個又參與七個銀行 |
| 暫時參與的 | 五個銀行 | | |
| 間或參與的 | 八個銀行 | 其中有五個又參與一四個銀行 | 其中有二個又參與二個銀行 |
| 總計 | 三〇個銀行 | 其中有一四又參與四八個銀行 | 其中有六個又參與九個銀行 |

在八個『間或』隸屬於『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中，有三個是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國的銀行（維也納『銀行同盟』），其他兩個是俄國的銀行（『西伯利亞商務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直接或間接，全部或局部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總計有八十七個銀行，而這個集團所支配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資本總數，計有二三十萬萬馬克。

● 見薩斯堡所著德國銀行事業中的參與制度一文 (Alfred Lantsburgh: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 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 第五〇〇頁。

一個銀行既主持着這樣一個集團，並與其餘比它稍小的五六個銀行訂立協約，來經營特別巨大和特別有利的財政業務，如國債等，那末這個銀行當然是已經由『中介人』一變而為極少數壟斷者底聯合組織了。

我們且從黎舍爾統計中摘引如下一些簡略材料，來說明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德國銀行事業集中過程進行的速度：

柏林六個巨大銀行所有的機關

| 年 份 | 在德國的分行 | 兌換所和兌換處 | 其所經常參與的德國股份銀行 | 機關總數 |
|-------|--------|---------|---------------|------|
| 一八九五年 | 一六 | 一四 | 一 | 四二 |
| 一九〇〇年 | 二二 | 四〇 | 八 | 八〇 |
| 一九一一年 | 一〇四 | 二七六 | 六三 | 四五〇 |

由此可見，銀行的密網擴展得非常迅速，它包羅全國，集合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累萬個分散的企業變成爲一個全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以至於轉變成爲一個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上述一段話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說到的那個『分權』，實際上使無數從前比較『獨立的』經濟單位，或正確些說，局限於某一地方的經濟單位，都隸屬

於一個中心。其實，這是集權，是把巨型壟斷公司底作用、意義和勢力加強起來。

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網』還要緊密一些。英國——包括愛爾蘭在內——一九一〇年所有銀行底分行總數，計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其中四個大銀行，各有四百個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個至六百八十九個），另外四個大銀行各有二百個以上的分行，其他十一個銀行各有一百個以上的分行。

法國三個最大銀行，即『里昂信託公司』、『全國匯兌局』和『總公司』所有業務與分行網之擴展，有如下表：

| 在外省各地 | 分行和支行數目 | | 資本數量（單位百萬佛郎） | |
|-------|---------|-----|--------------|-------|
| | 在巴黎 | 總數 | 自己的 | 他人的 |
| 一八七〇年 | 四七 | 一七 | 二〇〇 | 四二七 |
| 一八九〇年 | 一九二 | 六四 | 二六五 | 一，二四五 |
| 一九〇九年 | 一，〇三三 | 一九六 | 一，二二九 | 八八七 |
| | | | | 四，三六三 |

● 見考甫曼所著法國銀行一書 (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 一九一一年杜平根版，第三五六頁，第三六二頁。

巴黎爾爲要說明現代大銀行底『聯繫』，引用了『匯兌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即德國和全世界最大銀行之一(它的資本在一九一四年已達三萬萬馬克)所收發信件統計：

| 年 份 | 信 件 數 目 | |
|-------|-----------|-----------|
| | 收 到 的 信 件 | 發 出 的 信 件 |
| 一八五二年 | 六，一三五 | 六，二九二 |
| 一八七〇年 | 八五，八〇〇 | 八七，五一三 |
| 一九〇〇年 | 五三三，一〇二 | 六二六，〇四三 |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中所有的清單數目，在一八七五年是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件，而在一九一二年則已增至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九件了。

這些簡單數目字，也許要比長篇議論更能明顯地表明：資本的集中和銀行活動的擴大，使銀行底作用根本變更了。散處各方的資本家，集合成爲一個集體的資本家。銀行替幾個資本家經營

● 見列斯克爾所著法國儲蓄事業一書 (Jean Lescure: "L'épargne en France")，一九一四年巴黎版，第
五二頁。

活期存款，似乎只是執行着一種純粹技術性的，完全輔助性的業務。當這種業務範圍擴展得很大的時候，少數壟斷者就支配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全部工商業底業務，就能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存款及其他種種財政手續，起初確切探知各個資本家底營業情形，然後就實行監督他們，用擴大或減少，便利或阻難信貸的辦法來影響他們，以至於完全決定他們的命運，決定他們的收入，奪去他們的資本，或使他們有可能迅速而大規模地增加他們的資本等等。

我們剛才說過了柏林『匯兌公司』擁有三萬萬馬克資本的事實。『匯兌公司』資本這樣迅速的增加，便是柏林兩個最大銀行，即『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爭奪霸權的一幕。

在一八七〇年間，『德意志銀行』還是個新開設的銀行，只擁有一千五百萬馬克的資本；『匯兌公司』當時擁有三千萬馬克的資本。在一九〇八年間，前者有資本二萬萬，後者有資本一萬七千萬。到一九一四年時，前者所有的資本已增至二萬五千萬，後者因與另一個頭等大銀行『沙福豪生聯益銀行』聯合起來，便把資本增到了三萬萬。在這種爭奪霸權的鬥爭中，這兩個銀行間的『妥協』，當然也隨着鬥爭而更加增多，更加鞏固起來。而這種發展的進程，便使那些站在絕對不越出最穩健最溫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圍的觀點上來觀察經濟問題的銀行事業專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

『其他銀行也會循着這條路線進行』，——德國銀行雜誌論及『匯兌公司』資本增至三萬萬馬克的事實時寫道：——『於是現時在經濟上統治德國的三百個人，就會漸漸減至五十個，二十五個，以至更少的數目。現代的集中運動不會只以銀行事業爲限。各個銀行間的緊密聯繫，自然會使這些銀行所庇護的許多新迪加工業家也接近起來：將有一天，我們醒過來時，忽然看見我們面前盡是些托拉斯而感覺驚異；到那時候，就會必須以國家的壟斷來代替私人的壟斷。雖然如此，但我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責備自己，因爲我們不過是聽憑客觀行程自由發展下去，而用股票稍稍把它加速了一下罷了。』●

這便是資產階級政論家毫無辦法底表現，而資產階級的科學界與這種政論家不同的地方，祇是更不誠實，而企圖隱蔽問題實質，想用枝節問題去掩蔽根本問題罷了。看見集中的結果而感覺『驚異』；『責備』資本主義德國的政府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害怕因採用股票而『加速』集中，如德國『研究卡德爾』的專家契爾施基那怕美國托拉斯，而『寧願』有德國卡德爾，彷彿卡德爾『不會像托拉斯那樣異常加速技術和經濟的進步』●，——這難道不是表

● 見塞斯堡所著資本三萬萬的銀行一文(A. Tansburgh: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見銀行雜誌

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四二六頁。

● 見契爾施基所著前書，第一二八頁。

明毫無辦法麼？

但事實還是事實。在德國沒有托拉斯，而『祇有』卡德爾，但統治德國的不過是三百個資本巨頭。而且這種巨頭數目還在不斷地減少。銀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銀行立法如何不同，總是多倍加強加速着資本集中和壟斷公司形成的過程。

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過：『銀行在社會範圍中造成了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底形式，但祇是形式而已。』（見俄譯本，第三卷下冊，第一四四頁）我們所引用的關於銀行資本增長的統計材料，關於巨大銀行底支行和分行數目及其清單數目等等增加的統計材料，都具體表明出整個資本家階級底這一種『公共簿記』，並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而已，因為銀行收集（雖然只是暫時收集）一切貨幣收入，包括小私有主、職員和少數上層工人底收入。從形式上看來，『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就是由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現象，這種銀行在法國約有三個至六個，在德國約有六個至八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本。但是，從內容上看來，這種生產資料分配制絲毫也不是『公共』的，而是適應於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性的資本——利益的私有的分配，因為這種大資本是在民衆忍飢挨餓，農業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工業，而『重工業』從其餘工業部門中收取貢賦的條件下動作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過程中，儲蓄社和郵政機關開始來與銀行競爭，它們是一種比較更『分權』的組織，就是說，它們的勢力普及於更大的區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多的居民。且看美國專門研究銀行和儲蓄社存款增加情形比較問題的委員會所收集的統計：

存款（單位十萬馬克）

| | 英國 | | 法國 | | 德國 | |
|-------|------|-------|------|-------|------|--------|
| | 銀行存款 | 儲蓄社存款 | 銀行存款 | 儲蓄社存款 | 銀行存款 | 信託公司存款 |
| 一八八〇年 | 八·四 | 一·六 | ？ | 〇·九 | 〇·五 | 〇·四 |
| 一八八八年 | 一二·四 | 二·〇 | 一·五 | 二·一 | 一·一 | 〇·四 |
| 一九〇八年 | 二三·二 | 四·二 | 三·七 | 四·二 | 七·一 | 二·二 |
| | | | | | | 一三·九 |

儲蓄社為支付四厘至四厘又四分之一的存款利息，就必須替自己的資本找得『有利的』投資，如從事於兌換期票、典押及其他業務。銀行和儲蓄社間的界限『漸漸失去』。例如波胡姆和

● 引自美國全國金融委員會底材料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見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第一二〇頁。

愛爾福特兩城的商會，要求『禁止』儲蓄社從事於『純粹的』銀行業務，如兌換期票之類；並要求限制郵政機關所進行的『銀行式的』業務。銀行大王好像是畏懼國家的壟斷將從意料不及的方面來侵襲他們。但這種畏懼，當然不過是好像一個事務室內兩個管事相互競爭而已，因為儲蓄社中的數十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那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壟斷不過是一種替某某工業中將近破產的巨萬富翁，提高並擔保其收入的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制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的事實，還表現於交易所作用底衰落。『交易所之為流通方面的必要中介，——銀行雜誌寫道：——是從前銀行還不能把它所發行的大部分有價證券分配於它的顧客中間的時候的事，可是那個時候早已過去了。』^①『一切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越大，銀行事業越集中，這句

①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八一一頁，第一〇二二頁；一九一四年，第七四三頁。

②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三一六頁。

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①『從前在七十年代時，充滿少年銳氣的交易所』（這是對一八七三年交易所危機和創業舞弊糾紛等事實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開闢了德國工業化的新紀元，而在現今的時候，銀行和工業已能「獨自應付」了。我國大銀行統治交易所；便是德意志工業國組織完備底明顯表現。這樣一來，自然動作的經濟法則底活動範圍縮小下去，而經過銀行自覺調節的範圍異常擴大起來，於是少數領導者所負的國民經濟方面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這就是德國大學教授叔爾茨·黑維尼茨所寫過的話。^②他是替德國帝國主義作辯護，而為全世界帝國主義者所尊敬的人物，他企圖抹煞一件『小事』，即經過銀行來進行的這種『自覺的調節』就是由極少數『組織完備的』壟斷者來剝削大眾。資產階級大學教授底任務並不是要揭開全部內幕，並不是要揭穿銀行壟斷家所玩弄的一切勾當，而是要粉飾這些勾當。

① 見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 (Dr. Oscar Stühli: "Geld und Bankwesen"),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六九頁。

②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 (Selndes Gdewe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雜誌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 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第一二頁和第一三七頁。

比叔爾茨·黑維尼茨更有權威的一位經濟學家和銀行『活動家』黎舍爾也是這樣說法，他用一些毫無內容的語句來搪塞無法否認的事實：『交易所從前含有一種爲全部經濟和有價證券流通所絕對必要的性能：它當時不僅是它所匯集的那些經濟運動最準確的度量工具，而且幾乎是那些經濟運動中一個自然動作的調節者。現在呢，它的這種性能已是日漸消失了。』●

換言之，舊時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制的資本主義，以交易所爲絕對必要調節者的資本主義，已成爲過去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代替了它，這個新的資本主義，包含有某種過渡階段，某種自由競爭制和壟斷制混合物底明顯特徵。這個最新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過渡』到何處去呢，——這就是一個自然要發生，而資產階級的學者却不敢提出的問題。

『在三十年前，自由競爭的企業家，執行了十分之九不屬於「工人」體力勞動範圍以內的經濟工作。現在呢，這種經濟的智力工作十分之九，都由僱員們來擔任了。銀行事業便處於這一發展過程底領導地位。』●叔爾茨·黑維尼茨底這種供認，又使人一定要來發問：最新的資本主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六三〇頁。

● 見銀行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一期，第四三五頁。

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進到何處去的過渡呢。

由於集中過程增進而成為全部資本主義經濟領袖的少數銀行，它們彼此進行壟斷性協定的傾向，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要日益顯現和加強起來的。美國現在已不是由九個，而是由兩個最大的銀行（即兩個巨富洛克費爾和摩爾根）統治着一百一十萬萬馬克的資本了。上面所指出的那個德國『沙福豪生聯益銀行』為『匯兌公司』所吞併的事實，在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方面引起了如下的評論：

『銀行集中過程的增進，使一般可以向之取得信用借款的機關日益減少，因而使大工業更加依賴於少數銀行集團。工業和財界彼此聯系日密，於是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底行動自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大工業對於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變為托拉斯）這一事實，發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真的，我們已屢次看見各大銀行康采恩開始成立某種協定，因而使競爭受到限制。』^①

● 引自叔爾夫·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見

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一九一五年杜平校版，第二二頁和第一三七頁。

● 引自叔爾夫·黑維尼茨所著同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第一五五頁

這又是銀行事業發展中最高成就的壟斷。

至於說到銀行和工業間的密切聯繫，那末在這一方面，銀行底新作用是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倘若銀行替某個企業兌換期票，替它經營活期存款等等，那末這種業務，單獨看起來，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家底獨立性，而且銀行也沒越出平常中介作用底範圍。如果這些業務擴大鞏固起來，如果銀行把巨量資本『收集』於自己掌握，如果銀行經營相當企業底活期存款而能够（事實上確實如此）更詳細、更完備地知道它這位顧客底經濟情形，那末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家日益完全依賴於銀行了。

同時，銀行與工商大企業實行的所謂個人聯合也日益增進，雙方用佔有股票的手段，用銀行經理充當工商企業監察人（或董事），或反之，用工商企業經理充當銀行監察人的辦法，而愈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德國經濟學家愛德思搜集了關於這種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過程的極爲詳細的材料。柏林六個最大銀行，有它們的經理在三百四十四個工業公司裏當代表，又有它們的董事在四百零七個公司裏當代表，一共在七百五十一個公司裏有它們的代表。由它們佔有兩個監察會會員，或監察會會長位置的公司，共有二百八十九個。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有保險會社，有交通機關，有飯館酒樓，有戲院，美術品製造業等等。另一方面，在這六個

銀行底監察會中（在一九一〇年間）有五十一個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炮廠底經理，巨大輪船公司『哈巴克』（『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底經理等等。六個銀行中，每個銀行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間參與了替數百個（由二百八十一個至四百一十九個不等）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事業。

銀行和工業實行的『個人聯合』，又以前後兩者與政府實行的『個人聯合』補充之。『他們自願把監察會會員底位置，——愛德思寫道，——讓給有聲望的人物，以及去職的政府官吏，因為這些人物使公司與當局接洽時，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大銀行監察會，照例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議員參加。』

可見，巨大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循着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路徑迅速進行的。結果便一貫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幾百個財政大王間相當的分工：

『一方面，個別巨大工業家活動範圍擴大起來』（加入銀行董事會等等），『各外省銀行經理專門負責主持某一個工業區域，同時大銀行底領導者中間的專門化也相當加強起來。這種專門化，一般說來，祇有在

●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與黎舍爾所著前書。

全部銀行企業底規模很大，尤其是它與工業的聯繫極廣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行。這種分工是按着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把本銀行與工業聯絡方面的事務完全委托給某一個經理去主持，作爲他的專門職務；另一方面，每個經理都親自擔任監督幾個或幾組在職業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用有組織的辦法監督單個企業的程度了：）『某一個經理專門負責管理德國工業，或單只管理德國西部的工業』（德國西部是德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其他的經理則專門負責與外國政府及外國工業發生關係，收集關於各工業家等等個人的消息，主管交易所事業等等。此外，每個經理又往往專門主管某一地方或某一部門的工業：有的主要是在電氣公司監察會裏工作，有的是在化學工廠、啤酒廠或製糖廠裏工作；有的是在幾個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又參加保險公司監察會：一言以蔽之，在巨大銀行中因銀行活動規模擴大與種類增多的關係，顯然是形成着各個經理彼此愈益細密的分工，其目的（和結果）是要稍微提高他們活動底程度，使之超出於單純的銀行事務，使他們有更大的判斷能力，更通曉工業中一般的問題及其各個部門中特殊的問題，養成他們在工業方面銀行勢力範圍內活動的能力。除這種辦法外，銀行更竭力邀集熟悉工業的人物、企業家、去職官吏，尤其是在鐵路與礦務機關中供過職的人，來加入監察會：。』

●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五七頁。

在法國銀行事業中，也有與此同類的機關，祇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例如，法國三個最大銀行之一的『里昂信託公司』，專門設立有一個『財政消息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其中經常有五十多個工程師、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律師等等工作着。這個機關每年耗費六七十萬佛郎。它自己又分成八科：有一科負責收集專門關於工業企業的消息，另一科負責研究一般統計，第三科負責考察鐵路公司和輪船公司，第四科負責考察證券，第五科負責研究財政報告等等。

結果一方面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溶合起來，或如布哈林所說得中肯的那樣，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起來；另一方面是銀行日益轉變為真正『萬有性的』機關。我們認為必須引用一位最有研究的作家愛德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說法：

『我們考察全部工業聯繫的結果，便看見那些專為工業工作的財政機關底萬有性。巨大銀行恰巧與其他銀行形式相反，恰巧與文獻中有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如說銀行應當專門從事於某一部分業務或工業中某一部分工作，以免喪失自己的立腳點等語的要求相反，而力求把它與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弄得異常複雜，使其

● 引自考甫曼所著論法國銀行的文章，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五一及往下各頁。

所包含的生產區域與部門盡量廣泛紛繁，力求消滅各個地方或各個工業部門彼此因各個企業發展情形不同而發生的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一個趨勢是使銀行與工業的聯繫成爲普遍的現象；另一種趨勢是使這種聯繫更加堅固更加緊密起來；這兩種趨勢都在六大銀行中實現了，雖然不很完全，但是已經大規模地並在同一程度上實現了。』

在工商業界方面，往往有人對銀行的『恐怖主義』發出一種不滿的怨言。當大銀行用下述例子中所表明的那種方式去『指揮』其他企業時，這種怨言當然是要發生的。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柏林D字銀行（四個最大銀行底名稱都是以D字母開頭的）之一，給『西北中德意志水泥新迪加』經理部寫了如下的一封信：

『根據貴公司在本月十八日所登載於某報的通知看來，貴公司定於本月三十日召集的全體大會，將通過能使貴企業實行爲敝行所不能接受的種種變更的決議。敝行鑒於這種危險，不得不停止發給貴公司一向所享用的信貸，不勝抱歉之至；但如貴公司在這次大會上不通過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並且對於將來能給敝行以相當的擔保，敝行即願開始談判供給貴公司新信貸的問題。』●

● 見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Dr. Oscar Stiller: "Gold-und Bankwesen"), 1907年柏林版, 第一四八頁。

其實，這也是小資本因受大資本壓迫而發出的那種怨言，不過在此地落到了『小』字輩中的，是整整一個新迪加罷了！舊時的大小資本間的鬥爭，又在新的、高得無比的發展階段上重演起來。當然，擁有數十萬萬巨資的銀行企業，也能用空前無比的手段去推動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設立專門從事技術研究的團體，而研究所得的結果，當然是祇供『友善的』工業企業去享受。屬於這一類團體的，有『電氣鐵道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局』等等。

大銀行底領袖們自己不能不知道這裏所形成的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條件，但他們在這些條件前面祇有表示束手無策而已：

『誰在最近幾年來考察過大銀行經理和監察會會員人選變更的情形，——麥德思寫道，——誰就會知道，全部權力漸漸轉到了視大銀行積極干預一般工業發展事業為必要急務的人們手中去，於是這些人和老舊銀行經理，便因事務關係，有時且因個人關係而發生意見分歧。這裏問題實質就在於銀行既是一種信用機關，那末它是否會因這樣干預工業生產過程而受到損失呢；它是否會因從事於這種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關的活動，從事於這種能把它引入比以前更會使它服從於工業行情盲目統治的那個範圍中去的活動，而犧牲掉自己的穩固的原則和可靠的利潤呢。許多老舊銀行經理，都是這樣說。但大部分新進經理，却認為積極干預工業問題，也好像隨着現代大工業出現而出現了大銀行和最新工業式的銀行企業一樣，是必不可免的。雙方

意見祇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爲在大銀行底新活動中，既沒有什麼穩固的原則，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①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了時了。新資本主義是進到某方面去的一種過渡。尋找『穩固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去『調解』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實踐家底承認，完全不像那些用官場口吻辯護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如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一流人極力讚美『有組織』資本主義一樣。

大銀行底『新活動』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呢，——關於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從愛德思那裏找到頗爲確切的答覆：

『現時工業企業間的聯繫，有其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關，即同時按集權原則與分權原則所組織起來的大銀行。這種聯繫之形成爲特殊的國民經濟的現象，當不早於一八九〇年。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一八九七年，因爲在那個時候，各種企業都實行了大規模的「合併」，並爲適應銀行底工業政策而初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權組織。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更遲的時候，因爲只有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才

①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四頁。

大大加速了工業方面和銀行事業方面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初次把銀行和工業的聯繫變成了大銀行底真正壟斷，使這種聯繫比從前更加堅強緊密。」^①

總之，二十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進到新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即是從一般資本統治進到財政資本統治的轉捩點。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工業資本，——希法亭說，——日益不屬於使用這種資本的工業家了。工業家祇有經過銀行，才得支配資本，銀行對於工業家說來，便是這種資本底所有人。另一方面，銀行也只好日益把自己所有的資本保存到工業中去。因此之故，銀行便日甚一日地變成工業資本家了。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的這種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就稱之為財政資本。』『財政資本便是由銀行所支配而由工業家來運用的資本。』^②

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因為它沒有指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是沒有指出生產集中和資本集

①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一頁。

② 見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版，第三三九頁。

中發展到了很高程度，以致勢必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壟斷的事實。但是，一般說來，在希法亭底全部敘述中，尤其是在我們從而引出這個定義的那一章前面的兩章中，是着重指出了資本家壟斷組織底作用的。

生產集中；由集中而產生壟斷組織；銀行與工業溶合或混合生長，——這便是財政資本產生的歷史和財政資本這一概念底內容。

現在我們就來說明在一般的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制的環境中，資本家壟斷組織底『經營』必然變為財政寡頭統治的情形。我們要指出，德國（而且不祇是德國）資產階級科學界的代表，如黎舍爾、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及其他等人，完全是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底辯護人。關於寡頭制所形成的『機構』，寡頭所採用的手段，寡頭所獲得的『正當和不正當的』收入之規模，寡頭和國會間的聯繫等等，他們都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竭力去加以掩蔽，加以粉飾。他們用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辭句來搪塞『可惡的問題』，而號召銀行經理們提起『責任心』；讚揚普魯士官吏們底『盡職精神』，用嚴重的神情考察那些毫不嚴重的『監督』法律和『條規』草案中的細枝末節，玩弄理論的把戲，例如李甫曼教授就寫出了如下的『科學』定義；『商業是一種業務的活動，專事於收集財富，保存財富，以供應用……』（着重點是李甫曼教授自己加的）……這樣說來，

商業是在尚不知道交換爲何物的原始時代就已經有過了，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也會存在的！

但是，表明財政寡頭駭人聽聞統治的駭人聽聞的事實，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在美國、法國或德國，都出現了一些雖然是本着資產階級觀點，但畢竟還是把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種近於真情的敘述，並對財政寡頭制作了——當然是市儈的——批評。

首先要提起前面已經略略說過了的那個「參與制度」。德國經濟學家黑依曼，可以說是最先注意到了這件事實要點的人。他把這點敘述如下：

「總經理管理着總公司（直譯爲「母親公司」）；總公司又統治着那些依賴於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後者又統治着「孫女公司」等等，餘此類推。於是，只要握有稍大一點的資本，便可統治許多極大的生產部門。例如通常只要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本，便能監督整個股份公司。所以一個總經理只要擁有一百萬的資本，便能支配各「孫女公司」所有的八百萬的資本了。要是這種「錯綜結合」辦法繼續下去，那末擁有一百萬資本，便能支配一千六百萬，三千二百萬等等……的資本了。」^①

①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四七六頁。

②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Lias Gido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stahl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六九頁。

其實，經驗證明：只要佔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便能指揮股份公司底業務，因為常有一部分散處各方的小股東，實際上是完全沒有機會來參加股東大會等等的。所謂股票佔有權底『民主化』，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或揚言說他們希望——它會造成『資本民主化』，加強小生產底作用和意義等等，其實不過是加強財政寡頭權力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那些較先進或較老的和較爲『諳練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律也就允許發行價值較少的股票。德國法律不許發行少於一千馬克的股票，於是德國的財政大王望見英國法律允許發行少至一個金鎊（等於二十馬克，約合十個盧布）的股票，便羨慕不已。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德國最大工業家兼『財政大王』之一的西門子，在德國國會中說道：『價值一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底基礎。』^①這個商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一問題，要比號稱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的卑污作家，有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因為這位卑污作家以爲帝國主義祇是某一個民族底劣根性而已：

①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一版，第二五八頁。

② 引自叔爾夫·恩維尼茨所著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雜誌，第五卷，第二期，第一一一頁。

但是『參與制度』，不僅促使壟斷者底權力極端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放肆玩弄隨便一種黑暗醜惡的勾當，剝削大眾，因為『母親公司』底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兒公司』負責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他們經過『女兒公司』是什麼都可以『做到的。我們且從德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五月號上引出如下的例子：

『加塞爾城的『彈簧鋼鐵股份公司』在數年前算是德國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因為管理不良的結果，股息從百分之十五落到了百分之零。事實真相原來如下：經理部沒有得到股東底同意，出借了六百萬馬克給該公司所屬『女兒公司』之一『哈西亞』，後者名義上的資本只有數十萬馬克。這筆借款，幾乎是比『母親公司』底股資大過三倍，而在該公司決算表上却絲毫也沒有提及；在法律上，這種隱瞞的行為完全是正當的，並且可以延長到二年之久，因為這種行為並沒有違犯任何一條商業法律。監察會會長，以負責人資格在這種假決算表上簽了一個字，但他仍舊做着加塞爾商會的會長。股東們知道這筆借給『哈西亞』公司的款子，是遠在這筆借款已被證明是個「錯誤」：（「錯誤」二字，作者理應放在括弧以內）：『以及因為洞悉此中秘密的人們開始把『彈簧鋼鐵公司』股票賣出去而使其價格幾乎跌落了百分之百以後：

……這一個在股份公司中極常見的玩弄決算表上收支平衡把戲的標本例子，便能說明為什麼股份公司董事會要比私人企業家更輕意得多地去幹冒險勾當。最新式的決算表製定法，不但使他們能把冒險勾當瞞過普通

的股東，並且使主要的關係人能在所玩的嘗試失利的時候，立刻把股票賣出去，藉以卸去責任，而私人的企業家，却要以自己的皮骨來替自己所做的事情負全部責任：

許多股份公司底決算表，頗與中古時代有名的摺蹟紙本相似，要發見藏於紙裏的原稿真實內容，必須先把表面上所寫的字跡擦去。」（摺蹟紙本是把原先寫在羊皮紙上的基本手稿塗上一層油粉，而在油粉上寫出另外一些文句的稿紙）

「最簡單，因而也最常用的一種複雜決算表的方法，便是用創立「女兒公司」或合併這種「女兒公司」的手段，把一個企業分成幾部分。從各種目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上看來，這種制度都顯然是特別有利的，所以現時不採用這種制度的大公司，簡直是一種例外。」^①

作者在最大的壟斷公司中舉出著名的「電氣總公司」（即 A. E. G.，關於這個公司，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作為最大規模地採用這種制度的例子。一九一二年，這個公司參與了一百七十

① 見愛施維格所著女兒公司一文 (L. Fashwago: "Tochtergesellschaft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五四四至五四六頁。

五個以至二百個公司，當然是統治了這些公司，並且總共把持了約近十五萬萬馬克的資本。

懷有好意的——即懷有一番辯護掩飾資本主義的好意的——教授們和官吏們叫一般人注意的那些監督規則、公佈決算、製定一定的決算格式、設立監察機關等等的辦法，都是不會有什麼意思的。因為私有權是神聖的，誰也不能禁止誰去買賣股票、交換股票、典押股票等等。

『參與制度』在俄國各大銀行中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根據阿哈德所公佈的材料就可斷定。阿哈德在『道勝銀行』充任僱員至十五年之久，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確切，叫做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作者把俄國大銀行分為兩大類：(甲)在『參與制』

● 見海尼格所著電氣托拉斯之路一文 (Kurt Heilig: "Der Weg des Elektrizitäts"), 載於新時代雜誌, ("Neue Zeit"), 一九二二年 (第三十卷), 第二期第四八四頁。

● 見阿哈德所著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大銀行在市場上的政治和經濟作用及其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和德俄兩國關係的影響一書 (E. Agard: "Gross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ss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ss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一九一四年柏林版。

下經營的銀行；(乙)『自立的』銀行，但他所謂『自立』，是單憑己意，指其不依賴於外國銀行而言。作者把第一類又分為三個分類：(一)德國人參與的；(二)英國人參與的；(三)法國人參與的，——這是指各該國最大外國銀行底『參與』和統治而言。作者把銀行資本分為投入『生產事業』的資本(即投入工商業的資本)，和投入『投機事業』的資本(即投入交易所和財政業務的資本)，他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為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可以把第一種投資方式和第二種投資方式分開，而把第二種投資方式消滅掉。

作者所引用的統計材料，有如下表：

各銀行所有的資本數量(按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的賬目報告書計算)

| 俄國銀行種類 | | 所投的資本(單位百萬盧布) | |
|---|-------|---------------|---------|
| | | 投入生產事業的 | 投入投機事業的 |
| 甲類(一)四個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羅斯銀行，國際銀行，匯兌銀行 | | 四一三·七 | 八五九·一 |
| 甲類(二)兩個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 | 二二九·三 | 一六九·一 |
| 甲類(三)五個銀行：道勝銀行，聖彼得堡私人銀行，阿速夫海頓河銀行，莫斯科聯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 | 七一·八 | 六六一·二 |
| (十一個銀行)共計 | | 一，三六四·八 | 一，六八九·四 |
| | | | 三，〇五四·二 |
| | | | 總計 |

乙類

八個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窩爾加—喀馬銀行，容克股份銀行，聖彼得堡商業銀行（從前的弗斐堡銀行），莫斯科銀行，（從前的梁布申斯基銀行），莫斯科匯兌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五〇四·二 三九一·一 八九五·三
（十九個銀行）共計……：……：……：一，八六九·〇 二，〇八〇·五 三，九四九·五

按照這個統計表來看，約達四十萬萬盧布的大銀行『活動』資本總額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即三十萬萬多盧布，屬於實際上是外國銀行底『女兒公司』的銀行；在這些外國銀行中佔首要地位的，便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聯合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總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俄國兩個最大的銀行，即『俄羅斯銀行』（『俄羅斯國外貿易銀行』）和『國際銀行』（『聖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將其所有的資本由四千四百萬盧布增加到了九千八百萬盧布，而將其所有的準備金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了三千九百萬盧布，『其中四分之三是用德國資本經營的』；前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康采恩』，後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匯兌公司』所領導的『康采恩』。慈善的阿哈德所深為憤慨的，是柏林銀行握有大部分的股票，致使俄國股東毫

無力量。自然，輸出資本的國家總是獲得最多的利益：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了『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底股票，而把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櫃子裏藏了一年之後，便以百分之二百九十三的價格出售，即幾乎是以多一倍的價格出售而『賺得了』約六百萬盧布的利潤，即希法亭所稱呼的『創業利潤』。

據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底全部『實力』等於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即幾達八十三億之多，同時作者又把各個國外銀行底『參與』，或更正確點說，各外國銀行底統治分配如下：法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五十五，英國銀行佔有百分之十，德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三十五。據作者計算，在這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活動資本總數中，有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萬，即百分之四十一，是屬於各新迪加，即『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¹⁾，煤油新迪加，冶金業新迪加，水泥新迪加。可見，由於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的關係，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的過程，在俄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集中於少數人掌握而享有實際壟斷權的財政資本，因從事於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經營國家公債票等等活動，而獲得有加無已的巨量利潤，以鞏固財政寡頭底統治，替壟斷者去向社會徵收貢賦。以下便是希法亭從美國托拉斯實行『經營』的無數例子中引來的一個例子：一八八

(1)

七年加福美爾把十五個小公司合併成爲一個糖業托拉斯，其資本總額等於六百五十萬美金。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如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滲了水』，而估定爲五千萬美金。這樣『提高資本額』是預期到未來的壟斷利潤的，正如同美國的鋼業托拉斯，因預期未來的壟斷利潤而購買了很多很多的鐵礦山一樣。果然，這個糖業托拉斯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結果竟能爲『滲水』七倍計算的資本支付百分之十的股息，即能爲在創辦托拉斯時實際上所交納的資本支付幾達百分之七十的股息！到一九〇九年時，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已等於九千萬美金。在二十二以內，資本數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法國，『財政寡頭』底統治（『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語，是李濟斯在一九〇八年印行第五版的那部名著之標題），只是所取的形式稍有不同而已。四個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價證券方面所享有的，並不是相對的壟斷權，而是『絕對的壟斷權』。事實上這是『幾個大銀行所組成的托拉斯』。壟斷權也就使它們能用發行證券的辦法獲得壟斷利潤。在締結借款條約時，借債方的國家所得到的，通常不會超過總數百分之九十；其餘百分之十，便由銀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銀行從四萬萬佛郎的中俄公債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八，從八萬萬佛郎的俄國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從六千二百五十萬佛郎的摩洛哥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

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八又四分之三。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以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極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的。李濟斯說道：『法蘭西人是全歐洲的高利貸主』。一切經濟生活條件，因資本主義這種蛻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更。在人口、工業、商業和海運等等停頓時，『國家』却藉高利貸來發財致富。『拿出八百萬佛郎資本的五十個人，能够指揮四個銀行所有二十萬萬佛郎。』我們所說過的那個『參與』制，也產生出同樣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總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爲『女兒公司』『埃及製糖廠』發行了六萬四千張債券。發行底行市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即是銀行從每一個虛布上賺得了五十個哥比。後來這個『女兒公司』底股息結果表明是虛假的時候，『大眾』便損失了九千萬至一萬萬佛郎，而『總公司』底經理之一，便是『製糖廠』底董事。無怪乎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財政寡頭專制國。』『財政寡頭統治一切，既宰制報紙，又宰制政府。』

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之一，其特別高度的利潤，在財政寡頭制底發展與鞏

● 見李濟斯所著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書 (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第五版

(一九〇八年巴黎版)，第一一頁，第一二頁，第一六頁，第三九頁，第四〇頁，第四八頁。

固中有極重大的作用。德國的銀行雜誌寫道：『在本國內部，沒有那一種事業，能獲得近似於在發行外國公債時作中介所賺得的那樣高度的利潤。』⁽¹⁾

『沒有那一種銀行業務，能像發行證券的事業那樣獲得高度的利潤。』據德意志經濟學家所作的統計，因發行工業企業證券而獲得的每年平均利潤數目如下：

| | | | |
|-------|-------|-------|-------|
| 一八九五年 | 三八·六% | 一八九八年 | 六七·七% |
| 一八九六年 | 三六·一% | 一八九九年 | 六六·九% |
| 一八九七年 | 六六·七% | 一九〇〇年 | 五五·二% |

『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間，因發行德國工業證券而「賺得」的金錢，計達十萬萬以上。』⁽²⁾

在工業高漲時期，財政資本獲得無限大的利潤，而在衰落時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就陷

⁽¹⁾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七期，第六三〇頁。

⁽²⁾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書，第一四三頁；並見桑巴德所著十九世紀的德國國民經濟一書 (W.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第二版(一九〇九年)，第五二六頁，附錄

於滅亡，大銀行便『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的事業，或『參與』獲利的『整理』和『改組』這些企業的事業。在『整理』這些虧本企業時，『股票資本跌價，即收入是按照較小的資本量來分配，以後便把這種資本量當作基礎來計算收入了。或者倘若收入降低到零時，便吸收新的資本，把這種新資本與收入微細的舊資本結合起來，便能產生充分的收入了。』而且，——希法亭又補充道，——現在這一切整理和改組手續，對於銀行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這是一種獲利的業務；第二，這是迫使窘乏的公司依賴於銀行的一種良好機會。』

請看如下的例子。多特蒙德城的礦業『聯合』股份公司。是在一八七二年創辦的。所發行的股票資本幾乎等於四千萬馬克，而當第一年獲得百分之十二的股息時，股票市價便漲到百分之二百七十。財政資本就措到了油，而賺得了二千八百萬的『小利』。在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又是那個很順利地把自己的資本增加到了三萬萬馬克的最大德國銀行，即『匯兌公司』。後來『聯合』股份公司底股息降低到零了。股東們只好贊成『勾銷』資本，即喪失一部分資本，以免喪失全部資本。於是經過多次『整理』的結果，在三十年以內便從『聯合』股份公司

● 見財政資本一書，第一七二頁。

賬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萬以上的馬克。『現在，這個公司原先的股東們手裏所有的股票，只剩下票面價值百分之五了』⁽¹⁾，而銀行在每次『整理』中，却繼續『賺錢』。

把發達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拿來做投機生意，也是財政資本所經營的一種特別有利益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壟斷權是與地租壟斷權及交通壟斷權結合起來了，因為土地價格的增加，把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獲利的機會等等，首先是依這些土地與城市中心的交通是否便利為轉移，而這些交通線是操在經過參與和分配經理位置而與這些銀行相聯繫的大公司掌握中的。結果便形成了銀行雜誌職員，專門研究土地貿易及土地典押等事業的德國作家愛施維格所謂『泥潭』的局面：經營城郊土地買賣事業的投機狂，各建築公司的破產（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諾爾公司』的破產，這個公司因『最富足和最強大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之助，抓得了達一萬萬馬克的巨款，而這個銀行，當然是經過『參與』制，即暗地裏，在背後動作，並且『不過』損失了一千二百萬馬克，便卸去了一切責任的），從那些浮吹的建築公司方面，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以及與『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機關勾結，用欺騙手段包辦頒發基地證書和

●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書，第一三八頁，以及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五一頁。

市議會關於允准建造的文據等等。

『美國人的風俗』，本來是歐洲的教授們和慈善的資產者所假意厭棄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却簡直成了各國一切大城市中流行的風俗了。

一九一四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托拉斯』，即由三個柏林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鐵路公司、電車公司和公共馬車公司）組成一個『同益』公司。銀行雜誌載道：『當公共馬車公司底大部分股票轉到其他兩個運輸公司手裏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就知道有這一種計劃存在：本來可以完全相信抱這種目的的人所說的話，他們是希望用統一調節運輸事業的方法來達到相當的節省，其中有一部分利益終究是能歸大眾享受的。但這個問題複雜化了，因為站在這個新創的運輸托拉斯背後的，是能隨意利用所壟斷的交通工具去適應其地段貿易利益的銀行。爲要相信這種完全斷語合理，祇須記起一件事實，就是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時，鼓勵創辦該公司的那個大銀行底各種利益就已經滲合進來了。換句話說，這個運輸企業利益是和地段貿易利益互相錯綜的。』

● 見愛麗維格所著泥潭一文 (T. Eschwege: "Der Sumpf")，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九五二頁；同

上，一九二二年第一期，第二三三及往下各頁。

原來，這條城市電氣鐵道東面的支線必須經過屬於銀行的那些地段，而當該路建設工程已有保證時，銀行便把這些土地賣出去，結果是使自己和幾個參與人獲得了巨量的利潤……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操縱着幾十萬萬的資本，便絕對必然要深入於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而不管政治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細節』怎樣。在德國經濟文獻上，通常都是阿諛式地讚美自己普魯士官吏的廉潔，而指摘法國人的巴拿馬式舞弊習氣或美國人的政治賄賂風氣。但是，實際上，甚至專論德國銀行事業的資產階級作品，也不得不時常遠遠越出單純銀行業務的範圍，例如，因官吏們轉到銀行中去服務的事實增多，而不得不論及『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在培倫街』（即『德意志銀行』所在地）『暗中鑽營肥缺的德國官吏，還有不受賄賂的麼？』●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一九〇九年著作了一篇標題為拜占廷式侵略政策底經濟意義的論文，曾說及威廉第二到巴力斯坦的旅行，以及『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道的建築』，而認為『這一件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於德國受到『包圍』一事』（所謂『包圍』是指愛得華第七

● 引自運輸業托拉斯一文（"Vorkaufstrust"），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八九頁。

● 引自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一文（"Der Zug zur Bank"），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七九頁。

底政策，他會企圖孤立德國，而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來包圍它）『應負的責任，要比我們所作的一切政治錯誤所負的責任還大。』●我們已經提過的常在這個雜誌上撰稿的作家愛施維格，在一九一二年寫了標題為財閥和官吏的論文，其中揭露了一位德國官吏菲爾克爾底行爲。菲爾克爾本來是卡德爾問題研究委員會中的委員，嘗以努力作事見稱，而不久以後就在最大卡德爾（鋼鐵新迪加）中獲得了一個肥缺。這一類全非偶然的事件，便使這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在許多經濟生活方面所擔保的經濟自由，都已成爲毫無意思的紙上空文』，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甚至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們避免淪爲不自由人民的厄運。』●

至於講到俄國，那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够了。數年前，所有報紙都記載過一個消息，說信託局經理達維道夫離開政府職務，而在一個大銀行中獲得了一個位置，按照合同，他在數年中所得的薪俸，就要超過一百萬盧布以上。這個信託局是個行政機關，其任務是『要統一全國一切信託機關底活動』，並供給了首都各銀行八萬萬以至十萬萬盧布的津貼●。

● 見同上一期銀行雜誌，第三〇一頁。

● 仍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二期，第八二五頁，一九一三年第二期，第九六二頁。

● 見阿哈德所著前書，第二〇二頁。

資本主義底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權與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分離，貨幣資本與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分離，單靠從貨幣資本上獲得收入爲生的食利者與企業家及其他一切直接參加資本運用事業的人們分離。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統治，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這種分離已達到了極大的程度。財政資本超越於其他一切資本形式的事實，是表明食利者和財政寡頭佔有統治地位，是表明少數佔有財政『實力』的國家超越於其餘一切國家。至於這一過程已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可以從發行證券——發行各種有價證券——的統計中看出來。

賴馬克在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①上公佈了關於全世界發行證券最周詳、最完備而且可以比較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後來在經濟書籍中屢次分別引用過的。以下便是四個十年間的總結：

每十年內發行證券的數目（單位十萬佛郎）

| | |
|-----------|-------|
|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 七六·一 |
|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 六四·五 |
|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 一〇〇·四 |
|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 一九七·八 |

① 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冊，一九一二年海牙版。——統計表第二欄，即關於各個小國家的材料，大體上是按一九〇二年的標準擬定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由於在普法戰爭以及戰後德國創業舞弊時代加緊發行公債的關係，全世界發行證券的總數提高了。一般和大體說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個十年間，增加速度比較還不很快，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才大量增加起來，十年之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見，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轉變時代，不僅是在壟斷組織（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增長上發生了轉變（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了），而且是在財政資本增長上也發生了轉變的時代。

據賴馬克估計，一九一〇年全世界有價證券總數，約有八千一百五十萬萬佛郎。他爲了刪去重複的大概數目，便把這個總數減到五千七百五十萬萬至六千萬萬佛郎。以下便是這個數目在各國間的分配情形（此地所引用的總數是六千萬萬）：

一九一〇年有價證券數目表（單位十萬萬佛郎）

| | | | | | |
|-----|-------|-----|-----------------|-------|-------|
| 英國 | | 一四二 | 日本 | | 一一 |
| 美國 | | 一三二 | 荷蘭 | | 一二·五 |
| 法國 | | 一一〇 | 比利時 | | 七·五 |
| 德國 | | 九五 | 西班牙 | | 七·五 |
| 俄國 | | 三一 | 瑞士 | | 六·二五 |
| 奧國 | | 二四 | 丹麥 | | 三·七五 |
| 意大利 | | 一四 | 瑞典、挪威、羅馬尼亞及其他國家 | | 二·五 |
| | | | 總共 | | 六〇〇·〇 |

根據這些數字，立刻便可看出，四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非常特出的，它們各佔有自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不等的有價證券。其中有兩個是最老而且是——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擁有殖民地最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即英國和法國；其他兩國是在發展速度方面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生產中散佈程度方面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這四個國家一共擁有四千七百九十萬萬佛郎，即約佔全世界財政資本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國，都是這樣或那樣成爲這四個國家，這四個國際銀行家，這四個全世界財政資本「棟樑」底債務人和納貢者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特別考察資本輸出在造成財政資本國際依賴與聯繫網這一事業中所起的作用。

四 資本輸出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底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制佔統治的現代資本主義底特徵是資本輸出。

資本主義是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此時勞動力也成爲商品了。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之發展，就是資本主義底明顯特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

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是必不可免的。英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比其他各國都早，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它施行自由貿易，希圖成爲『環球作坊』，成爲供給所有各國製品的承辦人，而所有其他國家就應當供給它各種原料，作爲交換。但英國底這種壟斷地位，至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時期已被破壞了，因爲當時其他許多國家都用『保護』關稅實行自衛，而發展成爲獨立資本主義國家了。二十世紀開始時，已形成了另外一種壟斷制：第一，在所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都形成了資本家底壟斷聯合；第二，那些資本蓄積達到極大程度的少數最富國家已處於壟斷地位。結果在先進國家裏就出現了巨量的『過剩資本』。

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雖有驚人技術進步發生，而到處都仍然還是半飢半飽，乞丐不如的民衆生活水準提高起來，那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資本過剩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也就是往往提出這種『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會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大衆生活的貧困，是這種生產方式底根本必要條件和前提。當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過剩資本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生活底水準，因爲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底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去，藉以提高利潤的。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因爲缺少資本的關係，利潤通常都是很高，地價較低，工資低廉，原

料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範圍，鐵道的主要路線已經建設起來或已在開始建設；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障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在少數國家中已經『成熟過度了』，『獲利的』投資場所已是不够了（在農業不發達與羣衆貧困的條件下）。

以下便是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資本的大概數目：

投在國外的資本 (單位十萬萬佛郎)

| 年 份 | 英 國 | 法 國 | 德 國 |
|-------|--------|------------|------|
| 一八六二年 | 三·六 | 1 | 1 |
| 一八七二年 | 一五 | 10 (一八六九年) | 1 |
| 一八八二年 | 二二 | 15 (一八八〇年) | ? |
| 一八九三年 | 四二 | 20 (一八九〇年) | ? |
| 一九〇二年 | 六二 | 27—37 | 12·5 |
| 一九一四年 | 七五—100 | 60 | 44·0 |

● 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 (Hobson: "Imperialism"), 一九〇二年倫敦版, 第五八頁; 黎舍爾所著前書,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才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在大戰前夜，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以至二千萬萬佛郎。按最低限度的利率五厘

- 第三九五頁和第四〇四頁；安恩特 (P. Arndt) 所寫一文，見世界經濟文匯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一九一六年版，第七卷，第三五頁；賴馬克所著一文，見公報 (Nejmarck, Berlin)；蒂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第四九二頁；路易·喬治 (Lloyd-George) 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見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出版的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哈姆斯所著全世界經濟問題一書 (B. Harna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耶拿版，第二三五及往下各頁；施里德爾博士所著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一書 (Siegmund Schill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卷，第一五〇頁；皮施所著大不列顛資本之投殖等一文 (George Pains: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見皇家統計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七十四卷，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號，第一六七及往下各頁；吉烏里奇所著德國底經濟發展與德國銀行在國外的擴展一書 (Georges Monitch: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à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一九〇九年巴黎版，第八四頁。

計算，從這一數目上所得的收入，每年當達八十萬萬佛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全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國家中資本主義寄生性底堅實基礎！

這種投在外國的資本究竟怎樣分配於各個國家以及究竟投在什麼地方，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祇能給個大概的回答，但這個大概的回答，也能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底某些普遍的相互關係和聯繫：

國外資本分配於世界各洲的大概情形 (一九一〇年左右) (單位十萬萬馬克)

| | 英國 | 法國 | 德國 | 總數 |
|-------------|----|----|----|-----|
| 歐洲……… | 四 | 二三 | 一八 | 四五 |
| 美洲……… | 三七 | 四 | 一〇 | 五一 |
| 亞洲、非洲、澳洲……… | 二九 | 八 | 七 | 四四 |
| 共計……… | 七〇 | 三五 | 三五 | 一四〇 |

在英國佔居首要地位的，是它的殖民地的領土，它在美洲也有很多的殖民地(例如坎拿大)，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更不必說了。英國巨量資本的輸出，是與巨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極密切關係的，關於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講到。法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它輸到國外的資本，

主要是投在歐洲，首先是投在俄國（至少有一百萬萬佛郎），並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國家公債，而不是投在生產企業中的資本。法國帝國主義與佔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貸的帝國主義。德國帝國主義又是另外一種帝國主義：它的殖民地不多，它投在國外的資本，要比其他各國更為平均地分配於歐美兩洲之間。

資本的輸出，在所輸到的那些國家中，是要影響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因此，資本的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相當的停滯，但這種停滯又只會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擴大加深其向前的發展。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是常常有機會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底性質就能暴露財政資本和壟斷組織統治時代底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誌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表演着一種很值得亞力斯多芬舉筆描寫的滑稽劇。很多的外方國家，自西班牙到巴爾幹，自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向巨大的貨幣市場公開或祕密地要求借款，有時是十分急迫地要求借款。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形並不怎樣美妙，而政治的前途也不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於拒絕發給借款，因為生怕鄰國捷足先登，同意借款，而相繼獲得相當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是常常多沾利益的：商務條約上的優惠條件，開設煤站，建設海港，利益豐厚的租借，定購大

財政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統治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到處都施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繫』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公開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規定拿一部分債款來購買債權國底出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借款的條件。法國在最近二十年來（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時常採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各個特別巨大企業彼此訂立的契約，往往——如施里德爾所『柔和』描寫的那樣●，——『近於收買行徑』。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司奈德，英國的阿姆司脫龍，便是這種商號底標本，它們與巨大銀行和政府皆有秘密的聯繫，在締結借款條約時，是不易『避開』它們的。

法國借款給俄國的時候，便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六日締結的商務條約上把它『逼迫了』一下，而獲得相當的讓步，直至一九一七年為止；同樣，法國根據它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與日本締結的商務條約，也從日本方面獲得了相當的讓步。奧國和塞爾維亞兩國關稅戰爭，從一九〇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二期，第一〇二四頁。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四六，三五六及三七一等頁。

六年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一年，而只有過七個月的休戰，其一部分原因就是奧國和法國在供給塞爾維亞軍需品方面發生的競爭。德沙尼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衆議院中說道，法國各商號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供給了塞爾維亞價值四千五百萬佛郎的軍用品。

奧匈帝國駐沙保羅（巴西）領事在工作報告中說道：『巴西鐵道建築工程，大部分是用法比英德等國資本進行的；這些國家在簽訂與鐵道建築工程相關連的財政手續契約時獲得了供給鐵道建築料的特權。』

由此可見，財政資本真可說是把它的密網佈滿於世界各國了。在這方面，建立於殖民地的銀行和分行，實有很大的作用。德國帝國主義者看見『老牌』殖民帝國在這方面特別『順利』的情形，真是羨慕不已：在一九〇四年，英國有五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二千二百七十九個分行（一九一〇年，有七十二個銀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個分行），法國有二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一百三十六個分行，荷蘭有十六個殖民地銀行和六十八個分行，而德國却『祇有』十三個殖民地銀行和七十個分行。美國資本家又妬羨英德兩國資本家，而於一九一五年訴說道：『在南美洲，五個德國銀行

● 黎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三七五頁，並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八三頁。

有四十個分行，五個英國銀行有七十個分行；在最近二十五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了四十萬萬美金左右的資本，結果它們支配了這三國裏面全部商業百分之四十六。』●

在假借的意義來講，輸出資本的國家已把世界分完了。但財政資本又達到了實行直接分割世界。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資本家底壟斷同盟，即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首先就分割國內市場，將本國生產幾乎完全奪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國內市場是必然和國外市場相連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之增加，隨着一切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之擴大，隨着

● 見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研究院紀事刊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五十九卷，一九一五年五月出版，第三〇一頁。在同卷第三三一頁上又指明說，有名的

統計學家皮施在財政雜誌統計家 (Statistician) 最近一期上發表的論文中，認為英德法比荷五國所輸出的資本

總數，計有四百萬萬美金，即等於二千萬萬佛郎。

最大壟斷同盟底『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它們相互間的國際協定，形成國際卡德爾。

這便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底新階段，較先前集中程度高得無比。我們且來看看這種超等壟斷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吧。

電氣工業是最足以代表最新技術進步和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這個工業部門，在兩個最先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是最為發達的。在德國，一九〇〇年的危機，特別厲害地加緊了這工業部門的集中。當時那些已與工業充分密切混合生長了的銀行，在這個危機時期更極度加速加深了較小企業崩壞的過程，較小企業被大企業吞併的過程。『凡最需要銀行幫助的那些企業，——愛德思寫道，——銀行恰巧拒絕予以幫助，於是那些和銀行無密切關係的公司，起初雖有過瘋狂的興盛，後來却遭遇了無可救藥的破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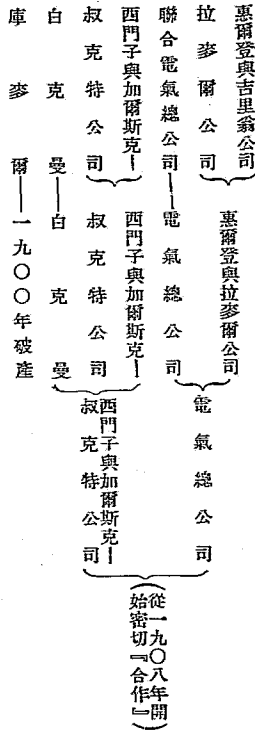
結果，在一九〇〇年以後，集中過程便大步前進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電氣工業中有七八個『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包含有數個公司（總共有二十八個公司），每個集團背後站着有兩

●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二三二頁。

個以至十一個銀行。到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時，所有這些集團都合併成爲兩個或一個集團了。且看這個過程是怎樣發展的：

電氣工業中的集團

在一九〇〇年以前：



到一九二二年時：

這樣發展起來的著名的『電氣總公司』，一共統治着一百七十以至兩百個公司（經過『參與』制），其所支配的資本總共約十五萬萬馬克。單就它的國外直接代表機關數目來說，就有三十四個，其中十二個是股份公司，分佈於十多個國家中。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德國電氣工業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經等於二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其中有六千二百萬是投在俄國的。不用說，

這個『電氣總公司』是一個極大的『聯合』企業，單就它所有的製造公司數目來說，便有十六個，這些公司製造着各種不同的產品，從被覆線和隔電器起，直至汽車以及航空器具止。

但是，歐洲的集中過程，也就是美國集中過程底一個組成部分。其經過情形如下：

美國

總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湯姆生、霍斯東公司為歐洲創設了一個公司
愛迪生公司為歐洲創設了『法國愛迪生公司』，後者又把專賣權轉讓給德國公司

聯合電氣公司
電氣總公司 (A.E.G.)

電氣總公司 (A.E.G.)

德國

這樣便形成了兩個電氣『強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依賴於它們的電氣公司了』，——海尼格在他那篇標題為電氣托拉斯之路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關於這兩個『托拉斯』底週轉和企業規模，下列數目字便能使我們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大概觀念：

| | 商品週轉 (單位百萬馬克) | 僱員人數 | 純利 (單位百萬馬克) |
|----------------------|------------------|--------|----------------|
| 美國的『總電氣公司』(G.E.O.)…… | 一九〇七年· 二五二 | 二八,〇〇〇 | 三五·四 |
| | 一九一〇年· 二九八 | 三二,〇〇〇 | 四五·六 |
| 德國的『電氣總公司』(A.E.G.)…… | 一九〇七年· 二一六 | 三〇,七〇〇 | 一四·五 |
| | 一九一一年· 三六二 | 六〇,八〇〇 | 二一·七 |

一九〇七年，美國的托拉斯和德國的托拉斯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競爭便從此停止了。美國的『總電氣公司』『獲得了』美國和加拿大；德國的『電氣總公司』『分得了』德國、奧國、俄國、荷蘭、丹麥、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幹。關於『女兒公司』，又締結了特殊的——當然是祕密的——條約，這些『女兒公司』逐漸侵入新的工業部門以及『新的』而表面上尙未分割的國家中去。此外，條約上還規定互相交換新發明和實驗成績。

要和這個實際上是統一的、全世界的、支配有數十萬萬資本、在天涯地角都有其『支店』、代表機關、代辦處及聯系等等的托拉斯來競爭，不待說是很難很難的。但是，這兩個強大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實，當然並不能排除在勢力對比因不平衡發展、戰爭、破產等等的關係而發生變更時實行重新分割世界的可能。

煤油工業便是企圖實行這種重新分割，為重新分割世界而鬥爭的一個極可注意的例子。

『世界的煤油市場，——愛德思在一九〇五年寫道，——現在還是由兩個巨大財政集團所割據着，這兩個集團便是美國的洛克費爾「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和俄國的巴庫煤油田主人路特希理德與諾貝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古烏里舍所著前書，第二三九頁；海尼格所著前文。

爾。這兩個集團彼此有密切的聯系；但是幾年以來，它們的壟斷地位已受到五大敵人方面的威脅：（一）美國煤油源的窮竭；（二）巴庫的曼德舍夫公司方面的競爭；（三）奧國的煤油源；（四）羅馬尼亞的煤油源；（五）海外的煤油源，特別是荷屬殖民地（極富足的「撒姆爾」公司和「協爾」公司，也是與英國資本有聯系的）。後面三批企業是與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那些德國大銀行有聯系的。這些銀行有條不紊地獨自發展煤油業，例如在羅馬尼亞，以求獲得它們「自己的」據點。在羅馬尼亞煤油業中，一九〇七年計有外資一萬八千五百萬佛郎，其中德資佔七千四百萬。」^①

經濟作品中逕直稱爲『分割世界』的鬥爭開始了。一方面，洛克費爾底『美孚油公司』想要奪得一切，便在荷屬境內設立了『女兒公司』，收買荷屬印度的煤油源，想以此打擊它的那個主要敵人，即英荷合資創辦的『協爾』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及其他柏林銀行又力求把羅馬尼亞『保持』在『自己』手裏，而把它與俄國統一起來反對洛克費爾。但是，洛克費爾佔有更大得多的資本，且擁有運輸煤油和輸送煤油給消費者的卓越組織。這個鬥爭結果必然要使

①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九三頁。

② 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四五頁。

『德意志銀行』遭到失敗，而且真正在一九〇七年遭到了完全失敗，此時『德意志銀行』只有兩條出路：或是甘願受到數百萬損失而取消它的『煤油利益』，或是屈服。結果『德意志銀行』選定了後一條出路，而與『美孚油公司』訂結了很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照此條約，『德意志銀行』必須『不作任何損害美國利益的經營』，但同時又規定，在德國一旦通過政府壟斷煤油的法律時，這個條約便應失其效力。

『煤油趣劇』從此開始了。德國一個財政大王格文涅爾爵士，即『德意志銀行』經理，委託他的私人書記史道斯開始進行主張煤油壟斷的宣傳。這個最大柏林銀行底全部龐大機關及其所有一切廣泛的『聯系』都一齊動作起來，報章上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喊聲，說要反對美國托拉斯方面的『羈軛』。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國會幾乎是一致通過決議，請政府製定煤油壟斷法案。政府馬上響應了這個『大眾歡迎的』主張，於是『德意志銀行』想欺騙其美國對手，用國家壟斷的手段來補繕自己業務的這一套把戲，就好像是已經獲得勝利了。德國煤油大王已在預管着不亞於俄國糖廠主人那種巨量利潤的滋味；但是第一，德國各大銀行彼此發生了分贓的爭執，『匯兌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求私利的企圖；第二，政府害怕與洛克費爾鬥爭，因為德國能否不必經過洛克費爾而獲得煤油，是很成問題的（因為羅馬尼亞的生產率不大）；第

(1)

三，一九一三年德國要花費十萬萬金錢去從事於戰爭的準備。壟斷的法案擱置下去了。鬥爭結果是洛克費爾『美孚油公司』暫時獲得了勝利。

柏林銀行雜誌論到這點時寫道，德國祇有施行電氣壟斷，變水力為廉價的電氣，才能與『美孚油公司』鬥爭。但是，——銀行雜誌補充說道，——『電氣壟斷制，只有生產者需要它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就是說，只有在下一次電氣業大危機已經逼近，而各私家電氣「康采恩」現時在各處所設立，並且已從市政局和政府等方面獲得了某些部分壟斷權的那些高昂的巨型電站，處於不能獲利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到那時候，就會必須採用水力；但是也不能由政府出資來把水力變成廉價的電氣，而還是必得交給「受政府監督的私人壟斷組織」去經營，因為私資工業已經訂立了許多契約而商定了可以取得巨量的償金；以前加里業的壟斷是如此，現在煤油的壟斷是如此，將來電氣的壟斷也會是如此。我們的那些迷戀於美妙原則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畢竟應當瞭解：德國實行的壟斷制，從來也沒有抱定想使消費者獲得利益或給政府一部分企業利潤的目的，當然也就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結果，而始終都是由國家負責來挽救將近破產的私人工業的一種手段。』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一〇三六頁；一九一二年第二期，第六二九頁；一九一三年第一期，第三八八頁。

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得不出這種寶貴的供認。在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私人的壟斷和國家的壟斷在財政資本時代怎樣連成一氣，它們兩者實際上不過是各最大壟斷者為分割世界所進行的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個別環節。

商航事業方面集中過程莫大的增長，也引起了分割世界的結果。德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公司，即『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和『北德路易郵船公司』，各有資本二萬萬馬克（股票和債券）和價值一萬八千五百萬至一萬八千九百萬馬克的輪船。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成立了所謂摩爾根托拉斯，叫做『海上貿易國際公司』，它把英美兩國九個輪船公司統一起來，擁有資本一萬二千萬美金（四萬八千萬馬克）。德國資本大王們和這個英美托拉斯間，在一九〇三年時就因分配利潤而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德國的公司放棄了在英美兩國間轉運事業上的競爭。條約上很明確規定那些海港『屬於』誰，並且成立了一個共同的監察委員會等等。條約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但規定有一個附帶條件：在一旦發生戰爭時，該約即應失其效力。

國際鐵軌卡德爾形成的歷史，也是異常耐人尋味的。英比德三國的鐵軌製造廠在一八八四年

●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一二五頁。

間，即工業情形極端衰落的時候就第一次作過組織這樣一個卡德爾的嘗試。加入協約的各國工廠，同意彼此不競爭各訂約國內部的市場，而把國外市場按如下標準分割了：英國獲得百分之六六，德國獲得百分之二七，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七。印度完全給予英國。爲了反對一個沒有加入協約的英國公司，便合力舉行進攻，而照商品買價總量中抽取相當部分來補償這一進攻的耗費。但到一八八六年時，就有兩個英國公司退出了同盟，而這個同盟便從此瓦解了。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後來發生的幾次工業興盛的時期中，始終沒能達到過協定。

一九〇四年初，在德國成立了鋼業新迪加。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又按如下標準而把『國際鐵軌卡德爾』恢復起來了：英國獲得百分之五三點五；德國獲得百分之二八點八三；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一七點六七。後來法國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獲得的份額是在超過百分百以上的總數中佔有百分之四點八、百分之五點八和百分之六點四，即是在達到百分之一〇四點八、百分之一〇五點八和百分之一〇六點四的數目中獲得上述的部分。一九〇五年，又有美國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加入進來，隨後奧國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現在，——福格爾施坦在一九一〇年間寫道，——地球已經分完了，於是大消費者，尤其是國營鐵道，也就因爲世界已被分割完結，而且沒有願及它們利益的關係，可以像仙人一樣到天宮裏去隱居了。』●

又有一九〇九年成立的國際銻業新迪加，它在德比法西英五國工廠所組成的三個集團間正確地分配了生產的份量。還有國際火藥托拉斯，它據李甫曼說，『是所有一切德國炸藥製造廠間最新式的密切的同盟，後來，這些製造廠與法美兩個同樣組成的炸藥製造廠，共同分割了全世界。』

照李甫曼計算，德國所參加的國際卡德爾，在一八九七年約有四十個，而在一九一〇年便有一百個左右了。

有些資產階級的作家（完全叛變了自己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例如一九〇九年立場的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了）認為：國際卡德爾是資本國際化底最明顯表現之一，它令人能希望在資本主義下達到民族間的和平。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實踐上是一種詭辯，是一種辯護最惡劣機會主義的卑污手段。國際卡德爾表明現在資本家底壟斷組織已發達到怎樣的程度，各資本家同盟究竟爲了什麼而進行着鬥爭。後面這一點最關重要：祇有它才能向我們

①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一〇〇頁。

② 見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Liepmann: "Kartelle und Trusts"），第二版，第一六一頁。

說明現時事變底歷史經濟內容，因為鬥爭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在經常依照種種較為次要和暫時性的原因而變更着，但是鬥爭底本質，它的階級內容，祇要階級一天存在着，總是不能變更的。例如德國資產階級（考茨基在理論上的推論方面實已轉入德國資產階級那裏去了，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爲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蔽現代經濟鬥爭（分割世界）底內容，而強調這個鬥爭底某種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裏所說的當然不只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資本家實行分割世界，並不是由於他們有特別的惡意，而是因爲現有的集中程度迫着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去獲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來作的，因爲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有別種分割法。實力是隨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而變更的；爲要瞭解現時的事變，必須知道那些問題是由實力變更更來解決，至於這些變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變更，還是經濟範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變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基本觀點。用資本家同盟相互鬥爭與妥協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不和平的，後天又是和平的形式）問題去偷換鬥爭與妥協底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到詭辯家的地步。

最新資本主義時代表明給我們看，各個資本家同盟彼此根據經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形成

了相當的關係，而與此同時並存，與此密切相關的，便是各個政治同盟，即各個國家，彼此也根據領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殖民地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經濟領土』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

六 列強分割世界

地理學家蘇泮在他論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①一書中，對十九世紀末期殖民地擴張的情形，作了如下一個簡短的總結：

| 屬於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面積百分比 | | (包括美國在內) | |
|-----------------|--------|----------|--------|
| | 一八七六年 | 一九〇〇年 | 增減數 |
| 在非洲的…… | 一〇·八% | 九〇·四% | 十七九·六% |
| 在波里內西亞的…… | 五六·八% | 九八·九% | 十四二·一% |
| 在亞洲的…… | 五一·五% | 五六·六% | 十五·一% |
| 在澳洲的……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 |
| 在美洲的…… | 二七·五% | 二七·二% | 一〇·三% |

① 見蘇泮所著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A. Supan: "Die territorialen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一九〇六年版，第二五四頁。

『所以，——蘇洋總結起來說，——分割非洲和玻里內西亞，便是這個時代底特點。』因為在亞洲和美洲已經沒有未被佔據、即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了，所以我們必須把蘇洋底結論擴大起來而說道：最終分割世界，便是這個時期底特點。所謂最終，並不是說再沒有可能實行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並且是必不可免的，——而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殖民政策，已經使佔據地球上所有未被佔據的土地的過程完畢了。世界是第一次已被分完了，所以將來祇有實行重新分割，即是從一個『主人』轉歸另一個『主人』而不是從無主的轉歸『主人』了。

所以，我們是處在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這個殖民政策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即財政資本，有異常密切的聯系。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詳細考察事實的材料，以便盡量確切地查明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的區別，以及現在的實際情形。這裏，首先就發生了兩個事實問題：是不是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殖民政策加強起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尖銳化起來呢？在這方面，現時世界被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美國作家莫里斯在他的論殖民政策史的著作中，企圖把英法德三國在十九世紀各個時期所

● 見莫里斯所著殖民政策史一書 (Henry O.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一九〇〇年紐約

版，第二卷，第八八頁；第一卷，第四一九頁，第二卷，第三〇四頁。

有殖民地領土面積統計材料歸納起來。現在把他所得出的總結簡錄如下：

殖民地領土面積

| 年 份 | 英 國 | | 法 國 | | 德 國 | |
|---------|-----|-------|------|------|-----|------|
| | 面 積 | 人 口 | 面 積 | 人 口 | 面 積 | 人 口 |
| 一八一五至 | | | | | | |
| 一八三〇年…… | ? | 一二六·四 | 〇·〇二 | 〇·五 | — | — |
| 一八六〇年…… | 二·五 | 一四五·一 | 〇·二 | 三·四 | — | — |
| 一八八〇年…… | 七·七 | 二六七·九 | 〇·七 | 七·五 | — | — |
| 一八九九年…… | 九·三 | 三〇九·〇 | 三·七 | 五六·四 | 一·〇 | 一四·七 |

英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時期，並且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年間也加緊得頗為厲害。法德兩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正是在這二十年間。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壟斷前期的資本主義，即以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資本主義發展極廣的時期，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現在我們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以後，便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並異常加強了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所以，資本主義進到壟斷階段，進到財政資本階段，顯然是和分割世界鬥爭尖銳化的事實聯系着的。

霍柏森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年這一時代劃為歐洲列強加緊擴展領土的時代。據他的計算，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奪得了三百七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五千七百萬人口；法國奪得了三百六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三千六百五十萬人口；德國奪得了一百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一千六百七十萬人口；比利時奪得了九十萬平方哩的面積連同三千萬人口；葡萄牙奪得了八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九百萬人口。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拚命爭奪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中有目共睹的事實。

在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代，即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代間，英國佔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為，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貝爾在他發表於一八九八年的論現代英國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在一八五二年的時候，如笛斯勒這樣一個一般說來是很傾向於帝國主義的英國政府要人，尚且說過『殖民地是懸在我們頸上的磨石』。而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成為當代英國主人公的，却已是公開宣傳帝國主義和毫無顧忌地實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羅德斯和張伯倫了！

● 見新時代雜誌(Die Neue Zeit)，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二頁。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佔領導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當時已經明白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底所謂純粹經濟根源和社會政治根源間的聯系。張伯倫當時宣傳帝國主義是『真正的、聰明而合理的政策』，並特別指出了英國當時在世界市場上所遇到的德美比方面的競爭。資本家當時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創辦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也重複着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急於去奪取世界上尚未分割的土地。羅德斯，據他的密友新聞記者斯特德敘述，在一八九五年論到自己的帝國主義思想時告訴他說：『我昨天在倫敦（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會議。我在那裏所聽到的粗野的發言，充滿了要求「麵包，麵包！」的呼聲。回家時，我把所看見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結果我便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底重要了；我的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爲使聯合王國四千萬人民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領土，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取得新的區域來銷售我國工廠與礦山所出產的貨物。我常常說，帝國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戰，你就應當做帝國主義者。』

● 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四頁。

這就是巨萬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戰爭罪魁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年所說的話。他擁護帝國主義的言論，雖然是粗笨了一點，雖然是公然無恥，但按實質說，他和馬斯洛夫、秋得庫木、沙特列索夫、達維德諸位先生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等等底『理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羅德斯是一位稍微誠實一點的社會沙文主義者：

爲要對分割世界領土和最近幾十年來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變動，給一個較確切的敘述，我們且來利用蘇泮在上述那部著作中對世界列強殖民地領土問題所作的統計。蘇泮所考察的是一八七六年和一九〇〇年的情形。我們現在就拿一八七六年（他選定這一年，是很恰當的，因爲這年正是西歐資本主義壟斷期前發展階段大體上已經完結的時期）和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來加以考察，並以胡伯納底地理統計表上更新的數目字來替代蘇泮底數目字。蘇泮只考察了殖民地，而我們認爲要描寫出一幅完備的世界分割情景，最好是把關於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目字也都增補進去。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已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第三兩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結果我們便得到如下的總結：

列強佔有的殖民地領土

(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百萬)

| | 殖民地 | | 宗主國 | | 總計 |
|----------------------|------|-------|------|-------|----------|
| | 面積 | 人口 | 面積 | 人口 | |
| 英 國 | 二二·五 | 二五一·九 | 三三·五 | 三九三·五 | 四四〇·〇 |
| 俄 國 | 一七·〇 | 一五·九 | 一七·四 | 三三·二 | 一六九·四 |
| 法 國 | 〇·九 | 六·〇 | 一〇·六 | 一三六·二 | 一四五·一 |
| 德 國 | | | 二·九 | 五五·五 | 九五·一 |
| 美 國 | | | 〇·三 | 一二·三 | 七七·二 |
| 日 本 | | | 〇·三 | 九·七 | 一〇六·七 |
| 六大強國共計 | 四〇·四 | 二七三·八 | 六五·〇 | 五二三·四 | 八一·五 |
| 其他強國(比利時, 荷蘭等)所有的殖民地 | | | | | 九·九 |
| 半殖民地(波斯, 中國, 土耳其) | | | | | 一四·五 |
| 其餘各國 | | | | | 二八·〇 |
| 全地球 | | | | | 一三三·九 |
| | | | | | 一, 六五七·〇 |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是分割『完畢』了。自一八

七六年後，殖民地領土已大規模地擴展了：六個最大強國所有的殖民地領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即由四千萬平方公里增加到了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增加數等於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比各宗主國總共的面積（一千六百五十萬）多至一倍半以上。其中三個強國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沒有一點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即法國，當時也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到一九一四年時，這四個強國已獲得了面積一千四百一十萬平方公里，即約比歐洲面積多至一倍半的殖民地領土，所包含的人口幾達一萬萬人之多。殖民地的擴展是異常不平衡的。例如，我們若拿面積大小和人口數量都相差不久的法德日三國來比較，便可看見法國所佔有的殖民地領土（按面積說），幾乎等於德日兩國殖民地領土總和的兩倍。不過，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初期，法國財政資本底數量大概也要比德日兩國合共數目多幾倍。除開純粹的經濟條件而外，地理及其他等等條件也是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基礎而影響於殖民地領土的大小。近幾十年來，在大工業、交易和財政資本發展的壓力下，世界各國均等化，各國經濟與生活條件平等化雖然進展得很快，但各國彼此間的差別還是不小的。在上述六國中，我們看見，一方面是進步得異常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另一方面，却是老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它們近年來的進步要比前面幾個慢得多；第三方面，還有一個在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俄國），這裏最新的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說

是由資本主義前期種種關係所結成的特別稠密的網子籠罩着。

除了大強國底殖民地領土以外，我們在統計表上還列進了各個小國家底小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可以說是可能和一定會實行『重新分割殖民地』時所爭取的最近目標。這些小國家之所以能保持其殖民地，主要是因為各大強國彼此間存在有一種妨礙分贓妥協的利害矛盾和磨擦等等。至於『半殖民地』國家，那它們便是自然界和社會一切部門中所常見的過渡形式的例子。財政資本在一切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佔有異常巨大的勢力，可以說是決定一切的勢力，能支配那些享有完全政治獨立地位的國家，並且在實際上已經支配了這些國家；關於這種事實的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說到。但是，對於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以被支配的國家和民族喪失獨立地位為條件的那種支配。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的國家，便是標本式的『中間』形式。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在世界其餘部分已瓜分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當然是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了。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也有過的，甚至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就已經有過的。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羅馬進行了殖民政策，實行了帝國主義。但是『一般』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彼此根本區別的議論，就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

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①。其實，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也是與財政資本底殖民政策大不相同的。

最新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便是最大企業家壟斷同盟底統治。當所有原料的來源都掌握於一手的時候，這種壟斷同盟便堅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知道，各資本家國際同盟也就因此而拚命集中力量去剝奪敵方一切競爭的可能，購買各種原料來源，例如鐵礦山或煤油源等等。只有佔領殖民地，才可完全保障壟斷組織在與競爭者鬥爭中戰勝各種意外的危險，甚至能戰勝敵方企圖用國家壟斷的法律來實行自衛的那種危險。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原料來源的鬥爭愈緊張，於是為佔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帶拚命的性質。

『我們，——施里德爾說，——可以提出一個也許使某些人覺得荒誕無稽的斷語：即城市和工業人口的增加，在最近將來與其說會遇到食品缺乏方面的障礙，倒不如說會遇到工業原料缺乏方面的障礙。』例如愈

① 見劉卡斯所著大羅馬與大不列顛一書(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1911年鄂克斯版，或見克羅麥爾所著古代與現代帝國主義一書(Harl of Cron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1910年倫敦版。

趨愈貴的木材方面的缺乏，皮革方面的缺乏，紡織工業原料方面的缺乏，都日益緊張起來。「工業家同盟企圖在全世界範圍中造成農業和工業相互的平衡；一九〇四年幾個主要工業國家棉織業工廠主同盟所成立的圖際同盟便是一個例子；後來在一九一〇年間，歐洲各國麻織業工廠主同盟也成立了這樣一個同盟。」●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尤其是他們中間的現今的考茨基派，當然企圖把這種事實底意義減輕，硬說原料『可以』不用『昂貴而危險的』殖民政策，而在自由的市場上獲得，說原料供給是『可能』用『簡單』改良一般農業條件而使之大大增加起來。但是，這種說法變成了辯護帝國主義的議論，變成了粉飾帝國主義的辭藻，因為它的出發點就是忘記了現代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即壟斷。自由市場日益成爲過去的事情了；壟斷性的新迪加和托拉斯日益減削自由市場；而『簡單』改良農業條件，就是改善民衆生活狀況，就是提高工資、減少利潤。試問，除了甜蜜改良派底幻想以外，那裏會有能於關懷民衆生活，而不去設法奪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財政資本，不但重視已經發現的原料來源，而且重視那些潛在的來源，因為在現今時代中，技術進步的迅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是發明了新的方法（爲了這一個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八至四二頁。

目的，大銀行能够派遣大批工程師和農業學家等等去進行專門的調查），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就會變成有利可圖的了。礦源的調查，新的製造方法以及利用各種原料的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財政資本必然企圖擴大經濟領域，甚至企圖擴大一般領域。托拉斯計算將來『可能的』（不是現在的）利潤和計算將來的壟斷結果，而按兩三倍估價的標準把自己的財產資本化；同樣，財政資本估計到可能的原料富源，生怕在爭奪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後幾塊土地，或爲重新分割已經分完了一些土地的瘋狂鬥爭中落後於他人，所以總想奪得儘量多的土地，而不管要用什麼手段，不管這塊土地好壞如何，不管它位置在什麼地方。

英國資本家極力設法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埃及一帶，發展棉花的生產（一九〇四年埃及二百三十萬公畝耕地中，已經有六十萬公畝，即四分之一強的面積，是種植棉花的），俄國資本家想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一帶發展棉花生產，因爲他們這樣來作，便能更容易地戰勝國外的競爭者，更容易獲得壟斷原料產地的地位，更能用『聯合制的』生產，用包攬棉花生產製造方面一切手續的辦法去創立一個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業托拉斯。

資本輸出底利益也同樣要促進掠取殖民地的舉動，因爲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祇能在這個殖民地市場上）用壟斷的手段去消滅競爭者，獲得承辦權，鞏固相當的『聯繫』等

等。

在財政資本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財政資本底政策和思想體系，都使奪取殖民地的趨向加強起來。希法亭很正確地說過：『財政資本不是傾向於自由，而是傾向於統治。』有一位法國資產階級的作家好像是發揮和補充羅德斯上述的意見^①而寫道：現代的殖民政策，除有各種經濟原因而外，還有許多社會原因：『由於生活日益艱難，不僅使工人羣衆感受痛苦，而且使中等階級感受痛苦，於是在一切老文明國家中，便積累起一種危及社會安寧的急燥、憤怒和怨恨心理；脫離了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必須找到應用的場所，要讓它在國外去發洩，以免在國內發生劇變』。^②

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時，必須指出財政資本和適應於財政資本的國際政策，即歸結於列強爲經濟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鬥爭的那個政策，造成許多過渡的國家依賴形式。這個時

① 見本書第一〇五頁。——譯者。

② 見瓦爾所著法國殖民地領土 (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摘自劉西葉所著大洋洲的分割一書

(Henri Rousso: "Le partage de l'Océanie")，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一六五頁。

代中的標本國家形式，不僅有兩種基本國家，即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依賴國，它們在政治上和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財政和外交方面處處依賴於他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各種過渡形式之一的半殖民地。另一形式底標本便是阿根廷。

『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他論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寫道，——在財政上完全依賴於倫敦，簡直可以說是英國底商業殖民地了。』●施里德爾根據駐倍諾斯愛勒的奧匈帝國領事一九〇九年報告，認定英國投在阿根廷的資本，計有八十七萬五千萬佛郎。我們不難設想，英國財政資本及其忠實『友人』（外交）因有這種情形，已與阿根廷資產階級及其全部經濟政治生活方面的領導人物間發生了怎樣堅固的聯系。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自由貿易一書 (Schulze-Gaevernitz:

„Prak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

一九〇六年來比錫版，第三一八頁；並見瓦特浩督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 (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六頁。

葡萄牙底例子，又是政治上獨立而財政上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多少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事實上，自從進行爭奪西班牙承繼權的戰爭（一七〇〇至一七一四年）時起，二百多年以來，始終是處在英國保護之下。英國爲了鞏固它在反對敵人（西班牙和法蘭西）鬥爭中的地位，就實行保護了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中輸入商品，尤其輸入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商港和海島、海底電線等等的可能。各個大國和小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是一向就有的，但它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已成爲普遍的制度，已成爲『世界分割』體系中的一部分，變爲全世界財政資本活動中的一些環節了。

爲結束世界分割問題起見，我們還要指出以下一點。不但西美戰爭後的美國書籍和英布戰爭後的英國書籍，完全公開而明確地在十九世紀末尾和二十世紀初期提出了這個問題，不但最『羨妬』『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書籍，有系統地估計了這件事實；而且在法國資產階級書籍中也很肯定而廣泛地——當然是從資產階級觀點上可能做到的那種限度內——提出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家特里沃底言論，在他所著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中論列強與分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一卷，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頁。

割世界一章內寫道：『近年來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除中國以外，都被歐洲列強和美國佔據了。由此已發生了許多衝突以及預示着最近將來就會發生更可怕爆裂的勢力範圍的變遷。大家都得趕急來幹，因為凡是沒有及時爭得一份的國家，就會永遠也得不到它所應得的一份，也就會不能參加那一定會成爲下一世紀（即二十世紀）主要事實之一的大規模剝削世界的事業。正因爲如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與美國也就充滿了擴張殖民地領土，即實行「帝國主義」的狂熱，而這個「帝國主義」便是十九世紀末葉最顯著的特點。』然後，作者又補充說：『在這樣分割世界的情形下，在這種瘋狂獵取地球上的寶藏和巨大市場的角鬥中，在這個十九世紀時代創立起來的各個帝國間的勢力對比，是與創立了各該帝國的民族在歐洲所佔的地位全不相稱的。在歐洲佔優勢的國家，足以決定歐洲命運的國家，並不是在全世界上也同樣佔優勢的。可是，殖民地領土的廣大，佔據尙未查明財富的希望，顯然是會反轉來影響到歐洲列強勢力的對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這個已經改變了歐洲境內政治局面的問題，一定還會日甚一日地改變這個局面的。』^①

① 見特里沃所著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一書(J. E. Drantle: "Problems of politics and society")，一九〇二年巴黎版，第二八九頁。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現在我們就要作出相當的總結，把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議論歸納起來。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底發展與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祇是發達到了一定的、很高的階段時，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性已經變成為與它們相反的東西，而由資本主義進到更高社會經濟形態上去的那個過渡時代底特點，已經到處形成並暴露出來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方面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底基本特性；壟斷是適與自由競爭相反的東西，但自由競爭分明已開始變成壟斷，而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用最大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集中達到了很高程度，以至產生了並產生着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斷組織，以及十來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金的銀行資本與這些壟斷組織溶合起來的現象。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臨駕在競爭上面，與之並存，因而產生出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磨擦與衝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進到更高制度上去的過渡。

如果要下一個極簡短的帝國主義定義，那就要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壟斷階段。這樣的定

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財政資本是佔壟斷地位的少數最大銀行底銀行資本與工業家壟斷同盟底資本溶合起來底資本，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又是從自由擴展於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強國所佔據的區域中去的殖民政策，進到獨佔已經分割完結了的世界領土的那個殖民政策上去的過渡。

太簡短的定義雖很方便，因為它能把主要點歸納起來，但是如果你要從它中間特別引伸出所要說明的那個現象底各個極重要的特點，那它就顯得很不充分了。因此，我們並不忘記，所有一般定義都只有一種有條件的和相對的意義，始終不能把現象的全部發展上的一切複雜聯系概括起來，而認為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比較完滿的定義，其中包括如下五個主要特徵：第一，生產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而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溶合為一，而在這個『財政資本』基礎上造成了財政寡頭；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起來了；第五，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帝國主義就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已經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已經完結了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

我們往下就會知道，倘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僅注意到它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即上述定義所局限的那些現象），而且注意到資本主義底現時階段在一般資本主義發展中所佔的歷史地位，或注意到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兩個主要傾向的關係時，我們便可以而且應當對帝國主義下一個另外的定義。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按上面那個含義所說的帝國主義，毫無疑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爲了使讀者對於帝國主義能得到一個儘量確切的概念，我們故意儘量引用了對於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特別確切查明的事實不得予以承認的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作的估計。爲了同一個目的，我們又引用了一些詳細的統計材料，使讀者們能明瞭銀行資本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等等，數量怎樣變成了質量，成熟的資本主義怎樣變成了帝國主義。不待說，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一切界線，當然都是有條件的，是變動的，所以，如果爭論帝國主義究竟是在那一年或那一個十年『最終』確立，便是愚不可及了。

但是講到帝國主義定義問題時，首先就要與所謂第二國際時代，即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年時期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進行爭論。

在一九一五年，甚至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考茨基就堅決反對了我們所下的那個帝國主義定義中的基本思想，他說決不應把帝國主義瞭解爲某種經濟底『時期』或階段，而應把它瞭解爲

一種政策，即財政資本所『選定』的一種政策；不應把帝國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看作一個東西』；如果把帝國主義瞭解爲『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現象』（卡德爾、保護關稅制、財政資本家底統治、殖民政策），那末關於帝國主義是爲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問題，便是一種『毫無意思的贅言』，因爲這樣一來，『帝國主義便會自然是資本主義切身必需的東西』等等。爲了把考茨基的意見表白得特別清楚，我們就來引用他所下的帝國主義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根本直接反對我們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因爲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來宣傳這些思想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一部分人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一個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

這個定義是根本要不得的。它片面地，即任意地單只拿出一個民族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本身

●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〇九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

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以及按它對帝國主義的關係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任意而且很不正確地單只把這個問題和兼併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內的工業資本聯接起來，並且又同樣任意而不正確地把兼併農業區域這一點着重提了出來。

帝國主義就是趨向於兼併，——這便是考茨基底定義在政治方面的含義。這方面的含義是對的，可是極不完滿，因為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是一般趨向於壓迫和反動的。但我們在這裏要考察考茨基本人所納入他的定義中的經濟方面。在這一方面，考茨基底定義中的不正確處，就十分顯然暴露出來了。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所以，在法國恰巧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因工業資本衰弱，財政資本特別迅速發展而使兼併政策（殖民政策）極度加劇起來，也就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祇是要兼併農業區域，而且要兼併工業極發達的區域（德國垂涎於比利時，法國垂涎於羅來因區）；因為第一，地球已經分割完畢了，在實行重新分割的時候，不得不伸手於任何一塊土地；第二，對於帝國主義重要的，是幾個巨大強國爭先恐後地力求獲得霸權，即力求爭得領土，其主要目的不是直接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霸權（比利時是德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英國的一個據點；巴格達是英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德國的一個據點等等）。

考茨基特別——並且屢次——援引英國人底言論，說英國人確定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底純粹政治上的意義是與他考茨基底意思相符的。我們且舉英國人霍柏森爲例吧。霍柏森在他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寫道：

『新帝國主義和舊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已不是表明一個強盛帝國企圖單獨稱霸，而是表明好幾個帝國受擴大政治勢力和獲得商務利益的同樣慾望所驅使，互相爭雄的理論與實踐；第二，就是財政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着商業利益。』●

由此可見，考茨基一般引證英國人底言論，實際上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除非他去援引那些庸俗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或公開辯護帝國主義的人）。由此可見，考茨基冒充繼續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實際上却要比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一步，因爲霍柏森還比他正確一點地估計到了現代帝國主義底兩個『歷史具體的』特點（而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恰巧是絕對忽視歷史具體性的！）：第一，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第二，財政資本家統治商人。倘若主要點是工業國兼併農業國，那末商人就要佔主要地位了。

● 見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 (Johns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三三四頁。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成了全面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那一整個思想體系基礎；關於這點，我們往後還要講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是極不莊重的：究竟是把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稱爲帝國主義呢，還是把它稱爲財政資本的階段呢。隨你去怎樣稱呼，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要點是在於考茨基把帝國主義底政策和它的經濟割開了，他把『兼併』解釋爲財政資本所『選定』的政策，而拿另一個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爲立腳點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起來。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制是能與政治上非壟斷的、非強力的、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照這樣說來，世界領土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分割完畢而成爲資本主義各大強國互相競賽特殊形式之基礎的這一局面，是能與非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容的。結果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上各個極深刻的根本矛盾，而是加以掩飾與蒙蔽；結果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去代替馬克思主義。

考茨基同德國一個辯護帝國主義及兼併政策的作家孔諾夫進行過爭論，後者粗笨而厚顏無恥地說道：帝國主義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是進步的；因此，必須向帝國主義去匍匐跪拜，歌功頌德！他這種話，令人聯想起民粹派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描繪的那個諷刺畫：倘若馬克思主義者

認爲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和進步的現象，那末他們就應該開設酒店而努力培植資本主義了。考茨基『反對』孔諾夫說：這話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而祇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對這種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兼併等等。

這種反駁似乎是很雅觀的，而實際上是等於更精細地更隱藏地（因此更危險地）宣傳與帝國主義妥協，因爲『反對』托拉斯和銀行底政策，而不觸犯托拉斯和銀行底經濟基礎，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就是一種善良而幼稚的幻想。迴避現存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不去揭露極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底理論，而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這樣的『理論』，當然只能用去辯護那個主張和孔諾夫保持統一的意見。

『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考茨基說，——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即是把卡德爾政策推廣到對外政策方面去，而成爲超帝國主義的階段』●，即全世界各帝國

● 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二二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主義國家彼此聯合起來，而不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鬥爭的階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杜絕戰爭的階段，『由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來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

關於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說到，以便詳細證明這個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到了怎樣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呢，我們就要照本書底一般計劃來考察一下關於本問題的確切經濟統計。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這個所謂『超帝國主義』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抑或只是一種超等廢話而已呢？

倘若把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作『純粹』抽象的東西，那末由此可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發展趨勢是走向壟斷，因而也就要達到全世界統一的壟斷組織，即全世界統一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但這同時也是毫無意思的；這正好像說：『發展趨勢』是走向於在化學實驗室裏面生產食料。在這點上說來，超帝國主義『論』，也如『超農業論』一樣，是一竅不通的。

倘若所說財政資本時代的『純粹經濟』條件，是指二十世紀初的歷史具體時代的東西，那末對於『超帝國主義』這一死板抽象概念（這個概念只是爲了一個最反動的目的，即使人不去注意

●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一期（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第一四四頁。

現存矛盾底深刻性)的最好的回答，便是拿現代全世界經濟底具體經濟事實與之對立起來。同時，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這些毫無意思的議論，又鼓舞了那種十分錯誤而替帝國主義辯護人助威的思想，似乎財政資本底統治把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削弱下去，而實則財政資本底統治正是把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加強起來。

卡爾維在他所著的全世界經濟入門●這一本書裏企圖把一切最重要的純粹經濟的材料綜合起來，以求具體說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全世界經濟底內部關係。他把全世界分為五個『主要經濟區域』：(一)歐洲中部區(除英俄而外的全部歐洲)；(二)不列顛區；(三)俄國區；(四)亞洲東部區；(五)美國區。同時他把殖民地列入佔有這些殖民地的國家底『區域』內，而把少數沒有分配於各區的國家，例如亞洲境內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境內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亞等等，『擱置一旁』。

● 見卡爾維所著全世界經濟入門，(R. Calver: "Einführung in die Volkswirtschaft"), 一九〇六年柏林版。

他所引錄的關於這些區域的經濟材料，略如下表：

| 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區域 | 面積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 | 人口 (單位百萬) | 交通工具 | | 貿易 (進出口共計) (單位十萬馬克) | 工業 | |
|------------|------------------|--------------|---------------|---------------|---------------------------|----------------|---------------|
| | | | 鐵道 (單位千公里) | 商船 (單位百萬噸) | | 開採量 (單位百萬噸) | 織造 (單位百萬支) |
| 歐洲中部區● | (二七·六) | (三八八) | 二〇四 | 一八 | 四一 | 二五一 | 二六 |
| 不列顛區● | (三三·六) | (四六) | 一四〇 | 一 | 二五 | 二四九 | 五一 |
| 俄國區 | (二八·九) | (三九八) | 六三 | 一 | 三 | 一六 | 三 |
| 亞洲東部區 | (二二·六) | (一三一) | 八 | 一 | 二 | 〇〇·二 | 七 |
| 美國區 | (三〇) | (一四八) | 三七九 | 六 | 一四 | 二四五 | 一九 |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高的(交通工具、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展的)三個區域，即歐洲中部區、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其中有三個是統治着世界的國家：即德國、英國和美國。它們相互間的帝國主義性的競賽和搏鬥是極端尖銳的，因為德國祇有一塊很小的地區和少許的殖民地，而

● 括弧裏所指的是殖民地底面積和人口。

『歐洲中部區』之形成尚須待諸來日，並且這個『歐洲中部區』是在殊死戰中誕生着的。目前全歐洲底特徵便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反之，在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內，政治上的集中程度是很高的，但它們相互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前者所有的殖民地簡直是不可勝數；後者所有的殖民地却異常微小。而在殖民地方面資本主義又剛在開始發展起來。奪取南美洲的鬥爭，一天尖銳一天。

有兩個區域是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區域，即俄國區與亞洲東部區。前者人口密度極稀，後者極密；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後者全不集中。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爲奪取中國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

試把考茨基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與這些實際的情形，與這種經濟政治條件極不一致的情形，與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相稱的情形，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狂烈的鬥爭的情形等等比較一下。難道他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喪胆的市儈想逃避險惡實情的反動企圖麼？考茨基認爲是『超帝國主義』底胚胎的國際卡德爾（恰好與實驗室裏的藥片生產『可能』稱爲超農業底胚胎一樣），豈不是給我們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例子麼？豈不是給我們表明由和平分割轉爲不和平的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轉爲和平分割的例子麼？難道從前協同德國——例如在國際鐵軌新迪加或國際商船托拉斯內——來和平分割了全世界的美國財政資本及其他各國財政

資本，現時不是又在按那些用並非和平的手段變更了的新的勢力對比來重新分割世界麼？

財政資本和托拉斯，並不減弱全世界經濟中各個部分發展速度上的差異，而是加強這種差異。既然勢力對比變更了，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訴諸強力，還能有什麼解決矛盾的辦法呢？在鐵道統計中，我們便可看到說明整個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和財政資本發展速度參差情形的非常確切的材料。在最近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史中，鐵道長度底變更情形如下：

鐵道長度 (單位一千公里)

| | 一八九〇年 | 一九一三年 | 增加數 |
|--------------------|-------|-------|-----|
| 歐洲..... | 二二四 | 三四六 | 一二二 |
| 美國..... | 二六八 | 四一一 | 一四三 |
| 一切殖民地..... | 八二 | 二一〇 | 一二八 |
| 亞美兩洲的獨立國和半獨立國..... | 四三 | 一三七 | 九四 |
| 共 計..... | 六一七 | 一,一〇四 | 四八七 |

● 見德意志帝國一九一五年統計年鑑 (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15), 第四六至四七頁; 一八九二年的鐵道統計 (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 1892). 關於一八九〇年各國殖民地間鐵道分佈方面的某些詳細情形，只能給了一個大約的估計。

可見，鐵道發展得最爲迅速的，是亞美兩洲的殖民地和獨立（以及半獨立）國家。大家知道，四五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底財政資本，是在這裏統治一切，支配一切的。亞美兩洲殖民地及其他國家裏建築二十萬公里的新鐵道，便是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有着收入上的特別擔保，使鋼鐵廠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的四百餘萬萬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與海外諸國內發展得最快，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強國（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緊張起來了。財政資本從特別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中徵收的貢款，日益增加。在分割這種『贓物』的時候，極大一部分是落到那些生產力發展速度並不常居首位的國家掌握中。各最大的強國中鐵道長度，把它們的殖民地包括在內計算，有如下表：

（單位一千公里）

| | 一八九〇年 | 一九一三年 | 增加數 |
|-------------|-------|-------|------|
| 美國…………… | 二六八 | 四一三 | 十一四五 |
| 不列顛帝國…………… | 一〇七 | 二〇八 | 十一〇一 |
| 俄國…………… | 三二 | 七八 | 四六 |
| 德國…………… | 四三 | 六八 | 二五 |
| 法國…………… | 四一 | 六三 | 二二 |
| 五大強國共計…………… | 四九一 | 八三〇 | 三三九 |

總之，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鐵路，是集中於五個最大強國手中的。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集中程度，即財政資本集中程度，還要遠過於此，因為例如有很大數量的美俄及其他各國鐵路的股票和債券，是屬於英法兩國巨富富翁的。

英國因有廣大的殖民地領土，故能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十萬公里之多，即四倍於德國。但誰都知道，在這一時期內，德國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石煤和鋼鐵出產量的增長，要比英國（更不必說法國和俄國）快得不可計量。一八九二年，德國出產了四百九十萬噸生鐵，英國出產了六百八十萬噸；但到一九一二年時，已是一千七百六十萬噸與九百萬噸之比，即趕過英國很遠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爲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蓄積的程度與財政資本所分得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份量互不相稱的情形，除了戰爭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 還請參照克拉蒙德所著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帝國間的經濟關係一文 (Edgar Corn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載於皇家統計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一九一四年七月號，第七七七及往下各頁。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現在我們還要來考察帝國主義底另一個非常重要而為大部分談論帝國主義問題的人往往沒有充分估計到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底缺點之一，便是他比非馬克思主義者霍柏森還倒退了一步。我們此地所指的，就是帝國主義所具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最深的經濟基礎，便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性的壟斷，即是從資本主義裏面產生出來，而處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競爭的一般環境中，同時又與這個一般環境經常發生無法解決的矛盾。但是，這種壟斷，也與其他任何一種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出停滯和腐化的趨勢。既然已在規定着，雖然只是暫時規定着壟斷性的價格，於是那些推動技術進步，亦即推動其他一切進步，推動進展的種種動因，也就相當消失下去；於是也就造成了一種以人工方法阻止技術進步的經濟上的可能。例如美國有個歐文斯發明了一個能引起製瓶業革命的製瓶機。德國製瓶工廠主卡德爾收買了歐文斯發明品專利權，而把這個發明品擱置起來，不拿去應用。當然，在資本主義下，壟斷決不能完全而很長久地除去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也就是超帝國主義論一竅不通的原因之一）。當然，用改良技術的辦法來減低成本費和提高利潤的可能，是促進各種變更

的。但壟斷制所特有的停滯的與衰落的趨勢，還是繼續發生作用，並且它在個別工業部門中，在個別國家裏，往往還在相當時期內佔得上風。

壟斷式的佔據特別廣大特別富饒或位置很便利的殖民地，也引起同樣的結果。

其次，帝國主義是巨量貨幣資本積聚於少數國家之中；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種資本數達一千萬萬佛郎以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的有價證券。因此，食利者階級，即是專以『剪息票』為生者，完全不參加什麼企業而專以懶惰為職業者的階級，或正確點說，食利者階層，就空前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經濟基礎之一的資本輸出，更使食利階層完全脫離生產的現象加強起來，使剝削數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為生的國家處處都呈現出寄生性的特徵。

『在一八九三年間，——霍柏森寫道——不列顛投於國外的資本，約佔不列顛聯合王國財富總數百分之十五。』●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這個資本又大約增加了一倍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霍柏森往下又說，——加於納稅人的負擔是很繁重的，對於工商業家所有的意義又是很少的；而對於尋求投資場所的資本家』（這個名詞在英文上是用『investor』，意

●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五九頁和第六〇頁。

即『投資者』，食利者一語來表示的)，『却是巨量利潤底來源：據統計家季芬計算，在一八九九年間，大不列顛從它的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即輸入和輸出中所得到的純利，等於一千八百萬金磅（即一萬七千萬盧布左右），是按八萬萬金磅週轉總額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所得出的數目。』雖然這個數目很大，但它並不能說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而能把它說明的，却是從『所投殖的』資本中獲得的收入，即食利者階層底收入，其數目為九千萬以至一萬萬金磅。

在世界最帶『商業性的』國家中，食利者底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四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底本質。

因此，『食利國』（Rentnersaat），或放債國這一名詞，便成了論帝國主義問題的經濟作品中通用的名詞。世界分成了極少數放債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了。『在投放於國外的資本中，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佔居首位的是投在政治上依賴的國家或同盟的國家中的資本：

英國借債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各國。在必要時，英國底海軍便擔任法庭差役的職務。英國底政治力量保護英國免除債務人方面的反叛。』瓦特浩曾爵士在他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Schulze-Gaevernitz, Br. Imp.），第三二〇頁及往下各頁。

一書中，舉出荷蘭作為『食利國』的標本，並且說現在英國和法國也成為這樣的國家了。施里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很標本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列入進來，祇因為它『很少帶工業性』。美國祇在美洲方面才算是債權國。

『英國，——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漸漸由工業國變成放債國了。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絕對的增加，但是從利息和股息方面，從發行證券，擔任中介和投機事業方面所獲得的收入，其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却日益增長起來。照我的意見，這個事實也就是帝國主義高漲底經濟基礎。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要比出賣者與購買者的關係更堅固些。』至於德國，那末柏林的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他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德國是食利國一文中寫道：『德國人喜歡譏笑現在法國常有的那種變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指出，若就資產階級來說，

① 見瓦特浩曾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 (Sart. von Waltershausen: "J. Volkwirt. Syst. aus.",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冊。

②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三頁。

③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前書，第三二〇及往下各頁。

德國情形是日益接近於法國情形的。」

食利國是寄生腐化資本主義底國家，這種情形不能不反映到這種國家裏一切社會政治條件上面來，尤其是不能不反映到工人運動中的兩個基本派別上面來。爲盡量明顯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且來引證霍柏森底言論。霍柏森是一位最『可靠的』證人，一則因爲誰也不能疑心他偏袒『馬克思主義正統派思想』；二則因爲他是個英國人，很知道這個最富有殖民地、富有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經驗的國家中的實際情形。

霍柏森在英布戰爭血跡未乾時敘述帝國主義與『財政家』利益的聯系，敘述『財政家』從各種承辦手續方面所得的利潤數量增加的情形說：『資本家便是指揮這一標本寄生主義政策的人，但是同一動機也影響到了工人中間那些特殊階層。在很多城市中，各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依政府定貨的；冶金業中心與造船業中心底帝國主義，大都以這種情形爲基礎。』據這位作者底意見，有兩種情況削弱了各老大帝國底力量：第一是『經濟寄生性』，第二是用依賴國民編制軍隊。『第一種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的風氣，驅使統治國利用其各個外藩區域、各個殖民地、各個

依賴國來增加本國統治階級的財富，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之安分守己。『我們要補充一句：爲要在經濟上有可能使用這種收買手段，不論其形式如何，便要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

關於第二種情況，霍伯森寫道：『帝國主義盲目症底最奇怪表徵之一，便是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所表現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爲最甚。我們所藉以佔領了印度帝國的那些戰役，大部分都是由我們用土人編成的軍隊去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都是由英國人擔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所有各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外，幾乎都是由土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伯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那樣的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與瑞士那部分爲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就是說，少數從遠東獲取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爲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精製品工業中工作的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宗食品和大宗半製造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或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闢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往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

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賈品，並利用這種賈品來豢養許多馴服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業品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漢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為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細想一下，當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家，「投資人」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底經濟監督，而使其能從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汲取利潤，而把它用之於歐洲的時候，這種制度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為複雜，世上各種勢力的變動很難逆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的。假如這些勢力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

作者說得完全對。假如帝國主義底勢力不會遇到抵抗，那末它們就會正是走向這種結局的。他對於『歐洲聯邦』在現代帝國主義情勢下的意義，是估計得正確的。只須補充說，暫時在大多

●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一〇三、二〇五、一四四、三三五以及三八六頁。

數國家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勝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有系統地、一往直前地朝着這一方『努力的』。帝國主義就是分割世界，並且不只剝削中國一個國家，就是使少數最富國家享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因此就造成一種經濟上的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藉以養育，形成並鞏固機會主義。只是不要忘掉一般反抗帝國主義和特別是反抗機會主義的力量，而這種反抗力量，自然是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所看不見的。

德國機會主義者吉爾德布蘭，先前曾因擁護帝國主義而被開除了黨籍，現在却正可以充當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他很巧妙地補充了霍柏森底言論，宣傳必須組織『西歐聯邦』（俄國除外），以便『共同』行動：去反對非洲黑人，反對『大同教運動』，以便維持『強有力』的陸軍和海軍』，反對『日華兩國聯盟』●等等。

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一書中關於『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敘述，也給我們指出了同樣的寄生性特徵。從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年間，英國的國民收入大約增至兩倍，而在這一時期中從『國

● 見吉爾德布蘭所著工業統治地位和工業社會主義之動搖一書(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ohütterung der Industrie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 一九一〇年版，第二二九及往下各頁。

外』所獲得的收入，却增加到了九倍。如果說『教育黑人去勞動』（當然是非用強迫手段不行的）是帝國主義底『功勞』，那末帝國主義底『危險』，就是『歐洲將把體力的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後把較重的工業勞動，卸到黑色人類身上，而自己安息於食利者生活，因而就會準備起紅種人和黑種人在經濟上以至於政治上的解放。』

英國離開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日益擴大起來，而專門用作富人游戲娛樂的場所。一般人講到蘇格蘭這一貴族化程度最高而專供狩獵及其他各種游藝用的地方的時候，便說它是『專靠遺產和卡內基先生』（美國巨富富翁）『來生活的』。英國每年消耗於賽馬和獵狐游藝的費用，就等於一千四百萬金磅（約合一萬三千萬盧布）。英國食利者底數目約計一百萬人。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口百分數日益減少：

| 英國人口 | | 主要工業部門中的工人數量 | | 工人對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 |
|--------|------|--------------|-----|-------------|--|
| (單位百萬) | | (單位百萬) | | | |
| 一八五一年 | 一七·九 | 四·一 | 二·三 | 二·三% | |
| 一九〇一年 | 三二·五 | 四·九 | 一·五 | 一·五% | |

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那些資產階級學者論及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說到工人『上層分子』和『真正無產階級下層分子』之間的區別。從上層分子中間產生出

(1)

大批參加合作社、職工會、游藝團體和許許多多教門的分子。選舉制是適應於這個階層的。英國的選舉制『還有充分的限制，能把真正無產階級下層分子除外』！！爲了粉飾英國工人階級底情形，人們通常只講到這些佔無產階級少數的上層分子：例如『失業問題主要只是涉及倫敦居民，以及很少爲政治家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分子的問題』●……其實應該說：很少爲資產階級政客和『社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分子。

從帝國主義國家中移往國外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從落後國和工資較低的國家中移入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招來的工人和移來的人口）逐漸增加的現象，也是與上述種種現象有關的帝國主義特點之一。據霍柏森說，英國移往國外的人口，自一八八四年起減少的情形如下：一八八四年計有二十四萬二千人，而一九〇〇年祇有十六萬九千人。從德國移往國外去的人口，在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間，達到了最高的程度，計有一百四十五萬三千人，但在後來二十年以內，却已跌到五十四萬四千人以至三十四萬一萬人。而從奧、意、俄等國移入德國的工人數量，却增加起來了。照一九〇七年的戶口調查，在德國計有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個外國人，其中有

●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第二四六、三〇一、三一七、三二三、三二四及三六一頁。

四十四萬零八百個工業工人和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個農業工人^①。法國礦業中的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②。美國從東歐南歐移入的僑民，從事於工資最低的工作，而升充監工和從事於工資優厚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美國工人^③。帝國主義又還有在工人中間也造成特權階層並使其脫離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趨向。

必須指出：在英國方面，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機會主義思想，引起工人運動暫時腐朽的趨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很久以前就已表現出來，因為帝國主義底兩個重大特點，即佔有巨量殖民地領土和在世界市場上佔居壟斷地位，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便存在於英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數十年之中，有系統地考察了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與英國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特點之間的這種聯系。例如，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裏寫道：「英

①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彙刊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第二一一卷。

② 見歐格爾所著法國資本底投殖一書 (Eugene: "Die Kapitalanlagen der Franzosen")，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

③ 見古爾維奇所著移民與勞動一書 (Hornwich: "Immigration and Labor")，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所以全世界上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概是想變終究造成一種與資產階級並列的資產階級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在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裏，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大約經過二十五年之後，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寫的那封信內，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後來，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裏又寫道：『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是作怎樣的想？他們對於這點的想法，也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對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也是這樣說明了的。）

這裏已經把因果關係明白指示出來了。原因是：第一，這個國家剝削着全世界；第二，它在

● 見馬恩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二卷，第二九〇頁；第四卷，第四五三頁。見

考茨基所著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書（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一九〇七年

柏林版，第七九頁；他這本書是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那個很早很早的時候寫的。

全世界市場上佔有壟斷地位；第三，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結果是：第一，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化的分子；第二，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已經最終完成了極少數國家分割全世界的事情，其中每個國家現時在『全世界』上所剝削的（指吸取額外利潤而言）那一部分，要比英國在一八五八年所剝削的少一點；每一個國家都利用托拉斯、卡德爾、財政資本以及債權債務關係等等而擁有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每個國家都在相當程度上佔有殖民地壟斷權（我們已經說過，在七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全部世界殖民地領土中，有六千五百萬，即百分之八十六是集中於六個強國掌握；有六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是集中於三個強國掌握。）

現今情形底特點，就是形成了不能不使機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絕對相反情形加強起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條件：帝國主義已從萌芽狀態長成爲統治的體系；資本家的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策中佔據了首要地位；世界地域上的分割已經完結；另一方面，現在已經不是英國獨佔壟斷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強國爲參加壟斷而進行鬥爭，這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特點。現時機會主義已不能如它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那樣，在某一個國家內獲得幾十年之久的完全勝利，但在許多國家裏都已經最終成熟，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腐化，以至於變爲社會沙文主義而與資產

階級的政策完全溶成一體了。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我們現在是把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當作廣義的批評來說，即是指社會上各個階級根據各自的一般思想體系對待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而言。

一方面，巨量的財政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掌握，造成異常廣泛而稠密的聯系和關係，不僅使中小資本家和中小業主受其支配，而且使最小資本家和最小業主也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一國財政資本家集團與其他各國財政資本家集團，為分割世界和統治其他國家而進行尖銳的鬥爭，——結果便使一切有產階級都紛紛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普遍』迷戀於帝國主義底前途，瘋狂擁護帝國主義，多方粉飾帝國主義，——這便是當代的標誌。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已侵入到工人

● 波特列索夫、齊赫克爾、馬斯洛夫諸先生所代表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無論是它的公開形式也好，無論是它的暗藏形式也好（齊赫芝、斯科別列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諸先生所代表的形式），也都是從俄國式

機會主義、即取消主義中長成的。

階級中間去了。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萬里長城。如果說現今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首領，是理應稱呼爲『社會帝國主義者』，卽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那末霍柏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已經指出了有屬於機會主義『費邊社』的英國『費邊帝國主義者』存在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通常是用較爲暗藏的方式來辯護帝國主義，抹煞帝國主義佔有完全統治地位並有深厚根源的事實，竭力把細枝末節提在前列，而拚命用一些毫不莊重的『改良』計劃，如由警察機關來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計劃，去引誘人們離開重要的問題。至於那些敢於承認說改良帝國主義基本特質的思想是一種荒謬思想的公然無恥的帝國主義者，却是很少發表意見的。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德國帝國主義者在所出版的全世界經濟文庫中，企圖考察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當然特別是那些非德屬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指出印度的騷動和抗議、納塔耳（非洲南部）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等。其中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來評論一部記載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行而有亞非歐三洲各國被外族統治的民族所派代表參加的附屬民族種族代表會議情形的英文書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於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作

了如下的估計：『他們說，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統治國應當承認附屬民族的獨立權；國際法庭應當監督各強國與弱小民族所訂條約的履行。代表會議並沒有越過這些幼稚願望範圍以外。他們毫不瞭解，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現今的形式緊相聯結的，因此（!!）與帝國主義作直接鬥爭是沒有希望的，至多也只能局限於反對某些特別可惡的過火現象。』●既然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基礎的企圖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幼稚的願望』，既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沒有『越過』它前進，所以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就要『越過』它後退，而走向於用冒充的『科學』來巧加掩飾的那種崇拜帝國主義的立場了。這也是一種『邏輯』呵！

用改良主義方法改變帝國主義基礎究竟是否可能做到呢，究竟是要向前進去使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繼續加緊加深起來呢，還是要往後退而使其減弱下去呢，——這便是批評帝國主義時所應注意的根本問題。既然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各方面的反動，是因財政寡頭底壓迫和自由競爭底消除而使民族壓迫加強起來，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幾乎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都有對帝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思想發生。考茨基以及廣大國際考茨基主義

● 見全世界經濟文庫（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表現，就在於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實行去與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思想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與它打成一片了。

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性的美西戰爭，在美國引起了『反帝國主義者』，即資產階級民主派最後一批戰士底反對運動。他們稱這次戰爭爲『萬惡』的戰爭，認爲兼併異國領土是違背憲法的行爲，宣佈說美國對菲律賓土人領袖阿奎納多的舉動是『沙文主義者底一種欺騙手段』（最初，美國向阿奎納多允諾給予菲律賓自由，後來却派美國軍隊登陸而把菲律賓佔領了），並引用了林肯底言論：『白人統治自己，便是自治；白人統治自己而又統治他人，便不是自治而是專制了。』●但是，既然這全部批評都是害怕承認帝國主義與托拉斯——亦即與資本主義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害怕響應大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出來的力量，那末這種批評也就不免是一種『幼稚的願望』。

霍柏森在批評帝國主義時所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柏森比考茨基更先表示否認了『帝

● 見巴士葉所著美國帝國主義一書（*L. Pensonille: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一九〇四年吉威版，

國主義底必然性』，而主張必須『提高人民底消費力』（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哩！）。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批評帝國主義，批評銀行專橫勢力，批評財政寡頭統治等等的，也有我們屢次援引過的阿哈德、藍斯堡、愛施維格、以及法國作家白拉爾，即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那部標題為英國與帝國主義的淺薄著作底作者。所有這些人並不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而是以自由競爭和民主制去與帝國主義對立，批評了勢必引起衝突和戰爭的巴格達鐵道建築計劃，發表了維持和平的『幼稚願望』等等，而那位研究國際證券發行情形的統計學家賴馬克，在一九一二年計算價值數千萬佛郎『國際』財富時，甚至大聲驚嘆道：『難道可以假定說和平竟會受到破壞麼？在這樣巨大的數目字下，竟會有人冒險挑起戰爭麼？』●

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方面表示出這樣的幼稚氣，當然是沒有什麼奇怪，而且他們本來就利於扮作這種幼稚模樣，而『煞有介事地』談論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但是，既然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間，也站上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說什麼在和

● 見國際統計學研究所公報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冊，

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者，偽社會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都是意見一致的』，試問這個考茨基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結果便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底深根，而只是用改良主義的『幼稚願望』來逃避這些矛盾，搪塞這些矛盾。

以下便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批評的標本。他舉出一八七二至一九一二年英國對埃及輸出輸入的統計材料，結果得出這方面的進出口數量竟比英國進出口總額增加得慢些。於是考茨基便作出結論說：『我們並沒有任何根據來假定說，英埃貿易若不用武力佔領埃及的手段，而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就會要發展得慢些哩。』『資本實行擴展的趨向』，『最好是能用帝國主義強力辦法，而用和平民主制辦法去實現。』●

考茨基底這番議論獲得了他的俄國跟班（以及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掩護人）斯皮克塔托爾先生方面拚命的擁護。這番議論正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批評底基礎，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考察一下。我們且從引證希法亭底言論開始，因為希法亭底結論，據考茨基屢次——其中有一次是

● 見考茨基所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國際同盟一書(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 Staat und Staatenbund")，一九一五年柏林版，第七二頁和第七〇頁。

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宣佈，是『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無產階級底任務，——希法亭寫道，——並不是要用已成過去的那個自由競爭時代和仇視國家的政策去與更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對立。無產階級對財政資本所施行的經濟政策的答覆，對於帝國主義的答覆，決不會是自由貿易，而只會是社會主義。現在，無產階級政策底目的決不能是實現什麼恢復自由競爭的理想——因為這種理想現在已變成爲反動的理想了，——而只能是用消除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完全消滅競爭。』

考茨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了，他在財政資本時代擁護『反動的理想』，什麼『和平民主制』以及『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因爲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向後轉，是從壟斷的資本主義回轉到非壟斷的資本主義上去，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辦法，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如果沒有財政資本，那末英國與埃及（或與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了。這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一般壟斷組織方面的限制，沒有受財政資本底『聯系』或壓迫（即也是壟斷）

● 見財政資本，第五六七頁。

所限制，沒有受各個國家壟斷式佔據殖民地的情形所限制，那末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麼？

考茨基底議論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意思，而這個『意思』又是毫無意思的。我們就退一步說吧：是的，如果沒有任何壟斷組織，自由競爭就會把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快些了。但是，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則產生着壟斷的那個生產集中與資本集中也就會來得愈厲害。而且壟斷已經產生出來了，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了！雖然壟斷組織現時已阻礙着發展，但這也不能成爲擁護自由競爭的理由，因爲自由競爭既然產生了壟斷，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無論你把考茨基底議論怎樣翻來覆去，但是在它中間除了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而外，便找不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如果把這種推斷改正一下，而說得如傑斯皮克塔托爾所說的那樣：現在英屬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要比英屬殖民地與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慢些，——但這也是挽救不了考茨基的。因爲打擊英國的也是壟斷，也是帝國主義，不過是其他國家（美國，德國）方面的帝國主義罷了。大家知道，卡德爾引起了一種新奇的保護稅制，其所保護的（這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上就已經指出了的〔三〕）恰巧是那些便於出口的貨物。其次，大家知道，卡德爾和財政資本所有的特性，是那種『按拋賣價格輸出』的制度，即英國人所稱爲『拋出』的制度：卡德爾在本國按壟

斷式高價出賣生產品，而在國外却以賤幾倍的價格銷售，以求打倒自己的競爭者，而把自己的生產擴大到最高限度等等。如果說德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是比英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發展得快些，那就只是證明德國帝國主義要比英國帝國主義新鮮些、強大些、有組織些、高一些，而決不是證明自由貿易底『優越』，因為這裏並不是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制或殖民地隸屬制鬥爭，而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鬥爭，一個壟斷同盟與另一個壟斷同盟鬥爭，一個財政資本與另一個財政資本鬥爭。德國帝國主義對英帝國主義勢力上的優越，要比殖民地界線和保護關稅牆垣厲害些：由此而得出一個擁護『自由貿易』與『和平民主制』的『理由』，便是一種鄙俗思想，便是忘掉帝國主義底根本特點與特性，便是用市儈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有趣得很，甚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監斯堡，雖也如考茨基那樣用市儈態度來批評帝國主義，但他對貿易統計材料所作的研究，却要比考茨基底研究較為科學一點。他並不是單用一個隨便拿來的國家和其餘各國比較，並不是單拿殖民地和其餘各國比較，而是把帝國主義國家輸出到兩種國家中去的出口統計材料拿來比較：第一種是財政上依賴於它而向它借款的國家，第二種是財政上獨立的國家。所得到的結果有如下表：

(1)

德國輸出量 (單位百萬馬克)

| 輸到財政上依賴於德國的國家 | | 輸到財政上不依賴於德國的國家 | |
|---------------|-------|----------------|---------|
| 羅馬尼亞 | 一八八九年 | 大不列顛 | 一九〇八年 |
| 葡萄牙 | 四八・二 | 法蘭西 | 七〇・八 |
| 阿根廷 | 一九・〇 | 比利時 | 三二・八 |
| 巴西 | 六〇・七 | 瑞士 | 一四七・〇 |
| 智利 | 四八・七 | 澳大利亞 | 八四・五 |
| 土耳其 | 二八・三 | 荷屬印度 | 四四・七 |
| 共計 | 二九・九 | 共計 | 六四・五 |
| | 二三四・八 | | 四〇・七 |
| | | | 十三六三% |
| | | | 十一二七% |
| | | | 十一〇八% |
| | | | 十五三% |
| | | | 十九二% |
| | | | 十一四% |
| | | | 十一四% |
| | | | 十八五% |
| | | | 十七三% |
| | | | 十一四三% |
| | | | 十七三% |
| | | | 十四七% |
| | | | 十四七% |
| | | | 增加百分數 |
| | | | 二,二六四・四 |
| | | | 一,二〇六・六 |
| | | | 共計 |

藍斯堡並沒有作出什麼總結，所以他也就很奇怪地沒有看到：如果這些數目字真能證明些什

(1)

麼，那也不過是證明他自己不對而已，因為輸出到財政上依賴的國家中去的，畢竟要比輸出到財政上獨立的國家中去的增加得快些，雖然是快得不多。（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着重點，因為藍斯堡底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藍斯堡考察商品輸出與借款間的聯系時寫道：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間，由幾個德國銀行作中介締結了發行羅馬尼亞公債的條約。其實，在未締約幾年以前，這些德國銀行就已經以這筆公債作擔保而發給過借款了。這筆公債主要是用來向德國購買鐵路材料的。一八九一年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量，計值五千五百萬馬克。第二年就跌到了三千九百四十萬馬克；中間經過一些起伏，到一九〇〇年時已跌至二千五百四十萬馬克了。直到最近幾年內，才因發行兩筆新公債而重新增加到一八九一年的水準。」

「德國對葡萄牙的輸出量，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間，因發行幾次公債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萬馬克（一八九〇年）；在此後兩年內，跌至一千六百二十萬馬克和七百四十萬馬克，直到一九〇三年時，才恢復到原先的水準。」

「德國與阿根廷貿易的統計材料，尤其表示得明顯。由於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〇年發行兩次公債的結果，德國對阿根廷的輸出量，在一八八九年計達六千零七十萬馬克。過兩年後，輸出量降到一千八百六十萬

(1)

馬克，即不到原先輸出量三分之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間，才又達到並超過一八八九年的水準，其原因是由於德國那時又貸給了阿根廷幾次國家公債和市政公債，供給了建築電氣工廠用的款項，以及其他各種信貸。

『德國對智利的輸出量，因發行一八八九年公債而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萬馬克（一八九二年），過一年後又跌至二千二百五十萬馬克。一九〇六年間，因由德國幾個大銀行作中介締結了新公債的結果，輸出量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萬馬克（一九〇七年），但到一九〇八年時，又跌至五千二百四十萬馬克了。』●

藍斯堡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一種很滑稽的市僧道德式的結論：與公債相連的出口是很不穩固，很不平衡的；把資本輸到國外，而不『自然而地』『和諧地』發展祖國工業，是很不妥當的；發行外國公債時，『克虜伯』工廠必須付出價值數于百萬的『高昂』賄款等等。但這些事實却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輸出量底增加，恰巧是與財政資本底欺詐勾當聯結着，財政資本絲毫也不願及什麼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只圖盡量剝括，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層皮：第一是從公債上取得一筆利潤，第二是當這筆公債用來購買『克虜伯』工廠底產品或鋼鐵新迪加底鐵路材料等等時，又是從這筆公債上取得許多利潤。

● 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一九及往下各頁。

我們再重說一遍，我們並不認為藍斯堡底統計是個完備的統計，但我們畢竟要把他的統計引用一下，因為他的統計是比考茨基和斯皮克塔托爾兩人底統計較為科學得多，因為藍斯堡指出了觀察問題的正確方法。為要推論財政資本在出口事業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財政家欺詐事業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卡德爾貨物銷售等等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單只拿一般殖民地與非殖民地比較，拿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比較，拿一個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與其餘一切國家比較，就會恰巧是迴避和掩蓋問題本質了。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理論批評，其所以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其所以只可用作宣傳和機會主義者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講統一的門徑，就是因為這種批評恰巧迴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斷組織和與之並存的自由競爭間的矛盾，財政資本底巨大『業務』（以及巨量利益）與自由市場上『誠實無欺的』貿易間的矛盾，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方面）與沒有加入卡德爾的那些企業（另一方面）間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所臆想出來的那個鼎鼎大名的『超帝國主義』論，也含有完全同樣反動的性質。試把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斷和霍柏森在一九〇二年的論斷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難道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不能由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即用國際

(1)

聯合財政資本共同剝削全世界的辦法代替各國財政資本相互鬥爭的政策所排擠。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底一個新的階段，是可以設想的。至於它能否見諸實現，那末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根據來解決這一問題。」

霍柏森說：『現在很多人認為，在各自佔有許多不文明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少數巨大聯邦帝國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是現代趨勢最正當發展的道路，而且這種發展道路是最有希望在堅固的聯帝國主義基礎上達到永久和平的。』

考茨基所稱爲超帝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霍柏森比他更早十三年時所稱爲聯帝國主義的東西。考茨基除了用一個字冠代替另一個字冠來應造出一個怪深奧的新字眼外，其『科學』意見底進步處，就只在於他企圖把霍柏森所描寫的東西——其實是英國牧師玩弄的騙局——假冒爲馬克思主義。在英布戰爭以後，英國牧師這一高貴等級極力安慰那些在南非洲戰爭中喪失了不少生命，並爲保證財政資本家獲得更高利潤而繳付了更高捐稅的英國小市民和工人，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說帝國主義並不壞，說它很快就要變爲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聯（或超）帝國主義，——

●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第一四四頁。

這難道不是最好不過的一種安慰麼？無論英國的牧師或甜密的考茨基抱有怎樣慈善的目的，但他那個『理論』底客觀的，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却不過是用極反動的辦法來安慰羣衆，叫他們癡心妄想，在資本主義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轉移羣衆視線，使其不注意那些劇烈矛盾與現代緊張問題，而注意於虛偽的所謂新的未來的『超帝國主義』前途。在考茨基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除了欺騙羣衆而外，是一無所有的。

例如，只要把那些人皆知而不容爭辯的事實拿來與考茨基竭力誘惑德國工人（和各國工人）的那種前途明白對照一下，便可知他所說的這種前途極端虛假了。試舉印度、安南和中國爲例。誰都知道，這三個一共有六七萬萬人口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即英法日美等國財政資本剝削的。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爲彼此敵對的聯盟，以求保持或擴張它們在上述亞洲國家中的領土、利益和『勢力範圍』，這就會是『聯帝國主義』或『超帝國主義』聯盟了。又假定所有的帝國主義強國共同組成爲一個聯盟來『和平』分割上述亞洲國家，那就會是『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了。這種聯盟底實際例子，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已經有過了，例如列強在共同對付中國時，就締結過這樣的聯盟。試問是否『可以設想』，說這種聯盟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而考茨基恰巧就是以這樣的條件爲前提的），不會是短時期的呢？說

[1]

這種聯盟能除去各種各樣的磨擦、衝突和鬥爭呢？

只要明明白白提出這個問題，便可知道只能給以否定的回答。因爲在資本主義下，爲實行分割勢力範圍、分割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計算各個參與分贓者底實力，即它們各自擁有的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實力而外，再也不能設想出什麼其他的根據。而這些參與分贓者所有的實力又變得更得各不相同，因爲在資本主義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彼此平衡的發展，是決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底資本主義實力與當時英國底實力比較起來，還是小得可憐；日本當時與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過了一二十年之後，難道還『可以設想』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實力對比照舊沒有變更麼？絕對是不可這樣設想的。

所以，資本主義現實中的（而不是英國牧師或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鄙俗的市儈的幻想中的）『聯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不管這些聯盟採取那種形式，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一切帝國主義強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前後兩次戰爭中間的『暫時休戰』。和平的聯盟是準備戰爭，同時又是從戰爭中脫胎而來，互相制約，根據同一種帝國主義聯系，同一種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相互關係而引起和平鬥爭形式與不和平鬥爭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而聰明絕頂的考茨基，爲了安撫工人並把他們與投到資

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調和起來，便把一條鍊子上的某一環節與另一環節割開，把今天的一切強國爲共同『安撫』中國（請回憶它們鎮壓義和團起義事件吧）所締結的和平的（與超帝國主義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國主義的）聯盟，與明天的那個不和平的衝突，與那個準備在後天又由所謂『和平的』總聯盟去分割——譬如說——土耳其等等等的而不和平的衝突割開。考茨基不願提到帝國主義和平時期與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活生生的聯系，而寧可把僵硬的抽象觀念介紹給工人，把工人和他們那些僵死的領袖調和起來。

美國人喜爾在他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序言中，把近代外交史分爲以下三個時期：（一）革命時代；（二）立憲運動時代；（三）現代『商業帝國主義』時代。另一個作家又把一八七〇年起的大不列顛『全世界政策史』分爲四個時期：（一）第一個亞洲時期（反對俄國在中亞細亞一帶向印度的進展）；（二）非洲時期（約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〇二年止），即爲分割非洲而與法國進行鬥爭的時期（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事件，那時險些要與法國開

● 見喜爾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 (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第一卷, 第一〇頁。

戰)；(三)第二個亞洲時期(與日本訂約反對俄國)；(四)『歐洲』時期，主要是反對德國。銀行『活動家』黎舍爾早在一九〇五年時，便指出法國財政資本在意大利進行活動，以準備意兩國在政治上的聯盟；德英兩國爭奪波斯的鬥爭以及所有歐洲各國資本為借款給中國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開展起來等等事實，而寫道：『前鋒隊底政治衝突，是在財政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便是『超帝國主義的』和平聯盟與普通的帝國主義衝突密切相聯的具體實際情形。

考茨基企圖掩飾帝國主義最深的矛盾，因而也就必然要去粉飾帝國主義的這種傾向，是在他批評帝國主義底政治特性時也表現出來了的。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度時代，而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到處散佈的都是統治趨向，而不是自由趨向。這統治趨向底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便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起來。民族壓迫和兼併傾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傾向(因為兼併無非是破壞民族自決而已)，也特別尖銳化起來了。希法亭很正確地指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尖銳化的聯系：『至於新開關的國家，——他寫道，——那末輸入這裏來的資本就使種種矛盾加緊起來，引起那些發生民族覺悟的人民來進行有加無已的反抗，反

●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一七八頁。

對外來的敵人；這種反抗很容易發展成爲反對外資的危險行動。舊式的社會關係根本革命化起來；各「史外民族」數千百年來的農村閉塞性，日益破壞下去；它們日益捲入於資本主義的漩渦了。而且資本主義本身也漸漸授予各被征服民族求得解放的工具和手段。於是它們也就提出歐洲民族曾經認爲最高尚的那個目標，即創造統一民族國家，作爲獲得經濟文化解放的工具。這種獨立運動，將危及歐洲資本在其所剝削的那些最寶貴而含有最優美前途的區域中的地位；於是歐洲資本也就只有經常增加自己的武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①

這裏尚須補充一點。帝國主義不僅要在新開闢的國家中，而且要在舊的國家中實行兼併，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就使反抗加緊起來。考茨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加緊政治反動的事實，而抹煞了一個已經是特別迫切的問題，即在帝國主義時代決不能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的問題。他表示反對兼併政策，同時又把自己的這種反對意見，用一種最不傷害機會主義者而爲機會主義者所最易接受的形式表示出來。他是直接對德國大眾說話的，但他終究恰巧把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實，例如德國兼併亞爾薩斯和羅來因的事實，掩飾起來。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來估計考茨基底這種「偏向」

① 見財政資本，第四八七頁。

吧。假定說日本人指斥美國人兼併菲律賓的行動，試問是否會有很多人相信日本人這樣來作，是因為他根本反對兼併，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兼併菲律賓呢？是否要承認，只有當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兼併高麗，要求讓高麗自由脫離日本的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反對兼併的這種『鬥爭』看作是誠心的和政治上誠懇的態度呢？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的理論上的分析，以及他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上政治上的批評，都是浸透了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一種蒙蔽掩飾帝國主義最主要根本矛盾的精神，浸透了力圖把歐洲工人運動中陷於破壞的那種與機會主義者統一的局面保持起來的傾向。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按其經濟本質來說，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基礎上，而且恰巧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進到更高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上去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現代所特有的四種主要壟斷形式，或壟斷性資本主義底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在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很高階段的時候長成的。這便是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即

(1)

卡德爾、新迪加與托拉斯。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紀開始時，它們已在各先進國家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固然，最先開始走上組織卡德爾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度保護稅則的國家（德國和美國），但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也表明出了壟斷制是從生產集中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事實，不過時間上稍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制使奪取最主要原料來源，尤其是為供給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主要的、卡德爾化程度最大的工業部門，即煤炭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來源的鬥爭，加緊起來了。壟斷性的佔有主要原料來源，使大資本底權力加強到了可驚的地步，使卡德爾化了的工業和沒有卡德爾化的工業間的矛盾異常尖銳化了。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中長成的。銀行已由平凡的中介企業，變成了財政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由三五個最大的銀行實現了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間的『個人聯合』，把佔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總數大部分的數百萬萬資本，都一手包攬起來。財政寡頭制把依賴關係的密網籠罩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一切經濟和政治機關，——這便是這種壟斷底最明顯的表現。

第四，壟斷是從殖民政策中長成的。財政資本在無數『舊有的』實行殖民政策的動機上，更

加上了一個新的動機，即爲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投殖民地，爭奪『勢力範圍』（即成立有利契約，獲得租讓，取得壟斷性利潤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而鬥爭的動機。例如，當歐洲列強還只把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積佔領爲自己的殖民地時（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是如此），殖民政策還不用壟斷手段，而按所謂『自由奪取』領土的方式去發展。但是，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被佔領的時候（到一九〇〇年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時候，便必然開始了一個壟斷式佔有殖民地，亦即是爲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

壟斷性資本主義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銳的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價高漲和卡德爾壓迫這兩件事實就够了。這種矛盾尖銳化，便是歷史過渡時期中最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個過渡時期是在全世界財政資本完全勝利時就已經開始了的。

壟斷、財政寡頭、趨向統治而不趨向自由、極少數最富強國家剝削一批批弱小國家——所有這些便產生了使人必須把帝國主義解釋爲寄生腐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點。帝國主義底趨向之一，即造成『食利國』或放債國，使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專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爲生的現象，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若以爲這一腐化趨向排除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可能，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個別工業部門，個別資產階級階層，個別國家，在帝

國主義時代，各以多少不一的強度，時而表現着此種趨向，時而又表現着彼種趨向。整個說來，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得比先前快得不可計量，但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成爲更不平衡，並且這種不平衡又特別表現於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底腐化。

研究德國大銀行問題的作家黎舍爾論到德國經濟發展底速度時寫道：『德國在前一時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年）進步得並不很慢，但是和德國現今時代（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年）全部經濟及其銀行發展底速度比較起來，便好像昔日郵車速度和近代汽車速度相比較一樣，而近代汽車駛行之快，對於不謹慎的步行者和汽車上的乘客本身都是很危險的。』這個異常迅速發展了的財政資本，正因爲它是這樣迅速發展起來了，所以又很想更『安然』把那些必須從更富足的國家方面奪取過來的殖民地佔領起來，而這種奪取，又不是單只用和平手段所能做到的。在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要比德國來得更快，而現代美國資本主義底寄生性也就因此而表現得特別明顯。另一方面，例如把共和派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君主派的日本資產階級或德國資產階級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些資產階級之間極大的政治上的差別，也都極度減弱下去，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爲這種差別根本就不重要，而是因爲所有這些資產階級都帶有相當的寄生性的特徵。

許多工業部門中某一部門裏的資本家，許多國家中某一國家裏的資本家等等，既獲得壟斷性的高度利潤，在經濟上便有可能收買工人階級中某些階層，暫時且能收買其中頗大的一個少數，吸引他們站在某一部門或某一國家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其餘一切部門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彼此因分割世界而緊張起來的對抗，更使這種趨向加強起來。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與機會主義間的聯系，這種情形在英國表現得最早而且最鮮明，因為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帝國主義特點，在英國要比其他各國出現得更早得多。有些作家，如馬爾托夫，愛用一種『官場樂觀主義的』（如考茨基與鳩思曼一樣）議論來否認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相聯系這一現時特別觸目的事實，如說什麼假若先進的資本主義恰巧加強了機會主義，或是說假若領薪最多的工人恰巧傾向於機會主義，那末反資本主義者底事業就未免毫無希望了。切不要看錯這種樂觀主義底意義：這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的態度，這是用來掩飾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呵。其實，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和特別討厭的發展，並不能保證機會主義底勝利臻於鞏固，也正好似一個健康身體上的膿瘡迅速的膨脹，只足以加速膿瘡爆裂而使身體恢復健康一樣。在這方面最危險的，倒是那些不願意瞭解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系起來，便是一種空洞而虛假的廢話的人。根據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問題所說的一切，便要把帝國主義估計為過渡的資本主義，或更正確點

說，垂死的資本主義。在這點上特別耐人尋味的，便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敘述現代資本主義時所常用的字眼：『互相錯綜』，『沒有孤立性』等等；說什麼銀行是『一種按其任務和發展講都沒有單純私有經濟性質，而日益超出私有經濟調節範圍的企業』。而講了後面這句話的那個黎舍爾，同時却又非常鄭重地說道，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化』的『預言』是『沒有實現的』！

『互相錯綜』一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只是抓住了現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個過程中最觸目的一點。它證明觀察者只看見單個樹木而沒有看見樹林。它證明人們盲從式地模寫着外表的偶然的紛亂的現象。它證明觀察者為一大堆生硬材料所壓倒，完全不能瞭解其中所含的內容和意義。股票佔有關係，即私有主關係，是『偶然互相錯綜起來的』。但是隱藏在這種錯綜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現象基礎的，却是那些變動着的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大企業規模已擴展得十分龐大，以精確估計巨量事實為根據來有條不紊地設法取得數千萬人民所必需的總額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原料；既然有系統地設法把這些原料轉運到各個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甚至是彼此相距數千百里的地點；既然由一個中心來指揮一切順序製造的階段，一直到製成許多種類的熟製貨品為止；既然這些生產品是按照一個總的計劃來分配於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美德兩國的煤油銷售，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支配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就顯然是生產底社會化，而決不

(1)

是什麼簡單的『互相錯綜』；那末私人經濟關係和私人所有關係，就顯然已變成一種不合於內容的外殼，而假如用人工方法來延緩其必被消除的時日，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來；它也許能在腐化狀態中存留一個比較長久的時間（如果割治機會主義膿瘡的事情竟不幸而遷延下去的話），但它終究還是必然會被消除掉的。

熱烈崇拜德國帝國主義的叔爾茨·黑維尼茨驚嘆道：

『倘若德國銀行底領導工作，歸根到底是擔負在十來個人身上，那末他們的活動之關係於國民福利，在現時已經是要比大多數政府總長底活動更爲重大了』（這裏把銀行家、總長、工業家以及食利者『互相錯綜』的事實忘掉，當然是較爲有利的）：『倘若把我們所說過的那些傾向底發展事實澈底推想一番，那末結果便是：一國底貨幣資本統一於銀行之中；銀行又互相聯合成爲卡德爾；全國急需投殖的資本都化作有價證券。那時便會實現聖西門底天才預言：『現在生產中因經濟關係不是按一個調節計劃發展的事實所引起的無政府狀態，定會讓位於有組織的生產。那時生產便不會再由那些彼此孤立，各不相謀，不知道民衆經濟要求的企業家去指揮，而會由相當的社會機關去主持。中央管理委員會既有可能從更高的觀點上去觀察廣闊的社會經濟領域，就會把這個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於全社會，並把生產資料轉交給適當人物去支配，特別是會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於彼此協調的狀態。現在有一種機關已把相當組織經濟勞動的作用包括於自己的職

務以內，這種機關便是銀行。」我們現在離實現聖西門底這些預言的時候還遠；但我們已經是在實現這些預言的道路上走着：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但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1)

這不消說是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一種漂亮的「反駁」。從馬克思底精確科學分析倒退到聖西門底猜想上去了，而聖西門底猜想雖然是個天才的猜想，但終究只是一種猜想。

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六七至一七五頁

●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一書（*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第一四六頁。

簡要註釋

〔一〕凡爾賽派是法國反動資產階級政府方面的人，其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這個政府在巴黎公社勝利（一八七一年三月）以後，就從革命的巴黎逃到凡爾賽去了。公社社員是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參加者而言。——（見

正文第一六頁）

〔二〕『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煤區礦物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七〇頁）

〔三〕是指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章上所加的註釋而言的。——（見正文第一五二頁）

著 寧 列
命 革 與 家 國

說學的家國於國義主思克馬
務任的中命革在級階產無與

校 譯 木 蒼

國家與革命係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中文版翻印

出版局聲明

本版國家與革命一書，是按莫斯科馬恩列學院一九四六年刊印的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所載原文譯出。

爲便利讀者瞭解起見，本書後面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要註釋。凡列寧自己所加의脚註，概未標明註者是誰。

目 錄

| | |
|-------------------------|------|
| 初版序言 | 九 |
| 再版序言 | 一 |
|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 三 |
|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 三 |
| 二 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 七 |
|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 三 |
| 四 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 三 |
|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 三四—六 |
| 一 革命底前夜 | 三四 |

| | | | |
|-----|---------------------------|-------|-------|
| 二 | 革命底總結 | | 三六 |
| 三 |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 | 三六 |
| 第三章 |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 | 三六—三七 |
| 一 | 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 | 三六 |
| 二 |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 | 三七 |
| 三 | 國會制底消滅 | | 三六 |
| 四 | 民族統一底組織 | | 三七 |
| 五 |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 | 三七 |
| 第四章 |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 | 三六—三七 |
| 一 | 『住宅問題』 | | 三六 |
| 二 |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 | 三七 |
| 三 | 給伯伯爾的信 | | 三六 |
| 四 |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 | | 三六 |
| 五 |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 | 三六 |

| | |
|---------------------------|---------|
|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 101 |
|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 101—106 |
|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 101 |
|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 102 |
|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 103 |
|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 104 |
|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 104—110 |
|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 106 |
|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 107 |
| 三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 109 |
| 初版書後..... | 110 |
| 簡要註釋..... | 110—115 |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時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加速並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它所加在勞動羣衆身上的駭人聽聞的壓迫，就愈益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我們在這裏是指它們的『後方』而言——已變成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牢獄。

遷延不止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慘象與災難，使羣衆底生活狀況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義憤加強起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它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已獲得實際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成份，造成了在全世界上各正式社會主義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科夫斯卡婭、路班諾維契以及稍帶掩飾色彩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及其同流；在德國

有謝德曼、列金、達維德等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里、黑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漢德曼和費邊派（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表示卑鄙奴僕式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偉大列強是早已剝削着、奴役着很多的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恰恰就是爲了分割和重分這種贖物的戰爭。若不與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則使勞動羣衆從一般資產階級影響下，特別是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便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且來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而對於這個學說被遺忘了的或遭受了機會主義曲解的諸方面，加以特別詳細的論述。其次，我們將特別分析從事於這種曲解的主要代表，即在這次戰爭時期中陷於極端可憐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給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作一主要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大概正在完結其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講來，整個這次革命，祇能認爲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鍊條中的一個環節。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就不僅獲得了實際政治意義，而且有了最迫切

的意義，因為這個問題是關於要向羣衆說明，爲着使自己從資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應當在最近將來做些什麼事情的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II)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時幾乎沒有改變。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作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現今的遭遇，正和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底學說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遭遇一樣。當偉大革命家在生時，壓迫階級總是用不斷的追究來酬答他們，總是以最野蠻的惡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中傷來對待其學說。當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說是把他們偶像化，給他們的名字賦予某種榮譽，以便『安慰』並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閹割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其革命鋒芒，而使之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這樣『修琢』馬克思主義的事情上正趨於一致了。他們把這學說底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遺忘，而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覺得可以接受的東西，提在第一

位，加以頌揚。現在，所有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要藐視他們呀！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這些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甚至日益頻繁地說着什麼『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彷彿這個馬克思造就了極有組織的工人協會是爲了進行劫掠戰爭哩！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學說。爲了這點我們就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著作中拿出許多很長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證，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且難於通俗；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一切句段，或至少是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句段，必須儘可能完備地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够獨立地領會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全部見解，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又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真憑實據地證明出來和一目了然地指明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起源一書講起，這書於一八九四年已在斯多德牙爾印行第六版了。我們必須從德文原本中譯出引句，因爲該書俄文譯本雖多，但其中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是譯得極不好。

『國家——恩格斯在總結他那歷史的分析時說道，——絕不是從外面強迫加給社會的一個力量。國家也

並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現實」或「理性底外形和現實」。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爲不可調和的對立方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爲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彼此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駕於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當中產生出來，但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便是國家。」

（德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思想，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恰巧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開始，而按兩個主要方面進行着。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雖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僅僅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却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調和階級底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則國家就會既不能發生，也不能支

持下去。而按市僧的和庸俗的大學教授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看來，國家却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既把這種壓迫法定和鞏固起來，同時又緩和階級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彷彿緩和衝突乃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鬥爭手段。

例如所有一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當關於國家底意義和作用的問題恰巧成了非常嚴重，成了在實踐上立刻行動，而且是廣大規模行動的問題時，他們都一下完全落到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所有這兩個黨底無數決議及其政治家們底許多論文，都完全被這個市僧的庸俗的『調和』論所浸透。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決不能和它的對立方（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這一點却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也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着貌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更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既

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又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述一點：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並且非消滅統治階級之所建立，而在其中體現了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如我們在下面所可看見的，就是馬克思根據對革命任務之具體歷史分析絕對肯定地作出的結論。而正是這個結論竟被考茨基——這點我們在下文中要來詳盡指明——所『遺忘了』和曲解了。

二 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國家與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第一個特徵，——恩格斯繼續說，——就是它按地域標準來區分其管轄下的人民』……這樣的區分法，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與按宗族或氏族為標準的舊組織作過長期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特徵，就是社會權力底建立，這個權力已經和那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居民不直接符合了。這個特別的社會權力之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後，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這個社會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構成這個權力的，不僅有武裝隊伍，而且還有實體的附屬

物，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機關，這些東西是氏族社會制度中所沒有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那稱之爲國家的『力量』，即由社會中產生出來，而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且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底主要點何在呢？就在於那些支配有監獄等等的特別武裝隊伍。

我們完全有權說這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爲任何國家所特具的社會權力是與武裝居民，與其『自動的武裝組織』，『不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如同所有一切偉大革命思想家一樣，他盡力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正是那種普遍流行的庸俗觀念認作是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爲那些不僅牢固並且可說是頑梗不化的偏見所奉若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底主要工具，但是——難道可以不這樣麼？

在十九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而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沒有眼見過一次大革命，——這是不能不這樣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何以需要駕於社會之上而使自己與社會脫離的特別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等）這個問題，西歐的和俄國的庸人一味從斯賓塞〔二〕或米海洛夫斯基〔三〕那裏借用三言兩語，藉口說什麼社會生活複雜化，什麼職能分化等等，來作答覆。

這樣的藉口似乎是『合乎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即社會分裂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個分裂，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與那些使用木棍的猿猴羣，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宗族社會的人們底原始組織比較起來，祇是程度上複雜得多，技術上高越得多，但這樣的組織總會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彼此敵對，且敵對得不可調和的階級，而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那它們便會彼此武裝鬥爭起來。於是就有國家形成起來，就有特別的力量，特別的武裝隊伍成立起來。而每次革命破壞國家機關時，都明白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力圖恢復那替它服役的特別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如何力圖創造這類的新組織，即能够不替剝削者服役而替被剝削者服役的組織。

恩格斯在上述議論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是每次大革命都在實際方面明顯地而且以廣大行動規模提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別』武裝隊伍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互相關係問題。我們往下就會看見這個問題怎樣由歐洲歷次革命和俄國幾次革命底經驗所具體表現出來。

但我們且回頭來看看恩格斯底敘述吧。

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個社會權力是薄弱的（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北美在帝國主義前期自由移民佔多數的那些地方），但一般說來，這個權力是在加強着：

：「社會權力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化以及隣近國家增大與人口增多的程度而加強起來。例如拿現今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把社會權力激增到勢將吞食全社會甚至全國家這樣的高度。」

這一段文字至遲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標明爲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底完全統治來說，無論就最大銀行底專權現象來說，無論就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來說——在法蘭西還剛才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兩國，甚至還更薄弱些。從那時起，『侵略競爭』已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因爲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地球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國家所瓜分完結了。從此海陸軍備已無限增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由於英德兩國互爭世界統治權，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強盜戰爭，使社會一切力量都被強盜國家政權『吞食』到已接近於完全崩潰的地步。

恩格斯還在一八九一年就已能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大強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而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當正是這個競爭已經加劇許多倍並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却用『保護祖國』，『保衛共和國與革命』等等的辭藻，來遮掩他們保護『自家』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的行爲！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維持駕於社會之上的特別的社會權力，就需要賦稅和國債。

：『官吏既掌握着社會權力和徵稅權，——恩格斯說，——他們就成爲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氏族社會各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對官吏們說來已經是不够的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於是製定出一些關於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區區不足道的小警察』都擁有大過於氏族代表的『權威』，可是甚至文明國底軍權首領，一見氏族首長享有的那種『不是用威迫手段獲得的社會敬意』時，都得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提出了官吏之爲國家政權機關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什麼東西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一八七一年如何由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

過，而在一九一二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煞過。

：『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就是那個最有力的，在經濟上佔統治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就成爲在政治上也佔統治的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並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不過也常遇到一些例外的時期，那時彼此鬥爭的階級達到這樣勢均力敵的狀態，使國家政權暫時得到對於這兩個階級的相當獨立性，成爲彷彿是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獨裁君主制，法國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德國底俾斯麥時代，就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在已轉而壓迫革命無產階級以後，當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已經軟弱無力，而資產階級又還沒有充分力量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就是如此。

在民主共和國內，——恩格斯繼續說，——『財富運用自己的權力，是間接的，但因此是更可靠的』，——第一，就是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美國）；第二，就是用『政府與交易所聯盟』的方法（法國與美國）。

現今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甚至在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國內，都已把這兩種維護並實施財富專權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舉例來說，既然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頭幾個月，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帕里琴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四〕中對於一切制裁資本家和制止其掠奪行為，制止其藉供給軍需品來盜竊國庫的種種辦法，都實行怠工；既然帕里琴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帕里琴斯基同樣的人來代替了他），就被資本家『獎賞了』年薪十二萬盧布的位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是直接的收買呢，還是不直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加聯盟呢，還『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切爾諾夫輩與策烈鐵里輩、亞甫克森鐵夫輩與斯科別列夫輩究竟起着什麼作用？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還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財富』專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其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為它不依賴於資本主義之不良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經過帕里琴斯基輩、切爾諾夫輩、策烈鐵里輩等等）這個最好的外殼之後，就能如此可靠地，如此牢固地來確立自己的權力，致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無論何種人員、機關或政黨之更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權力。

還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為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顯然是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長期經驗，所以說道，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東西的。』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像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一樣，都正是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懷着一種妄想，並且要人民相信這種妄想，以為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裏』真正能夠表現大多數勞動者底意志，並保障這一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個妄想，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聲明，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宣傳和鼓動中，是隨時隨地都遭到曲解。至於恩格斯在這裏所駁斥的這個妄想底全部虛偽性，則我們以後在繼續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今』國家的見解時，還會加以詳細揭破的。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總結如下：

『由此可知，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就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各階級時，國家就因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的了。』

在我們現時正迅速走近之生產發展底更高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復必要，而且還成爲對於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出來一樣。階級一經消逝，則國家也會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以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爲基礎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會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是它所應分到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而與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派底宣傳鼓動作品中，很少遇見。而且就即令遇見有這段引文時，也多半是彷彿崇拜偶像才把它引用來的，就是說，是爲了向恩格斯正式表示敬意，而絲毫不企圖思考一下，所謂「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這意思是說，該預先要有何等廣闊而深刻的革命。他們甚至往往不懂得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 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一語，負有這樣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頻繁，又這樣明顯地指明機會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把戲底本質所在，遂使我們必須對此作一番詳細考察。現在我們且把從中引出這語句的那段言論全部轉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但這樣一來，它就消滅它自己之爲無產

階級，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一切階級區別和階級對立，而同時也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在階級對立中進展而至今存着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即必需有當時剝削階級底這個機關，以便維持其生產底外部條件，就是說，特別是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捐制在當時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之內。國家會是整個社會底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祇是因爲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底國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國家公民資格的奴隸主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當國家終究真正成爲全社會底代表時，它就會自行成爲贅物了。當任何一個必須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已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單獨生存競爭已不復存在，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過火情事也一併消失時，那時就會沒有什麼必須加以鎮壓了，而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即國家，也就會不再需要了。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整舉而自行泯沒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我們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關於「自由人民國家」的語句，這個語句在鼓勵的意義上是可以暫時存在，但歸根到底說來，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我也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所謂無政府主義

者關於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杜林先生推翻科學的舉動，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一—至三〇三頁）

可以大胆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議論中，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成爲社會主義思想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認爲國家『消亡』而與無政府主義『廢除』國家的學說不同的這一點。這樣來截斷馬克思主義，就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在這樣的『解釋』之下，就僅僅留下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爲只有慢慢的，平坦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風暴，沒有革命。對於國家『消亡』之流傳的、普遍風行的、大衆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瞭解，無疑是蒙蔽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最粗暴的、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曲解，這種曲解在理論上是由於把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來的恩格斯『總結』議論中也指出了的最重要情節和理由都遺忘了。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既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至於這是什麼意思，那却是『照例』用不着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點，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主義的』『僻性』。其實，在這幾句話當中，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

革命之一底經驗，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簡明地表示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來更詳細地論述。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

第二，國家是『特別的鎮壓力量』。恩格斯這個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這裏已說得十分明顯了。而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少數豪富對千百萬勞動者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消滅國家之爲國家』，也就在於此。以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不言而喻的，這樣以另一個（無產階級的）『特別力量』來代替這一個（資產階級的）『特別力量』的更換，絕對不能按『自行消亡』形式來實現。

第三，恩格斯說到『消亡』一語和甚至說得更鮮明更光彩些的『泯沒』一語時，他完全明白而肯定地說是指『國家以全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以後，即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代而言。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恥曲解馬克思主

義的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也就是關於民主制底『泯沒』和『消亡』。驟然看來，這似乎是很奇怪。但是祇有那些對於民主制也是國家，因之當國家消逝時民主制也就消逝這點不會思索到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瞭解』。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祇有革命才能够把它『消滅』。而作為最完滿民主制的國家，是只能『自行消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他說『國家自行消亡』的這個著名原理後，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他從『國家消亡』這個原理中所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可以擔保地說，在讀過或聽過關於國家『消亡』言論的每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八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不僅是把他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用去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已。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大概有九個人不懂得何謂『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為什麼攻擊這個口號就是攻擊機會主義者。歷史就是這樣寫法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被人暗中假造為普遍流行的庸人主義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重述了千百次，被人庸俗化了，被人簡單化地打進頭腦中去，成為頑固的成見了。而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蒙蔽了，被人『遺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要求和流行口號。在這個口

號中，除了對於民主制概念的市儈浮誇的描寫而外，是別無半點政治內容的。既然人們當時是爲了合法而用這個口號來暗示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會同意從鼓動觀點上來『暫時』『辯護』這個口號。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性的，因爲它不僅表現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粉飾，而且表現不瞭解社會主義觀對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擁護民主共和制度，作爲在資本主義下對於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可忘記，即令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然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任何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特別的鎮壓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

第五，在恩格斯這本含有大家都記得他關於國家消亡議論的著作中，還有關於強力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對這種革命作用底歷史估計，也就變成了對強力革命的真正頌揚。這是『誰都不記得』的，關於這個思想底意義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而在羣衆中的日常宣傳鼓動中，這些思想簡直不起任何作用。其實這些思想是同國家『消亡』論密切聯系而成爲一個嚴密的整體。

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論吧：

……『至於強力在歷史上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除作惡而外），『即革命的作用；至於照馬克思底話，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新社會的時候，強力就是這個舊社會底接生婆；至於強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道路和破壞殭死硬化了的政治形式的手段，——關於所有這一切，杜林先生都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了推翻剝削制的經濟，強力也許是必要的——這是他覺得很可惋惜的咧！——因爲據他說，任何應用強力的行爲都會使應用強力的人敗壞德性呵！雖然在每次勝利的革命以後都有過高度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進展，但他終究說出這種話來了！加之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須知民衆可能被逼進行強力衝突，這至少會有如下的益處：可以拔除那因三十年戰爭（五）的恥辱而浸入民族意識中的一種奴僕精神。而這種黯淡的、萎靡的、軟弱無力的僥倖思想，竟敢自薦給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麼？』（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第二編第四章末段）

怎樣才可以把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即直至他逝世時爲止，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來與國家『消亡』論結合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義，用無原則的或詭辯的方法任意（或爲了討好於當權者起見）抽出其中這個或那個議論來把它們結合起來，而且在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都正是把國家『消亡』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現今社會民主黨人在

其論馬克思主義的正式作品中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現象。這樣一種替代，自然不是新奇的，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常見的事。當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機會主義時，把折衷主義偽造為辯證法是最易於欺騙羣衆的，能夠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它顧到了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一切矛盾影響等等，而其實則不給予任何對於社會發展過程的完整的革命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強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這是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還要更詳細說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之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所替代，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而按通例是只能經過強力革命來實現的。恩格斯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完全同馬克思屢次的聲明相符合（我們要記得，在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底結尾一段中，曾傲然公開聲言強力革命之必不可免；我們要記得，約在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批評〔六〕一書中曾毫不留情地攻擊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性）——這種頌揚，絕不是『執迷』，絕不是豪語，也不是論戰伎倆。必須有系統地教育羣衆來這樣估計，而且只是這樣估計強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底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對於馬恩學說的背叛，其特徵就在於所有這兩種思潮都把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遺忘了。

由無產階級國家來替代資產階級國家，除非有強力革命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消滅，即國家底澈底消滅，則只能經過『自行消亡』而實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別革命形勢時，分析每一個別革命底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而我們現在就正要說到他們學說中這個顯然是最重要的部分。

(11)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已經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底最初著作——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作成的。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在這兩部著作中，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一般基礎而外，還有在相當程度內對於當時具體革命形勢的反映，因此我們來考察考察這兩位作者在尚未做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結論之前他們關於國家的言論，也許是較為適當一些。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寫道，——將創造一個攔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階級對抗底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拿這個關於國家隨階級消滅而消逝的思想之一般概述，來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敘述對照一下，確是很有意義。

：「在描述無產階級發展最一般的階段時，我們探究了現存社會內部多少隱藏着的內戰，直至這個內戰轉變為公開的革命，那時無產階級用強力推翻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變（直譯：提昇）無產階級為統治階級，奪得民主制。」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裏，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儘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一九〇六年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第三七頁）

這裏我們看見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最精彩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說的那樣）的思想，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關於國家的定義，在各正式社會民主黨普遍流行的宣傳鼓動作品中，不僅從來沒有加以解釋過，而且恰巧是被遺忘了。因爲它是與改良主義絕不相容，它是當面打擊那些說什麼「民主制底和平發展」的通常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幻想的。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覆着，硬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却『忘記』補充說，按照馬克思底意見，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別的權力組織，是爲了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強力底組織。究竟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哪一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爲着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能領導這個鎮壓的，能實現這個鎮壓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反資產階級鬥爭，將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維持剝削制，即是爲着極少數人底私利而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即是爲着絕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以階級妥協的夢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見解也是夢想的，他們不是把這個改革想像爲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而是想像爲由少

數來和平服從那已經瞭解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是和承認國家超階級性的觀點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而在實踐上就走到叛賣勞動階級利益。舉例說，這是已由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七一年革命底歷史所表明，這是已由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在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所表明了。

馬克思曾畢生奮鬥來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現時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復活了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把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貫引伸為論政權、論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這一特別階級才能做到，因為它所生存的經濟條件訓練它去進行這種推翻，給它以實現這種推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同時却團結着、統一着、組織着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够成爲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這些羣衆受着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往往比無產階級所受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却不能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鬥爭。

馬克思所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學說，就必然要歸結於承認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藉羣衆武裝力量的政權。爲要實現推倒資產階級，就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爲統治階級，變爲能夠鎮壓資產階級所必然進行的拚命反抗，並

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來建設新經濟制度的這樣的統治階級，才能做到。

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權，集中的權力組織，強力組織，既用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廣大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却把工人黨教育成爲一些脫離羣衆而代表那班工資較優的工人們利益的代表，只圖在資本主義下『營謀』苟安生活，爲着一飯之惠竟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即放棄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系。這個作用底完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特別的強力組織，那末由此就會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不預先消滅，不預先破壞資產階級給自己設立的國家機器，則創造這樣的無產階級

組織是否可能呢？共產黨宣言會接近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時，就說出了這個結論。

二 革命底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他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把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澈底的，它還經歷着苦難的考驗，它在有條有理地執行着自己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日』（拿破崙第三舉行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底頭一半，現時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另一半。它首先使國會權力臻於完備，以便得到推翻這個權力的可能。現在，當它已達到這地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之表現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爲與它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着重點是我們加的）『而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這後一半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有極複雜的人爲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隊伍加上五十萬大軍，——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氣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

代，正當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而且這個寄生機體是加速了這種崩潰過程。『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又擴大了政府權力底容量，機關和行政人員底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除了更大的分工外，沒有增添絲毫新的東西』：

…『最後，國會制的共和國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竟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底工具和集中。迄今所有一切政變都祇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不是把它毀壞。』（着重點是我們加的）

『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底奪得，視爲自己勝利時主要的勝利品。』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第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了莫大的進步。在那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爲抽象，還是表現於最普泛的概念和語句中。在這裏，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而且做出了格外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說：過去一切革命祇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毀壞的。

這個結論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點。而正是這個基本點，不僅被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所完全遺忘，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曲解了（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一般的歷史總結，使人們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得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勝利以後就會立即開始消亡，因爲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既不需要，並且是不會有的。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怎樣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提出來且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既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就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偉大年代底歷史經驗來做基礎。馬克思底學說就在這裏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的哲學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呢？在每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在各被壓迫階級獨立行動面前，國家機器如何變遷，如何演進呢？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任務怎樣呢？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君主獨裁政體崩壞時代。最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關，即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種機關恰恰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工人底經驗都把這種聯系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

階級由於切身所受的苦痛領略到這種聯系的意味，——正因為如此，所以工人階級這樣容易懂得並且這樣牢固地領會到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教訓，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不是昏聩地和輕浮地否認這個教訓，便是更輕浮地『一般地』承認它，却不願做出相當的實際結論來。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那些腐蝕着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然而正是『塞住』生命氣孔的寄生蟲。現時在正式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那視國家為寄生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專有的屬性。這樣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把社會主義玷辱到這種地步竟將『保護祖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藉此擁護並粉飾這個戰爭的市僧們，當然是很有益處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經過歐洲從封建制度崩潰時起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須得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其支配，大半就是經過這個機關來實現的，因為這個機關給予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底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靜和尊榮的位置，使這些位置底佔有者駕於人民之上。試看一看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後半年中所發生的情形吧：以前首先委任黑幫分子充當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贓物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却力圖把這些改良

選延『到立憲會議的時候』，而對立憲會議的召集則又慢慢選延到戰爭結束時再說！但是對於瓜分贓物，佔據各部總長、次長、督撫等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配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在一切中央與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並重分『贓物』勾當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總結，客觀的總結，毫無疑義的：各種改良辦法是延期了，官吏位置是分配過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的重新分配來改正了。

但在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間（如以俄國爲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間）『重分』官吏機關的事實愈多，則各被壓迫階級，首先是領導它們的無產階級，就會愈加認清自己與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黨——甚至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黨也包括在內——就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關，即仍是鞏固那個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抱定任務不是改良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把它破壞，把它消滅。

這樣提出任務，並不是由於邏輯的推論，而是由於實在的事變發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
的新穎經驗。馬克思該如何嚴格地依據歷史實際經驗，這點我們可從以下事實中看出來：他在

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那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時，經驗還沒有給予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去。在一八五二年，根據如自然歷史觀察這樣的確切性所能指出的，還只有下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到要『集中自己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毀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裏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為公理，把它們移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爲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序言裏說，——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階級搏戰，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國達到更加澈底的結局。這種階級搏戰所在以進展及其結果所藉以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鮮明。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它是一個純粹等級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它所具有的典型式的明顯性，實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而抬起頭來的無產階級反對那佔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裏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國所未見過的。』（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起，法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發生了停頓，但

這個停頓，無論如何長久，絲毫也不是說，在行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不可能表現為階級鬥爭達到決然結局的模範。

我們且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底歷史拿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吧。我們可以看出見比這要遲緩些、複雜些、舞台更廣闊得多，但總還是同樣的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或在君主制的國家（如英國，在相當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等等），都形成着『國會權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贓物』的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為搶奪政權而鬥爭，而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始終不變，——最後，『行政權力』，其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又臻於完備和鞏固。

毫無疑義，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全部最新進化中的共同特徵。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這三年內，法國用迅速的、尖銳的、綜合的形式來表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巨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裏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裏，由於對無產階級的高壓之加厲，『國家機器』都異常加強起來，官吏軍事機關都空前增長起來。

現在，全世界歷史，無疑是在較一八五二年更廣大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

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給了最可注意的材料。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摘要登載於新時代雜誌上〔七〕（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裏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這都不是我的功勞。

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各階級底經濟解剖。我所作出的新工作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過程所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聯繫著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庭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確的。而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是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瞭解和承認。無怪乎當歐洲底歷史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一切「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考茨基所著無產階級專政那小冊子，是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這本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按市儈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在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則卑鄙地背棄它的一個標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出版）。

(1)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爲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站在馬克思上述言論所品評過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因爲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內（而在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爲反對資產階級而實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一 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硬說企圖推翻政府就會是絕望的蠢舉。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人們強迫工人決戰，而工人已出身應戰時，當起義已成爲事實時，馬克思就不管當時有種種惡兆，而終以極愉悅的心情來歡迎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不以迂儒態度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如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而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却按自由主義精神大叫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公社社員們顯出如他所說的『衝天』的英勇精神而表示歡愉。雖然這次羣衆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在其中看見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個相當進步，是比較幾百個綱領和議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自己所抱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爲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就是由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是於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寫成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陳舊了』。

……『特別是——他們繼續說，——巴黎公社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擷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放在單括號內的語句，是由兩位作者從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主要教訓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竟把它作爲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恰巧就是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這個修改底意思是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們，即使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的讀者們所不知道的。關於這個曲解，我們將在下面專論曲解的那一章內詳細說及。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那句名言之流行的庸俗『見解』，就在於認為似乎馬克思在這裏是着重指出緩慢發展底觀念以與奪取政權的觀點等等對立。

而其實却恰巧相反，馬克思底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以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為限。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即正值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寫給庫格曼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見，我認為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着重點是馬克思所加；在原文上有 *renverser* 一字，『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嘗試恰巧就是如此』（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期，第七〇九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種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在『毀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這幾個字中，已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

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簡明表示出來了。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已被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遺忘，而且簡直被他曲解了！

至於馬克思從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引出的語句，我們已在上面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議論中，有兩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以大陸來局限自己的結論。這在一八七一年時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閥機關，並且在頗大程度內還沒有官僚制度。因此馬克思就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於人民革命，會想像不必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預備條件，且是確有可能的。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

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

第二，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

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

如果列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八〕，當然都得承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民衆，最大多數人民，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當中都沒有顯然積極地、獨立地起來為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奮鬥。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其中未曾有過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時得到過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無疑義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民衆，大多數人民，呻吟於壓迫和剝削之下的社會最『下層』的人，都會獨立奮起，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嘗試，即按自己的方式來建設新社會以代替那正被破壞着的舊社會的嘗試，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哪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為人民大多數。把真正

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農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爲自己開闢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由於許多內外原因而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在說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時，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是說得很多而且時常說到的），而極嚴格地估計到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在對比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國家機器，既是工人利益，也是農民利益所要求的，這個共同要求把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關於剷除『寄生蟲』而用某個新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呢？

一一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還是十分抽象的，正確些說，還只指出任務，而沒有指出其解決的方法。以『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以『奪得民主制』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關於這個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究竟會採取哪種具體形式，這個組織究竟會如何與最完備和最徹底『奪得民主制』這點相吻合，——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既不願意陷於空想，就期待由羣衆運動的經驗作出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把公社底經驗——不管它是怎樣少——加以最仔細的分析。我們且把該書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時，從中世紀發端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無孔不入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等」，都發展起來了。隨着勞資間階級對抗底發展，「國家政權愈益帶有用以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機器底性質。在每次表明是階級鬥爭相當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底純粹壓迫性質，總是日益公開顯露出來。」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用以進行反勞動

戰爭的全國武器」。第二帝國〔九〕把這種情形鞏固了。」

「公社是與帝國絕對相反的」。『它是這樣一種共和國制底一定形式』，『其任務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底帝制形式，而且要消滅階級統治本身……』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形式，究竟是什麼呢？公社所曾開始創立的國家究竟怎樣呢？

……『公社所頒佈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這個要求是現時一切想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政黨底綱領中都寫着的。但是，它們的綱領究有什麼價值，這是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行爲中看得最明顯的，他們在事實上恰巧是在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以後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成。這些代表是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公認爲工人階級代表的人。』……

……『向來都是國家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撤除其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爲公社底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的機關；其他一切行政部門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得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上等國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權以及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除而消除了。……』

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立刻就着手來毀壞那精神壓迫底工具，即僱
侶底勢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上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由公開選舉，而成爲負責並隨時可以撤換的。」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那已被打碎之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備的民主制：取消
常備軍，施行一切公務人員完全選舉和撤換制。但在事實上，這個「僅僅」却是表明以一種在原
則上不同的機關來代替另一種機關的偉大的更替。這裏恰巧看見「數變爲質」底實例之一：民主
制——經實現到一般所能想像的那樣最完全最澈底的程度，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
的民主制，由國家（卽用以壓迫某一階級的特別力量）變爲一種已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於公社會是特別必要，而公社所以失敗的原因
之一，就在於它沒有充分堅決地來這樣作。但是這裏，實行鎮壓的機關，已是居民大多數，而不
是少數，如像向來無論在奴隸制下，無論在農奴制下，亦無論在僱傭奴隸制下所有的情形那樣。
而既然是由人民大多數自己去鎮壓自己的那些壓迫者，那末專供鎮壓的「特別力量」已經不需要
了！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就開始消亡。人民大多數能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底特殊機關（特權
官吏，常備軍底長官），由自己來直接執行這些事情，而國家政權職能底執行本身愈是全民化，
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性也就愈見減少。

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着重指出過的公社所採取的辦法：取消支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公務人員底薪水減低到等於『工人工資』的水準。在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如下的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底民主制變為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鎮壓某一個階級的『特別力量』的國家，變為由人民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中被人遺忘得最厲害的，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在通俗的解釋中——這樣的解釋不可勝數——是不說這一點的。對於這一點，正像對於已經過時的『幼稚行為』一樣，『照例』是不講的，好像基督教徒得到國教地位時，便『遺忘了』原始基督教之帶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為』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不過』是幼稚原始民主主義底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始者』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施坦，曾屢次演習鄙陋的資產階級嘲笑『原始』民主主義的伎倆。他也如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也如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那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不在某種程度內『回返』到『原始』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不然，試問怎可進到使國家職能由大多數居民和全體居民來執行呢？）；第二，以資本主

主義成果和資本主義文化爲基礎的『原始民主主義』，是與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前期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創立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而在這基礎上，舊『國家政權』底絕大多數職能，已如此簡單化，已可化爲這樣一種簡單到極點的登記、填表、檢查的手續，以至每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够執行這些職能，以至只要給以通常『工人工資』就足可執行這些職能，可以（而且應當）把這些職能中的任何特權性的『長官制』影子都取消掉。

一切公務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完全選舉和隨時可以撤換，將其薪水降低到通常『工人工資』的水準，——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辦法，足可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利益結合起來，同時就會成爲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辦法是關係於社會底國家改造，即純粹政治的改造，但這些辦法當然祇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的步驟聯繫起來，即祇有與生產資料底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爲社會公有制的過渡聯繫起來，才能顯出其全部意思和意義。

『公社——馬克思寫道，——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關於「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爲它消滅了兩項最大的費用，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很少數人能『高昇』，能『出頭』——在資產階級意義上說，——即是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升為生活有保證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凡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而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佔大多數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政府壓迫，是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政府。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既實現這一點，同時就是向着按社會主義方式改造國家這方面前進一步。

三 國會制底消滅

『公社——馬克思寫道，——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這裏，普選權不是爲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hindern)，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正好似個人選舉權服務於任何其他僱主來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會計員一樣。』

這個在一八七一年對國會制所作的精彩批評，現在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爲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對國會制的批評，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作，且根據這個十足

加二的正當理由來把任何對國會制的批評都宣佈爲『無政府主義』!! 所以毫不奇怪的，就是在『先進的』國會制的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維德、列金、桑巴、倫諾德里、亨德孫、王德威爾得、斯道寧格、布蘭亭、比沙拉底等等一流『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而日益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不管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革命辯證法看作爲時髦的空談，漂亮的辭藻，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所慣作的那樣。馬克思善於無情摒棄無政府主義，因爲無政府主義不會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底『豬欄』，特別是在顯然沒有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國會制給以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當在國會中鎮壓並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底真正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國會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那末，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底觀點來看，擺脫國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國會制呢？

又得再三反覆地說：馬克思從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請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遺忘得一絲不留，以至他們除了對於國會制的無政府主義批評或反動

批評而外，簡直不懂得任何的批評。

擺脫國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在於把代表機關由清談館變爲『工作的』機關。『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真是打中了現代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和國會『哈叭狗』們底要害！請看任何一個國會制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後台辦理，是由閣部、官廳、參謀部執行的。在國會裏，僅僅專爲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真是真情實理，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它還未來得及建立真正的國會以前，國會制底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立刻發生作用了。腐敗市儈中的英雄們，如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輩，切爾諾夫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竟有本領把蘇維埃也按最卑劣的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方式弄污了，將其變成爲清談館了。『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用種種清談和決議來愚弄那些輕信的農夫。在政府內面，實行不斷的更換角色，一方面爲的要依次安插儘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來『飽嘗』優厚尊榮的肥缺，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工作則在官廳和參謀部中『作』着！

當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人民事業，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社論中——用『大家』都以

政治賈淫爲業的『好社會』中人底絕頂直爽口吻——自供說，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閣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仍然是舊的，它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的』對那些革命創舉實行怠工！而且即使沒有這個自供，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不也是證明了這點麼？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這些在內閣官場中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的切爾諾夫輩、路薩諾夫輩、孫齊諾夫輩以及人民事業報其他諸編輯先生們，竟喪盡廉恥，公然毫不害羞、毫不赧顏地當衆宣佈說，——儼如閒談一樣，——在『他們的』閣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辭句是用來欺騙一般鄉下愚民的，而官僚辦公廳裏的耽擱延宕則是爲博得資本家底『歡心』，——這就是『誠實的』聯合政府底實質。

在公社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那貪污腐敗的國會制的機關中，論斷和討論底自由是不會墮落爲騙局的，因爲議員們應當親自來工作，親自來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來檢查在實際生活中所得的結果，親自來直接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着，可是作爲一種特殊系統，作爲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地位的國會制，在這裏是沒有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則我們就不能想像出什麼民主制，甚至連無產階級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統治的志願，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願，而不是爲

驅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辭句，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如謝德曼和列金輩，桑巴和王德威爾得一派人所幹的那樣，則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不要國會制。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克思講到既爲公社，又爲無產階級民主制所需要的那個官吏機體底職能時，他拿『其他任何僱主』所僱用的人員來與之比擬，即拿那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員』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與之比擬。

馬克思是連絲毫空想主義痕跡也沒有的，就是說，他並沒有虛構和幻想一個『新』社會。反之，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爲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拿無產階級羣衆運動底事實經驗作根據，而努力從這經驗中取得實踐的教訓。他向公社『學習』，正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底偉大運動經驗學習一樣，從來不向這些運動講過一句迂儒的『訓言』（如普列漢諾夫說：『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或如策烈鐵里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一舉而把官吏機體到處澈底消滅，這是談不上的。這是空想。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吏機器打碎，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機器，以便可以逐漸使任何官吏機體化爲烏有——這却不是空想，而是公社底經驗，而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當前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管理底職能簡單化了，給我們以拋棄『長官制』的可能，而把全部事情都歸結爲無產者（以統治階級資格）用全社會名義來僱用『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制度，不要任何從屬關係；這些由於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而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根本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祇會把社會主義革命延遲下去，一直延遲到人們變成另外一種人時爲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想由現在的人們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服從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國家官吏底特別『長官制』可以並且應當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就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已經是一般市民底智識水平所足可勝任，並且只給予『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執行。

我們工人自己從資本主義所已造成的成果爲基礎來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倚靠自己工人的經驗，創立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它，把國家官吏底作用歸結爲不過是執行我們委託的人員，歸結爲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平常薪水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所有各色各樣和各種程度的技術專家），——這就是我們的無產階級任務，這

〔1〕

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可以而且應當從此開始的起點。這個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自然會使任何官吏機構逐漸『消亡』，使這沒有括弧的，不像僱傭奴隸制的新秩序逐漸創立起來，在這一秩序下，日益簡單化的監督和報告職能，將由大家來輪流執行，然後將成為習慣，最後，便將不復成其為特殊階層底特殊職能。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稱郵政為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式樣組織起來的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一切托拉斯都變為這種式樣的組織。這裏站在那些工作苦重而忍飢受餓的『簡單』勞動者頭上的，也同樣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僚。但是，社會管理底機體，在這裏已經預備好了。祇須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底鐵手去粉碎這些剝削者底反抗，毀壞現代國家底官僚機器，——那時，我們就有一個去掉了『寄生蟲』而擁有高度技術設備的機體，這個機體完全可以由已經團結起的工人們自己動用起來，僱傭一些技師、監工和會計員，而付給他們全體以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亦如付給全體『國家』官吏一樣。這就是對待所有一切托拉斯之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既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估計到那已由公社實際開始了的（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全部國民經濟組織得如像郵政一樣，使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所有一切職員都領取不過『工人工資』的薪水，使其受武裝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消滅國會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各勞動階級免除資產階級對於這些機關的糟踏。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公社在它來不及詳細去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簡要大綱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應當成爲甚至一個最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是會由各公社選舉出來的。

：「那時還會留歸中央政府的爲數不多而意義重大的一些職能，則不應該廢除——硬說應當廢除，這是故意偽造，——而應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即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不應消滅，反而應當用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現實，其方法就是消滅那以這個統一底體現者自居，但同時却想離民族而獨立，且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其實，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身體上的寄生贅瘤而已。」：「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權底純粹壓迫機關，而其合理的職能，則要從這覬覦着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底負責公僕。」

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之不瞭解——也許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瞭解——馬克思這些議論，該到了何種程度，這點在叛徒伯恩施坦所著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上，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正是論到馬克思上述一段話時，伯恩施坦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說來，在所有一切重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幾字放在括弧內，想必他是用以表示譏諷的意思）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的思維進程是萬分接近的』。自然，——伯恩施坦接着又說，——市政局底意義在增長着，但是『我覺得成問題的，是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未必就是如此消散（*Auflösung*——直譯是：解放，融解）現代國家，如此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其組織，如像馬克思和蒲魯東所設想的那樣：由各省或各省區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省區會議本身則又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織之，——這樣一來，全國代表機關底舊形式就會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一三四頁和第一三六頁）

把馬克思對於『消滅國家政權這寄生蟲』的觀點拿來和蒲魯東底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連想想不到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根本不是要以聯邦制來和集中制對立，而是要打碎現存於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

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只是他在自己周圍，在市僧庸人之流中和『改良主義』沈滯環境裏所看見的東西，即只是『市政局』！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則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關於這一點竟沒有人和伯恩施坦爭論過。許多人都會駁斥伯恩施坦，——特別是在俄國著作界中有普列漢諾夫，在西歐著作界中有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說到伯恩施坦這一對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之不會用革命頭腦思索問題，不會思考革命，真是到了極點，竟把『聯邦制』加到馬克思身上，把他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爲一談。而想做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掉衛革命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却對此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之最庸俗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個庸俗見解，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論公社經驗的議論裏，是連一點聯邦制的影子也沒有的。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相同處，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所看不見的；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不同之處，却恰巧是伯恩施坦所認爲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和蒲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之處，是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的，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或巴枯寧不同之處，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待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者。在他上述那段議論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那些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能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認作是消滅集中制！

而如果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裏，完全自由地組織在各地公社內，將一切公社底行動統一起來打擊資本，打破資本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轉交全民族、全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麼？難道這不是最澈底的民主集中制麼？並且不就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麼？

伯恩斯坦連想都想不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由各公社自願結合而為一個民族，可能由各無產者公社自願溶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伯恩斯坦，也如任何一個庸人那樣，以為集中制只是一種自上的，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並維持着的東西。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的這些見解會有人曲解一樣，遂故意着重地說，如果非難公社要消滅民族統一並取消中央政權，那就是有意偽造。他故意使用『組織民族統一』一語，以便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拿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說的人，是比任何聾子都要聾些。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就正是，不願聽說要消滅國家政權，不願聽說要消滅這寄生蟲咧。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引幾段。

『新的歷史創舉底通常命運，——馬克思寫道，——就是人們把它當作是抄襲舊的，甚至是早已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因為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之相似。於是這毀壞（Chaos——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公社底復活，……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聯盟（孟德斯鳩，基朗特派（1790）），……看作是那反對過分集中制的舊鬥爭底放大形式。』……

『公社制度定會把那些寄生於社會而阻滯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吞噬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也就會把法國底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定會使鄉村生產者，受每一省區內各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使他們能在那裏獲得城市工人作爲其自身利益底天然代表。而公社本身底存在又自然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已在成爲贅物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那是『寄生贅瘤』的『國家政權』，『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時成爲贅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公社經驗時用來評論國家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而現在却只得將其發掘出來，使廣大羣衆能夠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根據他對所經歷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作出的結論，恰巧是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機已經到臨的時候，被人們遺忘了。

∴『公社所引起的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現的利益之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極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公社底真正祕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反對佔有者階級之鬥爭底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制度就會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空想主義者曾從事於『發現』各種使社會能在其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根本擺手不談任何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爲資產階級國會制的民

主國家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極限；他們在這個『模範』面前祈禱到碰破頭額的地步，並且把任何想毀壞這些政治形式的意向都稱之爲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底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說，國家是一定會消逝的，而國家消逝底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沒有敢於去發現這個未來底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考察法國歷史，加以分析而作出按一八五一年事變所應作的結論：情形正歸結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而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革命運動業已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不管這個運動遭到挫折，不管這個運動爲期很短且顯然軟弱無力，而終於開始來研討，看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使勞動底經濟解放可能實現的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可以而且應當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

我們往下就會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中，在另一種條件下，繼續着公社底事業，並證實着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之點。恩格斯曾屢次說到這個問題，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個問題底其他方面發揮得非常鮮明而有力，因之我們對這些解釋必須加以特別說明。

一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公社底經驗，並再三說到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就是在論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顯然闡明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今國家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使我們有根據來把這兩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又顯然闡明那些不同的特徵，或者說達到國家消滅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這個問題是完全如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解決的：即是藉供求關係在經濟上逐漸的均衡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法，本身又再三地產生出這個問題，就是說，不能給予任何的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會要看時間和地方情形而定，同時也與那些更深遠得多的問題相聯繫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從事於臆造將來社會結構底空想體系，那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時在各個大城市中已有很充足的住房，只要把這些住房應用得合理，便可以立即幫助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東，而把那些沒有住房的工人或現時住在人數過多住宅裏的工人們搬進這些房屋裏去。而當無產階級一奪得政權時，這種為社會福利所要求的辦法，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的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說到國家政權活動底內容。剝奪住宅和佔據住宅，也是按現代國家底命令實行着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手續方面來說，也會『下令』佔據住宅和剝奪房屋。但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勾結着的官吏，對於實施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顯然，簡直是毫不中用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

相反。在實現後一種辦法時，單個工人變爲一個住房，一塊農民土地以及某些勞動工具底所有者；而在實現前一種辦法時，則由「勞動人民」成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發給個人或協作社。同樣，消滅土地私有的辦法並不就是要消滅地租，而是要把——雖然用變態的形式——地租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會排除承租和出租制底保存。」（第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內將考察這段引證中提到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恩格斯說得極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未必」——「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會毫無代價地發給住宅。把屬於全體人民的住宅取費租給各個家庭，就既要徵收這筆租金，也要實行相當的監督，又要有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有特別的軍閥官僚機關連同其負責人員獨享的特權地位。而過渡到可以免費發給住宅的情形，則是與國家完全「消亡」相關連的。

恩格斯講到布朗基主義者〔二〕在公社以後並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立場上來的時候，會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底必要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乃是進到廢除階級，同時也就廢除國家的過

渡。』：（第五頁）

那些愛好咬文嚼字批評的人們，或那些從事於『摧殘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也許以爲，在這裏承認『廢除國家』，而在上述反杜林一段議論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公式來駁斥，是有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責備國際主義者爲無政府主義者的風氣，日益普遍地流行起來了。

國家隨階級之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一書中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議論，並不是簡單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似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

因爲現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關於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曲解了，所以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在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彙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

(II)

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威權主義者』；這些論文僅在一九一三年才譯成德文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上。

：『如果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的立場時寫道，——採取革命的形
式，如果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來替代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一種侮辱原則的莫大罪惡，因為他
們爲了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爲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毫不放棄武器，不廢除國家，却賦予國
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一冊，第四〇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哩！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那認
爲國家隨階級消逝而消逝，或國家隨階級廢除而廢除的意見，而是反對使工人拒絕運用武裝，拒
絕採用有組織的強力，即拒絕那應服務於『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一目的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那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的國家，以免人們把他與
無政府主義鬥爭底真實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以廢除國家爲目的這一
問題上，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意見。我們肯定地說，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
時運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爲要消滅階級，就必須有被壓迫階級底
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選定最激烈最明顯的問題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工人推翻資本家底統

治後，是應當『放棄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打破後者的反抗呢？而由這一階級來有系統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階級，若不是『暫時形式的』國家，那又是什麼呢？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問問自己：他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麼？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黨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的麼？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闡明得更詳盡，更通俗得多。他首先就譏笑蒲魯東主義者那種糊塗觀念，因為蒲魯東主義者自稱為『反威權主義者』，即否認任何威權，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行中的海船來說吧，這些以應用機器和由許多人有計劃合作為基礎的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服從關係，因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某種威權或權力，則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動作起來，這難道不明顯麼？

：『如果，——恩格斯說，——我提出這種論據來反對那些最頑固的反威權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是呵！這是對的，但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代表的那種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爲只須改變某一事物底名稱，就可改變這一事物本身哩！』

恩格斯這樣來指明了威權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底階段不同而變更，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很荒謬的，並補充說，採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是在日

益擴大着，然後恩格斯就由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推論進而說到關於國家的問題。

：「如果，——恩格斯寫道，——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社會組織祇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威權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成爲必要的事實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對名詞。

「爲什麼反威權主義者不只以叫喊反對政治威權和反對國家爲限呢？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爲，國家以及政治威權，將由於未來社會革命底結果而消逝，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爲關注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威權主義者却要求一舉而把政治國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產生出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底第一步動作就是廢除威權。

「這些先生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鎗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會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威權主義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麼，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僅僅是散佈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這一點，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底事業。在前後兩種場合內，

他們都只是效勞於反動派。」（第三九頁）

在這段議論中間，牽涉到那些在考察關於國家消亡時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將專門論述這點）時應當考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係指出國家消亡底過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在其消亡底相當階段上，可以名之為非政治的國家。

恩格斯這段議論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做恩格斯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三年以來，已與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幾百萬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當採取的爭論態度。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這就是恩格斯對問題的提法。無政府主義者所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權力、權威、政權、國家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歸結為一句十足的市儈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厭棄。恩格斯底意見則完全不是這樣：他着重指出，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逝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然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即恰巧是機會主義派中的社會

(II)

民主黨人所通常迴避不說，而專門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研究』的問題。並且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很果斷地說：公社不是應該更多運用國家底，即握有武裝、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革命政權麼？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都是簡單用庸人底譏笑語句來敷衍，或至多也不過是用一句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樣的社會民主派，說它背叛了自己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是爲了極具體地來考察：無產階級對於銀行和國家，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態度。

三 給伯伯爾的信

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致伯伯爾信中下述的這一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問題的著作內，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之一。附帶說說，據我們所知道的，這封信第一次由伯伯爾刊印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第二卷中，這卷回憶錄是於一九一一年，即在這封信寫就並寄出之後經過三十六年才出版的。

恩格斯在這封致伯爾的信中，批評了那也由馬克思在致白拉克的有名信中批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特別說及國家問題時，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够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滅（*geh aufhört*）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利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國」（*Gemeinwesen*）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相當的。』（見德文原本第三二二頁）

要注意到：這封信是關係於黨綱，而這個黨綱是馬克思在他距此信僅幾星期後發出的信裏批評過的（馬克思底信寫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那句話中使用『我們』二字時，他毫無疑義是以自己和馬克思底名義來向德國工人黨

底領袖提議，從黨綱中把『國家』字樣勾銷而代之以『公團』字樣。

如果向現在這班爲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偽造出的『馬克思主義』底頭目們提議如此修改黨綱，那末他們該會怎樣狂吠起來，大罵『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爲了這點會褒獎他們的。

而我們則要做我們的事。在審查我們黨綱的時候，是絕對要注意到恩格斯與馬克思底忠告，以便更接近於真理，以便恢復馬克思主義而清除掉一切對於它的曲解，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困難也許只會在於名詞上。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團』，而恩格斯所採用的那個，並不是表示單個公團，而是表示各個公團底總和，公團底體系。在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字，所以我們也許只得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字，雖則這個字也有其不便之處。

『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斷語。看了上文以後，這個斷語是完全可以懂得的。公社已不再成其爲國家了，因爲當時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居民底大多數，而是居民中的少數（剝削者）；它已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自己上台來代替那特別的鎮壓力量。凡此一切，都是離開了原來意義的國家。而如果公社臻於鞏固，那末

在它中間，國家底痕跡就會自行『消亡掉』，它就會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將無事可做而逐漸停止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字樣來挖苦我們』，——恩格斯說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而言。恩格斯之所以認為這種攻擊是正確的，乃是因為『人民國家』是與『自由人民國家』一樣荒謬，一樣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會努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其在原則上正確，使其除去那些對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偏見。可惜！恩格斯這封信竟被攔藏起來達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便會看見，就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複着那些為恩格斯所警告過的錯誤。

伯伯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寫信回答恩格斯，就中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於黨綱草案的批判，並說他責備了李卜克內西底那種讓步態度（伯伯爾底回憶錄，德文版第二卷第三〇四頁）。但是，如果拿伯伯爾所著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來看，那我們就會在其中遇見一些對於國家問題的完全不正確的議論：

『必須把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為人民的國家。』（我們的目的）一八八六年德文版，第一四頁）

這是刊印在伯伯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接受了這

如此頑固重複着的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議論，尤其是普恩格斯底革命解釋被藏匿着，而全部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四 『愛爾福特綱領』(二) 草案批評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決不能不說到恩格斯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寄給考茨基，而直至十年以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出來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因為這主要是爲了批評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制度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而作的。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也給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表明恩格斯會如何細心深思地考察最新資本主義底種種變態，並因而如何善於在某種程度內預示到現今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如下：論到該綱領草案所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特質的『無計劃性』(Planlosigkeit)一語時，恩格斯寫道：

：『當股份公司進到統治並剷斷各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時，那就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了。』(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冊，第八頁)

這裏已經指出了對最新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估計中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變成

爲壟斷的資本主義。後面這幾個字是必須加上着重點的，因爲最普泛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言，似乎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未會產生，至今沒有產生，而且也不能產生的。就儘管托拉斯產生出某些計劃性，儘管資本大王們預先多少計算一國範圍或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多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其新階段上，但毫無疑義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的資本主義之『接近』於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底真正代表看來，乃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容易實現，可以實現和不可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所有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但我們再回轉來講國家問題吧。恩格斯在這裏給了三個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與國家制度間的聯系；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說到共和國，那末恩格斯是把這點當作他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的重心。如果我們記起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它成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標本的事實，那就可以毫無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乃是批評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

『草案底政治要求——恩格斯寫道，——有一個很大的缺點。該草案中沒有說到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到的東西。』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憲法不過是一八五〇年最反動憲法的抄本，德國國會，正像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君主專制底遮羞物』，想在這法定各小國存在和法定日耳曼各小國聯盟的憲法基礎上，實行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產』，那就是『顯然荒謬的思想』。

『提到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是不能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在綱領中提出的。但是恩格斯並不因『大家』都以為滿足，就簡簡單單容忍這個不言而喻的理由。所以他又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當推進的。恰巧現時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刊物上散佈着的（*Centralorgan*）機會主義，表明這件事情是如何必要了。現在，人們害怕那反社會黨人的法令（一三）又會恢復起來，或是因回想起在這個法令盛行時所作過的某些過早的聲明，就想要黨承認德國現今的法定制度足以和平實現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害怕非常法令復活為出發點的這個基本事實提在第一位，且毫不遲疑地稱之為機會主義，並申言說，正因在德國缺乏共和制度與自由，所以關於『和平』道路的夢想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充分謹慎，而不自行掣肘。他承認，在具有共和制度或具有很廣泛自

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呵！）有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一切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宣稱有這種可能，且在沒有任何必要時作出這種宣言，那就等於替君主專制搗去其遮羞物，而親自去替它遮蓋裸體罷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於是其中絕大多數正式領袖就果然成了君主專制底掩蓋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他們把一些普及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在第一位，而藉此將那些在大事變一發生，在政治危機一爆發時，就會自然而然的提到日程上來的具體問題掩蔽起來。其結果就只會使黨在有決定意義的關頭突然陷於束手無策的狀態，而在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使黨不知所從和缺乏一致，因為這些問題是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的』：

『這樣爲着眼前片刻的利益而忘却宏偉的根本大計，這樣貪圖一時的成功，這樣專爲一時成功而不估計將來結果的鬭爭，這樣爲了現在而犧牲將來運動的態度，也許是導源於「誠實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都是機會主義，而且「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更要危險些』：

『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一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這民主共和

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特有形式，這是法國大革命所已經表明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重複說到一個昭然貫澈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認為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絲毫也不消除資本統治，因而絲毫也不消除對於羣衆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必然會使這個鬥爭如此擴大、如此展開、如此暴露、如此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羣衆根本利益時，則這種可能就會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即在這些羣衆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的條件下，見諸實現。這在整個第二國際內，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上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遺忘情形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

論到與居民民族成份有關的聯邦共和國問題時，恩格斯寫道：

『什麼東西應當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它有反動的君主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國分立制，這個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底種種特點鞏固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整體的德意志中。）『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形式。聯邦共和國一般和整個說來，現今還是在美國廣大地區上所必需的；雖然在其東部一帶它已成爲障礙了。如果在英國建立聯邦共和國，那就會是一個進步，因爲在英國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個民族，而其國會雖然是統一的，可是此刻已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存在着。聯邦共和國在小

小的瑞士早已成爲障礙物了。那裏，其所以還容忍聯邦共和制度，這僅僅是因爲瑞士自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純粹消極的一員而已。若在德國實施瑞士式的聯邦制度，那就會是一大退步。聯盟制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兩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盟的國家，都有其特別的民法和刑法，有其特別的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同時並存的由各國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自治邦不管其大小如何都以一個邦的資格來參加表決。』在德國，聯盟制國家是達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過渡，我們的任務不是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二四〕往後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運動」來對它作以必要的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反而非常細心地努力去分析那些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個別情形底具體歷史特點來看清某一過渡形式是由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把聯邦共和國看作或者是例外情形和對於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進到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特殊條件下的『進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提出民族問題。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批評小國家系統底反動性以及在一定具體情形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現象，可是他無論何處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偏向，——這個偏向是

荷蘭和波蘭兩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的』小國家市僧狹隘民族主義之極正當的鬥爭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在這個無論從地理條件，或統一的語言，或數百年來的歷史看來都似乎已把英國各單個小疆小域底民族問題『解決了』的國家裏，恩格斯也估計到明顯的事實，認定民族問題還沒有消逝，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共和國底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爲實現統一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進行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運用這個概念時那樣，把民主集中制瞭解爲官僚主義的意思。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也不排斥廣闊的地方自治制，只要這種地方自治有各『公社』和省區自願堅持國家統一爲條件時，便會把任何官僚主義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絕對消除的。

『總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國』——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觀點時寫道，——『但不是如像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不過是一七九八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從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八年，法國每一省，每一公社 (Commune) 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正是我們也應當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才不要官僚制，這是美國和第一法蘭西共和國已經

向我們指明和證明了的，而現在澳洲、坎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又一次地指明給我們看。

這種省區的和公社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聯邦制自由得多的制度，在那裏，雖然單個自治邦對於整個聯邦國家是很獨立，但它對於縣和公社也是獨立的。自治邦的政府任命縣知事和地方長官，這是在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現象，我們將來在自己國家中也應當斷然排除，亦如排除普魯士的專員、縣長、省長以及一般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點，恩格斯提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規定如下：「在各省各縣各公社經過依普選制選出的官吏來實行完全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當局和各省當局。」

在被克倫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總長底政府所封禁的真理報上（第六十八期，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已經指出過，關於這一點——自然還不只這一點——我國假革命假民主派底假社會主義的代表們，是如何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自然，這些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來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根據確實事實，按最確切的實例，駁斥那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以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些。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是比聯邦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

真正要多些。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和省區等等所享受過的最多的自由，是集中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給予的。

對於這件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在我們黨的宣傳和鼓動中，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充分注意到。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爲法蘭西內戰一書第三版上作的序言中，——這篇序言是作於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最初登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對有關國家態度問題作了許多饒趣的附帶指示而外，又對公社底教訓作了一個極鮮明的總結。這個總結，由於有從公社起至當時止二十年間的全部經驗而更加深刻化，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那流行於德國的『國家迷信』的這個總結，真可稱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定論。

『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說，——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因此，在每一次由工人爭來的革命以後，就發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遭受失敗。』……

這個對於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瞭。問題底實質——就中也關於國家問題（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明得非常切要中肯。而恰巧這一實質，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大學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迴避不說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一個『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烈鐵里獲得了榮幸（卡芬雅克式的榮幸〔二五〕）機會來洩漏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祕密。策烈鐵里在其六月九日發表的『歷史的』演說中，偶然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裝的決定，同時當然把這個決定冒充爲他自己的決定，並且一般地是『國家』之所必要的！

策烈鐵里於六月九日發表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是每一個著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家都可引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來證明策烈鐵里先生所主持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革命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也與國家問題有關的附帶指示，是關於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其腐朽而愈益機會主義化，於是對於『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的有名公式，也就愈益加上庸俗的曲解。就是把這個公式曲解成爲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黨也是一件私人事情！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當時所奮起反對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還只看見

自己黨內機會主義底最微小的萌芽，因此他在當時說得很謹慎：

『參加公社會議的，幾乎盡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它的決議就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有些決議是把作為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基礎，而被共和派資產階級因其卑鄙怯懦所拒絕了的改良辦法，加以法定。例如實行了如下的原則：宗教對國家而言僅僅是私人事情。公社頒佈的另外一些決議，則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在某種程度內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

恩格斯故意把『對國家而言』幾字加上着重點，乃是針對着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加以打擊，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把宗教宣佈為對黨而言的私人事情，——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底黨降用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儈水準，這種市儈願意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這一任務。

將來著述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的人，當探究該黨在一九一四年陷於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論文中那些向機會主義大開門戶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於一九一三年“Los-von-Kirche-Bewegung”（與教會分離運動）的態度為止。

但是現在我們且來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怎樣給奮鬥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的教訓吧。

以下就是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教訓：

『正是至今存在的集中政府底壓迫權力——軍隊、政治警察、官僚，即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所創立，而從那時起被每屆新政府當作適宜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敵人的權力——正是這個權力，應該在法國到處傾覆，亦如它已在巴黎傾覆過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本來應當承認，工人階級得到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從事管理；工人階級爲要不致又喪失剛才爭得的統治，它就應當：一方面剷除那至今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全部舊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就應當保證有可能防範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而宣告所有他們毫無例外地都可以隨時撤換』：

恩格斯再三着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它的根本特徵，即把本來是『社會公僕』、社會機關的官吏，變爲社會主人的現象仍然保留着。

『爲了不讓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這種現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國家中都是不可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都委任那些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了按選舉者決議隨時可以撤銷被選舉者的法制。第二，它給予所有一切公務人員的薪水，不分職位高低，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所一般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這樣就造成了防止那種續營祿位和升官發財主義的可靠隄防，何況公社此外還施行了各代表機關代

● 這在名義上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計算，約等於六千盧布，有些布爾什維克犯了一種完全不

表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

恩格斯在這裏講到了一個有趣味的界綫，一達到這個界綫，徹底的民主制就變為社會主義，同時也就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為，爲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服務機關底職能變爲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以便使絕大多數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然後且使全體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而爲要完全排除升官發財主義，就必須使那些雖然是收入不豐但亦「榮譽」的國家服務機關中的位置，不能成爲博得銀行或股份公司內之收入豐厚的職位的橋樑，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很常見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却又是多餘的事。這種似乎很機智而實則不正確的論調，對於任何一個民主設施——連對官吏支付普通薪水的辦法也在內——都可以如此重複，因爲貫徹到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會消

可寬恕的罪過，例如他們竟在市議會中提議支付九千盧布的薪水，而不提議對全國施行以六千盧布爲最高限度的薪金，——這個數目是足夠的。

亡掉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舊時有句笑話：如果一個人脫掉一根頭髮，那末他是否就成了禿頭呢？

把民主制發展到底，尋求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踐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爲社會革命而鬥爭中的基本任務之一。如果民主制是一種單獨存在的東西，那末任何民主制都不能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無論何時都不會是『單獨存在』，而會是『總合存在』的，將也要影響到經濟，推進其改造，受到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是活生生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繼續說：

……『這種炸毀 (Spröden) 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替代它的情形，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詳細描寫過了。但是，這裏還須再一次簡單論述這種代替底幾個特點，因爲恰巧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已經由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說來，國家是『觀念底實現』，或譯成哲學語句，便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亦即永恆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而由此就產生了崇拜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事物的迷信心理，這種崇拜心理之所以很容易根深蒂固起來，是因爲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似乎全社會公共事業與公共利益只能用舊有方法來處置和保護，就是

說，只有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作。人們以為，假使不再去迷信世襲君主制度而主張民主共和制度，那他們就已是非常勇敢地前進了一步。其實，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至少國家也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獲得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害；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也如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斬截這個禍害底惡劣方面，直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一代人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的時候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叫他們在君主制度由共和制度所代替時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讀起來好像是直接對於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一般先生們的教訓，他們在其參加『聯合』政府的實踐中，正表現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對於國家的崇拜！還要指出兩點：（一）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國家之為『這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是『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度下的，但這根本不是說，壓迫底形式對於無產階級就漠不相關，如像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誨』的那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鬥爭形式和階級壓迫形式，能夠大大促進無產階級為消滅一般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二）為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才能完全拋棄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呢——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底消除問題相關連的，我們現在正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恩格斯講到『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會連帶說及這一點。

恩格斯在他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一八七〇年代雜著彙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的自序（作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中寫道：『一切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一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名詞，因為當時法國蒲魯東派和德國拉薩爾派都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

……『因此在當時，馬克思和我兩人——恩格斯繼續說，——都覺得爲了表明我們特有的觀點，絕對不可用這樣一個有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許可以過得去（mag passieren），雖然它對我們這樣的黨，是仍舊不確切的（unpassend，不適當的），因為我們黨底經濟綱領不簡單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逕直是共產主義的，因為我們黨底最終政治目的是在消除全部國家，因而也就是消除民主制。但是，真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政黨的名稱，是始終不會完全名符其實的：黨在發展着，而名稱依然如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臨終時都仍然忠實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曾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

確切的黨底名稱，但是未曾有真正的，即羣衆的無產階級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有了真正的黨，但其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其名稱在科學上的不正確性不會對它隱瞞起來，不會妨礙它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個談話家會用恩格斯的說法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有真正的黨，它發展得很好；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沒有意義的怪異名稱，除表示我們在一九〇三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二六）上佔有多數的這一全屬偶然的事實而外，絕對沒有其他什麼意思的名稱，也是『可以過得去』的；也許現在，由於我們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僧民主黨人在七八月間肆行追究的結果（二七），已使『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成爲享有全民榮譽的名稱，除此而外，這種追究又還表明我們黨在其真正的發展上作了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進步，因此，也許我自己也對於我在四月間提出的變更我黨名稱的提議猶豫起來。也許我要向自己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爲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幾個字留下放在括弧內面：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在通常談論國家問題時，人們常常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過而我們已經在上文中順便指出了的那個錯誤。就是說：人們常常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消亡也就是民

主制底消亡。

驟然看來，這樣的斷語似乎是極端奇怪而難於了解的；也許，甚至有些人會發生這樣的恐懼心：莫不是我們期望有一個將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麼？因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這種原則哩。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同一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制度，就是說，是爲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這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施行有系統的強力的組織。

我們所抱定的終極目的，是要消滅國家，就是說，要根本消滅任何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強力，任何加於人們的強力。我們並不期望有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但是，我們既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就深信社會主義將轉變爲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必要來對人們施用強力，不會有任何必要來使這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使這一部分居民服從於另一部分居民，因爲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起碼條件，而不需要強力和服從。

爲要着重指出這個習慣的因素，所以恩格斯就說到新的一代人，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能够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掉』——這裏所謂國家制度是指任

何國家制度而言，連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也在內。

爲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考察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刊登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上，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爲詳盡的說明。在這一精彩著作中批評拉薩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之聯繫的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伯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派」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驅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團』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為甚至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規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幾乎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底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絲毫沒有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正像自然科學家提出——譬如說——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進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却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國是與它在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乃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管其形式如何紛繁複雜，而各個不同的文明國度裏各個不同的國家却有一個彼此共同之點：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制度」，以與其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死亡時的那個未

來相對立。

「其次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遭到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那時，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類似的社會職能會仍然保存？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與「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起來，也是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的」……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以後，就來說明問題底提法，且似乎是特別警告說，爲要給這個問題以科學的答覆，就祇可依據確切判明的科學材料。

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所完全確切判明了的第一點，亦即先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今又爲那些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遺忘的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時期或特別階段。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繼續說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便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底發展情形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那些實際材料所作出的結論。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奪得民主制』。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民主制是怎樣變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在實際上始終只是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

制底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大多數居民都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際此時期中，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作了更大得多的工作。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的這種政治上覺悟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

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大眾生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摒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脫離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從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就是完全虛偽和欺騙的民主制之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平穩朝着『愈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別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為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為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為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許多剝奪自由的

手段。爲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鎮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爾的信中很燦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即是把他們摒除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澈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是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世箴言上所重複說明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制力，不需要什麼強制制，不需要什麼服從，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為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够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憤恨，引起抗議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供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它就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有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別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這樣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兇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大多數加於少

數，被剝削者加於剝削者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這是一件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要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悖的，於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的需要性就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羣衆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預先在這裏指出一下）就够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爲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個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情，却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情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羣文明人都很易於和解打架的事或不許虐待婦女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違背公共生活規則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生的根

本社會原因，乃是羣衆被剝削，羣衆陷於飢寒貧困，而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漸進程度如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憑空幻想，而是就現時所能確定的地方加以更詳細的確定，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網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為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养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剛剛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種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便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分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的法

權」，它也如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分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分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爲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爲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爲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够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們，連『我們的』杜干（二八）也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這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復存在了的。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

(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那種給不相等人們之不等量(事實上不等的)勞動以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法權」。爲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爲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來源都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爲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礙着這個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個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

把勞動變爲『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發展速度爲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爲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爲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其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二九）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每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每一個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到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一〇〕，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且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最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公司，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公司來開始，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公司，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那些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蠱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

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了的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也就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尙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掘壕隊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爲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式地臆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

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爲若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即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是隨時隨地都可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裏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

個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為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為一種僵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羣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在民主

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它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羣衆——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警——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在這裏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是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已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了的人人識字，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者都能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據的手續①。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地和在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知識分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爲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爲一個管理處，成爲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

●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實行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職能了』（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論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爲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卑鄙醜惡現象，並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爲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因爲當一切人都已學會管理，而且已在實際上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事情，就必然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爲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致使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爲習慣。

到了那時，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二〕。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關於國家對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如一般關於革命的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有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增長而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標本的現象，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觸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來加以迴避，或者不理會它。

一般整個看來，我們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上採取了既有利於機會主義又培養機會主義的這種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把它完全庸俗化。爲要簡括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且拿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著了一本專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關係問題的小冊子，標名為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是於一八九四年用德文出版的。

普列漢諾夫忽然異想天開的論述這個題目時，竟把反無政府主義鬥爭中最迫切最緊急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即關於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和一般關於國家的問題完全避開不談！他的這本小冊子最出色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藝的部分，其中包含許多關於斯底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

題目上的這種配合，不但令人可笑，而且足以特徵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的全部活動：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普列漢諾夫正是表明自己是個半學究、半庸人、在政治上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走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最詳盡地說明了自己關於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的見解。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出版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評時，寫道：『我們（即

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鬥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代表大會閉幕後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會企圖恰把巴黎公社宣稱爲『他們自己的』，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同時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這些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甚至沒有給一個略近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把整個關於國家的問題迴避不說，毫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公社以後的全部發展過程，這就必然要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因爲機會主義所最要求的，正是完全不提出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單是這也就是機會主義底勝利了。

一一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在俄國文壇中的譯本，無疑是比在任何其他國家文壇中多得無可計量。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戲謔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的還要多些（附帶說說，在這句戲謔話裏含有比說出這話的人所料想的還更加深切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對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作品的需求，表現得非常厲害，空前未有，並且所得到的這些作品

的譯本要比其他各國多得無比，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底豐富經驗加速度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底所謂年輕基地上來了）。

考茨基之特別著名於俄國，除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以外，就是他與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的論戰。然而有一件差不多沒有人知道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把考茨基怎樣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最大危機時期中滾到最可恥的錯亂境地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立場上去的情況加以考察，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不說的。這一事實就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曉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曙光雜誌〔二二〕，曾不得不與考茨基爭辯，而把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二三〕叫作『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所持的態度是曖昧的、躲閃的、並且是調和的。在德國文獻中還刊行過考茨基底信札，這些信札也表明他在奮起攻擊伯恩施坦以前表示過同樣厲害的動搖。

然而，含有更大得無比的意義的事實，就是現在當我們研究考茨基最近叛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看到，在他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和問題解釋方式中，他恰恰

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著作，即是他著的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很值得注意的，伯恩施坦在其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斥馬克思主義爲『布·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資產者千百次重複這種指斥來攻擊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特別說到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企圖——我們已經說過，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成就的——把馬克思對於公社的觀點與蒲魯東的觀點混爲一談。伯恩施坦會特別注意到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序言中特別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中把它至少重複過三次，將其極端曲解成爲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炸毀（*Sprenge*，即炸毀，是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而在伯恩施坦說來，似乎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分的革命手段。

這真是對馬克思思想之最粗蠻最醜陋不過的曲解了。

而考茨基在他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最詳細的辯駁中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肯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絕頂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他把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恩格斯序言中的一段引來後，就說什麼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但它一般地是能夠握取這個機器的，如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與馬克思真正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加在馬克思頭上，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問題的最重要的區別，被考茨基

抹煞了！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問題，——考茨基在『反對』伯恩施坦時說道，——我們可以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見德文版第一七一頁）

這不是反對伯恩施坦的論戰，而其實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此刻所需要的，恰巧祇是要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根本問題都『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在這四十年當中，教誨無產階級，說它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已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却玩弄手法，拿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替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爭辯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道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這樣的話頭來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倆對於無產階級黨應準備工人階級去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存在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我們且拿考茨基另一部更加成熟的、也多半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錯誤的著作來說吧。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裏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拿來作爲他所特選的題目。他提供了很多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迴避過去了。在這本小冊子內到處都只是說奪取國家政權，這就是說，他選擇的語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爲它認許奪取政權而不必破壞國家機器。恰巧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認爲在共產黨宣言綱領上已經『陳舊』的東西，考茨基却在一九〇二年把它復活起來了。

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特闢一節，專論『社會革命底形式與武器』。其中講到羣衆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大國家底權力工具如官僚和軍隊』，但是關於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

訓，他却一字不提。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並非偶然的了。

考茨基把問題敘述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這個綱領底條款。至於一八七一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一問題方面所給的新東西，他却置一辭。考茨基用下面這樣一些『堂皇』動聽的老生常談來敷衍了事：

『不言而喻，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革命本身就預定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定會改變我們現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如馬吃燕麥，伏爾加河流入裏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深刻的』鬥爭一類的話，來迴避下面這個對革命無產階級是很迫切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對於民主制的態度，比較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處』，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考茨基既迴避這個問題，在事實上就是在這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而在口頭上却向它宣佈赫赫可畏的戰爭，強調『革命思想』底意義（試問如果害怕向工人宣傳革命底具體教訓，那末這個『思想』究竟還有多大的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

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了』。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考茨基寫道，——可以同時存在着形式上極不相同的各種企業：官僚的（??），工聯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如下的形式：由工人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而這個國會就規定工作規則並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可以交給工會辦理，另外一種企業則可以按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見一九〇三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頁和第一一五頁）

這個議論是錯誤的，它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公社教訓做例子所解釋的，是倒退了一步。

從似乎必須有『官僚』組織方面來看，鐵路是和大機器工業內所有一切企業，是和任何工廠、大商店以及大資本主義農場絕對沒有什麼區別的。在所有這些企業中，生產技術都要求有絕對嚴格的紀律，要求每個人萬分準確執行其所擔負的那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使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使機器損壞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

但是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式的國會。全部

關鍵就在於這個『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僅僅『規定規則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如像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範圍以外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東西』，當然會『規定規則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却不會是『官僚的』。工人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碎，把它根本毀壞，把它粉碎無餘，而代之以仍然是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的機關；爲了防範這些人變成官僚起見，將立即採取那些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的辦法：（一）不僅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水不得高於工人底工資；（三）立刻過渡到使一切都來執行監督和監視底職能，使一切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就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爲『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思索過馬克思底話：『公社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考茨基完全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的區別，資產階級國會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用的）與官僚制（反人民的）聯成一氣，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則會立即採取辦法來根本剷除官僚制，且能夠把這種辦法實行到底，一直到把官僚制完全消滅，把供人民享用的民主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崇拜』國家，『迷信』官僚主義的態度。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的和最好的一本反機會主義的著作，即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因為它是一九〇九年，在我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大進步，因為其中不是說到一般革命綱領，像在一八九九年爲反對伯恩施坦而作的小冊子那樣，不是不管社會革命到來時期如何而泛論社會革命底任務，像在一九〇二年著的社會革命小冊子那樣，而是講述那些使我們必得承認『革命時代』正在到來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指出一般階級矛盾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着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以後，在東方自一九〇五年起也開始着同樣的時期。世界戰爭以驚人的速度逼臨而來。『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的革命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的時期了』。『革命的時代正在開始』。

這些斷言是完全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爲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德國社會民主黨會答應要作什麼，而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它（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墮落到了怎樣下流地步了。『現在的形勢——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道——會引起一種危險，使人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視作比現在更溫和的人。』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原來比人們所感覺

到的還要更溫和得多，更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說過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爲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而所有這些迴避問題、甘守緘默、托辭推諉等行爲總結起來，就必然產生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事實，關於這個轉向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爲代表來聲明說：我保持着革命見解（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革命底新時代已經到來（一九〇九年）；但是，既然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我就畢竟要違背馬克思還在一八五二年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一九一二年）了。

在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裏，問題正是這樣直截提出的。

二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潘業枯克以『左翼急進』派代表之一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這個派別有盧森堡，拉狄克及其他等人參加在內，極力堅持革命策略，而一致確信考茨基已轉到毫無原則地動搖於馬克思主義

和機會主義之間的『中派』立場上。這一見解底正確性已爲戰爭所充分證明，此時，『中派』（有人稱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派』，已把它全部可憎的卑鄙醜態性完全表露出來了。

潘業枯克在他標題爲羣衆行動與革命，而論到了國家問題的一文（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三十卷，第二冊）裏，把考茨基底立場估計爲『消極的急進主義』立場，估計爲『毫無作爲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第六一六頁）。潘業枯克這樣提出問題後，就談到我們所注意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任務的題目。

『無產階級鬥爭——他寫道，——不簡單是爲爭奪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和消除（直譯爲消散，Anlöschung）這些武器……只有把國家組織完全破壞，即鬥爭底最後結果已經到來時，鬥爭才告終止。人民多數底組織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底組織，而以此證明自己的優越性。』（第五四八頁）

潘業枯克用以表示自己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他的意思畢竟是很明顯，且來看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這種意思，倒是很有趣味的。

『直到現在——考茨基寫道，——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要奪得國家

(11)

政權，而後者却想要破壞這個政權。潘業枯克則想要把兩者兼而有之。」（第七二四頁）

如果潘業枯克底議論犯有不明晰和不充分具體的毛病（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因與本題無關，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是把潘業枯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旨找到了，而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却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爲自己的目的，認爲這個目的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只有當使國家走到消亡的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可以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完全消滅國家，却不懂得實現這種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必須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完全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所構成的公社式的國家制度代替之；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應用什麼去代替它和無產階級將怎樣來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由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其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利用現代國家爲手段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反對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業枯克，因為馬克思正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就是說，不能簡單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到新人手中來運用，而應當打碎、毀壞這個機關，代之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到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為他恰恰完全抹煞了為機會主義者所絕不能接受的這個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把『奪取』解釋成爲簡單獲得多數，這就恰恰是替機會主義者留下一個穴洞。

考茨基爲掩飾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起見，就採用書獃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自己底話。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說必須使『強力斷然集中於國家政權之手』。而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問道：潘業枯克莫不是想破壞『集中制』麼？

這就不過是一套把戲了，正與伯恩施坦在以聯邦制代替集中制的見解上，把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混爲一談的把戲相像。

考茨基所『引證』的話，與本題格格不入。集中制是無論用新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可能實現的。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會是集中制，可是這將是以『完全破壞』國家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爲基礎。考茨基採用十足的騙子手段，把馬克思

〔II〕

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那些盡人皆知的議論迴避不說，却拖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句。

：「也許潘業枯想要消滅官吏底國家職能麼？」考茨基接着說道，——但是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更不待說在國家行政機關內了。我們的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國家官吏，而是要求官吏民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的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在我們尚未奪得國家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鬥爭是不是要消除（直譯爲消散 *eliminate*）國家政權。內閣中有哪一部及其官吏可以消除呢？」於是他就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所取消：爲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得到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將來的國家」以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我們這個反對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第七二五頁）

這顯然是欺假手段。潘業枯所提出的，恰恰是關於革命的問題。這是無論在他那篇論文底標題上或在上面摘引的那一段文字當中，都說得很明顯。考茨基既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就恰恰是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現在我們是反對黨，而在奪得政權以後，我們再來特別談論吧。革命就化爲烏有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求的。

這裏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

政機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而代之以由武裝工人構成的新機關。考茨基暴露出自己對於『閣部』的『崇拜』，但試問爲什麼不可以由擁有十足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所設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閣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將來會是『閣部』仍然存在，還是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關；這些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線的聯繫，並且是完全頑固守舊的），抑或要加以破壞而用新的去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由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由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用新的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基本思想，而考茨基却把他抹煞掉，或是完全沒有瞭解它。

他提出關於官吏的問題，顯然表明他沒有瞭解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底學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行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所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下，民主制是被僱傭奴隸制和羣衆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所縮小、壓抑和割削得殘缺不全。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職員就

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出變為官僚的趨勢，就是說變為脫離羣衆而駕於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主義底實質所在，而當資本家沒有被剝奪以前，當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公務人員都不免會相當『官僚化』的。

從考茨基的話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選舉的公務人員將仍然存在，那末在社會主義下，官吏也將仍然存在，官僚制也將仍然存在！這點恰恰不對。馬克思正是按公社底實例而指明在社會主義之下，公務人員將不復是『官僚』，將不復是『官吏』，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除實行選舉制以外，還實行隨時撤換制，而且還實行使薪俸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而且還以『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在實質上，考茨基用以反對潘業枯克的全部論據，尤其是考茨基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的那個妙極了的理由，就表明考茨基是重複着伯恩施坦一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伯恩施坦在他所著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這本叛徒作品中，激烈反對『原始的』民主制觀念，反對他所稱爲『教條式的民主制』的東西：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不領報酬的公務人員，軟弱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伯恩施

坦就援引維伯夫婦所解釋的英國工聯底經驗。據說，工聯似乎是『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一三七頁）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按其七十年來發展的情形，工聯確信原始的民主制真已毫不中用，乃代之以通常的民主制，即與官僚制結合的國會制。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條件下發展，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發展的，在這個制度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禍害、強力、不公平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等的現象，非有種種讓步，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下，『原始的』民主制底許多成分是必然要復活起來的，因為，人民大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第一次起來不僅實行獨立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一切人都將輪流來管理，於是就會很快地習慣於不要任何人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頭腦，在公社底實際辦法中所看到了的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畏怯成性，因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決然脫離關係而害怕它且不願意承認它，無政府主義者則或由於躁急，或由於一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底條件而不願意看見它。『連想也不要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閣部和官吏哪能行得通呵』——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推論的，因為機會主義者滿懷着庸人思想，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性，而且還怕革命怕得要死（如我國孟什維

(II)

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祇須去想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着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底具體教訓，用不着分析應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那被破壞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指無政府主義者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一流人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如此推論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得出的策略就是一種絕望底策略，而不是那種勇敢無情、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實際條件、用以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公社在數星期間就能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作出實行上述種種辦法來擴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義的榜樣。我們將效法公社社員底革命勇氣，我們將把他們的實際辦法當作是指示實際迫切且立刻可能實現的辦法，那時，我們既按這樣的道路前進，就能達到完全破壞官僚主義。

實現這種破壞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時間，將推動羣衆去過新生活，將使大多數居民一無例外地都可執行『國家職能』，而這也就會一般地使任何國家都完全消亡下去。

：「羣衆罷工底任務——考茨基繼續說道，——無論何時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某問題上採取讓步態度，或用一個選就(entsagenkommando)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對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於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造成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相當變動(Verschiebung)……於是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也如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國會中大多數爲手段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爲駕於政府之上的主人翁。」(第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這就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在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在行動上則背叛革命了。考茨基底思想僅限於要一個『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較之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這一原則，是倒退到庸人思想方面去。

考茨基祇須實現他所愛好的與謝德曼輩、普列漢諾夫輩以及王德威爾得輩的『統一』，因爲所有他們共同的鬥爭目標，也就是造成『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

我們則要實行和這些背叛社會主義的叛徒們分裂，而爲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務使武裝無產階級自己成爲政府。這真是『天大的區別』。

考茨基祇須同列金輩、達維德輩、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輩、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

(II)

這些親熱伙伴們同處，因為他們都完全贊成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變動』，爭取『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這是極高尚的目的，其中一切都是機會主義者所可接受的，其中一切都是始終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範圍以外的。

我們則要實行和機會主義者分裂；而整個覺悟無產階級就會跟隨我們鬥爭，不是為爭取『勢力對比底變動』，而是為推翻資產階級，為破壞資產階級國會制，為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為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而鬥爭。

*

*

*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有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如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達維德、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包括斯堪的那維亞人斯道寧格和布蘭亭在內），在法國和比利時有曉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屠拉梯、特列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其實是一個始終依賴自由派的），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國會黨團工作裏和在黨底政論方面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統治的作用，他們公認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毫無掩飾的機會主義。在這班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却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毫無重大的區別。

我們根據這一情況，可以作出結論說：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們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公社底經驗不僅被他們遺忘，而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教導工人羣衆說，快到工人們應當發動起來的時候，那時務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代替它，並這樣來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爲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社會的基礎；——他們不僅沒有這樣作，反而教導工人羣衆以相反的東西，且用他們的『奪取政權』的方法，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處逃身穴洞。

當國家連同其因帝國主義比賽而加强的軍事機關，已變成軍事怪物來屠殺千百萬人民生命，以解決這一爭執：究竟是由德國或英國，由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時候，把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曲解和隱諱起來，不能不起極大的作用。

● 在手稿內還有如下一段：

第七章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

本章所標明的題目，如此廣闊無垠，是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的。在這本小冊子中，當然只好限於說明那些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政權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在此截止。

——編者）。

〔二〕

初版書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寫的。我當時已擬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大綱。但是除題目以外，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成，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妨礙』了。這種『妨礙』只可引為慶幸。但是，本書第二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也許要延擱一個長的時期；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

作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彼得格勒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至一四〇頁

簡要社評

〔一〕費邊派是英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良主義組織『費邊社』社員，該社成立於一八八四年。其所以取名為『費邊社』，是要表示該社主張緩進，因為古羅馬統帥費邊是素以緩進戰略聞名的。——（見正文第一〇頁）

〔二〕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是英國社會學家。據他的學說，國家之產生，並不是由於階級出現和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是由於『社會機能複雜化』的結果。——（見正文第一八頁）

〔三〕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是俄國社會政治運動中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民粹主義思想家，即所謂『社會學主觀方法』底代表人物。——（見正文第一八頁）

〔四〕聯合政府是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兩月後，即同年五月五日成立的第一屆臨時政府而言。參加這個政府的，除資產階級總長們外，還有孟什維克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和克倫斯基等。——（見正文第二三頁）

〔五〕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是由德國封建諸侯反對帝王權力開始的，隨後因有歐洲多數國家

被牽入其中，就成了國際性的戰爭。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加強了封建諸侯的權力，使德國在政治上更加分崩離析，國內經濟陷於極端破壞與枯竭的狀態。——（見正文第三一頁）

〔六〕哥達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三二頁）

〔七〕新時代雜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出版於一八八三至一九二三年。——（見正文第四六頁）

〔八〕這裏是指一九〇八年二月葡萄牙的和一九〇八年八月土耳其的資產階級革命而言。——（見正文第五三頁）

〔九〕第二帝國，即拿破崙第三統治時期（一八五二——一八七〇）的帝國，以別於拿破崙第一統治時期（一八〇四——一八一四）的第一帝國而言。——（見正文第五六頁）

〔一〇〕基期特派，得名於「基期特」一字，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大工商業資產階級政黨底代表者。——（見正文第七一頁）

〔一一〕布朗基主義者，是法國著名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底信徒。列寧說，布朗基主義者妄想『不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手段，而用一小羣知識分子陰謀手段來使人類擺脫僱傭奴隸制度』。布朗基主義者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中起了顯著的作用。一九〇一年，他們加入黑得創立的法國社會黨。——（見正文第七六頁）

〔一二〕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八六頁）

〔一三〕反社會黨人法令是一八七八年由德國首相俾斯麥建議施行，目的是要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消滅下去。經過長期鬥爭後，一八九〇年該法令被廢除了。——（見正文第八八頁）

〔一四〕恩格斯是指普魯士常權派『自上』用武力把分裂的德意志各邦統一為一個國家而言。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結果，成立了北德意志聯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便成立了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帝國。

——（見正文第九一頁）

〔一五〕是以法國將軍卡芬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得名。他用殘酷萬分的手段鎮壓了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的起義。——（見正文第九五頁）

〔一六〕這是指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間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言。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開會，但因警察追緝不得不遷於倫敦。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是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的代表大會；在這裏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代表大會上展開了黨內兩派（列寧領導的革命派和馬爾托夫領導的機會主義派）間主要是關於組織問題的鬥爭，使黨分裂成了兩個集團：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意思就是多數派和少數派，因為在投票選舉黨中央機關時，列寧底擁護者獲得了多數，而他的敵人獲得了少數。——（見正文第一〇二頁）

〔一七〕這是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彼得格勒發生的事件而言。這時，工人和兵士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下，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不願這是和平示威，却派出軍隊去反對示威者。臨時政府把示威鎮壓下去以後，就來追緝布爾什維克黨，封閉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刊物真理報，通令逮捕列寧，他不得不隱藏起來，捕捉了許多極有名的布爾什維克黨底活動家。但是黨由

列寧和斯大林領導，能於在這樣最艱難的環境中，準備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

(見正文第一〇二頁)

〔一八〕是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干·巴爾諾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而言。——(見正文第一八頁)

〔一九〕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一類高利貸者。——(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二〇〕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十五至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氣。——(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二一〕斯大林同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進一步發揮馬克思與列寧的國家學說，他定出社會主義國家底理論，指明了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獲勝利並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和任務。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中說道：「一九一七年八月，即是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成立幾個月以前，列寧寫成了他那部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列寧認為他這部著作底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當時立意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裏，他打算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列寧在他這本書第二部分裏，是想依據我們國家裏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繼續闡明和發揮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沒有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但是列寧所沒完成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該去完成的。(學聲如雷)

國家是在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所以產生，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約束被剝

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和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約束被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是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保護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從前，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曾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了要推翻資本主義，不僅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必須剝奪資本家，而且必須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吏機關，打破它的警察，而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作了的。但是決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加以變更而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利原有職能在將來也應當完全保存。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境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的。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階級爲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

鎮壓被推翻了的那些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於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就實現了兩個基本的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被推翻了階級。這一點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底職能是要鎮壓那些不順從的人，可是在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為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為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這一點也使我們的國家在表面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也進行過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是為了保護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而從前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却是為了保護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新經濟底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分子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分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因此而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為捕捉和處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

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是有了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並且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停止在此地。我們是在繼續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的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的。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中譯本，第七八九至七九三頁）。——（見正文第一二八頁）

〔二二〕曙光雜誌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刊物，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等主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見正文第一三二頁）

〔二三〕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由考茨基提出而通過的決議容許（雖然是有條件的）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一三二頁）

著 寧 列

病稚幼「派左」的中動運義主產共

試嘗之述講俗通略策與培戰義主思克馮

出版者的話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依照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所出中文本列寧文選第二冊所載本書譯文翻印的。

爲了便利參考起見，我們特將中文版列寧選集第十八卷所載本書「註釋」轉載在這裏，這個註釋是從俄文版列寧全集譯來的。

解放社編輯部

目 錄

| | |
|---------------------------------------|----|
|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 七 |
|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 一〇 |
|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 一四 |
|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 二〇 |
|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 三〇 |
|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 三六 |
|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 三九 |
|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 四四 |
|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 五九 |

一〇 幾個結論..... 五

增 補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一四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一七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三〇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三三

簡要註釋..... 三九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講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它的廣義而言；若按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上具有國際意義，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字底極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

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客觀情形却正是如此：即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一〕，奧國的鮑威爾〔二〕和阿得列爾〔三〕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爲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al-

alistische Bisherer, Heft 11; Ignaz Brand) 的這本無名氏〔四〕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五〕做了一篇標題爲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爲，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漸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裏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俄國會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爲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

〔III〕

想的熾熱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够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聲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

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有堅定性，需要有紀律，需要有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辭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

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去·極·認·真·地·加·以·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够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

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系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專制壓迫之下，迫切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用了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為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内，

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聚積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迫切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來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刊物上看到它們的雛形。在這

三個主要派別之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中間的、過渡的、不澈底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已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經受着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法』發展時期底整整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

了。消沈、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祕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的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好，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它最能於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和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爲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他們不願瞭解，一定要學

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公開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連拿破案（拿破案）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布爾什維克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非法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法可能』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布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七）。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的國外僑民這裏的報紙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高傲態度，聳起鼻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

{III}

所辦到的自由（秘密）交換意見，自由（秘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因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惡劣的叛徒。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八〕，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九〕，意大利的屠拉梯〔一〇〕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齷齪，而羣衆後來本着自己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布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現象（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它的莫大的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自由一些的共和國。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閣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

〔二〕和諾斯克〔二〕，考茨基和希法亭〔三〕，倫勃爾〔二四〕和阿烏斯鐵爾里茨〔二五〕，與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事實上也是如此）都是枯燥無味地重彈那套陳腔舊調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什維克那裏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底故技，變本加厲地表演出來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手醜行爲與糊塗觀念，特別『燦爛地』表明出來了，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僞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以至於破了產；現在，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

〔III〕

某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會制（事實上的）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什維主義

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完全認定，並已為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所充分證實的是：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羣衆代表），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有組織、有紀律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及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以及迅速轉為馴服、消沈和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種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自己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即前此所未見過的外形，重新發作起來。

(III)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的一種處罰。這兩種畸形互相補充。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雖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影響上却比較微末，其原因，一部分毫無疑義是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之所以說『一部分』，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發展得異常繁盛，因而澈底暴露了它的不正確性，暴露了它不能成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還在一九〇三年產生時，便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來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而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自己基礎的時候，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在三個主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厲害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是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須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把個人恐怖和暗殺手段，看作是自己的特殊

『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表現，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至於有些人竟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行為，或一般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採取的恐怖手段，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被普列漢諾夫（二六）（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過和唾棄過（二七）。第三個主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自己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惡意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同時他們自己却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模倣該黨內極端的機會主義者。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的事實，現時已在全世界歷史巨大範圍內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就是說，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普列漢諾夫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要求開除伯恩施坦（二八）底黨籍（二九），而布爾什維克始終繼承着這種傳統，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列金（二〇）底全部卑鄙叛變行動）原是最近似於革命無產階級為取得勝利所必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它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國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克黨（三一）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

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考茨基、希法亭、萊得布爾〔二二〕、克里斯平〔二三〕之流底機會主義和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我們現在把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止這時期作一總的考查，便可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致伯伯爾〔二四〕的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了當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機會主義國家觀，可是這封信被伯伯爾由一八七五到一九一一隱藏了達三十六年之久）；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它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什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其範圍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組織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二五〕時）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於固執己見，不願瞭解必須參加反動『國會』而被

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很好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的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宣佈召集諮議性的『國會』時，布爾什維克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什維克相反，曾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就果然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估計了當時的客觀形勢，即使羣衆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再轉為革命罷工，再轉為武裝起義的這種形勢。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爲了這樣一個問題：讓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議機關，還是要設法把這召集權從舊政府手中奪取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斷定，是否會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以及這種形勢是否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所以，抵制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爲它表明了，在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但若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便是大錯特錯。一九〇六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個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

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能很快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整個歷史環境，使我們必須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互相配合起來。現在試一回顧已經完全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系，已完全表現出來了，——就特別顯著地表明，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鬥爭形式與秘密鬥爭形式配合起來，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的鬥爭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單獨團體或『小組織』，而且時間也不久。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二六）、布哈林（二七）等同志，都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並且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是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的有害行為。這的確是與帝國

● 凡評論個人的話，相當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糾正這種錯誤的人。

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種妥協正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的這個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二八）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聯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的時候，我總是首先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說：

假定你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自己的金錢、護照、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你因此才得幸免匪患。這當然是一種妥協。"Do not say"（『我給』你的金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安全脫身的機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合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與這樣的妥協相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與國的鮑威爾與阿得列爾（更不用說倫勒爾這批先生們），法國的倫諾德爾（二九）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分子』（三〇）』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以及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而且有時間『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真是同強盜合

夥哩。

結論是很顯然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地絕對地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幼稚氣，同這種幼稚氣甚至難於認真講話。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爲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應當善於根據具體情況去辨別那種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爲的，對這類具體的妥協便要用全力去批評，最無情地去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它宣戰，決不許那些老於世故『拘於細行』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狡猾之徒，藉『一般是否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工聯『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所作的叛賣行爲和已實行的這種確是最惡劣機會主義、叛賣、變節的妥協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與的禍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這班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這點在政治上決不是隨時都像在這個幼稚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辨。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想出一個包診百病的萬應藥方，或者約許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那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試來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這個政黨，從一九一四年末，就會規定出它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它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使沙皇帝制失敗的主張，它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議論。這個政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却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革命興起，推翻了沙皇制度，建設了民主共和國，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好了推倒他們，並且果然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澈底廢除了地主與資本家底私有制。這個政黨既公佈和廢棄了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密約，又向各國人民建議和平，直到英法帝國主義者拆垮了和議而布爾什維克已竭盡全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政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締結的這樣的妥協，其完全正確性，對於一切人都已是日益昭然若揭的了。

俄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上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或間接辯護『保護祖國』口號，即保護本國的強盜資產階級。他們所繼續的叛賣行動，就是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

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與克倫斯基（三二）和立憲民主黨聯合，後來又與高爾察克（三三）和鄧尼金（三四）聯合，正如他們在國外的同道者與各該國資產階級聯合一樣，都是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打劫。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我們所要說到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他們不稱自己爲「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中可以看出得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三四），是由「萊茵河岸法蘭克福城地方黨組」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該反對派意見底實質，敘述得最顯著、確切、簡明扼要。只須引證其中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底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該作者便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包括參加國會）的問題』，只是爲要掩飾它想與獨立黨人聯盟的真正主要圖謀。這本小冊子上接着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以爲共產黨統治與黨底專政的問題，只是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底統治乃是各種政黨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底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目的。因之，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妥協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

『應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爲要包括那些應在共產黨指導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及階層，就必須建立具有最廣闊基礎和最廣大範圍的新的組織形式。這種爲一切革命分子所匯集的地點，便是以工廠組織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聽從『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在這裏。正是在這裏，把從事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爲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至於此外對從事鬥爭的羣衆之政治教育以及鬥爭中的政治指導，

(III)

則是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可見，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着：

『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面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它不惜採取妥協政策，贊成國會制度，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可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羣衆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並採用一個明確趨向於目的的方法，就是排斥任何國會制度和機會主義手段；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條件的推翻資產階級，以便然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專政——這裏是羣衆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旨。

每個布爾什維克，凡是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什維主義底發展史，一讀到這番議論之後，便立刻會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慣了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幼稚氣！』

但是我們要把這種議論更切近地考察一下。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黨）？』

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枉費心機，異想天開，結果却弄巧反拙。誰也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只有把一般極大多數並不同區分其在生產中之社會地位的人民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對立時，才可以把羣衆和階級對立起來；誰也知道，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担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明的事實。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胡說八道？偏要這樣標新立異呢？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秘密狀況之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之間的普通、正常、簡單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地位而弄得糊塗莫解。在德國，也如在歐洲其他國家裏，人們太習慣於合法生活，習慣於由各政黨按期舉行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來自由選舉『領袖』，習慣於用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情緒等等的簡便辦法來檢閱各政黨底階級成份。但是當革命急劇進展，國內戰爭擴大，因此不得不拋棄這種種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轉到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其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來提出或推出或保留『一批領袖』——這個時候，人們便張皇失措，於是妄想出一種絕無僅有的謬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內某些黨員（三五），由於他們不幸

（三）

生在一個小國內，享有特別優越與特別穩固的公開狀況底傳統和條件，從來不曾見過公開狀況與秘密狀況之互相更替，於是陷入迷途，茫然無措，竟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撫拾一些所謂『羣衆』、『領袖』這類現代『時髦』字眼，而毫不加以思索，隨便濫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並且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善於想一想這彼此間的關係，不善於把問題闡明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以及戰後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羣衆』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表現得特別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再三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產生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底領袖，總是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受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豢養。馬克思之所以從這班混蛋那裏博得令人尊敬的仇恨，就是因為他公開指斥他們爲叛徒。最新（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替某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在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了變節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祇願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於是就造成機會主義政黨之脫離『羣衆』，即脫離最廣大勞動階層，脫離他們中間大多數，脫離工資最低工人的現象。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鬥爭，不把這些機會主義的變節領袖加以

揭破，加以恥辱和驅逐，則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便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所進行了的就是這樣的政策。

在此種情況下，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殊不知在『打倒領袖』這口號掩飾之下，實際上却把一些胡言爛語怪誕絕出的新領袖推舉出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持着一般人性見解的舊領袖，這就尤其可笑了。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三六〕、沃里夫赫木〔三七〕、霍爾聶爾〔三八〕、什列迭爾〔三九〕、文迭爾〔四〇〕、額列爾。額

● 共產主義工人報（四一）（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所載額列爾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若不先破壞政黨，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制。』

拉丁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昏亂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莊重的德國人（額列爾及霍爾聶爾在上述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倫的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原理）也發表這種完全不合適的議論。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

〔三〕

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的，宣佈政黨根本上就不需要，這真是絕頂的荒謬之談，我們只有對之搖頭棄絕。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深刻地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就常常可以弄成怪誕絕倫的大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會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就無異是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而不經過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正經歷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多年內，階級還是會存在的。只有在英國，這個時期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總還是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驅逐，

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狂熱轉為灰心等等舊病復發的現象。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制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劣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和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組織者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底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入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為本階級裏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以其日常、瑣碎、無影無形、不可摸捉的腐化作用所造成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誰祇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會的問題。但首

先讓我根據我黨經驗來講幾句結束前一問題的話。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一八九五年第一次有過這樣的攻擊，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城的中央團體〔四二〕已開始形成，它應當負起領導各區團體的責任。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曾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不經什麼危險就可以痊愈的，病後機體甚至還會強健一些。另一方面，因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之迅速更替，而必須把總指揮部，必須把領袖特別『隱藏起來』，特別秘密起來的這種情形，會常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就是一九一二年馬林諾夫斯基〔四三〕這個奸細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一事實。他使幾十幾百個極好極忠實的同志遭到破獲，弄得他們坐苦工牢獄，弄得其中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未能造成更大的禍害，只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得恰當。馬林諾夫斯基身任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為博得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幫助我們創辦公開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沙皇制度下面也能够進行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够採用適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幾百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幹部送進苦工獄，送去遭死，而另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刊物，訓練出成千成萬新的

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個事實，那些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美、法、意的同志們），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現時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派遣奸細，而且將來也還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的。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確配合起來〔四四〕。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已決然對這個問題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空洞言論和怒氣沖沖的

- 馬林諾夫斯基後來曾被德國俘虜。他在布爾什維克執政時回到俄國，立刻被捕，交法庭審判，並被我們的工人槍決了。孟什維克特別厲害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了黨中央委員會。但是在克倫斯基執政的時期，我們要求逮捕杜馬議長羅將科〔四五〕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細，却沒有把這事實通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羅將科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到那尼金那裏去了。

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和『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作得特別『有力』和特別魯莽的，要算是霍爾聶爾了），也就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堅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而其實，這種策略乃是根本錯誤，內中除了空話之外，別無絲毫內容。

爲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今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國家中去。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我國的具體情形，有如下述。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據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黨員共有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前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四六）；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我們擔心黨過於擴大，因爲一般趨炎附勢巧於鑽營的人，勢必乘機混進到執政黨內來，而這些人本來是只值得槍斃的。一九一九年冬，當尤金尼奇（四七）離彼得堡只有幾俄里

遠，鄧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二百五十俄里）的時候，即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之際，而野心家，無賴漢和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分子，決不能指望把加入共產黨作為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遭受絞死和拷打）的時候，——這時我們才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是對於工人和農民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來領導全黨；同時還有人數更少的機關駐莫斯科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均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五個中央委員組成之。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在我們的共和國內，不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一個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職工會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已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職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是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底一切指令。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闊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就是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職

工會底熱烈擁護，如果沒有職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奮不顧身的工作，那當然，我們不要說兩年，便是兩個月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踐上乃是很複雜而紛繁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在羣衆中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人員舉行會議，與孟什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很少），他們教唆這些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鼓吹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實行怠工等等爲止。

我們認爲經過職工會來與『羣衆』發生聯系，還是不夠的。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這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我們要用全力來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需要，從他們中間提拔出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國家職務等等。最近頒佈的將國家監督事宜人民委員部改組爲『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担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關，就在世界上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會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

(黨對於這種大會是極爲注意的)，並經過特別派往鄉村去担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來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對資產階級性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進行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踐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一般機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熟悉這種機構，又親眼看見這種機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那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什麼領袖專政或是羣衆專政等等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辯，如像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些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那種莊重的、非常淵博的、極端革命的論調，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內工作，什麼可以拒絕這種工作，什麼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種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樣的論調，我們也不能不覺得是同樣幼稚可笑的廢話。

資本主義所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歷來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它們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才可以而且定會發展成爲規模

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不僅包含同行、同業和同一職業，並包含整個生產部門），然後經過這種生產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以及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具有全面智識的、受有全面訓練的人，即能夠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去，它必須向這個方向走去，並且定能到達這個目的，不過須要經過許多年份。目前就企圖具體實現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所將造成的這種未來結果，就無異於教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夠（而且應當）不是用幻想的，不是用我們所特別造就出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簡直不值一提的輕舉妄動。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當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享有這種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不問政治的態度以及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

底互相聯系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底巨大進步，何況這時，黨必須不僅用舊的精神，而且更要用新的精神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黨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期間內還會是一種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自己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使全國經濟底管理職能首先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上所必需的工人團體。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底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色彩』，企圖避開它，跳過它，那便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就等於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所應起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那種作用。另一方面，倘若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推延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聯主義偏見的工人的那天，這更是大錯特錯。政治家底藝術（而且是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瞭解）也就在於正確地估計這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去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於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之

(III)

充分廣大階層底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以後能於教育、訓練和吸引日益增多的勞動羣衆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得而且應當表現得比俄國更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裏，孟什維克以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職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由於存在有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職工會內『盤據』得更加牢實，那裏所形成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只圖私利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趨向於帝國主義的、受帝國主義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要比俄國有過的強大得多。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在西歐，同葛培爾茲〔四八〕輩、如沃〔四九〕輩、亨德孫〔五〇〕輩、麥爾黑姆〔五一〕輩以及列金之徒作鬥爭，要比在我國同孟什維克作鬥爭困難得多，我們這裏的孟什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上與這些人完全是一丘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人物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之外爲止。如果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夠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何況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裏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估計這種程度，只有各國那些

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我國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幾天，即十一月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也就可以作為測量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尺度。在這次選舉中，孟什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只有二百四十萬票；而布爾什維克却獲得了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登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合刊上。）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來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們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上層分子反動和反革命爲理由，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蠢舉，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須知我們的孟什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無非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稱呼孟什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Representants of the capitalist-class）這是美國的丹尼耳·德立昂（五二）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通的或落後

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底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於一八五二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五三〕）底影響之下。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羣衆』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高喊『羣衆』是怎樣濫用這個名詞。要想能夠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愛戴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他們由於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搗亂、陷害、侮辱和攻擊，凡是有羣衆的地方，就一定要到那裏去工作。應當善於承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忍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是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的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那怕這些組織是極端反動的。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恰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羣衆薈萃的這種組織。據瑞士人民政治日刊〔五四〕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的統計，英國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到一九一九年末，其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邊沒有關於德法兩國這同類的材料，但人所共知的確鑿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也大量增加了。

這些事實最顯著不過地說明了一件也爲其他千百個例子所證實了的事情，即正是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組織渴望，日益增長着。在英法德各國，有好幾百萬工人初次從一盤散沙現象，進到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接近的（對於那些還受着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所薰染的人們說來）組織形式，即職工會，而那班雖則革命，但是不高明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羣衆』『羣衆』！竟拒絕在職工會內進行工作！！藉口這些職工會『反動』而拒絕工作！！應想一種嶄新的、純潔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具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所作的這種更沒有理智，更危害革命的事情，是再也想像不出來的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空前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應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絕。

無疑的，葛培爾茲輩、亨德孫輩、如沃輩、列金輩那班先生們一定很感謝這類『左的』革命

家，因為他們正像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五五）裏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並拒絕在工會中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排出工會，使他們極不便於在工會中工作，並對他們施以侮辱、攻擊和追究。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動，巧智，非法手段，緘默態度，隱瞞真情，祇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內面，無論如何都要在那裏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沙皇時代，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公開的機會』，但當暗探局長蘇巴托夫（五六）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來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石金同志，他是彼得城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沙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和羣衆取得聯絡，想方設法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蘇巴托夫派底影響。在西歐，因為趨向於合法的、憲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偏見，特別根深蒂固，所以

● 葛培爾茲輩、亨德孫輩、如沃輩、列金之徒與蘇巴托夫派毫無二致，所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眼

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而且必須有系統地去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那種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極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直接地或間接地，公開地或暗藏地，整個地或局部地——都贊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和第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應該迴避，不應該抹煞，而要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已經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用極鄙視而且極輕浮的態度，否定地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有什麼論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那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

這樣張大其辭真是到了可笑的地步，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制度！莫非德國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那麼又怎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空談麼？

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在宣傳上講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廢除國會制度，還相隔得很遠。幾十年前，本有全部理由來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很長期和很頑強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講來，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但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這在全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看來，並無足輕重，從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是渺不足道，甚至無法加以大略的估計。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便是理論上莫大的謬誤。

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麼？這却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左派』底立場就很穩固了。不過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加以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這種分析

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20）上，載有關於國會制度的提綱〔五七〕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的左派或左傾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析，在下面我們就可以看見，也是十分糟糕的。

第一，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為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五八〕和李卜克內西〔五九〕這些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知道，『左派』是錯誤了的。單是這一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那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據。『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顯然錯誤，現在已不復成為錯誤了。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執行自己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仔細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樣也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不是羣衆底政黨，而只是知識分子和少數沾染

(III)

知識分子惡習的工人底小組和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法蘭克福地方小組所出版的該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無數萬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輕浮，太誇張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乃是確鑿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實自己的錯誤。既然『數百萬』和『無數萬』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制度，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末又怎能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是把自己的主觀願望以及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作爲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因爲沙皇制度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暴，而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時日，並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中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和意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所犯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地觀察過，特別注意地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當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時，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制度，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在政治上

已經過時了』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所認為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為過時了，羣衆也認為過時了的東西。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準上去，不應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準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制度的成見，叫做一種偏見。但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正是全體勞動羣衆（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之覺悟程度與準備程度底實在情形。

就即令不是『數百萬』和『無數萬』，而只有人數尚多的少數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父走，只有少數農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和富農（Grosbauern）走，那末，根據這一點，也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選舉，參加國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不開通的、被抑壓的和愚昧無知的羣衆。在你們還無法解散資產階級國會和其他任何反動機關的時候，你們便必須在這些機關內部工作，正是因爲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關於我們布爾什維克，說了很多稱讚的話。有時我禁不住要說：你們最好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布爾什維克底策略，多認識認識這些策略吧！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不正確，那就應該明白指點出來，並加以證明，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須的。如果是正確，那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當然，決不能把俄國條件與西歐條件等量齊觀。但當專門談到這樣一個問題：『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絕對必須切實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為如果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那麼這一概念就很容易變成空話。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別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

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至於這幾次選舉會經得到非常寶貴的（而對於無產階級也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這點，我敢說，我在上述那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的論文中，已經證明出來了。

由此得出不容爭辯的結論，證明了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了』的東西。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同時却希冀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眼光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便犯了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在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在事實上背棄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看『荷蘭左派』主張不參加國會的論據。上面所說到的『荷蘭派的』提綱，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即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處在革命狀態之中，此時參加國會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直接行動比較起來，已逐漸失去意義了。在這種條件下，國會將成爲反革命底中心，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自己政權底工具，這時，拒絕參加任何一種國會活動，甚至是必要的。』

(III)

第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為羣衆直接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爲重要，而不僅在革命時候或有革命形勢的時候才是如此。這種顯然毫無根據，從歷史和政治觀點看來都是錯誤的論證，祇是特別明顯地說明，作者絕對沒有估計到一般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革命前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沒有估計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關於配合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這一意義重大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因爲在一切先進的文明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內戰日益成熟與逼近，由於盡情破壞合法權利的共和國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够了）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對共產黨人所施行的瘋狂追究等等，以致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的配合，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很快就會一天比一天成爲必要（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成爲必要了）。這一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一般左派分子却絲毫沒有瞭解。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觀點上看來，是錯誤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這種參加，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不但有益，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所謂國會日益成爲反革命底機關和中心

(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過去任何時候，國會都沒有成爲反革命底中心，且也不能爲反革命底中心)，而工人正在建設作爲自己政權工具的蘇維埃，由這兩句話中就可得出結論說，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起來，以便進行蘇維埃反對國會的鬥爭，由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政府的蘇維埃派存在，不但不會促進解散國會，反而會使這件事情困難起來。當我們進行勝利鬥爭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在他們那裏有站在蘇維埃方面的、無產階級的反對派這一事實，而對我們的勝利毫無關係。我們明白知道，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在將被解散的反革命立憲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反對派，有澈底的布爾什維克派和不澈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這個提綱的作者們，完全弄糊塗了，他們縱然不是忘記了一切革命的經驗，至少是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的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反動國會以外的羣衆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如果是直接贊助革命的，那就更好）反政府派聯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一般『左派』在這方面的議論看來，他們不過是這類的革命教條主義者，從來未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也未曾深刻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只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爲主觀上『否認』某種反動機關，便算是實際上用許

(III)

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這機關破壞了一樣。

破壞對新政治（不僅是政治）思想的信任並加以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藉擁護這種思想爲名而把這種思想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因爲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六〇〕所說的一樣），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上所能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可以弄成荒談謬論，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它甚至會必然被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六一〕。荷蘭的和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此種欲益反損的蠢笨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這裏我不來試圖說明在那些條件下抵制國會才是有益的，因爲本文底任務，祇是關係於討論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幾個迫切問題，而來估計到俄國的經驗。俄國經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而正確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誤的（一九〇六年）。當我們分析第一次情形時，便可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沒有召集成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羣衆革命行動（尤其是罷工運動）發展得異常迅速，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給反動政府以任何的贊助，革命無產階級由於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而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羣衆的影響。十分顯然，這個經驗對目前歐洲的情形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的理由，

也同樣十分顯然，荷蘭人及『左派』擁護（那怕是有條件的）不參加國會的主張，根本上是不正確，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祇有害處。

在西歐與美國，國會已成了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分子所特別仇恨的東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也是完全自然的，因為在戰時和戰後，國會中絕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底行為實在是最卑污、最無恥、最變節的了。但在解決怎樣去與公認的毒禍作鬥爭的問題時，若為仇恨國會的情緒所迷惑，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罕有的東西』，因為人們期待這種情緒，實在是太長久，太枉然，太迫切了，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就使他們這樣易於為情緒所屈。自然，沒有羣衆中的革命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使革命的策略變為行動，但我們在俄國，由於有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经验，確信到這樣一個真理，就是說，革命策略決不能祇根據革命情緒來規定。規定策略，就必須把本國（及鄰國和世界上其他各國）一切階級力量加以清醒而極客觀的估計，並且估計到革命運動底經驗。僅僅咒罵國會機會主義，僅僅否認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正因爲太容易，所以這不是解決困難任務，更不是解決最困難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國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國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祇是

〔II〕

下列全部真理底局部表現，而全部真理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而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却就比西歐各國難些了。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結束工農深受其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爲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爲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的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要想『繞過』這種難局，『跳過』爲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國會的難關，那真是十足的孩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同時却害怕在反動國會內建立由堅決忠實英勇共產黨人所組成的卓越國會黨團時所遇到的困難！難道這不是孩稚氣麼？

德國的李卜克內西、瑞典的赫龍特（二），甚至沒有羣衆自下的贊助，尙且能作出真正革命精

神去利用反動國會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懷有失望與憤激情緒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惡劣的國會內鑄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羣衆，尤其是西歐小農中的落後羣衆所浸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制度偏見，比俄國的更厲害得多，所以共產黨人祇有在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堅強的、百折不回的鬥爭，以便去揭發、消除和克服這種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領袖」壞，因此悲觀失望，以至走到「否認」「領袖」的可笑地步。在「領袖」們常須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受到考驗和有威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而且若不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配合起來，若不使「領袖」受到考驗（就中也要在國會鬥爭舞台上考驗「領袖」），是無法克服這種困難的。我們的批評，並且是最嚴厲、最無情和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拿來反對國會制度或國會活動，而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善於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壇的領袖，特別是反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領袖。只有這樣的批評——當然同時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代之以適當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領袖，同時又教育羣衆，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情況，並學會瞭解從這種情況中產生出來往往是非常

(III)

複雜錯綜的任務。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我們從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中引來的那段話裏，看見過『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惜，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反對那三十三個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所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也是屬於那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之列的，他們每部大作中的每一句話，都含有極深遠的意思。

● 我很少有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波爾迪加〔六三〕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袒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無疑義是不對的。可是據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六四〕（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和山塞拉底〔六五〕同志主編的四本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這期間內出版）〔六六〕，以及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織之攻擊屠拉梯及其同道者，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人

恩格斯說：

「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我們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是由於我們在達到我們目的的道路上，不停頓於什麼過渡階段，不去妥協，因為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底壽命……。」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是經過一切非由他們而由歷史進程所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清楚楚看見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和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以爲自己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

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依然當國會議員，並繼續他們最有名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塞拉底同志及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種現象，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屠拉梯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議員們採取這樣錯誤的，不徹底或無氣節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辯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塞拉底同志顯然不對，他指斥議員屠拉梯「不徹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徹底」的，却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屠拉梯等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III)

階段和妥協，便是萬事安貼了，如果日內「動起手來」（這是他們確信的），而致權落到了他們手中，那末，後天「就會施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辦到的話，那他們也就不做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燥性，當作理論根據，這是何等幼稚氣啊！』（見恩格斯著：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底綱領，

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民國報（Volksstaat）〔六七〕上，一八七四年，第七十二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城出版，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對於瓦爾揚〔六八〕深致敬意，說瓦爾揚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瓦爾揚和黑得〔六九〕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大的領袖）。但對於他的明顯的錯誤，恩格斯却詳盡地加以分析過。自然，在年齡很輕毫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也如歲數頗大很有經驗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不可瞭解和不正確的勾當。並且許多詭辯家（這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蘭斯白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機會主義領袖底議論一樣：『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經過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者，通常都能很好領會恩格斯所敘述的這一深邃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忍受過『妥協』，即當工人要求條件全未達到，或僅僅達到一部分，也不得

不去上工，這時他們只好同被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妥協』。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矛盾加劇的環境之下，常常看見兩種妥協間的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窮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忠於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他們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効勞，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屈服於勸說，或爲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工聯會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國工人，也在各種不同的形式內，看見了類似這樣的現象。）

當然，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某種『妥協』底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之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罷工時是合理的『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出賣階級的領袖等等所進行的背叛階級的『妥協』，要困難得多。若是想擬定一種包治百病的藥方，或製定一種能適用

(III)

於一切情形的總規則（『不作任何妥協』！），那就是荒謬的想法。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善於來分別考察各個事實。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內領袖底作用，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有思考力的代表，在長期的、艱苦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警覺性，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祇要一般地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任何界限，對機會主義，我們正在進行而且必須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至於這些人們，假使他們還不懂得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就只有給他們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及增加其政治閱歷和生活經驗才能加以糾

● 每個階級，即令在最開明國家底環境下，即令是最先進的階級而且因目前形勢使它的一切智慧力發揚到最高度的時候，其中總還有——而且當階級尚屬存在，當無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基礎上完全鞏固和充分發展起來時，必然會有本階級的不去思想和不會思想的代表。否則，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正。在每一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底實際政治問題上，重要的事情，是善於辨別出其中表現最主要形式的不可容許的、叛賣的、體現着危害革命階級之機會主義的妥協，說明這種妥協的害處，並用全力去與這種妥協作鬥爭。當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兩夥同樣掠奪和同樣殘暴的國家中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最主要的、最基本形式的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掠奪利益。在戰爭以後，保護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訂立的聯盟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容許的叛逆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為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那小冊子上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一切機動和妥協的政策。』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此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責斥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它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而那些沒有經驗和缺少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爲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說這類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裏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哩！！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要薄弱些，首先簡單是因爲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其次就因爲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個國家內各種或各派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

利用各種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是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地應用這個真理，那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七〇〕；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社會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七一〕就已說過：『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這是彼得堡一條寬廣、清潔、平坦、筆直的大街）上的康莊大道』〔七二〕。自契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達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於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會費了如此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沙皇制度崩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就是說同他

們締結過多次實際的妥協；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當布爾什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七三〕、查蘇里奇〔七四〕、馬爾托夫〔七五〕、波特列索夫〔七六〕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盧威〔七七〕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雖則為時並不長）〔七八〕，同時我們却善於不斷地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去防止工人運動內部有絲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表現。布爾什維克總是繼續採用同樣的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同時向來都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第二級選舉或複選時），並且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揭發他們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在選舉杜馬時，布爾什維克曾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過短期的正式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時，我們會幾次多年地在形式上與孟什維克共處於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看作是在無產階級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切爾諾夫〔七九〕、那唐松〔八〇〕），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美瓦爾得和昆塔爾一齊開會，發表過共同

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來反對『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完全接近我們，幾乎是與我們心意合的一個『革命的共產主義』（八二）民粹派者）。正當十月革命之際，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非正式，但極為重要（而且是很有成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而未加以絲毫修改，這也就是我們無疑地締結了妥協，以便向農民證明，我們並不想以多數壓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妥協。同時我們會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至布列斯特和約成立後，他們破裂了這個同盟，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時，甚至舉行武裝暴動，後來竟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所以，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便攻擊中央，我們自然認為這是『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表現『左派』錯誤的明證。我們俄國也有過與德國謝德曼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也有過會反對孟什維克右派而與德國考茨基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什維克而轉向布爾什維克，這種情形，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顯然可以看到：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祇佔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佔有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佔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工人這種與俄國全係同一性質的由右向左的轉變趨勢，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却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從來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祇是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底勢力呢？

很明顯的，這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德國共產黨人執行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胆地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左傾』幼稚病底無數表現，這種病症現在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此也就可以更好更快地，對於身體更有益處地把這病症療治好。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證明自己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考茨基、希法亭，而克里斯平、萊得布爾之流，看來，大半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即無產階級派，這個派別發展得非常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大概共有七十五萬），是離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

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比錫城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提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獨立社會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了。反之，共產黨人定要去尋找而且要找到他們作這樣一種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並加速與此派作必要的完全溶合，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祇有騙子才會約許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有『容易』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沒有爲那些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這形形色色的無數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開通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幫、職業、有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即共產黨方面，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的及小學主的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問題是在於我們應當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我們應當順便指出一下：布爾什維克戰勝了孟什維克。這不僅會要求我們在

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即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策略，都是足以促進、增進、鞏固和增強布爾什維克而削弱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也在內）必然要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搖擺於愛護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應忽視這種動搖；既是利用這種動搖，那便要對某些傾向於無產階級分子讓步，當其傾向的時候予以讓步，視其傾向的程度來決定我們讓步的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什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頑強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優秀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優秀分子，都轉入到我們營壘裏來。這乃是長期的過程，那種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機動』的十萬火急的『決議』，只能去妨害那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己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誤之一。像霍爾的這種見解，表現得愈加『莊嚴』和『鄭重』，愈加『堅決』和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現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僅僅唾棄那種荒謬絕倫得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

以便對協約國作戰的『民族布爾什維主義』（勞芬別爾格等），是不夠的。應當瞭解，不允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的這種策略，根本錯誤。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謝德曼輩高踞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要求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所作的機動迂迴辦法，實在不好得很，因為他們多少替出賣階級的謝德曼派分担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而且是極冷靜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了『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去。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應當肯定聲言，說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認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屢次叛賣了階級，結果障礙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危害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要加以否認。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障礙着這種運

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此，根本的差別也就在此。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把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都空空放過了，那末，這罪過就應由他們去擔負。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具有全世界威力的堡壘）。把解除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定要必須立刻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就是市儈國家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奧托·鮑威爾這一流人去提倡的），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國家裏——德國也在內——實現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革命是一個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話，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而且應當的。既然俄羅斯一個國家爲了革命利益能够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那末，蘇維埃德意志，在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盟之下，爲了革命利益而忍受爲時更久的凡爾賽和約，也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做好圈套來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挑撥他們說：『請你們講講，你們不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不去巧妙地運用機動以反對好狡百出的而且

此刻還是強於他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却像三歲孩子一樣，果然走上這個圈套。事先束縛自己的手足，公開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且何時要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我們明知這場戰鬥對敵人有利，對自己不利，却居然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自己的戰鬥，那末，這種政治家，是絲毫也沒有用處的。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八二]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闊的、強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極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它們想建立共產黨，彼此間正在進行這一談判。『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的工人無畏艦週刊（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八三〕，由西爾維姬·潘克赫爾斯特〔八四〕同志主編，其中載有她寫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敘述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根據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來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等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那知對於立刻成立

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的共產黨加入舊的『工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這個『工黨』係大半由工聯組成之工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也同『社會主義工黨』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加入『工黨』，因此就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黨員，或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前者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共產主義政黨中的右派』（見潘克赫爾斯特底論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分歧正和德國的相同，雖然分歧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的，比在英國的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來把『左派』的論據考查一下吧。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了登載於該期週刊上加拉克爾（W. Gallacher）同志〔八五〕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八六〕，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國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底左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底代表，這個革命運動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以社會委員

● 似乎社會主義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反對參加國會。

會爲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國會議員們吵鬧得够久了。我們認爲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大批黨員羣衆，一想起國會制度，就愈益覺得討厭；一切地方團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蘇維埃。當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爲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說服他們的黨員回到國會議員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所有着重點都是作者加上的）擁護這夥匪徒。我們在這一方面的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底叛變。對於國會議員主義之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德孫，克略英斯（八七）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八八）、斯腦頓（八九）這夥人底營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羣衆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們，都不過是幫助麥克唐納、斯腦頓這班先生們。不列顛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這裏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

(III)

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分子來販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

這種反動分子非常貪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問號是作者加上的，如火如荼地想證明他們也和「主人們」一樣，即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異常透澈。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善於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會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羣衆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往往是矇矓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關心地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衆，單靠情緒是不够的；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底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百姓』都瞭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

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底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治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樣的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瞭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國會，凡是至今尚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是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誠實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總是一個最兇惡的反動者。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不從國會內部來瓦解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將來解散國會這一任務上的勝利，這樣是否能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曾想到有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同時該作者却說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见，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科學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底經驗，尤其是這些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業已經歷過的十分類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動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羣衆，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

{III}

團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亨德孫、克略英斯、麥克唐納、斯腦頓之流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很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並且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共同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式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攫得政權，定會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正確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贊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們以相當的幫助。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且來引用英國現時兩種政治文件：（一）內閣總理路易·喬治（1907-1920）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1920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1917）上面的記載）；（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在上述的她那篇論文內所發表的議論。

路易·喬治在他的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1912）（當時特請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那些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有些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密切聯合，否則，那圖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即路易·喬治所寧願稱爲『社

會主義』黨的工黨，就會獲得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的聽衆，向着那以前大概還不瞭解這點的國會議員的自由黨黨員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布爾什維主義。』路易·喬治又說明，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人是根本贊成私有制的。他說：『文明到了危險境界了，』因此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必須聯合起來……路易·喬治接着說：

『……如果你們走到農業區域去，那末，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自然依舊是那些沒有什麼變動的老黨派。

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就會和現在某些工業區域一樣的巨大。我國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注意到的一種情形。法國居民大都從事農業，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國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開始動搖起來，那末，由於上述原因，它就會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加厲害。』

讀者從這裏可以看出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他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路易·喬治那裏來學些東西吧。

我們再從路易·喬治演講以後所進行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有趣的問答：

『高雷斯 (Wallace) (九三)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許多援助，請問內閣總理認爲自己在工業區域裏對於產業工人採取的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該不會因此使目前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所抱定的完全是另一種見解。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件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很能幹，現在他們都從事於破壞政府底威信。結果無疑是大大加強同情工黨的輿論。一般輿論，並不趨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趨向於工黨，這是最近補選運動所證明了的事實。』

附帶說說，這一段話特別表明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弄得怎樣糊塗而不能不幹些無可救藥的蠢事。就在這點上資產階級也會滅亡的。我們的人，或許也做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改正），但我們的人終歸會成爲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的以下一番言論：

『：應克平同志（九四）（不列顛社會黨總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

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於工黨的意見。工黨黨員雖多，但裏面有很大一部分黨員是消極的和萎靡不振的。這些男女工人之所以加入工聯，因為他們廠內工友是工聯底會員，又因為他們都想領取補助金。」

「但是我們認為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為工黨是一派思想底產物，而英國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現時還沒有走出這派思想圈子，雖然民衆底腦筋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而快要改變這種情形……」

「……不列顛工黨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團體一樣，在社會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會上台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就是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也就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或遊移不定。」

「我們不應當因增加工黨底力量，而來分散自己的力量；工黨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必須準備着向工黨政府進攻……」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他們歷史上已為百年來經驗所體證，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底兩黨）制，認為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鬥爭。一部分自由派，好像覆舟時的老鼠一樣，紛紛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工黨必然會上台執政，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他們根據這種情形，竟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婭·潘克赫爾

斯特同志用以下的話把這個結論說出來了：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任何妥協：它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爲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爲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輩或謝德曼輩這批人走，因爲他們還沒有嘗過由這批人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國和德國，正因爲嘗過這種滋味，工人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由此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事實上去認識亨德孫和斯腦頓政府成立後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去戰勝聯合起來的路易·喬治和邱吉爾（九五）。若是不這樣做，便會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爲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只靠宣傳是決不行的。如果工人中現在顯然無力的少數，知道（或至少必應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時期以後，在亨德孫和斯腦頓戰勝路易·喬治和邱吉爾的條件之下，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表示失望，轉而擁護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會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大半是守善意的中立），而此時，這無力的少數人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要勇往前進』，這種口號，顯然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交戰一樣，前者本來應當『停住』，『轉折』，甚至締結『妥

協』，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做，却前去與敵人硬拼。這只是知識分子的孩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被壓迫勞動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能作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十倍或甚至百倍地驟增起來），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

在英國，這兩個使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得到勝利的條件，很明顯地正在日益發展着，這是從路易·喬治底演說中也看得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爲我們

看到有些革命者對於這兩種條件，都抱着不充分思索、不充分注意、不充分自覺、不充分估量的態度。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爭取羣衆（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簡單的空談家），那末，第一，就必須幫助亨德孫或斯腦頓去打倒路易·喬治和邱吉爾（更確切點說：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從自己的經驗上看出我們主張底正確，即是說，使他們確認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物完全無用，確認這批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階級的天性，確認這些人物之必然破產；第三，就必須促進下面這種時機的到來，那時多數工人由於對亨德孫輩失望，便可以一舉推翻亨德孫之流的政府，且有獲得勝利的極大可能；因爲既然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路易·喬治，尙且表現張惶失措，並由於他昨天和邱吉爾『磨擦』，今天又和阿斯克維特『磨擦』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削弱（並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末，將來亨德孫這批人底政府就定會更加張惶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具體地來說一說。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是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可以向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提議『妥協』，提議訂立選舉協定，

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前去反對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辦法）來分配國會中的議席，同時我們要保持着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的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去和他們聯盟，因為否則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的完全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總共十五年內）對於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即對於孟什維克所堅持過並爭得了的一樣。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並不去追逐議席，在這件事情上儘可讓步（但亨德孫之流，尤其是他們的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目的是爲了獵取議席）。我們贏了，因爲正當路易·喬治自己『激動』羣衆之際，我們能在羣衆中來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因而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自己的政府，而且幫助羣衆加速瞭解我們共產主義者反亨德孫輩的全部宣傳，我們應該毫無避諱，毫不減默地去進行這種宣傳。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同我們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爲我們立刻便指明給羣衆看（要注意，甚至在純粹是孟什維主義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

也贊成蘇維埃)；亨德孫這批人寧願接近資本家，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在羣衆面前佔了上風，這些羣衆聽了路易·喬治那段很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的)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便贏了，因為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了亨德孫和斯腦頓這班人害怕戰勝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路易·喬治底幫助，而路易·喬治却公然想去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舊曆)革命之後，我們布爾什維克反孟什維克和反社會革命黨人(即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所進行的宣傳，也正是在上述情況內，獲得了勝利的。我們那時告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着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只佔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俄國的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害怕拋開資產階級而取得政權，資產階級却明知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將一定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拖延下去，而社會革

●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根據當時消息，其結果如下：參加選舉者有三千六百萬人以上，布爾

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却没有能力來毅然決然地澈底反對這種拖延現象。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則共產主義者立刻就可在奪取羣衆同情心並使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喪失信用這方面，獲得贏局，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是毫不重要的。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絕對可靠的區域內，即是說，只在我們候選人之提出不致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那時我們在選舉鼓動中，要散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並在沒有我們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候選人而反對資產者。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同志，如果認爲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是放棄反對社會主義叛徒的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會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去接近羣衆，甚至於要使羣衆聽完他們的話，都時常感覺棘手。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講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德孫而反對路易·喬治，那末羣衆

什維克獲得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底各政黨共獲得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民主

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以及同類的各小團體共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定會聽我講話的。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制』招牌作掩飾的）邱吉爾專政好，而且也可以說明我之所以要投票贊成亨德孫，支持亨德孫，正好像絞索支持着絞犯一樣，使亨德孫這批人能更快地組織他們的政府，這也會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會使羣衆轉到我這方面來，也會促進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正如他們在俄德兩國裏的同道者所遭遇過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羣衆不會了解，說這種策略會分散和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對這些『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教條主義的論調，加到羣衆身上去吧！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大概不會比英國的高，而要比英國的低些。但羣衆瞭解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即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了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又舉行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布爾什維克就把這個立憲會議解散了，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礙布爾什維克，反而幫助了布爾什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意見分歧，亦即是否要加入工黨這個問題，我在這裏不能多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所知道的材料太少，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爲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

本身結構上，與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大不相同。不過毫無疑義的是，第一，要是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他不致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就想根據這一類原則得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末，他在這個應否加入『工黨』的問題上也必然要犯錯誤的。因為這一類原則，只不過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公社員們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任何妥協和任何過渡階段的錯誤。第二，毫無疑義，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和任何時候一樣，也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原則，應用到本國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特殊情形上去，應用到本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這種特殊情形乃是各國互異的，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猜度這種特殊情形。

然而這不僅有關英國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有關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總結。現在我們就來講述這個問題。

一〇 幾個結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現出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世界上第一次在一

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的範圍和力量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單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內，罷工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每年罷工人數，超過了十倍，而自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罷工不斷增多，且規模宏大。落後的俄國在許多異常特殊的歷史條件影響之下，第一次向全世界不僅昭示了被壓迫羣衆在革命時的自動精神之躍進式的增長（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了無產階級底作用比它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若干倍，昭示了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接着由政治罷工轉爲武裝起義，以及產生了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各階級之羣衆鬥爭及羣衆組織底新形式——蘇維埃。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首先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全面的發展，隨後就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成爲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現時證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歷着這種鬥爭，即日益生長、日益強健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之首先而且主要與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什維主義』，就是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第二，也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

(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開展起來，這種鬥爭乃是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已被打死了)和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過去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制度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同時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也就是說，非但在國際性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之內，無疑義地，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經過實質上乃是同類的預備學校以達到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經歷這一發展過程時，都是各自不同的。並且巨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走着這條道路，比布爾什維主義快得多，布爾什維主義成爲有組織的政派以後，歷史給了它十五年的準備期間，它才獲得了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的極短期間內，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把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擊潰了，而第二國際僅在幾個月前，還是比第三國際強大得無可比擬，儼如牢不破的龐然巨物，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刊物)和思想的贊助。

現在的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國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鬥

爭之原則上的基本任務，同時又顧計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種種特徵，以致這種鬥爭所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正在繼續擴大和增加，這種不滿是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一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定、彼此雷同的基礎上。當各民族間的民族差別和各國家間的國家差別尙屬存在時（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在很長時期內存在着），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多樣性，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確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底細節方面能有正確的形式上的變動，使這些原則能正確適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在每個國家中爲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爲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爲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而採取具體辦法的時候，應當善於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個民族的特點，這便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贊助蘇

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制度，贊助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事情（自然遠不是所有一切事情，然而主要的）已經是做到了的。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往下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是比較次要，——但在實踐上，却更切近於實際解決任務：這就是要找得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孤立無援，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

(III)

全卑鄙醜惡，感覺到若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端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九六〕，德國的卡普〔九七〕及其同類）底專政。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集團和派別，其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把廣大羣衆（而現在廣大羣衆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守舊、因循，而沒有醒悟的）引導到這種新立場上，確切一點說，就是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領導這些羣衆，以便使他們接近和轉到新的立場上來。從前若沒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當時那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的任務），就不能解決；現在若不消滅左傾教條主義，不完全克服和擺脫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這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羣衆走上能够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新立場這任務，同樣也就不能完成。

當以前我們的任務是在於吸引無產階級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時候（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還是這樣），宣傳便佔了第一位；在這方面講來，甚至那些小組雖帶着小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能作出成效來。但是現在到了羣衆實際行動的時候，要佈置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述語的話），要配備現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單靠宣

傳的老技巧，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時，不能像未曾領導過羣衆小組宣傳員所本來計算的那樣，只計算到幾千人；這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和幾千萬人。這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定要是毫無例外的一切階級之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佈置就緒，以致決戰時機已經因下列條件而完全成熟，也就是說：第一，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第二，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第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一方面在邱吉爾派和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微少的民族差異）中間的分歧，他方面在亨德孫派和路易·喬治派中間的分歧，從純粹共產主義，即抽象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作實際行動、作羣衆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看來，是渺小而毫不重要的。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看來，這種分歧却是極端極端重要。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

個覺悟的、篤信的、有思想原則的宣傳家，而且想做一個革命中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到這些分歧，在於猜透這些『朋友』中間之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機。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忠忱，與善於在實踐方面從事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轉折、退却等等的才幹融匯起來，以便促進亨德孫這流人（如果不舉出人名，那末，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即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們）底政權之成立與倒台；促進他們在實踐上必然破產，因爲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個方向去啓發羣衆的；促進亨德孫派——路易·喬治派——邱吉爾派中間（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帝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卡普派中間等等）必然的磨擦、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以使用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切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史，總是比最好的政黨，即最先進階級底最覺悟先鋒隊所想像的，其內容要豐富得多、繁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們一切才智能力特別高漲和緊張之

際，由最激烈之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來實現的。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把握毫不除外的一切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候還要冒着巨大危險去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業）；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時準備着極迅速地突然地由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若不決心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那麼誰也會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愚蠢，或甚至是一種罪行。可是這點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加明顯。因為在政治上愈難趁先知道，在將來此種或彼種條件之下，究竟那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倘若我們不把握一切鬥爭手段，那末，當其他階級的狀況，發生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特別薄弱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把握了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形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能極迅速地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為我們所代表的是真正先進真正革命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以為公開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時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和愚弄了工人；往往以為只有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但這不正確。正確的是那些例如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

〔III〕

時期，在最自由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極無恥和極厲害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大戰底強盜性質這一真理的條件下，不能和不願（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願』罷）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末，他們便是極壞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並熾烈起來的時候，不管是誰都參加革命，有的由於狂熱黨必，有的由於追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由於貪圖祿位，這時做一個革命者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極大困難，受盡千辛萬苦，才能擺脫這類的假革命家呵。當進行直接公開的、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具備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瞭解必須採用革命行動方法的羣衆中，來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也就有價值得多了。要善於尋求、探索和正確判定那種把羣衆引向於真正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之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現時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知道，而且任何人也不能預先斷定，那裏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足以喚醒、掀起並推動那些目前還未醒覺的極廣大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

們必須把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準備妥當，以便把『四肢都裝上蹄鐵』（正如已逝世的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那樣）。引起『山崩地裂』的，或許是國會危機；或許是由紛亂到了極點而日益險惡和日益加劇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是某種第三類的事變等等。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那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懷疑，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是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是堅定不移地解決了的），我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在沉眠中的無產階級羣衆動作起來，並把他們直接引到革命跟前去。我們不要忘記，例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在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會比現時少一百倍的環境中，單是像反動軍閥千百次無恥行爲之一（德來福斯〔九八〕案）的這樣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也就足以激動人民直接去實行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地、毫不放鬆地既利用國會選舉，又利用不列顛政府底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政策上的一切事變，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門和各方面等，按照新的方法，即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用第三國際底精神而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此地我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布爾什維克』式參加

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國外的共產主義者說，過去俄國的國會選舉運動，與通常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的國會制度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第三國際擁護者底任務，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門中，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改造為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在俄國底選舉裏，也曾經常有過真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只顧小利的，資本主義投機撞騙的行爲。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迥非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祿位的國會工作方式：務使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口號，務使真正無產者在沒有組織的，備受抑壓的貧民幫助之下，散發傳單，走遍工人住宅，走遍鄉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幸而歐洲所有的窮鄉僻壤，要比俄國少許多倍，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走到最平民式的茶樓酒肆中去，鑽進最大衆化的會社、團體和偶然集會裏去，在同民衆說話時不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在國會中說話的語氣），絲毫不爭逐國會議席的缺位，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揭破資產階級食言的地方，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舉行的選舉，向國民所發表的口號，來使羣衆盡量認識布爾什維主義；要知道，除選舉外，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平素是得不到這種機會的（自

然大罷工的機會是例外，因為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類似的全民鼓動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在西歐和美國，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這些事情是可以進行而且應該進行的，因為不費氣力，一般地就不能解決共產主義底任務，既然花費氣力，那就要解決日益複雜，日益和社會生活各部門緊相聯系，並把各部門先後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實際任務。

在英國，也應當在軍隊中，在『本』國被壓迫和不等民族中（如愛爾蘭、各殖民地）按照新的方式（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式，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式，不是用改良主義手段，而是用革命手段）來進行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須知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地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大戰後的現在，當各民族已飽受戰爭痛苦而迅速認識真情實況的時候（這種真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被打死和變為殘廢，只是為的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成衝突，掀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都有無數火星到處橫飛，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到底是那顆火星子能燃起大火，即能特別喚醒羣衆，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走到各方面，甚至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是毫無希望的方面去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担負起自己的任務，便不能照顧到各方面，便不能掌握

所有各種武器，便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把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按資產階級的方式建成了——而現在也按資產階級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能準備好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組全部社會生活。

現在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出乎資產階級及庸夫俗子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都改變了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改變了樣子。資產階級爲『布爾什維主義』所嚇倒，它因痛恨『布爾什維主義』幾至神經錯亂，所以它一方面既促進事變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布爾什維主義，因此它也就在其他許多方面削弱了自己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人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什維克時，——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而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更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出版至幾百萬份的資產階級報紙用盡各種腔調，大罵布爾什維克，反而喚起了羣衆去估計布爾什維主義；況且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生活中，由於資產階級『熱心』，反而大大引起了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的爭論。現在各國百萬富豪在國際上的行動，也使我们不得不對他們表示誠懇謝意。他們盡心竭力攻擊布爾什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之流毫無二致；他們做這件事情，也和克倫斯基一樣，做得

『太過火了』，因而也幫助着我們。法國資產階級把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作爲選舉問題的中心，而責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傾向布爾什維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認爲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嫌疑犯而大肆逮捕，到處造謠，說布爾什維克陰謀不軌，因之造成一種人心惶惶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它怎樣聰明，怎樣富有經驗，却做出了想像不到的蠢事，它建立了經費極端充裕的『反布爾什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評論布爾什維主義的書報，添僱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神父來專門反對布爾什維主義；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應該鞠躬致謝。他們在替我們効勞工作。他們幫助我們，促使羣衆來注意布爾什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問題。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另一種作法，因爲要想『緘口不說』布爾什維主義，要想剷除布爾什維主義，這點他們已經是辦不到了。

但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布爾什維主義底一方面：只看見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準備在這一方面，極力抵抗。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單個的國家裏，在某種短促期間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辦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顧及到這一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縱能達到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可說是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生長起來』，它的萌芽真正是無處不有，『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使用的最『愜意』

(III)

的比喻）已經根深蒂固地侵入到全機體之內。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傳染病』又會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出口迸發出來。這是生活的必然現象。儘管資產階級東奔西撞、兇狂暴戾、肆意橫行，做出許多蠢事，預先報復布爾什維克，並儘情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幾千、幾十萬個明天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儘管資產階級這樣橫行無忌吧，但它的命運總是和以前被歷史判處了死刑的一切階級底命運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將來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既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同時又能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估量資產階級瘋狂奔撞的行動。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布爾什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帝制派將軍們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手段所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日益鞏固，日益發展着；它是這樣根深蒂固，甚至連摧殘追究都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着共產主義運動。要使我们更加有把握和更加切實地走向勝利，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覺悟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各先進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所缺乏的，正是這種覺悟以及在實踐中體

現這種覺悟的本事。

那些博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前是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們如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底破產，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覺悟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以此教育過別人（從前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極大的錯誤，或在實踐上完全暴露他們是非辯證論者，完全是不善於估計到形式底迅速更變，以及舊形式中迅速充滿新內容的人，遂使他們底命運與漢德曼（九九）、黑得和普列漢諾夫相差無幾。

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祇是『呆呆注視着』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缺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種因客觀條件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轉變，而繼續千篇一律地重複那種簡單的、讀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經充實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這班聰明角色却固執成見，過去現在都還繼續在那裏肯定地向自己 and 別人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主義者，不要重複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要趕快糾正並要使機體少受損害而迅速消除那種爲『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不僅右傾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與『右傾』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比較起來，前者的危險性與嚴重程度，要小一千倍，然而，這祇不過是由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爲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也許容易醫治好，所以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爲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已經發展到無法包容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上看來，我們現在有了這樣堅固、這樣強大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足以使這種內容能夠而且應該無論在新的形式或舊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它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與征服一切的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要與舊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所有一切新舊形式變爲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澈底的勝利所運用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發展，走上最直接、最便捷的道路，

羊子
心
20

向着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獲得勝利的目標前進。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彷彿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樣，說什麼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不容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已經是錯誤了；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而且局部地已經並在繼續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右傾教條主義會因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忽略新內容，而完全破產了。左傾教條主義現在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能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開闢自己的道路，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把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別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去適應於不是由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由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各種更替。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慘禍，其卑鄙醜態內容及其所造成的無出路狀況，如此強有力地推動和加速了全世界革命，這個革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發展得這樣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更替着的形式，供獻這樣有教益意義而在實踐上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據，以致使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可以很快地完全地醫治好「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增補

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行報復，曾把我國掠奪一空，並不顧對本國工人所說的任何諾言，繼續加以掠奪和封鎖，而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我國印刷局已設法料理好來印行我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却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材料。我並不把這本小冊子看作是什麼比政論家短評較大的著作，因此要簡略地補述下列幾點。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現已成爲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行組織『共產黨』，以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走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是因爲我僅僅有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左派報紙蘇維埃（*Л. Совет*），上面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

〔III〕

與必要，同時也講到抵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派別）（二〇〇）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內的。

與『左派』，即『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在職工會內工作）實行分裂，好像過去與『中派』（或考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樣，也許要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觀念混亂要好些，因爲觀念混亂既妨礙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也妨礙黨內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去實際把自己考驗一番吧，讓他們不要嚴格集中和具有鐵的紀律的黨，不要有善於掌握各方面、各部門、各種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的能力，去試試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吧。實踐經驗很快就教會教訓他們的。

不過必須加緊努力，要使與『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礙或儘少妨礙在最近將來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子必然而且定要匯合成爲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布爾什維克所特別稱幸的，就是他們還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直接鬥爭以前，有十五年工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反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反對『左

(III)

派」。而在歐美，現在却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這種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覬覦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觀念和『光明正大態度』的話），但工人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成爲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能力的黨。

● 關於『左派』共產黨人，即反國會派，將來與一般共產黨人合併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樁長處，就是他們比較一般的共產黨人善於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歷上也屢次看到過這類的事情，不過範圍較小並且是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裏，而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什維克有時候在某些地方鼓動羣衆，比我們更有成效。局部地這是因爲在革命時候或者革命情景還歷歷在目的時候，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比較容易接近羣衆。然而這還不足以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或先進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羣衆，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那末，它就必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會說過，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事。此後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證實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Die Rote Fahne” Zentralorgan der Komm.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第三十二期上，載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卡普和留特維茨（一〇）軍事『盲動』及關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正確。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聲明對於那個『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參加的社會主義政府』，採用『善意反對派』底態度（就是不準備用『強力來推翻』這個政府）。

須善於採用不管對於城市、對於工廠『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淺近、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的說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的工作。

這個策略，基本上無疑義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之爲『社會主義的』政府，謝德曼這一流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這類的話，並且決不能寫出像『聲明』底第四條這樣的語句：

『：當政治自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當資產階級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專政時，這種情形，從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來看，爲了繼續奪取無產階級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爲重要：』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德孫派（謝德曼派）斯腦頓派（克里斯平派）跳不出，且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又不能不是資本底專政。德國共產黨中央爲要達到它所全然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便完全不應當寫這些在原則上正確和在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祇須說（如果要講講國會式的客氣話）：常多數城市工人跟隨着獨立黨人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祇好讓這些工人，去嘗試『他們自己』政府底經驗，以便他們自己能拋棄最後的市儈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種說法完全足以做這種真正必要的妥協的根據，而妥協的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

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但是在日常的羣衆鼓動工作中，並不受官場的國會式的客氣語所拘束，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輩這類下流東西，考茨基、克里斯平輩這批庸俗之徒在事實上揭穿自己如何自欺，又如何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會『最清潔不過地』做這一番『清洗』工作，來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販賣階級的社會主義底骷髏馬廐，『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現時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已經根本喪失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爲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得多）底真正面目，在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的事變時，就是在卡普和留特維茨底政變時[●]，又一次地暴露出來了。一個雖然簡短，却很明瞭的描述，便是考茨基所做的一篇小小文章，題目叫做決勝負的關頭（“Entscheidende Stunden”）〔101〕，這篇文章

● 這次政變，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三十日與國共產黨極好的機關報紅旗上異常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

克思主義的方法闡述過。（“Die Rote Fahne”，Wien 1920, No. No. 299, u. 297; L. J.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登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Freiheit」（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同時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論政局（二〇三）一文（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會用革命家的態度去思索和論斷問題。這些只會嘔嘔啜啜的市僧民主派，如果他們自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末，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便要增加千百倍，因為他們事實上，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必然要作出叛賣的勾當……同時却『竭誠地』繼續自信，以為他們是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由於胆小和無氣節的緣故，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毫無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時他們也是想『幫助』無產階級啊！

二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一類黨員，甚至這一批議員在自己的隊伍內，乃是一種錯誤。例如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駐羅馬通訊員這個局外的證人，更證實了這點，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了他和屠拉梯的一篇談話（二〇四）。這個通信員寫道：

「……屠拉梯先生認爲革命的危險，並不很大，不至於在意大利引起無根據的顧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祇是爲要使羣衆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與緊張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是毫不適用的。它只能是使勞動階級經常覺得有所希望。用這種學說做幻彩去眩惑無產者的人們，迫不得已進行日常鬥爭，以圖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好來遷延時日，使工人階級不致即時喪失自己的幻想，喪失對自己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接連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嚴重局勢，愈加嚴重。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全國憤慨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全國頹廢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還遠未覺悟到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其實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國內秩序和優裕生活：」

很明顯的，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教唆人等所掩蔽所粉飾的實情，却被英國的記者洩漏出來了。這種實情就是屠拉梯、特列維斯（一〇五）、莫其良尼、（二〇六）杜郭尼（二〇七）一流先生們底思想和政治工作正與英國記者所描寫的恰恰相同。這是澈頭澈尾的社會主義叛徒。他們主張在僱傭勞動奴役制下爲資本家發財而工作的工人應遵守秩序與紀律，單就這一點說，已是十足的叛變行爲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對於我們俄國人該是何等耳熟呵！他們說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該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呵！他們竟絲毫不懂得自發開展的罷工

運動底革命作用，該又是何等鈍拙，何等鄙陋的資產階級心理呵！真的，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記者替屠拉梯一流先生們幫了一次欲益反損的忙，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波爾迪加同志及其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想在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那就得仗義聲討，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真正的共產黨。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波爾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從對於屠拉梯這流先生們所下的正確批評中，作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爲凡是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來辯護這個觀點。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上有過用真正革命方式，即真正共產主義方式利用資產階級國會而毫無疑義是有益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模範例子。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千番百次以至無窮地說那種『舊的』、非布爾什維克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的所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在一切活動方面都應

該·加·添（而且若不進行長期的、堅持的、頑強的工作，便·無·法·添·加）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底傳統不同的東西（同時要保留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工作來說吧。報章、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一個多少文明的國家內，羣衆運動決不能沒有編輯機關。儘管你責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要使羣衆不受領袖底影響而保全純潔，也還是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還是不能使我們脫離在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兩年半以後，還是爲羣衆（農民和手工業者）中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所形成的這種氣氛，這種環境所環繞着。

利用國會是工作底一種形式，編輯事業是工作底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人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政黨底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無論在前一方面或後一方面——而且在資本主義下，以及從產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無論在那一方面的工作——都必然會遇到這樣一些困難和特殊任務，這種困難和任務是無產階級爲要利用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知識分子來達到自己

(III)

的目的，爲要戰勝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成見和影響，爲要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抵抗力（往後還

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環境）所必須加以克服和解決的。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以前，在各國，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等等痛罵國會制度，嘲笑被資產階級所腐化了的社會黨議員，抨擊鑽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著編輯工作，借著工會工作，去做同樣資產階級式的鑽營祿位的勾當，難道這樣的例子當時我們不是看得非常之多麼？如果只就法國來說，難道如沃和麥爾黑姆這些先生們底行爲，不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拒絕』參加國會的幼稚氣，就在於他們想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來『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罷了。極無恥的鑽營祿位行爲，資產階級式的利用議席肥缺，改良派的對國會工作的驚人曲解，卑鄙的市儈陋習——凡此種種，毫無疑義都是資本主義到處產生着的，不僅在工人運動以外，而且在工人運動內部產生着的通常和最流行的標本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逝得很慢，因爲農民經常不斷地重新產生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各方

面，都產生出形式上稍有差別，而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勾當，民族沙文主義，市儈卑污行為等等。

親愛的抵制國會派和反國會派的人們呵，你們自己覺得自己『異常革命』，但事實上，你們是看見與在工人運動內部之資產階級影響作鬥爭時發生了比較不大的困難，就為這些困難所嚇倒了，殊不知你們底勝利，即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事業，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困難的程度要大得多，要大無數倍。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今天的小困難所嚇倒了，却不知道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還必須學習，必須補習怎樣去克服同樣的，而程度却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時，會有更多的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鑽入到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裏面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機關中來，因為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並無從去建設共產主義，因為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淘養和重新教育他們，——猶之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一樣，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

(三)

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現在反國會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目空一切，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想一揮手就拋開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也就是這些任務要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中間復活起來（我們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且打破這種制度是很正確的，但是它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底名義之下，又重新復活起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內享受特權的，即熟練程度最高、待遇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制所固有的一切壞處都在不斷地復生着，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作再接再厲、堅持不懈的長期頑強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面，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本主義陋習，是很『困難的』事情：要把被資產階級偏見所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爲常的、當國會議員的領袖們趕出黨去，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中間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人數很少的相當一部分人）來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真正不愧爲工人階級代表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在羣衆中進行宣傳、鼓動、組織的迫切工作，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很『困難』，這是用不

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强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强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若與無產階級在準備獲得勝利的時候，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終歸必須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如同兒戲。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來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團，乃是一樁輕而易舉，形同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派』以及反國會派的同志們，連像克服現在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末，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服從自己並改造這些分子和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這些事情，並由於這樣倉卒補習，就會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則資產階級的

環境，自私的習慣，市儈的傳統，就一定會從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社會活動底一方面，即國會活動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所有各方面，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台上，毫無例外。在某種工作上，遇着某一椿『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便想畏難偷安，托詞躲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爲了這點，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的。應該學習並學會毫不除外地掌握所有一切方面的工作和活動，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氣、傳統和習慣。另一樣處置問題的辦法簡直是不鄭重的舉動，簡直就是幼稚氣。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寫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間

一九二〇年六月印成單行小冊子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五至二五〇頁

簡要社釋

(一)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九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時代馬克思主義之大理論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一八七四年，加入奧國社會民主黨，依附於該黨由塞伊和莫斯特所領導的半無政府主義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響之下，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在『特殊法』時期(一八七八——一八九〇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廢除非法的機關社民主黨人上合作。一八八三年，創辦了學術性的雜誌新時代 (Die Neue Zeit)，任它的編輯至一九一七年為止。在九十年代，寫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土地問題等)。一八九八年，經過大動搖之後，出而反對伯恩施坦底修正主義(反伯恩施坦)。但是，在其這一時期底著作中，即已有了好多漏洞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如關於辯證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馬赫哲學的調和態度等)。在其走向政黨之道路一著中，對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計，一般說來，還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從這個時候起，機會主義的『中派』的趨勢(考茨基的這種趨勢，始終是很厲害的)，在其一切政治的和理論的活動中便逐漸佔了斷然的優勢。他成了西歐中派底最有名的代表，而所謂『中派』者，就是機會主義的變種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他最後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用國際主義的辭句掩蔽自

已立場的真正社會沙文主義。他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創立人之一，後來成了該黨的右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反對蘇維埃制度，堅持所謂『純粹』的民主制度和國會主義。在德國十一月革命後，任愛伯特、謝德曼第一次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在任內實行爲協約國奴隸般服務的政策，竭力阻止與蘇維埃俄羅斯恢復關係。在伯恩會議上，以最敵視的方式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第二半國際創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贊助它回到第二國際的隊伍內。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兩卷半的唯物史觀（一九二七年）一著中，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叛賣，達到極端地步。他是蘇聯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公開宣傳反蘇戰爭和武裝干涉。可參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見正文第八頁）

(二) 鮑威爾（生於一八八二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爲該黨左翼，鬥爭雜誌編輯，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之有名頭子。著有許多關於工人運動、哲學及民族問題的小冊子。在其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一著中，主張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考茨基主義者；一九一四年爲俄國俘虜，拘留於西伯利亞，後由克倫斯基政府依彼得堡蘇維埃的要求，從該地釋放。在其短期停留於彼得堡期間，贊成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底立場。在奧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後，爲社會民主黨人倫勃爾聯合政府底外交部長（倫勃爾曾幫助協約國封鎖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〇年爲第二半國際組織者之一。反對第三國際，著了幾本反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書，如世界革命（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俄羅斯的新方針（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迫不得已而公開承認：『在蘇聯新經濟政策底基礎上面，正在進行着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這一鬥爭可說有社會主義勝利之希望』；但同時却說：聯共正在使資本主義復辟。一九二七年七月他領導奧國社會民

主黨，利用該黨的影響，以鎮壓維也納工人底起義。現爲第二國際執行委員。——（見正文第六頁）

〔三〕阿得列爾（生於一八七九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父爲維克多·阿得列爾。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爲瑞士

蘇立文大學理論物理學助教，同時兼任瑞士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人民權利主筆，以後爲奧國社會民主黨書記。

帝國主義大戰時，採取和平主義立場。因羣衆的工人運動底低落而感到失望，於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刺死

奧國總理斯杜克伯爵，以是被判死刑，以作苦工十八年代死。一九一八年奧國革命後出獄，出而反對俄國十

月革命。同時，他竭力消滅日益發展的奧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二〇年企圖成立『中派』的第二半國際。一

九二二年，根據他的提議，此第二半國際與復辟的第二國際合併，他任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左』的社會

民主黨是以革命詞句掩蔽社會民主黨政策底資產階級的實質，而阿得列爾正是這種『左』的社會民主黨底代

表者。在哲學上，他是屬於馬赫主義者。——（見正文第八頁）

〔四〕這本小冊子的著者是奧托·鮑威爾。——（見正文第九頁）

〔五〕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末創辦的第一個全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機關報，在國外出版而秘密散佈於俄國各

地。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造成了創立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基

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孟什維克把火星報奪入自己掌

握，而將其變成爲自己派別組織的機關報，用以進行反對布爾什維克，反對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鬥爭。

於是孟什維克所把持的火星報便被稱呼爲『新』火星報，以別於列寧所主編的革命的『舊』火星報。——（見

正文第九頁）

〔六〕運拿慘案是指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公曆十七日）沙皇軍隊槍殺運拿金銀（西伯利亞）內舉行罷工反對資方殘

酷剝削的工人一事而言。俄國各地工人用羣衆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回答了這次慘案。——（見正文第十七頁）

〔七〕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因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五年被以『叛國』罪名流放到西伯利亞。——（見正文第十七頁）

〔八〕龍格（生於一八七六年）法國社會黨黨員，律師，在帝國主義大戰幾年間，採取和平主義立場，並且始終投票贊成軍事公債。『Le Populaire』報的創辦人和主筆，該黨內部右派底首領，在一九一八年斯特拉斯堡大會上，該黨多數採取龍格立場，而龍格遂成了人道報底思想家和編輯。十月革命後，在羣衆中左傾情緒壓力之下，反對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爲『恢復國際委員會』主要活動者之一。在一九二〇年圖爾大會後（在該大會上共產黨人獲得勝利），與他的同道者一同退出黨，以後依附於維也納第二國際；再後，又回到第二國際。列寧對於龍格的批評，可看政論家的簡評一文（全集二十五卷，三十一至三十九頁）。——（見正文第十八頁）

〔九〕費邊派 這就是所謂費邊社的社員，該社以羅馬的名將費邊·匡克塔托爾（匡克塔托爾是拉丁話，意義就是做事遲慢的人）底名字命名，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該社成立的用意，就是要用和平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合會相抗衡。該社正式宣佈的宗旨，就是要用民主的精神來修改英國的憲法，並宣傳用社會主義的方法組織生產。該社不放棄政治鬥爭，不拒絕參加國會選舉，同時它却否認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不承認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見正文第十八頁）

〔一〇〕屠拉梯（生於一八五七年）意大利改良派社會主義者，就其所受教育講，爲法學家、著作家。從一八九二年起，爲意大利社會黨領導人之一。一八九八年，因參加所謂『飢民騷亂』，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但過了一

年，被政府釋放，並建議要他作部長。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他反對意大利參戰；在意大利參戰以後，則贊助以威爾遜主義為精神的妥協派的『民主的』和平；在大戰之後，在社會黨大會上，領導右的改良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及與共產國際接近；在一九二二年分裂之後，成為統一社會黨底首領。——（見正文第十八頁）

〔二〕謝德曼（生於一八六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青年時代為排字工人。一九〇三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即在國會中佔據顯要地位，為伯爾爾底密切合作者。一九一二年，被選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同年，在社會民主黨於國會選舉中大勝利以後，為黨團主席團委員和國會副議長。在伯爾爾逝世以後，與愛伯特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主要領導人。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該黨的一切叛賣活動，都是在他領導之下進行的。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之前，企圖挽救君主政體，加入巴登斯基親王內閣。在革命以後，當選入『人民代表委員會』——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臨時政府。曾用一切方法，鎮壓日益開展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正文第十九頁）

〔二〕諾斯克（生於一八六八年）德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木工；長久在礦工會中工作，佔據領導職位。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二年，任哥尼斯堡、刻姆尼斯及布蘭登堡等地社會民主黨報紙底主筆。一九〇六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尚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即擁護德國資產階級底殖民地政策。在大戰諸年間，依附於謝德曼立場，並與社會民主黨底多數黨員一同支持政府，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壓服基爾海員起義，此後，被委為基爾總督。隨着革命運動底加強，諾斯克以殘酷鎮壓海員有功，被召至柏林，加入『人民代表委員會』。他依靠反革命的單人——留特維茨等，殘酷地壓服了一九一九年柏林工人的一月起義。任謝德曼內閣國防部長時，在保皇派軍官幫助之下，並用大批恐怖的手段，壓服了革命的工人運動。

德國資產階級利用他作爲鎮壓日益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並在他協助之下，準備了卡普「盲動」之基礎，卡普暴動，才結束了他的部長野心。——（見正文第十九頁）

〔三〕蒂法亭（生於一八七八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底有名的理論家和代表者。一九〇六年旅居德國，在這裏積極參加社會民主黨黨校之領導工作，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合作，並編輯前進報（Vorwärts）（一九〇七——一九一五年）。一九一〇年發表其主要著作財政資本論，其中圖謀調和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不論何時，總接近於考茨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中派」。一九一七年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爲其中央刊物自由編輯和中央委員。爲該黨底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之主要代表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革命後，爲政府「社會主義化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反對獨立派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三年爲斯特萊施曼聯合內閣財政部長；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社會民主黨人羅勒聯合內閣財政部長。在社會民主黨基爾大會上（一九二七年）辯護「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現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思想家之一。——（見正文第十九頁）

〔四〕倫勃爾（生於一八七〇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底有名代表者。在其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關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治論」作了最初的解釋。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爲顯明的社會國防派。在一九一八年奧國革命以後，任奧地利共和國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堅持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從一九二〇年起，爲國民會議議員。——（見正文第十九頁）

〔五〕阿烏斯鐵爾里茨（一八六二——一九三一年）奧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屬於該黨右翼，國會維也納議員，該黨中央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曾採取鮮明的沙文主義（極端侵略性的國家主義）的立

場。——（見正文第十九頁）

〔二六〕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列寧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奠基人與最大的代表者。起初參加『土地與意志』黨，在一八七九年該黨分裂以後，成爲『黑分社』首領。一八八三年，流亡國外，脫離民粹主義，與阿克塞里羅德、查蘇里奇等，成立了俄國的頭一個社會民主組織『勞動解放社』。在九十年代，跟民粹主義、伯恩斯坦主義及其在俄國土壤上的反映——經濟主義，作了積極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成了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之一，曾受兩報底委託，起草黨綱草案，這個草案受到列寧方面的嚴厲批評。在普列漢諾夫修正以後，才作爲火星報黨綱草案原則和理論部分底基礎（其土地部分主要爲列寧所寫的），這個草案，經過小小的改變，被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所通過。在一九〇三年該黨分裂以後，頭一個時期，依附於布爾什維克，後來又依附於孟什維克，但是經過若干時期，在組織上脫離他們，但在思想上始終是接近於孟什維克。自取消主義發生後，在反對它的鬥爭中，不久又與布爾什維克接近。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做了極右的國防派（『號召』）底首領；在二月革命以後，仍繼續這條路線（『統一』），同時堅決主張擁護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請日以後，採取了完全反革命的立場，堅持『鐵的政權』之思想。仇視十月革命。列寧曾對普列漢諾夫的理論和哲學著作評價很高，但同時指出了他的一系列的重大錯誤（例如承認象形論，對辯證法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論之不正確了解等）。——（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七〕列寧是指的普列漢諾夫所著的『白色恐怖』一文，該論文登載於一九〇三年第四十八期火星報上。普列漢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關於法國大革命底恐怖寫道：『比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出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它無情

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然而這種恐怖是什麼呢？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它的巨大力量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究竟是什麼呢？據馬魯頓正確的意見，恐怖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底獄的時候。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底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的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羣衆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羣衆運動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

「……恐怖的代表，乃是法國人民反對歐洲反革命聯合力量而進行的英勇決鬥中的領導者。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的革命者，是異常值得學習的。然而它之所以值得學習，正因為它不斷向我們說：必須準備我們俄國的人民去打破我們全俄各處的巴士底獄。」（見普列漢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八〕伯恩施坦（生於一八五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爲該黨非法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九十年代中期，在該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常發表論文，企圖修改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而代以調和階級矛盾的理論，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導人，雖有指斥，但是這種批評很不够，仍讓他留在黨底隊伍內，宣傳他的觀點。在伯恩施坦底觀點出現以後，列寧當即予以澈底的抨擊（可參看全集第二卷四七三——四八六頁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一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爲社會和平主義者。現爲第二國際底首領之一。其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完全獲得了勝利，這從一九二五年所通過的新黨綱上，即可看出來。——（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九〕列寧是指的普列漢諾夫著的、登在一九〇一年第二——三期早霞雜誌上的Contra反對康德或者是伯恩施

坦先生底精神遠邁 (Cont's 的發音與康德同，字義是口是心非——譯者註) 這篇論文上的下列一段話：「伯恩施坦先生的見解中，現在只剩下社會主義底很少的痕跡。實際上他接近於主張「社會改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比接近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得多。然而他依然做一個「同志」，人們並沒有把它清洗出黨。」

(見普列漢諾夫文集第十一卷第六十三頁)——(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〇〕列金(一八二八——一九二〇年) 德國職工運動底活動者，最右的社會民主黨人之一，修正主義者，職業是金屬盤旋工。一八九〇年，當選為德國工會總委員會主席，從一九〇三年起，為國際職工會聯合會秘書，從一九一三年起，為該會主席。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為極端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利用自己的威信，使職工會服從軍閥的利益。一九一九年，為國民大會底委員。——(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一〕「斯巴達克黨」 是秘密的組織，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以李卜克內西為首的德國左派建立這個組織，目的在於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鼓動。該團體曾開展真正革命的反抗鼓動，然而它却不能擺脫中派底影響，它看不見與各種機會主義者有分裂之必要，它依然留在社會民主黨底範圍以內。一九一六年「獨立黨人」(加阿捷、列選布爾)與社會沙文主義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分裂以後，「斯巴達克黨」曾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同時却保留自己的組織，依然為一個特別的團體。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獨立黨人組織了政府以後，「斯巴達克黨」才與獨立黨人斷絕關係，到了那年十二月，該黨宣佈取消，而組織德國共產黨。——(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二〕萊得布爾(生於一八五〇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中派」立場，曾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堅決反對「齊美瓦爾德左派」自「獨立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為該黨首領之一。在一九

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時期，與李卜克內西和肯德同爲柏林革命委員會委員，但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擁護所謂『民主』。自共產黨人在加勒大會（一九二〇年）勝利以後，與『獨立派』在一起；但是，自『獨立派』與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以後，則拒絕跟從他們，而保持自己的小團體之存在。——（見正文第二四頁）

〔三〕克里斯平（生於一八七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社會民主黨分裂（一八一六年）以後，爲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著名的黨員和領導人。一九二〇年夏季，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進行關於『獨立派』加入第三國際的談判，但是回到德國以後，却拒絕聯合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與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殘餘部分又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裏。——（見正文第二四頁）

〔四〕伯伯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魯旋工人出身。在V·李卜克內西影響之下，於一八六五年加入第一國際，而成爲馬克思底擁護者。一八六九年和李卜克內西成立社會民主黨，一八七五年該黨與拉薩爾派合併，而成爲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以後改名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次當選爲國會社會民主黨議員。一八七二年與李卜克內西同被判兩年徒刑，拘禁於堡壘。被當局放逐和拘禁數次之多。爲黨的大會之經常參加者。在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上起有顯著的作用。在理論上，常自認爲馬、恩的學生。屬於黨的左翼，常常猛烈抨擊黨內和國際上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機會主義。晚年採取『中派』立場。著有好多書、小冊子及講演，流行頗廣。——（見正文第二四頁）

〔五〕布列斯特和約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帝國主義德國及其盟邦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強迫當時尚未鞏固的年輕蘇維埃俄國簽訂的掠奪條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威廉德國傾覆後，蘇俄政府便把這個條約宣佈廢除了。——（見正文第二四頁）

〔二十六〕拉狄克 (K. Radik)，生於一八八三年，加里西亞人。暗藏在布爾什維克隊伍內的好細。從一九〇一年起，

在加里西亞社會民主黨中工作；自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在波蘭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此後赴德國，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一九一七年十月，赴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所揭露的材料，一九一八年與暗藏奸細分子布哈林在一起，號稱所謂「左派共產黨人」，藉口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就圖謀破壞蘇維埃政權，殺害列寧和斯大林；從一九二四年起，加入托季反對派，並爲該派領導人之一，積極反對聯共領導。

一九二七年聯共第十五次大會將其開除；一九二九年承認錯誤，恢復黨籍。從一九三一年起，任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編輯委員，但暗中在托、布反革命聯盟領導之下，爲了反對聯共領導和蘇維埃政權，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積極進行暗害和破壞活動，並力謀帝國主義者侵略蘇聯，企圖在戰爭中使紅軍失敗，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一九三七年蘇聯法庭判處徒刑八年。——（見正文第二六頁）

〔二十七〕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七年）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所揭露的材料，在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他就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一九一八年初，自稱爲「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反對布列斯特和約，主張繼續戰爭，圖謀以此斷送年輕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一八年春，陰謀反對列寧，並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一九一八年夏季，主謀槍擊列寧，使列寧受傷；一九二一年，爲了從內部動搖和推翻列寧的領導，故意使黨內意見分歧趨於尖銳；在列寧臥病和逝世以後，積極企圖推翻聯共的領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反對聯共全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的總路線；以後爲了反對聯共領導與蘇維埃政權，與反革命的托季聯盟攜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積極進行暗害、軍事破壞、爆炸工作；殺害基羅夫、明仁斯基、奎只舍夫、高爾基，還企圖殺害人民所愛戴的大批黨政領袖；並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以間諜消息供給外國偵探機關；努力執行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底意志，力謀破壞聯共和蘇聯，毀壞國防，破壞建設，協助外國武裝干涉，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聯遠東沿海割割給日本，把蘇維埃白俄羅斯割給波蘭，把蘇維埃烏克蘭割給德國，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因罪大惡極，蘇聯法庭於一九三七年判決槍斃。——（見正文第二六頁）

〔二八〕羅斯白雷（生於一八五九年）有名的英國政治家，工黨黨員，下院議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做市長。爲社會主義每日快報（“Daily Herald”）創辦人 and 編輯之一。爲了考察俄國工人底革命勝利，曾兩次訪問蘇維埃俄羅斯（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六年）。在每日快報和工人週刊（“Tanshury's Labour Weekly”）上，對於俄國革命底事件，常作同情的解釋。——（見正文第二七頁）

〔二九〕倫諾德爾（生於一八七一年）法國社會黨首領之一，新聞記者。在佐列斯被毒以後，爲人道報編輯，把該報變爲社會愛國主義和反對國際主義底機關報。在一九二〇年該黨圖爾大會上，爲少數派，與其他同道者退出大會，而與一部分『中派』（龍格）保持機會主義的法國社會黨，今日該黨已經滾到社會法西斯主義方面去了。爲共產主義和蘇聯底最顯明的敵人。——（見正文第二七頁）

〔三〇〕工黨分子乃是英國工黨底黨員，該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它在自己的隊伍中包括工聯底會員以及其他工人組織底會員，它的目的，主要是國會鬥爭和進行選舉運動。在第二國際中，工黨是極右派。——（見正文第二七頁）

〔三二〕克倫斯基(生於一八八一年) 俄國二月革命底小資產階級首領之一；律師。因在政治案件中充任辯護師而著名；從一九一二年起，爲國會議員，在這裏加入勞動派黨團。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起，爲社會愛國派。在二月革命後，加入『社會革命黨』，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副主席，違反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不許作臨時政府部長的决定，竟加入臨時政府爲司法部長。在顧亦考夫辭職後，任海陸軍部長，依照協約國的要求，調動俄軍於六月進攻德軍。但結果完全失敗。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底七月運動被壓服以後，曾任迅速更換的幾次聯合內閣底總理。在柯爾尼諾夫事變以後，曾任總理和最高總司令。他以國家元首資格，實行妥協政策，而滾到反革命和波那帕特主義方面。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他企圖依靠前線，組織向彼得格勒的進軍，但結果被彼得格勒的工人赤衛隊所擊敗。十月革命以後，逃至國外，進行積極的反蘇聯活動。——(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三〕高爾察克(一八七三——一九二〇) 帝俄海軍將官；十月革命後爲西伯利亞反革命政府之一的頭子。帝國主義大戰時(從一九一六年起)爲裏海海軍總司令。二月革命以後，被迫去職，逃至國外。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一八年，接受英人和俄國反革命者底提議，到哈爾濱，組織反革命的白衛軍。秋季到奧姆斯克，由『社會革命黨』內閣委爲反革命的海軍部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反革命的軍閥、大資產階級及英人支持之下，在奧姆斯克舉行政變，將『社會革命黨』的內閣閣員逮捕，宣佈自己爲『俄羅斯最高統治者』。是年十二月，在烏發，逮捕了『立憲會議委員會』的委員，並在英法政府援助之下，開始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其綱領是用軍事獨裁和肉體消滅工人階級的辦法，使君主政體復辟。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把俄國變爲帝國主義底殖民地。但是英美的紅軍和革命的游擊戰，終於消滅了他。他本人被俘虜。一九二〇年二月，根據伊爾庫茨基革命委員會的决定，把他及其末了一個總理赫別拉也夫槍斃了。——(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三】鄂尼金（生於一八七二年）帝俄軍官，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內戰時，爲反革命的白衛軍頭子之一。一九一七年，依靠富有的哥薩克和英國的財政軍事援助，堅決幫助柯爾尼洛夫。十月革命以後，逃至頓河，參加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在一九一八年柯爾尼洛夫逝世以後，爲南俄反革命的白衛軍總司令。在他的活動中，企圖依靠俄國社會底『活的力量』。爲了這一目的，根據他的提議，在總司令之下，設立『特別會議』，其參加者，除極端的保皇黨之外，還有立憲民主黨人。但是『特別會議』從其成立之日起，就暴露了其內部的磨擦和毫無生氣。他並企圖用『土地改革』的辦法，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但亦未成功。他被紅軍擊敗後，於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將總司令名義讓位於當時還盤據在克里米亞的反革命的弗蘭格爾，此後他本人逃至英國。——（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四】萊因河法蘭克福地方出版的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黨）之分裂（Die Spaltung der K. P. D. in Spartakusland，Frankfurt a. M.）這本小冊子，是『左派』共產黨人的團體所辦的，其中所論述的要點，後來就成爲德國共產黨工黨政綱底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底舉義很厲害地被鎮壓下去，這就使得一部分德國共產黨人主張審查黨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不久以後，還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德國共產黨底裂痕就已表現出來了。新派底人（什列迭爾、永格、威德列爾）認爲無產階級失敗底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工人階級分散在好些政黨之內；第二，就是過於重視公開的鬥爭方法，它們以爲實際上這種方法使羣衆的革命自動精神降低。『左派』共產黨人，反對黨底策略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主張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 Arbeiterunion），來統一所有主張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革命工人；『左派』共產黨人堅持『直接行動』，要求共產黨人拒絕參加反動工會中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在甘迭里別爾格的黨代

表大會上，『左派』舉手反對德共中央迭里別爾格的提綱，他們被剝奪了繼續參加黨代表大會工作的權利，並被開除出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反對派柏林代表大會上（該大會代表了幾千個反對派分子），『左派』組織了新黨，叫做德國共產主義黨，開始與德國統一的共產黨進行持久的鬥爭，使革命無產階級底隊伍大形渙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致德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指出德國共產主義黨底綱領式的宣言、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原則，『顯然離開共產主義；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方面去』。德國共產主義黨與羣衆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系，它的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觀點的混合物，所以不明確和不固定，因為這個緣故，就在共產主義黨裏，有了產生新的、顯然表示『民族主義』的右傾反對派之餘地。在該黨內部，成了而且發育了右的派別，即所謂『漢堡派』（Handlunger Richtung）。——（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五〕本書俄文版第一版此句本爲『荷蘭論壇派』。與俄文版同時出版的有英、德、法文版，列寧在他專門寫給英文版的增補中，指出必須把他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一個名詞，改爲『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故這裏俄文版原文已經照列寧的這一指示而加以改正了。

『論壇派』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就建立了荷蘭共產黨，後來由荷蘭共產黨中產生了『左派共產黨員』。不久之後，左派的領袖——洛朗德、郭里斯特與郭爾鐵爾離開了政治活動。——（見正文第三三頁）

〔三六〕勞芬別爾格（生於一八七二年）漢堡社會民主黨人，以後加入共產黨。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德國共產黨海德

學大會上，與沃里夫赫木和呂勃領導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左派共產黨人』。在共產黨分裂以後，被開除黨籍。參加過成立『共產主義工黨』的領導工作。一九二〇年初，與沃里夫赫木組織所謂『漢堡派』，其目的是在把『一切民族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吸引到共產黨人方面來，以反對法國。他的所謂『民族布爾什維主義』並沒有成功，以後他就脫離了工人運動。——（見正文第三五頁）

〔三七〕沃里夫赫木 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十月與勞芬別爾格及奧托·魯爾，在共產黨海得堡大會上同代表『左』翼，被開除黨籍。在共產黨分裂後，參加組織『共產主義工黨』的事情。一九二〇年初，以所謂『民族布爾什維主義』理論出現，號召一切『民族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做『布爾什維克』，以與法國作鬥爭。——（見正文第三五頁）

〔三八〕霍爾赫爾（安頓·潘涅庫克底筆名） 荷蘭左派社會主義者，氣象學教授，一九〇七年他和同道者瓦英庫普、羅爾戈斯特等被機會主義者開除黨籍，一九〇九年，建立了左派社會主義的報紙論壇報。自共產國際成立後，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前，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世界革命的發展與共產國際底策略』，發揮了『極左派』的政治主張。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責斥了『極左派』底立場；在大會以後，他在維也納又用自己的真名字出版了那個小冊子。在該小冊子補充中，他污蔑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為機會主義，並拒絕加速革命以奪取非共產主義羣衆。現在他已經離開了工人運動。——（見正文第三五頁）

〔三九〕什列迭爾（生於一八五五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屬於『左派共產黨』，該派構成所謂『漢堡派』，其信徒號召『一切民族分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在『民族布爾什維

主義」旗幟之下，與法國鬥爭。——（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〇〕文迭爾 一九二〇年加入『左派共產黨』，爲『共產主義工黨』創立人之一。『漢堡派』底思想上領導人之一，該派在工人中間沒有什麼影響，不久即消聲匿跡了。——（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一〕『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共產主義工人報）乃是德國共產主義工黨的機關報。該報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出版，至一九二七年停版。開始時是日刊，後來改爲每星期出版兩次。該報擁護『直接行動』底方法，激烈反對利用公開的鬥爭，例如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會及加入工會。——（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二〕是指的一八九五年列寧在彼得堡創立的『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該協會將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統一爲一個集中的組織，它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萌芽。——（見正文第三八頁）

〔四三〕馬林諾夫斯基（一八七六——一九一八年）俄國四屆國會莫斯科省工人議事廳議員，同時爲警察廳底秘密職員。他利用自己講演的才能，突出於其他議員中間。一九一三年夏季，根據考夫斯基（他與警察廳亦有關係）底要求，不得不退出國會而出國。一九一八年，他回至彼得格勒，被最高法院判處槍決。——（見正文第三八頁）

〔四四〕最後這一段話，由列寧建議，曾完全採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提綱，該提綱是肯能和庫西寧起草的。——（見正文第三九頁）

〔四五〕羅將科（一八五九——一九二四年）葉卡切林洛斯拉夫省的最大地主。帝俄第三和第四屆國會主席。二月革命以後，爲國會議員臨時委員會主席，克倫斯基時代大資產階級反動底積極組織者。十月革命以後，逃往國外。——（見正文第三九頁）

〔四六〕根據聯共（布）歷來大會底統計，由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起至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止，黨員人數底變更如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底全俄四月會議，計八萬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計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底第八次代表大會，計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計六十一萬一千人。——（見正文第四〇頁）

〔四七〕尤金尼奇（生於一八六二年）帝俄底軍官，十月革命以後，逃至芬蘭。一九一九年，為反革命的「西北政府」（係英國人在愛沙尼亞所組織）的軍隊首領，兩次企圖奪佔彼得堡（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圖謀進攻彼得堡時，被紅軍所擊敗，率其殘部隱藏至愛沙尼亞，以後又逃至英國。——（見正文第四〇頁）

〔四八〕葛培爾茲（Gompers）（一八五〇——一九二四年）美國捲煙工人。任美國勞動聯合會主席達四十年之久，該聯合會擁護享有特權的工人貴族之狹隘職業的利益，宣傳『階級利益之協和一致』，並猛烈反對無產階級中間的革命趨勢。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依靠於美國工人階級的右傾分子，積極支持威爾遜總統底政策。一九一九年參加巴黎和平會議工作，任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二年充任華府會議美國代表團團員。主張對蘇實行孤立政策，積極反蘇。曾任『全國公民聯合會』——由『資本、勞動、及其他公民』代表組成的團體，以有名的億兆富翁莫根為主席——副主席。他甚至認為美國的職工運動都太左了。——（見正文第四六頁）

〔四九〕如沃（生於一八七六年）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書記，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為顯明的社會愛

國派。一九一六年爲國際職工聯絡局（此局是爲了代替柏林國際秘書處而設立的）主任。一九一九年爲國際聯盟國際立法委員會主席。如沃曾促成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國總罷工的失敗。他是改良派的阿爾斯特丹國際派首領之一。爲法國駐國聯的代表。——（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〇〕亨德孫（一八六三——一九四〇年）（即漢德森）英國職工運動和英國工黨有力首領之一，就職業講爲鐵錐工人。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實行與自由黨政府妥協之政策。自基爾哈爾辭去該黨主席職務（一九〇八年）以後，於兩年內曾佔據這個職位；後來於麥克唐納因其和平主義而放棄這個職位後，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再度担任此職。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初，與哈爾一同簽署以第二國際英國分部名義告英國工人書，號召反對戰爭，但在英國參戰後，却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進行徵募自願軍的運動。一九一五年爲第一次聯合內閣教育大臣，一九一六年爲路易·喬治戰時內閣不管部大臣。但一九一七年被迫辭職，因贊同在斯托哥爾姆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思想，遂引起了英國渴望『激底勝利』的資產階級的憤怒。在麥克唐納第一次內閣時（一九二四年）爲內務大臣，第二次內閣時（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爲外交大臣。在麥克唐納投入保守黨陣營後，曾領導黨內偽善的『反對派』。一九三九年德國法西斯匪徒進攻波蘭，發動世界大戰前，爲英國駐德大使，力謀與德國希特勒妥協。——（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一〕麥爾黑姆（一八八一——一九二五年）法國工團主義者，汽鍋工人工團底組織者，以後爲魯貝勞動介紹所底領導者。一九〇五年，當選爲金屬工人聯合會秘書處委員，指導該聯合會達十八年之久。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歷次大會底參加者。一九一五年，與布德龍同爲工團主義運動左翼底代表者，曾代表法人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並與德國代表會共同簽署反戰宣言。回到法國以後，積極參加組織『恢復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工作。

一九一六年，在工團主義組織與勞動介紹所代表會議上，跟如沃一同投票贊成歡迎威爾遜的決議案。一九一八年，轉至如沃方面，成了阿姆斯特丹職工國際底擁護者。蘇維埃俄羅斯底敵人。——（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二〕丹尼耳·德立昂（一八五二——一九一四年）美國社會黨底領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底創立人與領導人之一，曾跟美國職工會領導者的機會主義和背叛行為作鬥爭，一九二——一九一五年為國際社會主義局委員。在其文字工作中，發揮了『工業國家』組織的思想，在新社會的建設上給了無產階級職工組織以過

分的意義，過高估計了工人政黨之作用和意義。——（見正文第四七頁）

〔五三〕列寧是指的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在這封信說，恩格斯寫道：『工人們在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之後，由於暫時的經濟繁榮，由於他們期待「帝國底繁榮」，似乎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請看馬恩書信一書。該書是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的。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七〇頁）。——（見正文第四八頁）

〔五四〕人民政治日刊 是瑞典共產黨底日報。一九一六年為赫格龍特所創辦。一九二〇年該報主張必須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進行了努力的鼓勵，以反對參加瑞典政府的正式社會主義者（以勃朗寧為首）所實行的讓步政策。——（見正文第四八頁）

〔五五〕世界產業工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W. W.) 是美國工人底革命組織。一九〇四年，當西部鐵工聯合會底鬥爭正激烈的時候，產生了這個組織，以便與妥協的美國勞動聯合對立起來。這個組織到了一九〇五年才在組織上完全形成，它具有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世界產業工會底主要活動，就是多半在無產階級最落後和無組織的階層中組織罷工。在罷工的時候，這個組織用革命鬥爭底方

法來行動，與警察衝突的時候，就組織工人來自衛。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三年間，世界產業工人會底會員實行了幾十次大罷工而得到大勝利。在大戰的時候，世界產業工會並沒有中止羣衆的罷工鬥爭，因此它的會員備受政府壓迫。十月革命以後，在美國成立共產黨以後，世界產業工會敵視美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只是在共產國際執委向世界產業工人會發表宣言以後，這個組織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態度才改變了性質，而且在一九二〇年甚至進行了談判，討論了世界產業工會執行委員會底代表與統一共產黨底代表是否可以召集共同會議的問題。——（見正文第五〇頁）

〔五六〕蘇巴托夫（一八六四——一九一七年）『蘇巴托夫主義』或『警察社會主義』底鼓吹者和組織者。從一八八九年起爲莫斯科暗探局副局長，以後爲正局長；曾在俄國好多城市（維爾諾、明斯克等）發展廣泛的好細活動。一九〇二年組織工會（『莫斯科機器工廠工人互助會』，『彼得堡工廠工人互助會』），其目的是在使工人離開革命活動。一九〇三年辭職，以後由官廳放逐至烏拉第米爾。一九一五年在特別樸夫又加入警廳。一九一七年二月被槍斃。——（見正文第五〇頁）

〔五七〕此地是指的荷蘭『左派』共產黨人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該提綱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一期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上（"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 1. February 1920）。——（見正文第五三頁）

〔五八〕威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德國、波蘭和俄國工人運動的參加者。著有許多關於經濟等問題的理論著作。生於波蘭，一八八九年流亡蘇立支，一八九三年，參加『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底成立工作。從一八九七年起，差不多從未中斷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隊伍內

工作，自光輝地進行反對伯恩施坦主義和米萊蘭主義以後，在該黨內和第二國際內佔有顯著地位。一九〇四年，在組織問題上，堅持孟什維克底觀點；後來才脫離了孟什維克。一九〇七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大會上與布爾什維克在一起，出而反對孟什維克。是年秋季，在司徒加大會上，與列寧在一起，對於戰爭決議案提出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不久，出而反對考茨基和「中派」的其他代表者，領導黨內左傾急進反對派，但卻沒有提出與他們斷絕關係的問題。在布爾什維克與取消派的鬥爭中，採取調和派立場，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支持孟什維克。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國際主義立場，但是在組織上沒有決心與社會民主黨脫離。差不多在全部大戰期間（從一九一五年二月起），處在獄中，在非法的斯巴達克通信上合作，提出『領導原則』——國際主義者底政治主張，這個政治主張，於一九一六年六月間，在『國際社』全體會議上通過。是年春季，在獄中，用尤尼烏斯的筆名，寫了一本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小冊子，其中指出了有成立第三國際的必要。在獄中所寫的俄國革命小冊子（一九一八年九月）中，在對於十月革命的估計上，犯了許多錯誤的論點，這些錯誤論點的大部分，以後都改正了。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後，脫離社會民主黨，創辦和編輯紅旗（"Rote Fahne"）雜誌。參加過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領導工作。在德國一九一九年一月起義被壓服以後，為謝德曼政府所逮捕和槍殺。盧森堡對於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有巨大的革命功績，但同時在理論與策略觀點上（『盧森堡主義』）犯了一系列的半孟什維克性的大錯誤（例如關於政黨作用，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不斷革命問題，等等）。——（見正文第五三頁）

[五九] 李卜克內西（一八七一一—一九一九年）德國革命的工人運動底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共產主義

青年運動底奠基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底兒子。從其政治活動底最初起，即依附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熱烈主張組織青年工人以進行反軍閥的宣傳。一九〇七年司徒加青年國際底奠基人。是年，曾出版軍閥主義與反軍閥主義一書，因此，入獄一年半。在世界大戰宣佈以後，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在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內發言，反對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但八月四日在黨的紀律壓力之下，與其他一切人一同投票贊成該軍事公債。在下一表決中（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他是投票反對軍事公債底唯一議員。一九一五年着手組織「斯巴達克黨」，並以小叢書方式，出版非法的刊物，取名為斯巴達克叢書。在被動員以後，未能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但致函該會議，號召作堅決的階級鬥爭。一九一六年五月一號，在柏林散發反戰傳單，這次行動，曾轉變為革命工人的遊行示威，從此被捕，被判決做苦工四年半。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才釋放了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勝利以後，他雖處在獄中，但他是德國首先站在俄國革命方面的人們之一，他號召德國工人仿效俄國榜樣組織蘇維埃，而且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確實組織了蘇維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期間，任革命委員會委員，領導運動；在革命委員會取消以後，被謝德曼政府所逮捕，與盧森堡同被反革命的德國軍人所殘害。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李卜克內西的名字，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象徵和共產國際的旗幟，他是共產國際底思想上的創立人之一。——（見正文第五三頁）

〔六〇〕狄慈根（一八二八——一八八八年）職業是皮匠，沒有任過學校，自學成爲工人哲學家，恩格斯底朋友。有一個時期曾旅居彼得堡。後來又到美國，在該地社會主義運動上起了巨大作用。在哲學上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而獨立地另外創造了一套觀點，該觀點與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則相近。其哲學著作有：人類頭腦工作之本質、哲學的勝利、社會主義者認識論漫談。——（見正文第六〇頁）

〔六一〕列寧此處是指的狄慈根所著的哲學底成就和關於邏輯的信（“Das Axiom der Philosophie und Priofobin Logik”）書中下列一段話：『同時只須慎重其事，不要誇大區別，不要使這種區別過度，以便不至於荒謬。』——（見正文第六〇頁）

〔六二〕赫龍特（生於一八八四年）瑞典左派社會黨底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爲革命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瓦爾德會議底參加者，在該會議上加入『齊美瓦爾德左派』。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工人反戰大會上出席講演，此次被控叛國，判處三年苦役。從一九二二年起爲共產黨人，兼共產主義的“fortschrittlich”報編輯；一九二四年，因機會主義（尤其他堅持共產黨人可以信仰宗教）被開除出共產國際。現爲第二國際底黨員，修正主義者布蘭丁文集底出版人。——（見正文第六二頁）

〔六三〕波爾迪加（生於一八八九年）有名的意國共產黨人，工程師。一九一〇年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一四年曾出席在安科納所舉行的社會黨大會，堅持社會黨左翼底立場。同年組織鐵路罷工，以抗議當局對羅曼納和馬那哈兩地起義之殘酷鎮壓，因此被解職。帝國主義大戰時反對社會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成立『不參加派』小組織，以後該小組織與格蘭斯派同爲意國共產黨底核心（一九二一年）。一九一七年爲他所辦的意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週刊先鋒和蘇維埃日報編輯。意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爲超左觀點底熱烈擁護者，堅決反對共產黨人之參加資產階級國會。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意國社會黨大會上要求與改良派決裂。大會結局是社會黨分裂，另成立意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執委第三次擴大會議責斥其『抵制觀點』，以後他與共產國際之間，關於統一戰線策略、工人政府等問題又暴露了新的分歧。他企圖在意國共產黨內另成立小組織，但是這一企圖爲共產國際執委和意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所堅決指責。一

九二七年法西斯政府將他逮捕，放逐至馬斯吉克島。——（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四〕即蘇維埃日報，爲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主義者——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在轟阿坡里地方所創辦。主筆是波爾。她加。列寧是指的下列三篇論文：（一）意大利社會黨中共產主義的懷疑派（"Frazione Comunista Astensionist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見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期蘇維埃日報）；

（二）列寧與懷疑派（"Tonin astensionism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三）錯誤（"Il Fals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五〕塞拉底（一八七二——一九二六年）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底有名代表者。意大利社會黨左翼——馬克思主義派底組織者和領袖，從一九一五年起，爲該黨中央機關報"L'Avanti"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國際主義的立場，積極參加成立齊美瓦爾德聯合會的工作。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爲意大利代表團領袖，並加入大會主席團，但半年以後，在意大利社會黨大會上，拒絕服從『莫斯科』條件（要求與改良派——杜拉第、毛底連尼、特列佛斯等毫無保留的決裂）之一。全部中派都是附和塞拉底的。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將意大利社會黨從國際開除出去。格蘭西、鐘拉利、波爾迪加等遂成立意大利共產黨，塞拉底與他的同黨繼續與改良派在一起，但是，在下層工人和法西斯蒂反革命運動壓力之下，他逐漸向左演進，於一九二四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六〕"Comunismo"（共產主義雜誌）每兩星期出版一次，由塞拉底主編。一九一九年創辦。列寧此地是指的下列兩篇論文：（一）社會黨在波洛尼亞所召集的大會（"Il Congresso Socialista di Bologna"，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的第二期共產主義雜誌）；（二）杜拉第與最高限度派（"Filippo Turra-

to il Massimalismo” 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期《共產主義雜誌》。(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七〕民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舊時中央機關報，在萊布齊地方出版，由威廉·李卜克內西主編。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間，恩格斯在民報上做了許多論文，後來把這些論文搜集起來，出了一本小冊子。一九〇六年求知社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俄文出版，名為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的文集（斯米爾諾夫翻譯，薩文校訂）。一九一九年由北方書局出版。列寧所引論的是最近出版的木子。(見正文第六六頁)

〔六八〕瓦爾揚（一八四〇——一九一五年）法國社會主義者。青年時代即參加革命運動，而為勃朗基底熱心擁護者之一。曾任巴黎公社國民教育委員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二國際時代，代表法國，參加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局。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數日後，即叛變革命，而跑到保護祖國方面去了。(見正文第六六頁)

〔六九〕恩得 (Coudré) (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 有名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一八八一年與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一同起草了法國社會黨綱領。積極跟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以及機會主義者、實行派、伯恩施坦派的流派作鬥爭。尤其猛烈反對佐列斯的與資產階級聯盟和妥協的政策。為反對社會黨黨員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米萊蘭主義）而進行的廣泛的革命運動，其功績亦屬於恩得。在法國聯合社會黨（在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國際大會後，恩得派與佐列斯派聯合而組成的）內，恩得派為左翼，但逐漸演進而為「中派」方向。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之初，顯明地背叛自己的革命歷史，屈服於「愛國主義」的情緒，成立了與資產階級的「神聖聯盟」，並加入資產階級的民族國防政府。(見正文第六六頁)

〔七〇〕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維什聶威茨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革命進

程底解釋，這種進程引起了一整串的密切聯系的、彼此追隨的現象。」（見馬恩書信一書。這本書由阿多拉夫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三五七頁）。——（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二〕契爾內舍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二年）『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精巧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底破產』（馬克思）；蘇代俄國革命者底導師。經濟學家，以翻譯米勒經濟學原理聞名，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精神，對該書加以自己的註釋，並著有好多關於社會主義思想通俗化和批評一八六一年農民改革的著作。同時，他又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在現代人雜誌（他是該雜誌領導人之一）上，寫了許多光輝的論文（譬如戈果里時代論，論列辛以及關於普希金的文章）。他認為俄國公社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底可能的萌芽。爲俄國六十年代革命運動底領袖和七十八十年代革命運動鼓勵者之一。一八六二年被捕，一直處在獄中和充軍中，幾乎到一八八九年死爲止，失掉了直接參加社會活動和著作活動的可能。對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三〕列寧顯然是只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證這一段文字的。契爾內舍夫斯基對於克里所著的致北美合衆國總統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信一書之俄文譯本，做了一篇評論，他在評論上說：『歷史的道路，並不是涅瓦大街，這整條大路，有時經過塵土飛揚的田野，有時經過泥濘卑濕的田野，有時經過窪地，有時經過叢密的森林。誰要害怕塵土飛揚，害怕弄髒鞋子，誰就不要從事社會的活動。』（請看契爾內舍夫斯基全集，一九一八年版，第八卷，第三七五至三八頁）。——（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三〕阿克雪里羅德（一八五〇——一九二八年）第二國際底思想家和領導者之一，俄國孟什維克底頭子。於七十

年代參加民粹派運動，依附於暴徒巴庫派。一八八三年與普列漢諾夫等在國外成立勞動解放社。一九〇〇年參加火星報編輯部。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爲少數派頭子之一，從此時起便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底極不可調和的敵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爲取消派頭子，堅持社會民主黨底活動須合法化，並須廢除秘密的黨的組織。仇視十月革命。在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墮落到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基礎和自由主義政策的地步。爲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局委員，贊成第二國際首領們對蘇維埃俄羅斯的仇視態度，主張有武裝干涉蘇聯之必要。——（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四〕查蘇里奇(女)(一八五二——一九一九年) 起初是民粹派，以後成爲社會民主黨人；六十年代末開始革命活動；一八六九年被捕，坐獄兩年，一八七五年被充軍。一八七八年因彼得堡總督格列波夫侮辱政治犯鮑戈留波夫(受笞刑)而憤慨，用手槍擊中格列波夫，格列波夫受重傷。被陪審裁判所釋放。一八八〇年流亡國外，與普列漢諾夫等一同成立勞動解放社，參加該社的文字活動，首次把馬克思的幾部主要著作譯成俄文。後來非法地回到俄國，從一九〇〇年起，與列寧等同編輯火星報。在一九〇三年分裂以後，依附於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與取消派沉溺在一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爲社會沙文主義者。反對十月革命。——（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五〕馬爾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年) 孟什維主義底有名首領和政論家之一。於一八九五年開始革命活動，參加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爲少數派首領，從那時起，便成了孟什維主義底有名的思想家和政論家。一九〇六年被捕並驅逐至國外。俄國第二次國會選舉時，爲孟什維克小組總領導者，堅持與立憲民主黨聯盟。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爲

取消派首領之一，編輯該派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的呼聲。一九一三年末回至俄國，以工人日報編輯的資格，領導社會民主黨右翼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旅居國外，採取『中派』立場，以革命辭句掩護其社會沙文主義。曾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中派）和京塔爾會議。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經過德國回至俄國，成了官方孟什維主義底反對派，支持新生活派，但是沒有脫離孟什維主義。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堅持必須由一切社會主義政黨底代表組織政府，在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以後，仍留下參加大會，但是不久，對於蘇維埃政權就採取了不可調和的仇視的態度。一九二〇年僑居柏林，在該地創辦和編輯孟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社會主義月刊，進行反蘇聯活動。——（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七〕波特列索夫（巴斯達羅威爾）（生於一八六九年）孟什維主義首領之一。一九〇〇年充軍期滿後，流亡國外，與列寧一同參加火星報與曙光報的組織。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依附於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和在反動期間，曾領導孟什維主義中的右派。為取消主義底理論家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為社會愛國主義底最公開的辯護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在進行瘋狂的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的資產階級的今日報上，起有領導的作用。十月革命以後，在國家檔案總處工作。自一九二六起，逃至國外，為孟什維主義的極右翼。積極反對蘇聯，為克倫斯基今日週刊底密切合作者和民主社會主義叢書的編輯。——（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七〕司徒盛威（生於一八七〇年）九十年代社會民主黨員，俄國社會民主黨宣言底起草人；『合法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代表者。在一九〇〇年末到一九〇一年初，曾以『民主反對派』代表的資格，與火星報派合作，但不久就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最後脫離，而投入自由派陣營，成為立憲派『解放社』底首

領。爲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滾到最反動的黑色百人團的國家主義方面。在十月革命後，蘇聯內戰期間，參加反革命的鄂尼金政府；以後又做了白匪烏崗格爾政府底部長；再後，編輯白黨在布拉加出版的俄國思想雜誌，把右派立憲民主黨人和保皇黨都聯合在一起。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編輯白黨在巴黎出版的正統保皇黨的復活日報。（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八〕此地所講的，是指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火星報編輯部在雷漢地方與司徒盧威所代表的「民主反對派」底談判。談判內容，就是磋商司徒盧威及其團體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條件。談判結果，根據司徒盧威所提出並爲火星派大多數反對黨的意見所通過的條件，擬好協定，但在實際上，這種協定，却沒有實行。（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九〕切爾諾夫（生於一八七三年）社會革命黨底思想家和頭子，一直是該黨的中央委員和其中央機關報革命的俄羅斯報編輯，一再出而「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不能應用於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戰爭年間，採取動搖的立場，搖擺於國際主義與國防主義之間；曾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在表決該會議宣言時棄權）。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爲顯明的社會國防派，任臨時政府第一次聯合內閣農業部長，七月事變以後辭職。立憲會議主席。十月革命以後，爲蘇維埃政權底最兇惡的敵人。一九一八年積極參加捷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的叛亂，並領導立憲會議代表在烏發的大會。一九二一年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白黨前立憲會議代表會議，該會議成立一委員會，其委員均爲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克薩斯塔特叛亂時，曾特至勒佛爾贊助。近年來爲所謂「構成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之變種）底代表者之一。（見正文第七二頁）

〔八〇〕那唐松（波布羅夫）（一八五〇——一九一九年）俄國『土地與意志』黨創立人之一，一八七二年充軍至亞爾汗干爾省。一八七八年，因加入『友人會』，又充軍至西伯利亞，直至一八八七年為止。一八九三年，與別

的民粹派一同組織了『民權社會革命黨』，以代議制度代替專制政體為目的。但不久，在一系列的逮捕以後，該黨即行瓦解。自九十年代『社會革命黨』成立起，即加入該黨中央委員會，幾乎從無更替。在反動諸年，曾反對該黨內懺悔和沒落的情緒。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和平主義立場，與契爾洛夫一同參加齊美瓦爾德和昆塔爾會議，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反對社會革命黨中央底妥協政策，與契爾洛夫分手，成為當時跟着布爾什維克黨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首領，一九一八年，堅持十月革命的勝利，責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並且完全與『革命的共產黨人』（他們於一九二〇年加入了俄共）採取一致立場。（見正文第七二頁）

〔八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乃是米爾巴黑（米爾巴黑是德國的外交家，一九一八年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以後，曾被任為駐蘇俄大使；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與德國所締結的和約，在莫斯科作亂，殺死了米爾巴黑——譯者註）被殺以及『社會革命黨』左派暴動（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分子。一九一八年七月末，在薩拉托夫地方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和團體，舉行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召集代表大會並組織新的民粹黨。根據會議底決定，在莫斯科出版勞動意志報，這個報紙開始時是由亞歷山大洛夫、巴捷里、比層科、多布洛霍托夫、科列加葉夫、烏斯亨諾夫主編的（後來這個報紙改為雜誌）。

九月二十五日在勞動意志派底代表大會上奠定左派民粹黨底基礎，該黨自稱為革命共產主義黨。在代

表大會底決議上特別指出該黨底策略立場如下：「新政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政綱說來，依然是民粹黨，同時它採取切實的和誠意的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策略，採取真正蘇維埃政黨底立場。」……它放棄秘密的活動，也不去破壞共產黨員底內外政策，它承認共產黨員是革命主要的領導力量。」「黨承認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階級勝利必要的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創造客觀的先決條件去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黨認為只有蘇維埃政權是第三國際理想和社會主義底唯一的和真正代表，所以它在國際政策底問題上，認為只有不削弱和不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是鞏固這種政權的種種辦法，才是適當的。」

當時那唐松在他致勞動意志報編輯部的信中，也完全同意於代表大會底決議（見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勞動意志報第十四期上）。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該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該黨的政綱。這個政綱雖然企圖放棄「社會革命黨」的傳統見解（例如這個政綱提出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然而它依然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它是民粹派折衷主義底表現。但同時這個政綱特別明顯指出這個政黨底策略基礎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黨底策略基礎。

一九二〇年四月，該黨由於對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組織勞動軍以及勞動軍事化——究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召集該黨底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底右傾分子佔多數，他們企圖使黨走上積極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道路。然而該黨在中央委員會底逼迫之下（中央委員會甚至不惜把大會解散了），依然能夠保持原有的策略立場。自從那個時候起，革命共產主義者開始準備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許可革命共產主義者派兩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通過關於一個國

家內只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革命共產黨就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間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的決議。——（見正文第七三頁）

[八二] 還在大不列顛共產黨未成立好久以前，就產生了『左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儼然成爲一派。這個運動底基本特點，就是劇烈反對國會活動和反對英國工黨。左派中最大的組織——社會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在這個問題上曾採取最不調和的態度。這個政黨的基本核心，就是一九〇三年脫離社會民主黨聯盟（該聯盟在甘特曼底領導之下，降到右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的水平）的左的分子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加入社會工黨的革命工人（因爲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社會工黨底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宣傳曾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工黨參加了關於統一問題的談判，要把凡是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立場的左派組織合併起來成爲統一的共產黨，然而它却提出以不加入工黨作爲統一的不易條件，但是沒有得到不列顛社會黨方面的贊助，因此拒絕繼續談判，同時該黨的要人坡烏里、馬克曼勞斯和別里在這個問題上表示讓步，並繼續參加統一會議，因此被開除出黨。附和左派的第二個組織——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乃是南威爾斯地方積極的煤礦工人的比較不大的一個團體，它帶着工團主義的性質。這個團體極端不主張革命的政黨參加國會，這就使得它與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接近起來，而這個聯合會裏面，多半是婦女，她們在西爾維姬·潘克赫爾斯特底領導之下，採取了極左的反國會的立場，這種立場在實質上只是該聯合會一般不主張政治活動的局部表現。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後來改名爲共產黨）宣佈自己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依然堅持自己政綱上和策略上的觀點，在共產國際裏保持『左的』反對派底地位。在蘇格蘭工人中間，影響比較大的，是工廠工人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組織起來的，它們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那些宣傳階級和平並放棄罷工鬥爭的妥協派的工聯。工廠工人委員會不僅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罷工鬥爭，而且也進行了公開的反戰宣傳。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在武裝干涉和封鎖的時期，工廠工人委員會曾努力進行了鼓動工作，來擁護蘇俄，要求英國政府承認蘇維埃政權並與它恢復商業關係。在對內問題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堅持必須進行羣衆的革命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便建立依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廠工人委員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它們同時進行了激烈鬥爭，以反對工黨在國會內和國會外的活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工廠工人委員會代表曾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工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八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上，列寧在自己的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講演中，曾批評工廠工人委員會反對加入工黨的態度。大不列顛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把參加國會選舉和加入工黨這兩項列入自己的政綱，而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左的團體，却依然沒有加入共產黨。它們依然獨立存在，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里德斯地方舉行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代表大會的時候為止。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大不列顛共產黨，共產黨（以前的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蘇格蘭共產主義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格拉茲鄆地方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共產主義團體合併起來，成爲大不列顛統一的共產黨，它們完全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社會工黨這一次也不同意合併，在該黨的上層分子中間，對於加入工黨的問題，保持激烈反對的態度。該黨地方組織中有很多黨員主張與共產黨員合併。——（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三〕“Workers Drendough”（工人無畏繼）乃是一九一四年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W. S. F.）在倫敦所創辦的機關雜誌。主筆是西爾維姬·潘克赫爾斯特。該雜誌進行了反國會的鼓動，並聲言反對英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組織加入英國工黨。——（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四〕西爾維姬·潘克赫爾斯特（女）（一八八二——一九二八年）英國社會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為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底領導者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曾進行公開的反軍閥主義的宣傳，因此，遭受資產階級政府方面底緝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參加極左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的組織（其會員主要為婦女）這個組織對國會活動抱否定態度，反對加入工黨。該聯合會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無畏繼》週刊，以潘克赫爾斯特為編輯。一九二〇年，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後因拒絕工人無畏繼服從黨的領導，開除黨籍。——（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五〕加拉克爾 蘇格蘭工人，一九〇四——一九一二年為礦工工會執委委員；一九〇六年出席在柏林所召集的國際礦工大會；『左派共產主義者』；一九二〇年主張反對國會主義和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工黨。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堅持其與共產國際基本路線顯然分歧的觀點。其立場（代表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底觀點（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責斥。為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積極參加人之一，英共中央委員。——（見正文第八〇頁）

〔八六〕加拉克爾所著的論文底完全標題是“A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W. Gallacher in the name of the Scottish Workers Committee of Glasgow”（“Worker Drendough” No. 48, 21 February 1920）（加拉克爾用格拉茲郭地方的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致主筆的一封信）（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

一日工人無畏雜誌第四十八期上)。——(見正文第八〇頁)

〔八七〕克路英斯(生於一八六九年) 英國工黨首領之一，國會議員，非熟練工人聯合會主席。一九二二——一九

二二年，爲國會工黨黨團主席。一九二四年，加入英國工人政府，爲不管理部大臣。——(見正文第八一頁)

〔八八〕麥克唐納(一八六六——一九三九年) 英國工黨首領；第二國際首領之一；所謂『構成的社會主義』底理論

家。工黨和工人代議制委員會創立人之一和工黨書記(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二)；從一九〇六年起，爲國會議員；一九二二至一九一四年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採取和平主義立場。一九二二年再度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並爲官方反對派首領。從一九二四年起，經過若干時期的左傾(當時他加入第二半國際)以後，他又回到第二國際的懷抱裏，最後，依附於工黨的右翼(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及其期間，即爲該翼首領)。一九二四年，爲第一次『工人政府』首相兼外相，實行溫和自由主義的政策。從一九二九年六月起，又任第二次『工人政府』首相，這個政府，在本質上，乃是繼續保守黨的反工人的和帝國主義的政策。在一九三一年秋季，該政府倒台以後，轉入保守黨陣營，領導聯合的『國民』內閣(工黨、保守黨、自由黨)，其任務是挽救英國資本主義者。——(見正文第八一頁)

〔八九〕斯騰頓(生於一八六四年) 英國社會主義者；獨立工黨出席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的代表(爲該黨右翼)；下院議員；一九二四年，加入麥克唐納內閣，任財相；一九二七年末，退出獨立工黨。——(見正文第八一頁)

〔九〇〕路易·喬治(生於一八六三年) 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歷任首相職務。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竭力實行民主改良。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估計爲『擁護正義』的『民主戰爭』，在這個時候，他與保守黨聯盟，

實行帝國主義者專政，廢止工人階級底獲得和英國憲法底基本原則，實行義務兵役制，以武力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在三年之內，他用英國公款幫助俄國的白衛軍匪徒，反對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在白衛軍最後失敗以後，他主張與蘇維埃俄羅斯恢復商務關係。——（見正文第八四頁）

〔九一〕曼徹斯特導報 是英國最有勢力的地方報紙之一，在曼徹斯特地方出版，反映自由黨左派底利益。一八二一年創辦。現時主筆是斯科特。

列寧在此地所講到的路易·喬治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在下議院自由黨黨團會議上所作的，並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九六五期曼徹斯特導報上所發表的演說，標題爲：「Mr. Lloyd George's Speech to the Liberal M.P.s. (路易·喬治對國會自由黨黨團所作的演說)」。——（見正文第八四頁）

〔九二〕阿斯克維特（一八五二——一九二八年）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一九〇八年爲首相；一九一五年爲聯合內閣（有社會主義者亨德孫等參加）首領；一九一六年讓位於路易·喬治。當路易·喬治與保守黨聯合時，另成立「獨立自由黨」左翼，脫離自由黨，出而反對路易·喬治底政策。在路易·喬治內閣倒台後，兩個自由黨合併，但各派間之鬥爭仍繼續進行。在一九二四年國會選舉中，又遭受失敗。一九二五年得貴族稱銜，爲上院議員。鮮明的反虛分子之一。——（見正文第八四頁）

〔九三〕密雷斯（生於一八六八年）英國自由黨黨員。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爲國會議員。——（見正文第八六頁）

〔九四〕應克平（生於一八八四年）英國工人運動底著名活動者之一；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爲不列顛社會黨機關報號名編輯。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爲該黨總書記。一九二二年因爲在英國傳播共產主義刊物而入獄。——（見正文第八六頁）

〔九五〕邱吉爾（生於一八七四年）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任海軍大臣；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任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貫反蘇反共。——（見正文第八八頁）

〔九六〕科爾尼洛夫（一八七〇——一九一八年）帝俄軍官，蘇聯內戰時期反革命頭子之一。曾參加日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五年，指揮在加里西亞的部隊，退却時，被奧軍俘虜，以後偷跑。一九一七年四月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曾下令調動炮兵，鎮壓工人遊行示威，後根據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要求，被迫去職。七月事變以後，被委為最高總司令，迫使臨時政府恢復前線死刑，差不多將選舉的士兵委員會之權利取消，採取殘酷的辦法以對付軍隊中的布爾什維克情緒。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反革命的軍人支持和同情之下，企圖建立軍事獨裁，以此目的，向彼得格勒進軍，結果完全失敗。十月革命以後，由貝霍夫監獄逃至頓河，在該處與反革命的阿列克謝耶夫一同領導反革命的白衛軍，反對蘇維埃政權，但被紅軍所擊敗。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葉卡切林諾達爾之戰役中被擊斃。——（見正文第一〇〇頁）

〔九七〕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五年）德國政治活動者，保守派；帝國主義大騷前，因係農業信用機關底組織者和領導者，與東普魯士大地產者有密切關係。在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前，為國會議員和『祖國黨』創立人之一。一九二〇年為反革命的國家政變——所謂『卡普首動』底主要領導者，當時，他成為政府的首領，但僅維持幾天而已。卡普政府為德國工人總罷工所推翻，此後，他逃至瑞典，在流亡中死掉。——（見正文第一〇〇頁）

〔九八〕德來福斯（一八五九——一九二七年）法國參謀總部一位軍官，猶太人，一八九四年因被誣告叛國，被軍事法庭判處終身單獨監禁。他是在保皇派、教會派、反猶太主義者所把持的法國參謀部之壓力下被判刑的，這

些人的目的是把出賣軍事秘密給德國的真正罪犯掩蔽起來（真正罪犯都是法軍當中最反動的軍官），而想藉此給共和政體以精神上的打擊，因為共和政體是允許猶太人在法軍中任官佐職務之權的。一八九七年秋季，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最進步的分子發動重審『德來福斯案件』的運動，這個時候，關於德來福斯的問題，立即獲得了顯明的政治性質。在擁護和反對重審的口號之下所進行的鬥爭，實質上是共和派與保皇派的鬥爭，而保皇派屢謀舉行軍事政變。這次審判，引起了全國的巨大騷動——羣衆的示威遊行、報紙上的激烈爭論，在輿論壓力之下，德來福斯終於被赦免了。——（見正文第一〇五頁）

〔九九〕漢德曼（一八四五——一九四一年）有名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律師、新聞記者。私人與馬、恩相識。一八八三年成立『社會民主聯盟』，以後改名爲『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一年又改名爲『不列顛社會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爲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帝國主義大戰前轉向擁護帝國主義；在大戰期間成了極端社會沙文主義者。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不列顛社會黨撒爾福特大會上（大多數反對戰爭），與其信徒一同被開除黨籍。之後，成立民族社會黨，一九二一年又改取老名稱社會民主聯盟。反對蘇維埃制度，主張干涉和封鎖蘇聯。漢德曼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他的評論，可看列寧漢德曼論馬克思一文（全集第十五卷二六七——二七〇頁）。——（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一〇〇〕抵制派乃是意大利社會黨底左派小組織，它在波爾迪加底領導之下，努力與改良派作鬥爭，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後來到一九二一年，在里沃爾地方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懷疑派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成爲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的基本核心。——（見正文第一一五頁）

〔一〇一〕留特維茨（生於一八五九年）德國軍人，反動派，一九一九年曾積極參加對斯巴達克黨起義的鎮壓。爲一

九二〇年卡普「盲動」底組織者之一，當時，德國政權有幾天曾落在以卡普爲首的反革命政府手中。——（見正文第一一七頁）

[102]考茨基所著的論文“Reichslandes situation”（央勝資的關頭），講到魯爾區域中鎮壓工人武裝起義的事情。考茨基寫道：『魯爾區域中目前的波動，只是卡普和留特維茨底國家政變所引起來的反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改變，魯爾區的工人就不致於實行武裝起義，那裏直到現在都會極其平靜。政府避開參加改變的人而逃到什徒加特，以避免流血慘劇，政府並不以此事爲丟臉。政府自從得到勝利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懲罰參加改變的任何人。政府是否能夠用自己的仁慈態度（雖然稍微有一點仁慈態度也好）去對待更加勤勉的工人（整個德國的生命有賴於這些工人們底手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政府在這一方面不採取任何辦法，那時德國人民就要受苦，那時德國人民就要過黑暗的日子。』（見“Reichsland”報第十七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見正文第一一九頁）

[103]克里斯平底論文“Der Politischen Situation”（論政局）登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二二期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底自由報上（“Freiheit”）。——（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104]列寧此地所引證的，是E.O.著的論文“Interview with Thratt”（E.O.著·與屠拉梯的談話），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第二二九五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The Manchester Guardian”）。——（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105]特別維斯 意大利社會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其中央機關報“Avanti”底編輯，直到一九二二年爲止。國會議員，意大利改良主義底理論家，屠拉梯底信徒。在帝國主義戰爭諸年間爲和平主義者。——（見正文

文(二二頁)

(二〇六) 莫其良尼 意大利老社會主義者之一，國會議員，意大利社會黨改良派有名活動者。曾出席齊美瓦爾德和昆塔爾會議。——(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二〇七) 杜鄂尼 意大利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就其觀點說，依附於屠拉梯派，主張與資產階級合作，並主張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III}

著 林 大 斯

礎 基 義 主 寧 列 論

出版者的話

論列寧主義基礎是依照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所出中文本列寧主義問題一書譯文翻印的。後者是按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十一版)譯出的。其中引證下面所註明的頁碼，是指各該著作俄文版本頁碼而言的。

解放社編輯部

目 錄

| | |
|-------------|----|
| 論列寧主義基礎 | 七 |
|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 一〇 |
| 二 方法 | 一六 |
| 三 理論 | 二〇 |
| 四 無產階級專政 | 二四 |
| 五 農民問題 | 二六 |
| 六 民族問題 | 二八 |
| 七 戰略與策略 | 三〇 |
| 八 黨 | 三二 |

九 工作作風……

論列寧主義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獻給

紀念列寧時應徵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說明這個題目，就得著作一整本書，甚至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對於列寧主義的詳盡說明，而至多也只能是對於列寧主義基礎的一個簡要敘述。雖然如此，但我認為作這樣一個敘述，藉以指出幾個為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底基礎。列寧的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

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基礎來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因而自然是與列寧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只是要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這個定義是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它絕對不能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特殊環境中，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現象了；就會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並不單只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帶有片面性弊病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底革命原素復活起來，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割裂成革命部分與溫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意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這

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分真理。這一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在訓練無產者去幹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時期活動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鬥生列寧，則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了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活動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說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

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長成和強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為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记：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所以與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也就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主要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是在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長大形成的。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有革命開始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與這種莫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職工會

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等，已經完全不够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既得贖物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原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資本主義陣地整個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定要實現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智識界的產生，民族意

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也就是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為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俄國而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

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祇有俄國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俄國資本底莫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盧布來繳付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最重要角色呢？

正因爲如此，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終於結合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能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會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人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真想不到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與反帝國主義革命，便與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且一定要轉變爲反帝國主義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興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因爲如此，所以俄國當時定要成爲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爲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爲俄國當時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爲當時僅在俄國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巧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台上，揭破帝國主義底癱疽，證明資本主義必遭破產，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而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

爲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爲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

正因爲如此，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孕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繫注於德國，因爲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爲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是移往德國了。

顯然，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也就是恰巧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大概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

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指明這個革命定會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所以不是偶然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就在他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是一定要移到俄國來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是綽綽有餘地證實了列寧這個預言的。

既然這樣，那末作過這樣革命和具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又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即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於遷就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是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是『照常』發展着；當時用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能達到『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

肥胖，根本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生動的羣衆革命鬥爭脫離了關係，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記起馬克思底理論，但目的是要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通過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但目的是要用一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够而無能爲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

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那就根本不能去與資本主義交戰。不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而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把第二國際底骯髒馬廐拿來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的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底革命鬥爭火焰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焰中檢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即是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與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為祇有這樣，才能造成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行爲，根據它們的行動來檢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訓練和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了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便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相當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使無產階級雖佔人口少數，但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那末，為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解決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

紀五十年代就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了麼？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是比——譬如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够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便不能保持政權，於是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爲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徹底百倍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了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請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有危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

所以它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即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試問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羣衆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企圖過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試問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了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革命理論並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真

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會最終形成的』（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為『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為理論是應當由實踐材料來考驗的。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各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這一口號底歷史，就足以瞭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皇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他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堂皇示威，當時第二國際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要遇到慘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為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祇要把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底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底方法是何等偉大了。這裏我不能不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那裏無情地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不願按實際行動去估計黨，而企圖按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的那種機會主義態度。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爲：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那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還不說第二國際各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還不說它們那種極力掩蔽自身錯誤，抹煞迫切困難問題，用一些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用一些消磨生動思想，使黨難於根據自身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的虛偽話頭來遮蓋自身缺點的態度，它們這種態度是受到了列寧譏笑和痛斥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中論到無產階級黨底自我批評問題時寫道：

『政黨對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人說：揭露自身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有危險的，因爲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

(IV)

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爲：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們黨還幼弱而不甚大時，就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說道：

『他們（指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而言。——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起來；

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見

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列寧底方法就是澈頭澈尾都爲這種批評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把馬克思底方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是把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恢復了，不僅是把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恢復了，而且是把這個方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了。

三 理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要點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為事實，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據說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點的。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會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愛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對列寧及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完全與列寧主義底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底偉大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

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瞭解四周事變底內在聯繫；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使實踐不僅能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下面這個著名原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瞭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擔負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他還在一九〇二年預察到我們黨所擔負的這種特殊作用時，就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更具有特別巨大的力量和特別重大的意義。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果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個極重大的任務，而擔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傑作裏面，爲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雖很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但他自己却甚至沒有敢於認真着手來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即工人階級黨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線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唯一按資本主義『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線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體系。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在工人階級前面行進，反對黨把羣衆提高到覺悟底水準上，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覺悟成分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祇聽從自發運動，跟着這運動後面做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

悟成分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體系，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而在實際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成立獨立工人政黨之必要，反對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根本要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一經指出以後，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以說明世界爲限，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

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各黨曾發表過恐嚇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裏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準』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準』這樣的決定因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就與之作過鬥爭的那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的變形表現罷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就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一種主要業務；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莫大勢力，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都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新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更加增長，把羣衆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唯一救星（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加緊向殖民地和依賴國輸出資本；擴展『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一直囊括全地球；資本主義變成爲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鏈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和依賴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個是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依賴國（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戰線上的反帝國主義義憤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那已被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一個世界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把以上一切結論綜合成爲一個總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性質、範圍和深度問題的觀察法，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IV]

就隨着改變了。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鏈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各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整個統一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那末這體系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的情形，就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為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

命，因為各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整個鏈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够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鏈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較多的地方。

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鏈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鏈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鏈條就在這裏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爲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

級爲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爲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爲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鏈條在俄國却原來是薄弱些。

在最近將來，這鏈條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鏈條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而奮勇的革命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顯然偉大、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爲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所共恨的外國帝國主義。

這鏈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例如在印度發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

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鏈條被衝破，通常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發生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失去了第二國際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懼怕瘟疫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予給它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向來都說（而且現在還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或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間斷時期，在這個間斷時期中，已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力量和準備反資本主義的『決鬥』。這個間斷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祇是，而且不能不祇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底掩蓋物和粉飾品。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孕妊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

帝國主義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環境內，當『繁榮的』資本主義已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而革命運動正在全世界各國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反動勢力，包括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內，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由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餘孽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這個原理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時，就在他所著的兩個策略這本書裏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鏈條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見

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比在兩個策略中更明顯地表現為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行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不是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稱為『「秩序」組織』，而是稱為『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他在這幾篇論文裏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向黨提出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為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細微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個執政當局』；他在這幾篇文章裏發揮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發生的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够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焰將延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

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就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而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羅斯從沙皇制度下，從地主土地權力下解放出來的局面，當然不是爲了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了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著名言論，他在這裏援引了我們剛才從兩個策略中引證過的那一段說明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如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人工造成的高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够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進行鬥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論呢？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力，徹底利用農民底革命毅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底革命毅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殊不知他們這樣作法，就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除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肯顧及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殊不知他們用這樣的政策，祇能阻止把農民爭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是不停頓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爲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而是因爲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一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自己的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真正的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而使它成爲自己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其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列舉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怎樣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吧：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至多也只實行上述要求，便立刻結束革命的，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爲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都被撤銷統治地位，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發展到使各國無產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以及至少是

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裏的時候爲止。」

換句話說：

(1)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與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論，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也就嘲笑了我國『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爲『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俄國『不斷論者』底理論出現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寫

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布爾什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見同卷所載列寧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一文）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必須記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穉病一書裏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够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够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當然不是。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有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獲得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獲得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

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够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當然不是。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爲不可戰勝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會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1）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圖謀恢復資本政權的所有一切行動；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爲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是自有根據來圖謀復辟的，因爲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

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何在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是『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祕訣」（習俗、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是『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

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爲『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和第一八九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同上，第一七

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應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與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

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够：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鍊成爲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個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
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層。

馬克思向工人說過：

『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是爲了把你們自己改變成爲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見馬恩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將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爲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的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頁和第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

〔IV〕

政並不是在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平常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的辦法。各國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竟用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抹煞了專政概念，通常都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和亨德孫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更換內閣的辦法，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由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同之處的。麥克唐納輩和謝德曼輩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能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癱疽的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羣衆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底徵候；雖然如此，但這種政府仍舊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

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為倚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按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絲毫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倚據，並得到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由此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供一切人享受，既供富人享受，又供貧民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見列寧全集，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及『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是要用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一件無疑的事實，即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不能有平等的事實。『純粹』民主論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底癱疽，掩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羣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是沒有得到，而且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為享有『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羣衆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不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甚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德輩和司丁尼斯輩、洛克費爾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為目標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為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決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

果，而祇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提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致額格爾曼的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為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為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會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為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會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充分發展的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尚未出現以前，情形會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此時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此時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此時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了，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

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已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不利』的關係，也許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但對於最

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至於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不能實現這個工作，那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比舊式組織優越的地方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能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的工人而無一例外。

就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能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民，兵士和水兵，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先鋒隊方面，即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及羣衆武裝起義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够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莫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羣衆底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組織能盡量便利羣衆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成爲無產階級這個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恰巧從前受資本家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羣衆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却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恰巧那些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也被人用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羣衆，現在却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

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三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而在原則上與那種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國會制的舊式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自蘇維埃政權出現時起，「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當還有階級存在時所有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羣衆化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以這個結合與合作爲倚據，所以它是居民多數統治少數的政權，是這個多數底國家，是這個多數專政底表現。

②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它既然是打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族勞動羣衆底合作爲倚據，所以它使這些羣衆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便使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都教導我們說：祇有無產階級能夠統一並領導被剝削勞動居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用生產單位的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能够使軍隊擺脫其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的工具。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能够真正一下子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法官的機關』（同上）。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國家形式能吸引被剝削勞動羣衆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管理，所以只有它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底基本現象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底範圍中也就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五 農民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會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無疑具有的那種嚴重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同時，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因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因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發生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政權並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爲在西方有特殊發展

條件，而首先是因爲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爲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他們文雅風度底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底表現。其實，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爲農民生活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能力，是否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他們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多數農民具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和剝削而進行的

鬥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而是說要援助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後備力量 and 同盟者的那些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到包括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爲止。這一時期的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的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爲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向之求得幫助的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底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爲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就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

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當時在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那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裏，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那時人數尚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到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是使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加強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與此完全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並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並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了基本的後備力量，即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了首位，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爲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

從而而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的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人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的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在同樣的大工廠裏作工的人，却只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裏最大的力量。

（2）企業裏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衛隊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便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澈底革命的力量。

（3）政治上萎靡不振的俄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效忠於沙皇政府的直接反革命勢力，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底懷抱，

而且因為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 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個情況便把農民拋入了革命底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便把工農鬥爭匯合為統一的革命洪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為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衝擊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應向那裏走呢？農民應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那毀滅一切，破壞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麼？然而它是敵人，——這是已由前後四屆杜馬底多年經驗所證明了的。向社會革命黨人麼？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幾乎是農民的政綱，可是，既然社會革命黨人想祇倚靠農民，既然他們在敵人勢力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軟弱無力，試問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個新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列去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

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經表明出自己的強大能力，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另外一種擔得起這件事情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是無從找得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農民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終於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以上便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那些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起，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止。這個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從羣衆底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可以大胆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的革命力量，是唯一能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底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奪農民多數的歷史。決定這一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

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從前，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所發出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政權，因爲當時他們，而且祇有他們，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爲爭得和平，爲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前面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祇是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正確，催促革命前進，並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兵士羣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孤立，已成爲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以上便是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些情況。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從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麼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爲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

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基礎。

但懷疑派是弄錯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

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會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爲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是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爲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了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硬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爲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

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

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在俄國，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實行之，——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

(IV)

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另一條道路，即使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發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以農業各部門（如蘇、馬鈴薯、油類等等）爲標準的新的巨大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蘇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蘇業民生產協作社。這個蘇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蘇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我在這裏說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制中的家庭工業，例如紡織業部門的家庭工業體系相

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的家庭生產體系下，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其他農業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認爲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新的民衆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時說道：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而只是幫助有真正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是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保證過渡於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那個基礎。

六 民族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所關懷其命運的一些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若干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是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了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而打破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此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自決原則曲解，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把民

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操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便使民族自決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兼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為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完全排除了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羣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種工具的，——而變成了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沙文主義鬼蜮伎倆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予羣衆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黨覺得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了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鬥爭，那末『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

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爲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生存而鬥爭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儘可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反帝革命鬥爭，而能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又已經證實：民族問題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能力，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是不是可以把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歐洲革命運

動死敵的沙皇制度。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下，部分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從革命運動底利益觀點上來具體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分子參加這運動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為前提。阿富汗國王為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個鬥爭能削弱、瓦解和掘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阿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

恩·亨德孫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爲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政府底閣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贊成』社會主義的。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違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即毫無疑義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爲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爲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範圍爲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

(6)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革命戰線，那末發展國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不能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來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馬

(IV)

克思)；

(8)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便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勝利物質基礎的統一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基礎上產生的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個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而產生的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的趨向。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第二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走向於轉變到社會

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自願聯合的建立，祇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祇有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堅強果決而毫不間斷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國）『社會主義者』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們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精神，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

〔IV〕

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應該首先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鏈，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不然，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那個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即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孤獨思想，他們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國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便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間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說明共產主義運動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種雙方面工作的言論吧：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裏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裏，在兼併的民族裏和被兼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爲一的目的，顯然是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可以說是異道同歸。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即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溶合（用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溶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爲帝國主義者，視之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爲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爲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也許以爲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

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七 戰略與策略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階段與戰略，（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領導，（五）策略領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當作階級鬥爭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是不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始終處於在野黨地位的那種條件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瞭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

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當時，祇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滔天的罪惡，並不在於它實行了利用國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是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爲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各黨就退避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成爲直接的實踐問題時，當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爲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都已經完全確切表現出來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了的那些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的。但列寧並沒有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爲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爲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體系，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及幼稚

病等書，毫無疑義都是加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去的最寶貴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

第一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

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貧農。鄰國無產階級是意料中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這個民主派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各黨孤立，這些黨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及依賴國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係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為實現這個路線而鬥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戰略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澈底完成反沙皇制度鬥爭或反資產階級鬥爭，而策略底目標却沒有這樣重大，因為策略並不是要爭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爭得某些戰役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那個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中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在這個時期內却變更過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底策略是進攻的，因為當時有着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和革命戰鬥口號，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較為公開的工人黨，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為當時是革命運動低落，是有着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杜馬外的公開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是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是應祕密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 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過幾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係於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關係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革命某一階段上可以依革命來潮或退潮，依高漲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成果，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暫息時間起見，是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成果的；

間·接·的：（1）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去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各個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機動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顯，所以必須指出：有時候，它們對於革命進程是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的衝突，其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毫無疑義是起了相當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當時各國帝國主義者忙於他們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可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為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線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當時後備力量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轉述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把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這個條件說明如下：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二。要估計到危機已達到頂點，先鋒隊已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的情形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那時，決戰時機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就是說，如果「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如果「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露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

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表現着動搖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要勇往直前地實行既定的方針，不顧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阻難和障礙，其所以必須如此作，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熟悉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黨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採取的錯誤步驟，——黨當時決定參加預備國會，——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是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企圖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黨參加這種機關，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

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使被糾正了的。

第四。當敵人力量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撥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時，當在那時力量對比下祇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並保存其後備力量時，就必須隨機應變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使黨有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為自己保留着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

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鴿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一種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是戰略領導底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取得在一定勢力對比下為準備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最高限度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為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羣衆引到革命戰線上，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是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免。問題是要使羣衆，使千百萬羣衆瞭解這種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是要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免，並提出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正確的那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揭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了。

召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使先鋒隊脫離自己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跟着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它舉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為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當時羣衆還沒能根據本身經驗察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與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政

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耐心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羣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列寧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時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昭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醜態，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的專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

[IV]

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握住整個鏈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自上至下地腐蝕着黨；當時思想上的分離是黨內生活底特徵，——在這時期，整個鏈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祇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意見一致的中堅，它能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組成爲真正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成了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

變過程鏈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有生產品而沒有銷路，便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藉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以後，只有把握住商業以後，只有把握住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目前：這樣的環節就是要由國家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的調節（指導），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便是在歷史事變鏈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爲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這種見解完全不對。布爾什

維克十分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〇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罷了。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必然要變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

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

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自然要變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鞏固革命的手段，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持點。

革命家接受改良，是要利用它爲連環鉤來把合法的工作與不合法的工作聯繫起來，是要利用它爲掩飾物來加強不合法的工作，這種工作底目標就是要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妥協辦法的實質。

反之，改良派接受改良，却是爲要拒絕任何不合法的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作革命的事業，而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金子底作用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那條『改良主義道路』，採取迂迴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息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道

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即在這種情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喘息時間，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在這種條件下，改良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发展規模已很廣大，而展開了很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而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底來源却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而為無產階級所支配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只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即令只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

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與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的：在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已極度緊張地運用過而弄得顯然不够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它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時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至八五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

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改造全部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提上後備力量，要與隣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自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了。擔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為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就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

橫在前途中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有一切優秀分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爲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

級利益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能夠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分，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如果黨與非黨羣衆沒有聯

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來，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羣衆送進黨來的，這些非黨羣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是把我們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黨，看作是親近親切的黨，他們認為黨之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爲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

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見列寧全集，第六卷，

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成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

『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

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破壞組織的思想。」（同上，第二二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統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會，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分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爲『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評論這些不穩定分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

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要裝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倚賴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倚賴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倚賴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補選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第一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爲順利進行反資本門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塞里羅得、馮爾托夫、頗特列索夫等人而言，他們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

決議，而預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障地，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擔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是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有必要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有充分的威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經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為服務機關，變成使黨與本階級

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繁殖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脫黨出版家，近視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

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年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

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

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

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末黨內鐵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爲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寧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爲要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

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爲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內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內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

這能比
法高階地。

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僧、智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豢養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僧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來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分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陷於癱瘓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

主義者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輩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是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

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爲甚至有益的
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個政權還沒有穩固，因爲逼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滅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九 工作作風

這裏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裏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的一種很特殊的要素，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黨工作者和國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是什麼呢？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第二，就是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老舊傳統態度

的一種消毒劑。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興奮的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沒有它，便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人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在實踐中就會大有可能墮落為空洞的『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是不可勝數的。誰不知道有一種『革命的』臆造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症，其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在他那篇標題為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過一些患有這種病症的『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果竟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但它正確地抓住了這種病症，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病症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臆造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病症，稱之為『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用日常平凡的事情來與這種『革命的』空砲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義，是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絕對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頁和第三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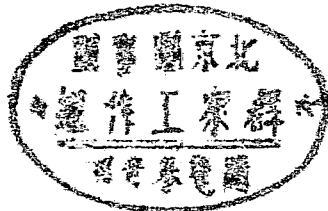
反之，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却是能消除『革命』馬尼洛夫精神和虛幻臆造主義的一種消毒劑。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有什麼障礙，而以其切實堅忍精神掃除一切和任何障礙，它對於一件事情只要已經開始來做，就一定要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如果沒有這個力量，那末認真的建設工作是無法作成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結合起來，那它就大有可能墮落為狹隘的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病症，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墮落下去，離開革命事業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為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結果是誤入迷途，離開了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酷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病症。列寧痛斥了這種病症，稱之爲『近視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須具有的

革命前途來與這種病症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臆造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與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可得到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IV]



189

·讀 必 郵 幹·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
國 家 與 革 命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論 列 寧 主 義 基 礎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出 版 ·

1—35,000(P)

